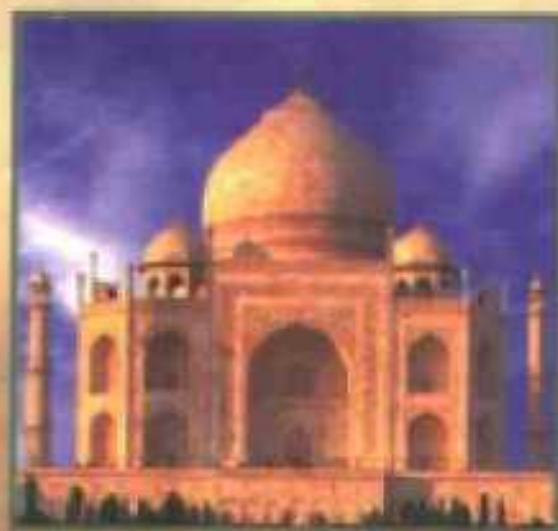


周秦汉唐研究书系

唐代丝绸之路 与 中亚历史地理研究

许序雅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L32

57.6

浙江省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

唐代丝绸之路 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

许序雅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许序雅著.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0. 5

ISBN 7-5604-1470-2

I. 唐… II. 许… III. ①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唐代②历史地理—研究—中亚 IV. K928.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5805 号

唐代丝绸之路与中亚历史地理研究

许序雅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开本 8.375 印张 210 千字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604-1470-2/K·197 定价: 16.00 元

2001. 3. 26

王府井书店

No. 0199093

提 要

自唐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到代宗大历七年（772年），中亚诸胡与唐朝发生了长达149年的直接交往，丝绸之路成为双方政治，经济和军事交往的纽带。在中国历史上，唐朝政治势力第一次越过葱岭，在河中、吐火罗等地设置了羁縻州府，中亚诸胡与唐朝建立起近百年的政治附属关系。唐朝与中亚交往的历史，构成了唐代内容丰富的历史篇章。

有关7~8世纪中亚诸胡的历史变迁，中亚诸胡与唐朝的交往之记载，主要保存在《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和《册府元龟》等唐代文献中。这些文献还反映了唐人对中亚诸胡的认识。本书即以这四篇文献为中心，兼及唐代其它相关文献，围绕“唐朝与中亚”这个重大课题，探讨唐代丝绸之路的变化，中亚诸城的方位和道里，7~8世纪中亚诸胡的政治发展，中亚诸胡与唐朝政治关系的演变，中亚诸胡、唐朝和大食之间的政治关系，唐朝在中亚诸胡抗击大食斗争中的作用，唐人对中亚诸胡的了解程度，汉籍记述的可信度。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力求以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中亚考古资料与唐代文献记载相参对，并对前人研究成果加以辨析。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1998年11月通过答辩）基础上修改而成，被列为浙江省社会科学“九五”规划课题。本书是对唐代文

献相关记载的系统研究，这在学术界是第一次。全书 17 万字，分为四章，每章论题各有侧重，各以一篇唐代文献（《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和《册府元龟》）为中心。第一章 7 世纪的中西交通；第二章 8~10 世纪中西陆路交通；第三章《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史地考辨；第四章中亚与唐朝的交往。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作者发现唐人所记千泉、白水城、恭御城、笈赤建城、米国都城的方位有疑问，不能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相勘合；唐人把曹国（西曹）与东曹（苏对沙那）相混淆；唐人对中亚伊斯兰化进程并不了解；唐人所记中亚诸城道里有许多讹误；8 世纪后期开始，随着西域东部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丝绸之路（中国段）走向发生变化，唐人西去东归之路与中亚诸胡东来之路有所不同；中亚诸胡与唐朝关系有亲疏之分；中亚诸胡的入唐贡献，并不是“以献为名”的商业活动，而主要是政治性的活动，这种朝贡活动反映了中亚诸胡与唐朝政治关系的演变；在中亚地区，唐朝确有支持中亚诸胡抗击大食的战略，唐朝与大食的关系尚不能定性为同盟友好关系。作者提出的上述观点，对以往中外学者（如法国学者沙畹，北京大学王小甫）的许多论点有很大的修正。本书的出版，对于唐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唐代文献研究、中亚学研究都将是很大的推进。

Studies on Tang's Silk Road and Central Asia's History and Geography

Abstract

From 624 AD up to 727 AD,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 had a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Tang Dynasty for as long as 149 years. The Silk Road became a link for the two sides to communicate in political, economical and military affai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Tang's political power, for the first time, spread farther than Chong—Ling, setting up an indirect dominating system in such lands as Transoxania and Tokharestan. It created a kind of political dependency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Tang.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ang and Central Asia constitutes a rich history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 in the 7th—8th centuries and their communication with Tang are mainly kept in *Da Tang Xi Yu Ji* (Records of the Western Lands of the Great Tang Period) (《大唐西域记》), *Xin Tang Shu · Di Li Zhi* (《新唐书·地理志》), *Xin Tang Shu · Xi Yu Zhuan* (《新唐书·西域传》), *Ce Fu Yuan Gui* (《册府元龟》) and other Tang's lit-

erature, which also reflected Tang people's knowledge about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 This book, having these four books as its leading reference, centralizes on the important topic—"the Tang Dynasty with Central Asia", which probes the changes in the Silk Road during Tang, the location of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 and their construction sites, the political growth of Central Asia in 7th—8th centuries,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Tang, the poli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tates in Central Asia, Tang and Da shi (Arab), the Tang playing role in the struggle of Central Asia against Arab, how far Tang people knew about Central Asia, and how much belief could be borne in the Tang literature. As far as the research method is concerned, this article tries to verify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Islamic geography, the archaeological achievements and the Tang literature. It also attempts an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work done by other scholars.

This article consists of four chapters. Each chapter has its own focus, concerning one Tang's book. Through an all-round research into the records in the Tang literature, the author finds out that the recorded locations of Qianquan(千泉)、Baishui city(白水城)、Gong Yu city(恭御城)、Nuchijian city(赤建城) and Miguo city(米国都城) couldn't be in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records of Islamic literature(Abarjaj, Isfijab, Nujakath, Māymurgh). Tang's people confused Cao(西曹, West Cao) with East Cao(东曹). They didn't quite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Islamic of Central Asia. There are a lot of errors made in Tang's records of the construction sites of the states in Central Asia. Since the late 8th century, with the change of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in the east of Western Lands, the trend of the Silk Road in Chinese territory altered. The Chinese and

Central Asian didn't follow exactly the same route.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 did not bear a same kind of close relation with Tang. The presentation of tribute of Central Asia paid to Tang is in a political activity rather than a commercial one, reflecting the history of the change in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Asia and Tang. In Central Asia, Tang did back the states of Central Asia in their struggle against Arab.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and Arab can't be defined as a good allied one.



许序雅,男,1958年2月出生于浙江省武义县。1979年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1983年考入贵州师大历史系,从项英杰师学习中亚史,获硕士学位;1995年考入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历史系,从黄时鉴师,攻读中西关系史博士学位。1985、1999年两次赴丝绸之路考察。发表论文30余篇,专著1部,译著3部(与人合作)。

2013/17

目 录

导 言	(1)
一、研究现状	(1)
二、问题的提出	(11)
三、研究方法及基本概念	(14)
四、各章研究的基本问题及贡献	(18)
 第一章 7 世纪的中西交通	
——《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行程辨析	(25)
一、玄奘所记路线和里程	(25)
二、诸城方位	(29)
1. 关于碎叶	(29)
2. 关于千泉	(31)
3. 关于恭御城	(33)
4. 关于斂赤建城	(35)
三、玄奘行程考辨	(38)
 第二章 8~10 世纪中西陆路交通	
——《新唐书·地理志》考辨	(53)
一、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之记述	(53)
二、贾耽《皇华四达记》之记述	(58)

三、其它汉籍所记西行道路	(63)
第三章 《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史地考辨	(77)
一、康国	(77)
1. 关于《新唐书·康国传》反映的年代及 康国的宗教信仰	(78)
2. 关于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	(80)
3. 关于康国至周邻国家道里	(81)
二、安国	(83)
1. 安国的历史变迁	(83)
2. 关于安国诸王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86)
3. 关于安国的道里	(88)
三、东安	(89)
四、东曹、西曹、中曹	(92)
1. 关于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93)
2. 关于曹、东曹、西曹的区别	(95)
3. 关于东曹、西曹的道里	(98)
五、石国	(99)
1. 几个名称的考释	(100)
2. 关于大宛都督府设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101)
3. 关于石国诸王	(104)
4. 关于石国道里、四至	(109)
六、米国	(112)
1. 关于米国、东米国的方位	(112)
2. 米国的政治状况	(116)
七、何国	(120)
八、史国	(123)
九、火寻	(127)
十、宁远	(128)

1. 关于拔汗那、呼冈城、西鞬城、渴塞城、俱战提	(128)
2. 拔汗那的政治状况	(133)
3. 拔汗那与唐朝的交往	(135)
4. 拔汗那的四至	(139)
十一、关于汉籍记述的史源	(142)
第四章 中亚与唐朝的交往	
——以《册府元龟》为中心	(169)
一、中亚诸胡朝贡与唐朝册封之统计	(169)
二、朝贡频率与西域的政治形势	(190)
三、朝贡、贡使、贡品及其政治、经济意义	(208)
1. 关于朝贡	(208)
2. 关于中亚诸胡的遣使	(211)
3. 关于贡品	(215)
主要参考文献	(239)
后记	(251)

导 言

1985年8月，我徘徊在丝绸之路（中国境内）考察之行的终点伊犁河畔，举目西望，试图追溯玄奘的足迹，回到唐代的中亚……

一、研究现状

唐代，在以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为中心的中亚地区，主要生栖着被中国史籍记之为“昭武九姓胡”的康、安等国和拔汗那。从武德七年（624）到大历七年（772），中亚诸国与唐朝发生了长达149年的交往。在吐蕃、东西突厥、突骑施前后雄起，大食不断东扩，东西文明不断交流的历史大背景中，在传统的丝绸之路上，金戈铁马之声不绝于耳，中亚诸胡使者、商人以及唐朝使者、僧人相继于道，成为中亚与唐朝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唐代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岁月里，唐朝政治势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越过葱岭，在河中、吐火罗等地设置了羁縻州府；中亚诸胡与唐朝确立起政治附属关系，并企图依赖唐朝抗击大食；西域文明对唐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乃至社会生活发生了

深刻的影响。

面对内容如此丰富的、色彩如此斑斓的历史篇章，众多学者不禁深深为之吸引，写出了许多与“唐朝与中亚”课题相关的传世之作。学术界关于“唐朝与中亚”和中亚学方面研究成果的积累，已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可贵的基础。这些成果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1. 有关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方面的成果

法国学者沙畹(E.Chavannes)《西突厥史料》(1903)，系统整理、翻译了两《唐书》及《册府元龟》有关西突厥的史料，并对上述汉籍中所涉及的中亚地名、相关史实做了简单考释。本书高明之处在于，作者注意以伊斯兰舆地文献来考辨汉籍所记。由于本书论述重点是西突厥史以及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所以作者没有利用中外文献来系统研究“唐朝与中亚”这一课题。作者尽管摘录了《册府元龟》有关中亚诸胡人唐朝贡的部分记述，但并没有展开研究，且对中亚九姓胡的朝贡性质定性不准。

英国学者米诺尔斯基(V.Minorsky)在翻译《世界境域志》(Hudūd al-‘Alam, London, 1937)时，以其良好的语言修养，大量使用伊斯兰文献，对8~10世纪中亚历史地理做了详细考释。我们在确定中亚众多地名的确切地点时，往往要借助他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他没有涉及汉籍记述。

荷兰学者德·胡耶(M.J.de Goeje)系统整理了古典时期(8~10世纪)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编成《阿拉伯舆地丛书》8卷(Leiden, 1870~1894)。在本世纪，一批法国学者又重新译校了这些舆地文献^[1]。我国学者宋巍也翻译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1991)。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7~10世纪的中亚历史地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Yule)收罗、节译了一批伊斯兰舆地文献，并做了初步的研究工作，写成《契丹行程》(London,

1913—15)。中国学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有许多资料译自玉尔的书。

1933年，在中亚撒马尔罕以东约140公里的穆格山城堡陆续发现了约90件文书，大部分是粟特文书，也有汉文、阿拉伯文和古突厥卢尼文书。穆格山文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使我们能够不再局限于从外部，即从汉人、阿拉伯人或突厥人的记述来研究粟特史，而可以从粟特人内部来观察历史。经学者们整理、释读和研究，确认这批文书主要是喷赤干领主迪瓦什梯奇的档案。围绕着文书的定年、文书所记人名、地名的考释、迪瓦什梯奇的身分及其统治年代、迪瓦什梯奇与康国王突昏、乌勒伽的关系、迪瓦什梯奇何时称粟特王、8世纪初粟特地区的政治状况诸问题，苏联学者克拉契柯夫斯基夫妇（В.А.И.Ю.Крачковские）、弗列依曼（А.А.Фрейман）、里夫什茨（В.А.Лившиц）、斯米尔诺瓦（О.И.Смирнова）、克里亚什托尔内（С.Г.Кляшторный）、美国学者费赖（R.N.Frye）、日本学者岩佐精一郎展开了长期的讨论。中国学者马小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籍记述，考定喷赤干即米国都城钵息德城，迪瓦什梯奇就是开元六年（718）遣使来朝的米国王。他还对穆格山粟特文书所反映的公元8世纪初期的粟特政治状况作了详尽的研究^[2]。

中国学者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1915），对《唐书》、《大唐西域记》所记西域史地做了考证，有筚路蓝缕之功。但是，丁谦忽视了汉籍有关西域史地记载因袭抄补的情况，以汉籍互校的方法来考辨西域史地，有“以讹校误”之嫌。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编注了大量中外文史料，并对西域史地的相关记述做了部分考释。其书与唐代有关的部分主要在第四册，论题主要有“唐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唐

代在中国之中亚人及其后裔”，“唐人所记中亚之动植物”，“唐代西域人组成之军队考”。该书主要缺陷在于，外文史料出处不明或混乱，审音勘同不甚了了，没有把中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也没有考辨汉籍所记是否正确。对该书缺陷，冯承钧先生有专门论述^[3]。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把沙畹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对西突厥史以及西突厥与唐朝的关系史提出了系统的见解。他还考证了公元588年西征波斯的突厥可汗，“昭武”的对音，唐朝所置西域十六国都督府州治地。由于选题所限，作者并没有涉及西突厥在中亚诸国的活动情况，以及突厥人在唐朝的中亚防御战略中的作用等问题。

长期以来，《大唐西域记》以记载详实、可靠而为中外学者所称道。对该书的整理、研究，历来为中外学者所注重。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984)、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1989)，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全译》(1995)堪称“《大唐西域记》研究”的代表作。四书各有所长，但在中亚地名勘同方面，尤以季书为善。季羨林等融汇各国学者研究成果，充分利用了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及中亚当地的考古成果，对《大唐西域记》所记各地的历史、地理、物产及文物制度逐地做了详细考释。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当今中外学者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最高成就。但是，他们没有把玄奘的中亚行程在整体上加以考辨，致使他们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失误和空白，诸如：玄奘所记中亚行程是否有误；千泉、笈赤建、白水城、曹国、米国等地究竟地处何方。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明了唐初丝绸之路中亚段的走向，不可能真正确定《大唐西域记》的可信度。正因为十分确信玄奘所记道里的正确，周连宽的研究才会漏洞颇多。他把碎叶、千泉、白水城、笈赤建、石国都城南勘异地，以求证玄奘所记之正

确。

国外学者研究《大唐西域记》的代表作应是 T. 瓦特斯 (Thomas Watters) 的《大唐西域记》英译本 (1904)^[4]。瓦特斯注意到玄奘所记中亚道里有所错乱, 白水城、千泉的地点有疑问。但是, 他没有系统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来验证玄奘所记, 也没有把玄奘的中亚行程从全程上加以考辨, 致使发现玄奘之记有误的机遇失之交臂。

对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研究, 重要的成果有韩国学者梁翰承、冉云华的校释本 (伯克利、汉城, 1984)^[5], 日本学者桑山正进的《慧超往五天竺国研究》(京都, 1992), 以及中国学者张毅的《往五天竺国传笺释》(1994)。桑山正进的研究分为释文、译文、译注三部分, 并有附论、参考文献、索引, 其研究较为深入。张毅主要依据汉籍记述, 对中亚的安、曹、史、米、康、跋贺那 (拔汗那) 等国史地做了粗略考辨。

苏联学者克利亚什托尔内 (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 在《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1964。中译本, 1991) 中, 分析了汉籍史料与突厥鲁尼文碑铭, 大大推进了 6~8 世纪中亚史地及突厥人与唐朝关系史之研究。此书尤为令人注意的一个贡献是, 作者考定《毗伽可汗碑》(大铭文第 24~25 行) 和《阙特勤碑》(大铭文第 31~33 行) 所记默噶在公元 701 年前后征讨的 alty Ćub Soıdaq, 并不是如马迦特 (J. Marqart) 所说的“粟特昭武六部”, 而是唐朝的六胡州; Ćub 为汉语“州”的对音, 而不是“昭武”的对音^[6]。中国学者张广达也接受了此观点, 并加以考辨^[7]。

2. 有关唐代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

俄国学者巴托尔德 (V. Barthold) 在充分挖掘、整理和利用阿拉伯—伊斯兰史料的基础上, 著《七河史》(1893)、《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1900)^[8],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7), 拨去了 7~12 世纪中亚历史上的厚重迷雾。他对中亚诸城 (如怛

逻斯、白水城、撒马尔罕、布哈拉、苏对沙那等)定位、城市沿革、道里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的探究成果已为中亚考古资料和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他和其他学者对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的研究成果,使我们有可能以这些文献为参照系,以验证汉籍记述的正确与否。遗憾的是,巴托尔德(又译巴尔托里德)没有能力利用汉文文献,因而无法研究7~8世纪中亚诸国与唐朝的关系,无法对该时期中亚诸国与阿拉伯、突厥、唐朝的关系作出卓有成效的研究。

G. Le. 斯特拉吉(G. Le. Strange)系统梳理了阿拉伯—伊斯兰文献的有关记述,对7~9世纪阿拉伯哈里发国的东部地区各城,逐地进行了考释,写成《东部哈里发国的土地》(剑桥,1905)。对于唐代汉籍记述,他几乎没有利用和涉及。

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对西域史地有许多精湛的研究。他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1916),《四天子说》(1923),《中亚史地丛考》(1929),《玄奘记传中之千泉》(1930)等著述,大大推进了学术界对唐代粟特人、唐与中亚历史地理之研究。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依据中国文献记述,对汉唐时期天山地区历史地理做了审慎的考证,写成《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1956年修订)。他的研究成果对“汉唐时期天山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具有奠基性意义。他的研究方法也给后学以启迪。

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中译本,1936),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汉籍记述,简要地考辨了河中诸城的方位和道里,辨析了康居与粟特之间的区别。

A. M. 别连尼茨基(A. M. Беленицкий)等主编的《中亚中世纪城市》(列宁格勒,1973),反映了苏联中亚地区考古发掘和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成果。作者对怛逻斯、白水城、石国都城等城的考定,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但是,作者把托克玛克西南的

阿克·贝希姆废城比定为八刺沙袞，而不是碎叶（上书，页 208～209）。此结论已为中国学者张广达所推翻。

张广达结合汉籍和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记载及中亚地区考古成果，对碎叶等城做了精当的考辨（〈碎叶城今地考〉，1979；《西域史地丛稿初编》，1995）。他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把碎叶（阿克·贝希姆）作为道里计量的一个基准点。

余太山在《塞种史研究》（1992）中，主要依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述，考辨了“康居”的地理位置、族名、族属和源流，分辨了“康居”、“康”及“Sogdiana”之间的区别，把白鸟库吉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此外，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1962）、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1988）等，也对西域历史地理研究作出了贡献。

西域史地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丝绸之路研究。岑仲勉《历代西疆路程简疏》（1962），日本学者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中译本，1990），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1994），主要依据汉文文献，对葱岭以东丝绸之路考证较详，对葱岭以西的道里则几乎没有涉及。苏北海《唐代中亚热海道考》（1988），把考证的终点延伸到热海（伊塞克湖）。史念海在《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1988）^[9]一文中，回顾了魏晋以来汉人对西域的探索，以及汉籍所记通往域外的道路走向。对于汉籍所记的真伪，史先生几乎未作考辨。

3. 唐朝与中亚关系史研究成果

英国学者吉布（H.A.R.Gibb）的《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伦敦，1923），从阿拉伯征服史的角度，探讨了阿拉伯对中亚的征服进程，中亚诸国的抵抗以及它们与唐朝、突厥人、突骑施汗国的关系。吉布主要利用了阿拉伯历史名家塔巴里的《年代记》、白拉祖里的《诸国征服者史》和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由于

没有大量利用汉文史料，因此对于下述问题吉布无力作出回答：唐朝在中亚设置羁縻府州的历史影响如何，唐朝在中亚诸国抗击阿拉伯人的斗争中究竟起什么作用，中亚诸国为什么屡屡向唐朝、突厥人求援，等等。

美国学者白桂思（Ch.I.Beckwith）主要依据阿拉伯史料、吐蕃史料以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写成《中亚的吐蕃帝国》（普林斯顿大学，1987）。白桂思探讨了吐蕃势力在中亚的进退，阿拉伯人、突骑施汗国与唐朝、吐蕃的关系，吐蕃与阿拉伯人、唐朝在中亚的争夺等问题。此书的突出贡献在于，综合利用了多语种资料，开拓了吐蕃史研究的新领域，对吐蕃、唐朝、阿拉伯及突骑施之间的关系，做了全景式的综合探讨。由于作者研究的角度是以吐蕃为本位，因而对于中亚诸国与唐朝关系之演变，汉籍记述的真伪及价值，他并没有深入探讨。

北京大学王小甫博士继白桂思之后，以唐朝为本位，探讨了唐与吐蕃、大食在西域争夺的历史过程，写成博士论文《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1989年写成，1992年出版）。他考证了吐蕃进出西域的交通路线（食盐之路，五俟斤路等），安西四镇的置废，并通过对汉、阿两种史料的认真比勘，否定了唐朝与大食曾在中亚对抗的说法，否定了长期流行的突厥人支持中亚诸国反抗大食入侵的说法，认为唐朝并没有支持突骑施抗击大食，突厥人只是力图恢复其对南部绿洲的传统控制，因而多次与吐蕃连兵袭扰西域，成为唐朝和大食的共同敌人。中亚诸国向唐朝遣使求援、诉苦，“主要不是由于侵略战争，而是由于与新宗主（阿拉伯）发生了矛盾”^[10]。不过，他并没有充分利用《册府元龟》等史料，来系统研究唐朝与中亚诸胡的关系。

薛宗正在《突骑施汗国的兴亡》（1984）、《康王乌勒伽向唐求援表文疏证》（1988）、《波斯萨珊王裔联合吐火罗抗击大食始末》（1988）、《石国考述》（1989）、《突厥史》（1992）、《安西与

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1995)等著述中,主要依据汉文史籍及吐鲁番出土文书,探讨了突厥人(东、西突厥)与唐朝的关系,唐朝势力在中亚的进退,中亚诸国与唐朝的关系,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和统治诸问题。对于中亚诸国与唐朝关系的演变,丝绸之路的走向,薛先生几乎没有涉及。他也没有以阿拉伯—伊斯兰文献来验证汉籍之记。

王治来的《中亚史纲》(1986)从中亚史的角度,谈及7~8世纪中亚诸国与唐朝的关系,唐朝在中亚所置羁縻府州的治地等。在汉籍中,王先生主要使用了两《唐书》的记述,而几乎没有利用《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史料。

日本学者伊濑仙太郎主要依据《册府元龟》、《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写成《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1955,东京)。在是书第八章,伊濑编制了“西域诸国朝贡表”,详列了西域诸国人唐朝贡时间、贡使、贡品和唐朝回赐的情况,探讨了西域诸国对唐朝的羁縻关系,以及唐朝的西域经营策略。本书可以说是国外学者系统研究唐朝与中亚关系史的代表作。但令人遗憾的是,伊濑的“西域诸国朝贡表”有许多遗漏,且有一些讹误。由于没有使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没有参考中亚考古成果,伊濑没有对唐代文献记述的真伪和可信度展开讨论。

蔡鸿生在《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1988)中,据《册府元龟》、《新唐书》,制成“唐代九姓胡入贡年表”。蔡鸿生着重于贡品的类释,并注意到九姓胡朝贡频率与中亚政治形势之间的联系。但是,朝贡频率、内容所反映的九姓胡与唐朝关系之亲疏、变化,唐朝的西域经营战略对九姓胡的影响,蔡先生均未做探讨。而且,蔡先生所编“年表”遗漏甚多。

关于中亚诸国与唐朝关系的重要论文尚有:吉布《公元715年阿拉伯对喀什噶尔的人侵》(1922)^[1],台湾学者张日铭《开元年间(713~741)唐大食关系之研究》(1975),卢苇《唐代中

国和大食在中亚地区斗争的发展和变化》(1985), 吴玉贵《唐代西域羁縻府州建置年代及其与唐朝的关系》(1986), 等等。

黄时鉴师主编的《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1994), 对汉籍记述进行了一番爬梳、整理工作, 并融汇了大量的中外学术研究成果, 以概述、条目解说、地图和插图, 扼要地、具体地勾勒出中西关系史的总貌和各个关节。其中, 第三编“隋唐时期中西关系史年表”(卢向前编制), 具列了隋唐时期中亚诸胡与唐朝交往的史事。但囿于体例等原因, 对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之演变, 《年表》未作探讨。

我国最新论述唐代西域历史的著作是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1996)。其中, 第四编“突厥汗国及其对西域的统治”、第五编“唐代西域”由吴玉贵撰写。作者清晰地剖析了唐代西域政治形势的发展, 叙述了唐朝在中亚建立羁縻州府的过程以及各羁縻州府的名称、辖地, 对唐朝的羁縻统治方式也有所涉及。作者依据《新唐书·王孝杰传》、《玉海》卷133所引《武经七书》的记述, 认定贞观末年唐朝势力已达碎叶, 648年设置了安西四镇, 且其中有碎叶镇。此外, 作者鉴别出《隋书·西突厥传》是记阿波系突厥, 《通典》、《旧唐书》、《新唐书》误将室点密系突厥(即西突厥汗国)和阿波系突厥合为一传^[12]。由于本书所论“西域”乃狭义的, 仅指中国新疆地区, 所以对中亚诸胡与唐朝的关系很少涉及。作者对下列课题均未作系统探讨: 中亚羁縻州府设置之前, 中亚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如何; 羁縻州府的设置, 对中亚九姓胡与唐朝关系、九姓胡与大食的关系又有什么影响; 中亚九姓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什么变化, 各国与唐朝的亲疏关系是否有别, 等等。

关于中亚诸国与唐朝的物质文化交流之代表作, 有劳费尔(B. Laufer)《中国伊朗编: 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中译本, 1964), 谢弗(E. H. 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1985;

中译本作《唐代的外来文明》，1995）。

二、问题的提出

综观上述这些著述，不难发现只有极少数研究者对唐代汉文文献有关中亚史地的记述加以整理和研究。即便是这些研究者，他们也很少把文献加以系统研究，致使文献的史料意义限于一时、一地、一事。考虑到有些汉籍记述甚至是7~8世纪中亚诸国史地状况的唯一记述，辨别汉籍记述的真伪，确立汉籍记述的可信度，就显得更为重要起来^{〔13〕}。在构架“唐与中亚”课题研究的宏大体系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平心静气地考辨唐代文献中有关中亚以及中亚与唐朝交往的记述，才能使我们的研究视角全面起来，避免使用史料的割裂性和随意性，客观地评价中亚诸国入唐朝贡的性质，准确地判断唐朝在中亚是否有抵制大食东侵的策略。

从上述中外学者著述中可以看出，唐代文献所记中亚诸胡国历史、地理状况是否有误，唐人对中亚的认识是否准确，唐代文献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有什么不同，中亚诸国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什么变化，它们与唐朝的亲疏关系是否有别，7~9世纪丝绸之路中亚段的走向如何，中外学者鲜有人详加辨析。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必须先从研究唐代文献着手。

唐朝国势强盛，盛行探索域外的风气。不但西行僧侣、官员、士卒写出许多有关西域历史、地理、风俗、物产的著述，而且朝廷也派员调查西域诸胡国，编撰出一批有关西域的图志。其中，记述唐代中亚诸胡历史、地理及唐与中亚九姓胡关系的著述

有^[14]：

輿地类文献：李泰《括地志》凡 555 卷；《贞观方物录》；程士章《西域道里记》3 卷；《西域图志》（显庆三年撰成）；王名远《西域图记》；许敬宗等《西域图志》60 卷^[15]；盖嘉运《西域记》；《十道四蕃志》；戴斗《诸蕃记》；贾耽《皇华四达记》10 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 卷；高少逸《四夷朝贡录》10 卷；吕述《黠戛斯朝贡图传》。以上诸书、图志，除了《括地志》残文辑存 4 卷^[16]，《皇华四达记》序文残留在《新唐书·地理志》，余皆不存原书。行纪类文献：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释迦方志》；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杜环《经行记》。还有《新唐书·西域传》，《旧唐书·西戎传》，《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乐史《太平寰宇记》，以及两《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通典》、《册府元龟》的有关记述。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唐代碑铭，唐人文集中也保存了一些记述。

上述这些文献详实记述了中亚九姓胡与唐朝的交往、唐朝政治势力在中亚的进退以及唐代不同时期中亚诸胡国历史和地理等基本史实，反映了唐人对中亚诸胡的认识以及唐朝对它们的态度。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我们可以确切明了唐代丝绸之路中亚段的走向及其变化，中亚九姓胡对唐朝附属关系的建立、变化及其特点，九姓胡入唐朝贡的性质、意义，唐朝在九姓胡抗击大食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唐人对中亚认识的正确程度，并确立对汉文史料相关记载的可信度，使“唐朝与中亚”课题研究具有坚实、可靠的基础。

上述这些著述的作者有一些（如玄奘，王名远，慧超）甚至亲自到过中亚。唐人对中亚诸胡的了解，理应是比较全面的。但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在实际上，唐人对中亚的了解相当有限。早在玄宗天宝二年（743），唐朝鸿胪卿王忠嗣所掌握的材料仅知

西域十几国，且错讹很多^[17]，以至于贾耽需要在9世纪初重新编撰舆地著作。这一方面说明7世纪唐人有关中亚的著述流传不广，另一方面提示我们：唐代文献记述是否有误？

面对如此浩瀚的文献，要在短短几年内做系统研究是常人所不可能完成的。综览诸多文献，我发现与本课题相关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大唐西域记》卷1、《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和《册府元龟·外臣部》四篇文献中。前两篇文献详细记述了唐代丝绸之路的走向，以及中亚诸国的相对位置；而且，《大唐西域记》是唐代最早记述西域史地的文献，详细记述了唐初丝绸之路走向和中亚诸胡的情况，《新唐书·地理志》保留了8世纪末中西交道状况，两者各具代表性。后两篇文献则集中保存了唐人对中亚诸胡国的认知以及九姓胡与唐朝交往的基本史实。这些记载既是唐朝与中亚交往的记录，又是双方交往的历史结果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人在与中亚诸胡交往过程中所持的立场、观点。而且，前三篇文献文字上的整理已经完成，《册府元龟》（明本）也基本不需要版本校勘，便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前人在研究这四部史籍时，又留下许多空白，出现一些失误。因此，我决定以这四篇文献为中心，兼及其它汉籍记载，对唐代文献所记中亚史地加以考辨。以文献研究为中心，可以避免研究者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研究过程中取舍史料的主观随意性，从而可以进一步客观、全面地探寻中亚诸胡和唐人活动的历史轨迹。

为了避免与前人研究相重复，我把研究重点放在中亚河中地区。由于文献的相对独立性，以致本书各章也具有了相对独立性。

三、研究方法及基本概念

(一) 研究方法

我们从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研究汉籍有关西域记述的正确与否,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参照系,即以境外史料和考古材料来验证汉籍记述。长期以来,丁谦等前辈忽视了汉文典籍有关西域史地记载因袭抄补的情况,以汉籍互校的方法来考辨西域史地,有“以讹校误”之嫌;也有的学者(如周连宽)以汉籍记述为信史,仅以汉籍记述来验证中亚史地,削足适履,指证中亚考古材料之不正确。

我在研究方法上,力图避免重蹈复辙。对于《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西域传》的有关记述,我从怀疑汉籍所记的研究角度出发,以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中亚考古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来验证之。而对汉籍有关中亚诸胡朝贡的记述(主要保存在《册府元龟》中),由于确乏境外资料可资验证,只能做文献意义上的研究。我的研究原则是:“有疑则考,中外互证,其余从略。”对本人学识及掌握资料尚不足考辨者,只有留待来日和贤者了。

有关唐代中亚史地的域外文献资料,主要是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的史料价值很高,尤其是有关道里、方位的记述。这是因为,在伊斯兰世界,出于宗教上的需要(穆斯林每日五次礼拜的朝向;赴麦加朝圣;寻求知识的圣训之鼓励),征收赋税的需要,以及经商的需要,舆地学特别发达。自8世纪中叶以来,涌现出一大批内容丰富、记述详实的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著述。这些地理文献既包括地理资料本身,

又包含了许多历史史料。这些文献除了对边远地区的情况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或出于猎奇心理撷拾了奇异传闻因而流于荒诞之外,大部分事实记述是翔实可靠的,其关于伊斯兰世界道里的记述尤为可信。中亚的考古成果及各城镇的实际里程,充分证明了这些记述的可信性。这些舆地文献(如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中外文对比的史料,以验证汉文典籍的记载,而且告诉我们许多西域城镇变迁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巴托尔德、马迦特、米诺尔斯基、张广达等名家无不强调利用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文献。这类文献的主要缺陷在于,后代作者经常随意抄袭前人记述而不予说明,导致有年代模糊不清之弊。汉籍记述年代学上的相对准确性,正可补伊斯兰文献之不足,两者相得益彰。

(二) 基本概念

西域 (Western Lands)

包括中国新疆地区(西域东部地区)和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地区(西域西部地区)两部分。

中亚 (Central Asia)

本文所指“中亚”为狭义的。所谓“中亚”,主要指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包括楚河流域及河中地区。铁门以南的吐火罗故地,不在本书讨论的范畴。

河中 (Transoxania)

“河中”是 Māwarā - al - Nahr 一词的意译,又译“河外”地。Māwarā - al - Nahr 一词最早见于 9~10 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地理著述中,它是指从巴格达东望,阿姆河彼岸、阿姆河以东的地区。具体地说,它是指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域。也有学者把它音译为“马维兰纳赫尔”之地。古代希腊人把阿姆河称之为奥克斯河或奥克苏斯河,把阿姆河彼岸(东岸)之地称之为 Transoxania^[18]。此词大致与“河中”相应。西辽曾在撒马尔罕

设河中府，所辖大致上是撒马尔罕绿洲、布哈拉绿洲。耶律楚材称，河中乃“西域寻思干城，西辽目为河中府”^[19]。13世纪伊朗史学家志费尼（Juvaini）说：“河中包括很多郡邑、区域、州县、城镇，其精华和核心是不花刺（布哈拉）和撒麻耳干（撒马尔罕）。”^[20]中国学者一般称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区为河中地区，但范围并不十分确定，一般是指两河之间的撒马尔罕（元代寻思干）绿洲和布哈拉绿洲，有时并含与其邻近的地区^[21]。本文所论“河中”，是指布哈拉、撒马尔罕绿洲以及拔汗那地区。

九姓胡和中亚诸胡

“九姓胡”即指中亚昭武九姓国。据《新唐书·康国传》所记，在唐代，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22]。陈寅恪先生把杜甫诗中的“杂种胡”皆视作“中亚昭武九姓胡”^[23]。实际上，唐人对“九姓胡”的界定也是不相一致的。杜佑《通典·边防九·西戎五》“康居”称：康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凡九国，皆其种类，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24]上列九国，加上康国，已经超过“九姓”之数。

本文中所讨论的“九姓胡”，以《新唐书·康国传》为基准。但由于《新唐书》编撰者没有注意劫布咀那（西曹）与苏对沙那（东曹）的区分，把两地相混淆了，致使我们无法一一鉴别汉籍所记史事是西曹的抑或东曹的，所以我把苏对沙那也包括进“九姓胡”中。此外，由于《新唐书·康国传》把中曹与西曹同传，把“东安”记事系于“安国”条下，所以我把中曹、东安也归入九姓胡。这样归类的目的在于，我们尽可能地接近唐人的认识轨迹。

“中亚诸胡”是指九姓胡（康、安、东安、曹、中曹、东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和拔汗那。由于唐代文献置拔汗

那于“九姓胡”之外，所以我在研究中亚诸胡与唐朝的关系时，有意识地把拔汗那与九姓胡相比较。

朝贡

在唐代，中亚诸胡往往向唐朝“贡献”和“上表”（请封、请求内附、请援等），这种“贡献”和“上表”，就是所谓朝贡。唐朝也往往对中亚朝贡国有赏赐、册封之举，这种赏赐和封册往往是与朝贡活动一起完成的，它们与朝贡活动构成了一种朝贡制度，但前者又不能说就是朝贡活动本身。此外，还有宗主国在蕃属国、羁縻政权当时没有朝贡的情形下，主动册封后者的。这种册封也构成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但它也不是朝贡活动本身。唐朝对朝贡活动的管理制度，也构成为朝贡制度的一部分。通过朝贡活动，朝贡双方结成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通过分析朝贡活动、贡使、贡品，我们可以了解朝贡国与宗主国之间以及朝贡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册封

本文所指的“册封”，是指唐朝帝王以一定的方式（如遣使持册书前往，当朝宣册），把封爵授给中亚诸胡国；或者，中亚诸胡国新王继嗣，主动遣使来唐朝请求承认、求封，而且唐朝满足其请求之类的活动。在册封活动中，是否有封玺、册文并不是定性的标准。本文所讨论的“册封”，主要是《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所记的册封活动，以及其它汉籍所记唐朝对中亚诸胡的“封”、“册”之举。由于《册府元龟》把“册封”归之于《外臣部·封册》，所以我们一般并不严格区分“册封”与“封册”之间的差别。

四、各章研究的基本问题及贡献

本书研究的中心是“唐朝与中亚的交往”这一课题。这一课题从不同角度可有不同的表述，如唐朝与中亚的交通及其变化；唐人对中亚的认识，中外文献所记中亚诸国方位、道里之差异；唐朝在中亚诸国设置羁縻府州的经过；羁縻州府的设置，对中亚诸胡与唐朝、大食关系的影响；中亚诸胡各国与唐朝的亲疏关系；中亚诸胡与唐朝政治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性质，等等。

第一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着重研究《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行程。通过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我发现在人们竭尽心智求证其翔实、可靠之后，玄奘所记中亚行程多数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记述及中亚考古成果不相符合；玄奘所记千泉不能与 Abarjaj（或 Barjaj）相勘同，筱赤建不能与（下）努舍疆、新城相勘同；玄奘所记白水城、恭御城的方位也有疑问；白水城与 Isfijab 方位不一。这说明早在唐朝初年，唐人对中亚诸胡国史地等基本情况的了解就有偏差。

第二章，考虑到中外学者（如岑仲勉、苏北海、松田寿男）对《新唐书·地理志》所记道里的研究局限在碎叶以东地区，我把研究视野伸向碎叶以西，着重研究《新唐书·地理志》所记中亚行程。从《新唐书·地理志》所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残文看，贾耽所记碎叶——怛逻斯里程比玄奘之记准确，而且路线有所不一。这一方面说明唐人认识的进步，以致《新唐书》编撰者也没有采纳玄奘之说；另一方面说明 7~8 世纪西域交通路线有所变化。遗憾的是，贾耽所记也有诸多遗误。从玄奘到贾耽，

唐人对中亚诸胡认知均存在偏差。

第三章，结合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中亚史籍，着重考辨《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诸胡史地状况。这种考辨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确定《新唐书·西域传》所记史实的相对年代，确定《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诸胡国的方位，辨析汉籍与阿拉伯—伊斯兰文献记述的差异，明了唐人对中亚认识的正确程度，并确立对汉文史料相关记载的可信度，避免使用汉籍记述时张冠李戴的现象。本章的贡献在于：

(1) 以更多的材料探讨唐朝在中亚建立羁縻统治的历史过程及其统治形式。唐朝以册命中亚本地王公为官的方式，实现其对中亚的羁縻统治，中亚本地政权得以保留和尊重。中亚诸胡完全接受了唐朝的册命，唐朝所册命的官职、王号一般可以世袭。在8世纪50年代以前，突厥人在中亚诸国（如石、安、米国）仍保持较大政治影响；对于中亚诸胡来说，唐朝的册命具有很大政治意义。中亚诸国与唐朝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军事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早在显庆年以前即已建立。唐朝羁縻统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义务。史实充分说明，唐朝对中亚诸胡国实现了有效的羁縻管辖。从贞观年以来西曹“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安国犒师，约651～656年（永徽年间）何国愿输粮予唐军等事例看，在贞观末年至永徽年间，唐朝声威确已到达中亚。我们不能以此时唐朝势力尚未到达碎叶一线为由，否认唐朝于648年设置了碎叶镇。

(2) 就政治而言，唐人和唐朝政府对九姓胡的王统非常关注。《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九姓胡政治状况基本可信，且可补中亚史料、阿拉伯——伊斯兰史料记载之不足。汉籍记载年代学上的相对准确性，使我们推断九姓胡的政治演变和王统变化。从《新唐书》有关记述看，曹国、米国在贞观年以前尚未独立称国，这反映了河中地区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

(3) 从《新唐书·西域传》看,唐人对九姓胡中的康、安、石国认识较为清楚,而对曹与东曹、西曹认知较为混乱,对火寻认知较晚。通过中外文献记载的比较研究,我发现唐人所记米国方位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 Māymurgh 不能相勘合;唐人把曹国(西曹)与东曹(苏对沙那)相混淆。就地理方位看,《新唐书》所记康、安、东安、石、史、何、火寻诸国均与阿拉伯—伊斯兰文献所记基本相同,但诸国周邻道里有较大偏差;唐代文献对中亚诸胡国物产的记述,也比较详实可信。

必须注意的是,对汉籍所记曹国、东曹史实要加以区别。《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九姓胡诸国道里、方位,有许多讹误。这与曹国、东曹、米国的方位有一定关系。《新唐书》所记道里与《隋书·西域传》较相近,而与《大唐西域记》有较大差异。看来,《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里程并不为唐人重视;显庆、龙朔年间,唐朝对中亚的调查和了解(许敬宗《西域图志》,王名远《西域图记》)并不细致、准确。

(4) 唐人对九姓胡的宗教信仰及中亚的伊斯兰化基本上并不了解。唐人对九姓胡宗教信仰的认知程度,基本上仍停留在《隋书》的水平。8世纪以来中亚诸国的伊斯兰化,并不为唐朝所了解。《新唐书》、《册府元龟》几乎没有记述九姓胡的改宗之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8世纪中叶以前,唐人对中亚的伊斯兰化程度所知甚少。唐代九姓胡仍以昭武为姓的国家仅有安、东安、米、何、史五国。在唐人看来,汉代康居五小王居地与昭武九姓国有某种联系(安国,康居小君长闾王故地;石,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何,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史,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火寻,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

第四章,通过整理《册府元龟》等汉籍记述,讨论中亚诸胡朝贡与唐朝的册封,探讨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及其演变,是中亚学界一直关注且未解决的问

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唐朝、大食与中亚诸胡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个课题的关键是如何找准双方关系的表现形式。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朝贡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双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记述，主要保存在《册府元龟》中，并散见于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等史籍。我通过汉籍的梳理，统计出九姓胡入唐朝贡凡 134 次，比伊濑仙太郎的统计多出 34 次，比蔡鸿生的统计多出 40 次^[25]。我发现，早在唐贞观年间，在唐朝设置羁縻府州之前，九姓胡即已与唐朝建立起较为稳固的朝贡关系，并负有一定的政治、军事义务。唐朝在中亚羁縻统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义务制度化。唐朝是追随西突厥的足迹，采取和平方式进入中亚的。唐朝以册命中亚本地王公为官的方式，实现其对中亚等地的羁縻统治，中亚本地政权得以保留和尊重。唐朝的册命，还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曹、米等国政治上的独立和发展。

九姓胡朝贡的频率、时机及贡品的质量与西域东、西部的政治形势及唐朝势力的进退，有密切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九姓胡的贡次、贡品种类及贡使身分有变化。贡次的变化，说明九姓胡与唐朝的关系有亲疏之分；唐朝在中亚设置羁縻州府并没有加强九姓胡与唐朝的朝贡关系。九姓胡贡品的质量，往往与九姓胡入朝动机有关。汉籍记为“遣使”朝贡的使者，具有九姓胡的国使身分。从九姓胡及西蕃诸国朝贡所请看，九姓胡对唐朝的朝贡关系主要是一种政治关系。九姓胡朝贡的政治性质，在不同时期有逐步加强的趋势。九姓胡的朝贡，基本上不是如沙畹所称的“以献为名”的商业性朝贡。九姓胡及西蕃诸国的入唐朝贡说明，面对大食的东扩，唐朝有一套应付大食的策略，即：利用突骑施的力量，通过赐封、慰抚等手段扶持中亚诸胡的势力，试图组织中亚诸胡抵抗大食的征服，以最少的军事代价维系唐朝在中亚的羁

糜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朝道义上的支持,促使了中亚本地民族意识的觉醒。在751年前的西域东、西部地区,虽然唐朝与大食曾有过军事联合(734~736年),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尚不能定性为同盟友好关系。

注释

- [1] G.Wiet: Yakūbi《诸国志》法译本,开罗,1937; J.H.Kramers & G.Wiet: Ibn Hawkal《诸地形胜》法译本,莱顿,1938; A.Miquel: Mukaddasi《诸国知识的最佳分类》法文节译本,大马士革,1963; H. Mass'e: Ibn al-Fakih《诸国志》法译本,大马士革,1973; Ch.Pellat: Mas'udi《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法译本,巴黎,1962; 耿昇中译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 [2] 马小鹤:〈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7年,第65~75页;〈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中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9~138页。(本书以〈〉标识论文,以《》标识专著。)
- [3] 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17~326页。
- [4] T.Watters, *On Yuan Chuang's Travels in India*, London, 1904.
- [5] Yang Han-Sung, Jan Yün, etc., *The Hye Chó Diary: Memoir of the Pilgrimage to the Five Riegiions of India*, Berkeley/Seoul, 1984.
- [6] C.Г. 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李佩娟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6~100页。
- [7]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9~279页。
- [8] 巴托尔德用了很多时间,从当时仅以抄本、写本形式流传于世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中选辑重要段落,汇编为《原始史料选辑》,作为《突厥斯坦》一书的第一编刊行。关于《突厥斯坦》一书,参见伯希和:〈《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T'oung Pao,

- 1930), 中译文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 商务印书馆 1962 年, 第 1~53 页。另参见张锡彤、张广达:〈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元史论丛》第一辑, 中华书局 1982 年。
- [9] 史念海:〈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 陕西师大主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 年第二辑, 第 73~110 页。
- [10]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第 178 页。
- [11] H.A.R.Gibb, *The Arab Invasion of Kashgar in A.D.715. BSOS*, vol. II—3, 1922, pp.467~474.
- [12]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第 119, 156~160 页。
- [13] 汉文文献对于 7~9 世纪中亚史地研究的价值, 巴托尔德有极高评价, 认为汉文文献甚至是中亚许多历史事件唯一的记述。参见 V.Barthold, *History of the Semirechye, Four Studies on Central Asia*, Vol. I, p.86 note 2, tr.by V. & T.Minorsky, Leiden, 1956.
- [14] 参见《新唐书·艺文志二》; 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一五、一六, 四库全书本。
- [15] 《新唐书·艺文志二》记作《西域国志》;《玉海》卷一六、《唐会要》卷七三记作《西域图志》。
- [16] 李泰:《括地志辑校》, 贺次君辑校, 中华书局 1980 年。
- [17] 《唐会要》卷一百;《玉海》卷一五。
- [18] 参见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 罗致平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页 59; 另参见 A. 阿格扎莫娃:〈论地名“马维兰纳赫尔”和“突厥斯坦”〉, 新疆社科院中亚所编《中亚研究》1989 年 1、2 期合刊, 第 65~70 页。
- [19] 耶律楚材:〈再用韵记西辽事〉,《湛然居士文集》, 谢方点校, 中华书局 1986 年, 第 67 页。
- [20]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何高济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第 113 页。
- [21] 黄时鉴师:〈辽与“大食”〉,《新史学》第三卷第一期, 台北 1992

年3月,第47~67页。

[22]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康国〉。

[23] 陈寅恪:〈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2~53页。

[24]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5255页。

[25] 蔡鸿生所定“朝贡”概念较狭窄。这可能是他统计朝贡数较少的原因之一。

第一章 7 世纪的中西交通

——《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行程辨析

《大唐西域记》是唐代最早记述西域史地的文献，详细记述了 7 世纪上半叶中西交通状况，反映了唐人对中亚诸胡最早的认知。此书影响之大，唐代其余舆地文献难出其右。该书流传 1300 多年，注疏、研究不乏其人。然细检玄奘所记之中亚行程和里程，仍有诸多疑问之处；诸多研究者不乏疏误之处。据此，让我们的研究就从《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行程开始吧。

一、玄奘所记路线和里程

据《大唐西域记》记述，大清池（伊塞克湖）至捕喝国（布哈拉）的行程和里程可概述如下：

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

素叶（水）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咀逻私城；

咀逻私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至白水城；

西南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

恭御城南行四五十里，至筱赤建国；

从筱赤建国西行二百余里，至赭时国（唐言石国）；

从赭时东南千余里，至怛捍国；从此西行千余里，至窆堵利瑟那国；

从窆堵利瑟那西北入大沙漠，行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

飒秣建东南至弭秣贺国（唐言米国），从此北至劫布咀那国（唐言曹国）；

飒秣建国西南行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国（唐言史国）；

从劫布咀那国西三百余里，至屈霜你迦国（唐言何国）；

从屈霜你迦国西二百余里，至喝捍国（唐言东安国）；

从喝捍国西四百余里^[1]，至捕喝国（唐言中安国）；

从捕喝国西四百余里^[2]，至伐地国（唐言西安国）；

从伐地国西南^[3]五百余里，至货利习弥迦国；

从羯霜那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东南山行三百余里^[4]，入铁门；出铁门，至覲货逻国故地^[5]。

上述这些地方，有许多已被中外学者明确勘定。咀逻私，《唐书·突厥传》作咀罗斯，又作怛逻斯，均为波斯语 Taraz 之音译，意为“装饰品”、“服饰”。怛逻斯故城遗址位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原名奥利阿塔）以西 18 公里处，西距奇姆肯特约 162 公里^[6]。米诺尔斯基（V.Minorsky）说，怛逻斯废城位于今塔什干东北约 280 公里处^[7]；9 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曰，怛逻斯至石国有 50.7 法尔萨赫（约合 316 公里）^[8]。这可能是由于后者所记道里较为迂回之故。

白水城，位于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城以东约 13~15 公里处的赛拉姆村（Sairam）。《元史》称之为赛兰城。布莱脱胥乃德（E.Bretschneider）、巴托尔德（V.Barthold）对赛兰城都有详考。^[9]

赭时国大致范围在锡尔河支流 Barak (又作 Parak) 河 (今名乞儿乞克 Chirchik) 流域。70 年代, 苏联学者认定, 古赭时都城在今乞儿乞克河附近的 Binkath 废城^[10]。1991 年 5 月, 南京大学刘迎胜先生与“草原丝绸之路”考察队的各国学者考察了塔什干地区, 认定公元 605~750 年石国的宫廷所在地即阿克·特帕 (Ak-Tepa) 遗址, 该遗址位于塔什干市中心东南方 15 公里处; 从公元 750 年~12 世纪上半叶, 塔什干政治中心迁至今塔什干市中心的宾卡特 (Binkat) 遗址所在地; 从 12 世纪下半叶——蒙古时代, 又迁至塔什干市西南约 50 公里的班那卡特 (Benakat) 遗址所在地^[11]。周连宽先生则把古赭时国都定在今塔什干城以西约 50 公里的旧石城^[12]。看来, 周先生是指班那卡特遗址。

怛怛国, 即《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之拔汗那 (位于“石国以东百里”),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三五作跋贺那国,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作跋汗 (位于“石国之南六百里”), 其都城 Akhsikath 古城, 在浩罕东北约 60 公里处。

率堵利瑟那, 即《隋书》卷六七〈裴矩传〉、卷八五〈西域传〉之苏对沙那国 (位于“跋汗东五百里”);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又作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勃布旦那、苏都识匿, 又称东曹国, “即汉代貳师城地也”^[13]。率堵利瑟那、苏对沙那等名, 应是穆斯林文献中的 Usrusana 或 Usrushana, 其国治在今塔吉克斯坦乌拉秋别 (Uratube, 西距撒马尔罕约 220 公里); 乌拉秋别以南 25 公里有著名的半制城 (Bunjikath, 今名彭吉肯特 Panjikand, 在半制城附近的穆格山古堡曾出土一批粟特文书)^[14]。

屈霜你迦国, 即《隋书·西域传》之何国, 《新唐书·西域传》记: “何, 或曰屈霜你迦国, 曰贵霜匿, 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屈霜你迦, 为中古波斯语地名 Kusanik、阿拉伯语地名 Ku-

saniyya 之对音。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撒马尔罕领有的地方中有 Kusaniyya^[15]。屈霜你迦国都城故址在今撒马尔罕西北 12 法尔萨赫(约 75 公里)^[16],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克尔米涅市。

喝捍国,又名东安国,言其在安国(布哈拉)之东也,托玛舍克及巴托尔德将其比定为波斯佚名作者所著《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中的 Kharghankath(卡尔干卡特,后称为 Kalkanata)^[17]。该城位于那密水(泽拉夫善河)之北,那密水之南为开尔米尼亚(Karminiya,又译开尔米尼亚,西距布哈拉 17 法尔萨赫,约合 106 公里),两城相距仅 1 法尔萨赫。交通干道从开尔米尼亚之南侧经过^[18]。《新唐书·西域传》称:东安国在那密水之阳^[19]。那么,喝捍应是卡尔干卡特。马迦特在《古突厥碑铭年代考》中,也把喝捍考定为 Kharghan,并称其城北邻泽拉夫善河,在今 Kernineh 附近^[20]。宋岷先生把布哈拉以东 22 法尔萨赫(合 141.7 公里,古达玛谓 19 法尔萨赫)的代布西亚(Dabusiyah)勘定为喝捍国。宋说存疑。

萨秣建,都城故址在今撒马尔罕市中心东北 1.5 公里的 Afrasiab 高地^[21]。

捕喝,《新唐书·西域传》又作布豁,安国,即布哈拉。

伐地国,《新唐书·西域传》康国条误为戊地,学者一般将其比定为布哈拉西南的拜坎德(Betik,或 Bitik,又作 Bilkad,或 Baykand);据 10 世纪上半叶阿拉伯舆地学家古达玛说,拜坎德至布哈拉的里程为 8.5 法尔萨赫^[22],约合 53 公里。考古材料证实,拜坎德遗址到布哈拉有 55 公里^[23]。

货利习弥伽国,《新唐书·西域传》作货利习弥国,又作火辞弥、火寻,并称该国居乌浒水之阳,东南 6 百里至戊地。古波斯语作花刺子模(Khwarizmik),在今中亚咸海南之基发(Khiva)一带。

靺货逻,即吐火罗。据日本学者内田吟风研究^[24],唐初以

来的吐火罗国为突厥族所建，其都城在昆都士（即《大唐西域记》中的活国）附近的阿缓小城（War-waliz）。《新唐书·西域传》称：“吐火罗……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其王号‘叶护’。”

二、诸城方位

在玄奘记载的中亚地名中，碎叶、千泉、恭御城、笈赤建国四城的方位和地点仍有疑问，难以与穆斯林著述和实际道里相吻合。

1. 关于碎叶

碎叶城故址，学者们勘定为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玛克西南 8~10 公里的阿克·贝欣姆（Ak—Beshim）废城。中外学者多数赞成此说，苏联考古成果也证实此说^[25]。这基本上已成铁案，似乎勿庸再议。

然细检玄奘所记，不难发现素叶（碎叶）与大清池（伊塞克湖）之间的距离（500 余唐里），与阿克·贝欣姆至伊塞克湖西端的距离（约 110 公里）相差太大。由于中国学者大多依据碎叶城来确定《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诸城（国）的相对方位，因此碎叶城与伊塞克湖的相对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

对于玄奘“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之记述，周连宽解释说：玄奘先到达清池东端，然后顺该湖北岸西行；从大清池西端向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碎叶；大清池本身的长度并不包括在“五百余里”之内。这是因为，《大唐西域记》的计程方法，由甲地至乙地，只计两地之间的距离里数，而不包括甲地或乙地本身的长度或宽度。据此，周先生在伊塞克湖西端以西 500 唐里寻找

碎叶故城，认定该城当在前苏联中亚的哈喇波尔多（Карабалты）与哈林宁斯克（Калининское）之间或其附近地区^[26]。遗憾的是，迄今尚无考古材料证实周先生的结论。

《大唐西域记》的计程方法，确如周先生所证。那么，“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作何解呢？

贾耽《皇华四达记》说，热海（伊塞克湖）至碎叶里程为280（唐）里^[27]。这比玄奘所记少了220里。贾耽所记（约合248华里）与今日阿克·贝欣姆遗址至伊塞克湖西端的里程（约110公里）大体符合，仅多出约14公里。这可能是唐代道路曲折之故。

显然，玄奘所记碎叶至清池里程有疑问。这可能是由以下三个原因之一造成的：一是玄奘可能到达伊塞克湖南岸中间某一点（在伊塞克湖西端以东约100公里处），然后离开湖岸甚远，往西北而行。这样，与湖岸大体平行的这段行程（约100公里），由于并非沿湖而行，因而也计入总里程。这样，玄奘所称“五百余里”则所言不虚了。法国学者沙畹（E. Chavannes）考证：寻常通道在此湖之北，可以俄文地图证之；湖之南通行甚难，最近欧洲诸旅行家业已证实其事；所以，玄奘必沿湖之北岸而行^[28]。可是，湖南岸难行，为什么就不能离开湖岸，寻路西行？《大唐西域记》、道宣《释迦方志》均无“循湖”、“沿湖”西北行字样，或可佐证。《慈恩传》卷二则有“循海（指热海——引注）西北行五百余里”字样。《慈恩传》之记如果无误，那么玄奘也有循湖南岸西行之可能。笔者询问曾于1991年考察过伊塞克湖的刘迎胜先生（南京大学），证实该湖南岸与湖畔高山之间有较宽的缓坡，可以沿湖从东到西通行，湖南岸并非不能通行。关键是南岸高山峻岭中是否有通向伊塞克湖的山口。再者，如果玄奘确沿湖北岸而行500余里，则有两种可能性，即或是把湖的长度也计算在内，但这与玄奘的计程方法不相符合；或是如周连宽先生所

推测的那样^[29]，不把湖的长度计算在内，在湖西端以西 500 唐里勘定碎叶故址。所以，第二个原因是，碎叶城确在伊塞克湖西端以西 500 唐里，贾耽所记和今日学者的考定均错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和考古成果看，这种原因并不成立。原因之三，则可能是玄奘所记里程数有误。

看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周连宽先生的考定很难成立。玄奘不可能沿伊塞克湖北岸而行，碎叶城也不在该湖以西 500 唐里处。所以，季羨林等也认为，玄奘西行路线在清池南岸^[30]。

2. 关于千泉

千泉，《慈恩传》卷二作屏聿，两《唐书》均作千泉。1930 年，法国学者伯希和考证说：屏聿当是突厥语 Bing-yul 的对音，该词意为“千泉”^[31]。也有学者认为，屏聿当为屏笔，为东突厥语（畏吾尔语）Ming bulaq 之对音，意义亦为千泉^[32]。岑仲勉谓，屏聿当为屏律，对音为东突厥语 Bing-bulaq^[33]。

千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 Abarjaj。他称此地有丘冈，环丘冒出水泉千眼，汇为东流之河；人们在此地猎取黑雉。此地位于怛逻斯与白水城之间，在怛逻斯以西，距白水城 17 法尔萨赫（约 212 华里）^[34]。古达玛把千泉记为 Barjaj；关于该地方位和道里，古达玛所记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相同^[35]。而玄奘则记述：千泉位于怛逻斯城以东 140～150 唐里（约 124～133 华里）处，从千泉往东 400 余唐里至素叶城（碎叶）：“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由此可见，玄奘所记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不同（参见图 1）。要明了个中原委，必需先确定千泉地点。

丁谦认为：千泉，地今无考；从该地西距怛逻私城百四五十里计之，千泉当在今俄属库穆阿雷；然自素叶至千泉断不止四百余里^[36]。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定，千泉在今哈萨克斯坦的梅尔克（又译麦尔基，Merke 或 Mepke，即阿拉伯地理著述中的 Mir-

ki 或 Barki) 附近; 在隋末唐初,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置牙帐于千泉, 这在《旧唐书·西突厥传》中有记载^[37]。梅尔克西至江布尔城(但逻斯)约 150 公里, 东距比什凯克城(原名伏龙芝, 此城附近的克留切夫废墟即阿拉伯地理著述中 Jul 城^[38])约 100 余公里, 那里至今仍是吉尔吉斯人在楚河与锡尔河之间最好的避暑胜地, 拥有良好的牧场和清澈的泉水。19 世纪后期, 舒勒尔(Schuyler)曾亲自考察梅尔克, 认定该地即古之千泉^[39]。而周连宽先生则认为, 千泉在江布尔城以东 140~150 (华) 里的阿该尔托布与泼得果尔诺之间及其附近地区^[40]。林梅村说, 千泉在塔拉斯河上游德米特里耶夫村附近^[41]。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公里)

玄奘所记(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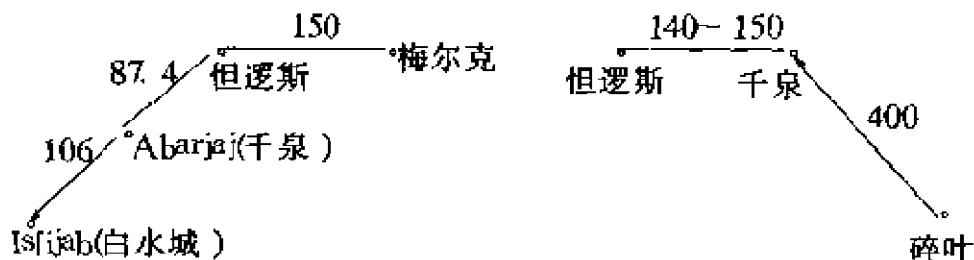


图 1

按: 梅尔克至江布尔城的实际里程 (150 公里), 比玄奘所记千泉至但逻斯城里程要多出 167~176 华里, 比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白尔钦 (Barki, 即梅尔克) 至但逻斯里程 (21 法尔萨赫, 约合 131 公里^[42]) 多出约 19 公里。梅尔克至碎叶故城 (阿克·贝欣姆) 里程, 今日实际约为 172 公里, 玄奘记为 400 余唐里 (约合 177 公里),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 38 法尔萨赫 (约 237 公里)^[43]。不过,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道路, 要从白尔钦往东北走, 绕道阿史不来城再往东南行, 所以里程要远 4 法尔萨赫 (约 25 公里) 左右。

综合上述材料, 玄奘所言“千泉”, 当在梅尔克一带, 玄奘

所记碎叶（素叶）至千泉里程大体准确；玄奘所记千泉西至怛逻私（怛逻斯）里程则有错简，少记约 85 公里。另外必须指出的是，玄奘所言千泉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千泉（Abarjaj，或 Barjaj），并非指称同一地方。至于屏聿（Bing-yul，或 Ming bu-laq）如何与白尔钦（Mirki，或 Barki，即梅尔克）相勘同，尚待有识之士作出解释。

而周连宽先生所考定之千泉方位则有误。这是因为，他注重于千泉与怛逻斯的相对位置，忽略了千泉与碎叶、伊塞克湖的相对位置。阿该尔托布、泼得果尔诺一线至碎叶故城当在 260 公里左右，这与玄奘所记碎叶至千泉里程（400 余唐里）大大不符。丁谦也犯了相同的错误。考虑到伊塞克湖及碎叶城位置的相对固定性，我们应该注重的是千泉与碎叶、伊塞克湖的对应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突厥下》的一条记述：“统叶护可汗……控弦数十万，徙廷石国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诸国……”^[44]。这个“千泉”位于石国之北，而非怛逻斯之东，它以石国为参照座标；其地理位置与玄奘所记不同，而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家所记相近。它的方位较为可信。

3. 关于恭御城

玄奘所记恭御城的具体地点，目前考古发掘成果尚不足以确认。季羨林等先生认为，此城大体上在今锡尔河支流乞儿乞克河与安格林河（Angren）流域，当在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说的“察赤（赭时）—伊腊克”（Chach—Ilak）地区之内^[45]。周连宽先生则认定该城在乞儿乞克（齐儿齐克）与帕尔塔拉齐克之间^[46]。以上两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把恭御城视为一个独自存在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只记恭御城而无白水城^[47]；在《新唐书·西域传》里，则只载白水城而没有恭御城。《释迦方志》和《新唐书·西域传》的有关记述都据自《大唐西域记》。所以，英国学者瓦特斯（T. Wattors）在《大唐西域

记》英译本中提出,“恭御”可能是突厥语 kuyu (意为泉城) 的译音;“泉”字可能是“白水”竖写时合二为一,白水城就是泉城,也就是恭御城;恭御城(白水城)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称的伊斯比(菲)加卜(Isbijab, 或为 Isfijab, “白水”之义)相同,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东南约 8 英里(约 13 公里)的赛拉姆村(Sayram, 即赛兰城)^[48]。但是,瓦特斯未能解释玄奘为何把恭御城和白水城分作两地记述之原因,也未能从里程上考定恭御城即白水城。

我们可以从里程上探寻相关诸城的方位。从怛逻斯至白水城,玄奘记为 200 唐里,约合 88.6 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 31 法尔萨赫^[49],约合 193.4 公里,两者相差 104.8 公里,相差一倍以上。今查两地实际直线距离,在 150 公里以上。玄奘所记肯定有误。而怛逻斯至恭御城,玄奘记为 400 唐里(约合 177 公里);这与穆斯林作家所记怛逻斯至白水城距离相比,仅少 16.4 公里(40 唐里)左右。难怪瓦特斯认为恭御城即白水城(参见图 2)。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公里)

玄奘所记(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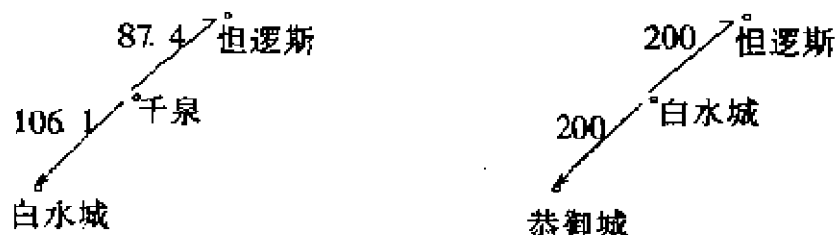


图 2

白水城至赭时里程,玄奘记为 440~450 里(约合 194.7~199.3 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则记为 19.7 法尔萨赫(约合 122.6 公里),玄奘所记比后者多出 72~76.7 公里。为解决此矛盾,周连宽先生把古赭时国都定在今塔什干以西约 50 公里的旧

石城。但如此勘定又使玄奘以后的行程不符。所以，苏联考古学者把古赭时国都定在今乞儿乞克河附近的 Binkath 废城（详见前述）。看来，问题仍出在白水城和恭御城上。

按：如果恭御城即白水城，则玄奘所记恭御城至赭时的里程（240~250 唐里，约合 106.3~110.7 公里），与穆斯林著述中白水城至赭时国里程相比，仅少 12 公里左右，两者大体吻合；这也与今日里程相符。但玄奘为何把这两个地名分作两地来记呢？

赛拉姆（白水城）至塔什干城北实际直线距离约为 120 公里，与穆斯林地理学家所记相符。另外，从怛逻斯至赭时的总里程，中外双方所记大体相符：玄奘记为 650 唐里，约合 287.4 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有 50.7 法尔萨赫（约合 316 公里），而古达玛记述的捷径（中途乘船）仅有 41 法尔萨赫（255.8 公里）^[50]。

从里程上看，玄奘所记白水城之方位，正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千泉相当；而前者所记恭御城，正与后者所记白水城方位相当。显然，或是玄奘把恭御城、白水城前后次序倒错，恭御城即突厥语“泉城”（kuyu）的对音，即穆斯林著述中的千泉^[51]；或是玄奘所记两城次序未错，“白水”或许即“泉”字之讹，“白水城”应为“泉城”，为穆斯林所记之千泉（Abarjaj，或 Barjaj），而“恭御”并非突厥语 kuyu 的对音，恭御城即穆斯林所记之白水城。第三种可能则是，玄奘所记白水城即 Isfijab，而其记里程有误，应另比定恭御城之方位。但这种可能微乎其微。

4. 关于筱赤建城

筱赤建，又作弩室羯。瓦特斯将其对应为 Nujikkend，并认为该词有可能代表了突厥语复合词 Nujabahkend，意为“贵人之地”^[52]。但更为流行的观点是：筱赤建是中世纪阿拉伯地理著述中 Nujakath、Nujikath 或 Nujkath 等词的音译，为突厥语“新城”之意^[53]。宋岷先生把“筱赤建”对应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道里邦国志》所记之“下努舍疆”(Nashsjan al-Sufla); 下努舍疆西距怛逻斯 3 法尔萨赫 (18.7 公里), 西距白水城 34 法尔萨赫 (212 公里)^[54]。丁谦认定, 笈赤建即《西游记》之赛兰, 《西使记》作赛蓝, 即琛姆罕特 (奇姆肯特) 城东之赛喇穆 (赛拉姆) 城^[55]。

显然, 丁谦把笈赤建和白水城的方位搞混淆了。赛拉姆应是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白水城的所在地, 而非笈赤建国。可能由于今本《大唐西域记》所记白水城和恭御城的方位、里程之混乱, 丁谦未能确定恭御城之方位。这导致他误定笈赤建方位。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 白水城 (赛拉姆) 东至怛逻斯有 31 法尔萨赫 (193.4) 公里; 玄奘说, 笈赤建至怛逻斯 440~450 唐里 (194.6~199 公里)。从里程上看, 笈赤建确与赛拉姆 (白水城) 相当。但是, “笈赤建”很难与 Isbijab (或 Isfijab, 白水城) 相勘同。而且, 如果把赛拉姆勘定为笈赤建, 那么玄奘所记白水城、恭御城无法与穆斯林所记和实际里程相对应。

《新唐书·西域传上》记载: “白水城……南五十里有笈赤建国, 广千里, 地沃宜稼, 多蒲陶。又二百里即石国。”《新唐书·西域传下》则曰: “新城之国, 在石东北羸百里。有弩室羯城, 亦曰新城, 曰小石国城。后为葛逻禄所并。”^[56]

上述两条记述误差约有 100 里 (与石国之距)。从方位上看, “笈赤建”条记述更为明确, 但这条记述与玄奘所记“笈赤建国”方位不符。玄奘说, 笈赤建国在恭御城以南五十里; 而《新唐书·西域传》则称, 笈赤建国在白水城以南五十里。如果恭御城即白水城之说成立, 那么《新唐书》和《西域记》关于“笈赤建国”方位之记述, 大体上是吻合的。苏联考古学者把笈赤建城比定为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地区的汗阿巴德 (Ханабад)^[57]。汗阿巴德与白水城、塔什干的距离, 大致与《新唐书·西域传上》“笈赤建”条所记相符。这进一步证明恭御城即白水城之说 (参

见图3)。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公里)

玄奘所记(唐里)



图3

可是，为证实玄奘所记无误，周连宽先生把窳赤建城认定为今塔什干以东约25公里的养吉—巴沙儿^[58]。章巽先生等则把窳赤建国都城故址定为今哈萨克斯坦之奇姆肯特^[59]。

按：养吉—巴沙儿至周连宽先生所比定之赭时国都（塔什干以西约50公里的旧石城）为150华里；而玄奘称，窳赤建国西至赭时国200余唐里（177华里以上）。养吉—巴沙儿东至赛拉姆（白水城，或玄奘所言之恭御城）约97公里，这与《大唐西域记》所记恭御城至窳赤建里程（40～50唐里）相差太大。周先生之误显而易见。究其原因，他把玄奘所记白水城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白水城相等同。

赛拉姆位于奇姆肯特之东南；玄奘称，恭御城（穆斯林著述中的白水城）在窳赤建国之北。因此，章先生之说也难以成立。我们应当在赛拉姆（白水城）之西南去勘定窳赤建国故址，而不是在赛拉姆之北。相形之下，苏联学者之说较为可信。

至于“窳赤建”、“新城”与“下努舍疆”三个地名，显然不能勘同。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下努舍疆，远在白水城（赛拉姆）以东约212公里，尚在怛逻斯以东约18.7公里；玄奘所言之窳赤建，在怛逻斯以西440～450（唐）里，在恭御城之西（南）40～50里。因此，窳赤建与下努舍疆不能相勘同。而“新城”一地，在《新唐书》中又有两说：一是《西域传》中所记

“新城之国，在石东北羸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国”。二是《地理志》摘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中的记述：碎叶西四十里至新城，再二百四十里至怛逻斯^[60]。贾耽所言之“新城”，距碎叶城仅40唐里左右（约35华里），正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言之奈瓦契特（Nawakit）城地望相当；奈瓦契特位于碎叶城以西3法尔沙赫（18.7公里）^[61]。因此，张广达师也认为，奈瓦契特城即新城；Nawakit，其意为“新城”^[62]。值得注意的是，从碎叶西行3法尔萨赫至奈瓦契特，再顺鲁凯布（或泽卡特）路走1法尔萨赫，可至“上”努舍疆。也许贾耽把“上”努舍疆（八儿思罕）混同为“下”努舍疆，从而把上努舍疆等同为新城了。

不管怎样，贾耽所言之新城与玄奘所称之筱赤建国不是同一地方，与《新唐书·西域传》之新城也不是同一地方，这是可以肯定的。

三、玄奘行程考辨

玄奘所记，除了上述诸城方位与伊斯兰地理学家所记不一，与今日考古成果不相符合以外，其道里走向及里程也与穆斯林著述有较大差异。试比较如下：

玄奘之记述：（单位：唐里）

碎叶—400—千泉—140～150—怛逻私城—200—白水城—
200—恭御城—40～50—筱赤建国—200—赭时—1000—窳堵
利瑟那国（苏对沙那）—500—飒秣建国—900以上—捕喝
国—400余—伐地国
飒秣建—300余—羯霜那国

阿拉伯地理学家：(单位：公里)^[63]

碎叶（库巴勒）—212.2—阿史不来城—49.9—俱兰—
87.4—下努舍疆

——18.7—怛逻斯—87.4—千泉（Abarjaj）—106—白水城
—122.6—

—赭时—156—扎敏—106.1—撒马尔罕—243.4—布哈拉—
53.4—拜坎德（伐地国）^[64]

赭时—156—扎敏—218.4—费尔干纳

扎敏—56.2—苏对沙那

要明了上述记载的异同，首先要确定唐代里程长度。关于唐代里程长度，学者歧异较多^[65]。唐里有大、小里之分。胡戟先生分析了存世 17 把唐尺的长度和有关文献记载，考定 1 唐大里为 531 米，当今 1.06 华里；1 唐小里为 442.5 米，当今 0.88 华里；度地一般用唐大里（如唐长安城周长），也有袭用旧法而用唐小里者（如《元和郡县志》卷 1 所记京兆西安至东都洛阳里程）；小里还用于测晷景^[66]。专治中国科技史的闻人军考定，1 唐大里为 531.486 米；1 唐小里为 442.905 米，与隋里相同，50 唐小里合 44.29 华里；天文大地测量及道里记载一般用唐小里^[67]。玄奘等所记之“里”，应是唐小里。而周连宽先生则认为，唐里与古汉里相同，1 古汉里合 0.3909 公里，1 公里等于 2.558 古汉里^[68]。后说备考。笔者从闻人军说。

按 50 唐里为 44.29 华里计，碎叶至怛逻斯段，玄奘所记里程数太少，仅有 550（唐）里左右，约合 243.6 公里；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里程则有 368.1 公里，两者相差约 124.5 公里。若以 1 古汉里等于 0.3909 公里计，两者相差更大，达到 153.1 公里。即便以唐大里折算，玄奘之记折合 291.5 公里，也

相差 76.6 公里。从今日实际里程看，阿克·贝欣姆废城（碎叶故城）至江布尔城（怛逻斯），距离当在 330 公里以上。玄奘所记里程数太少，显然有误。但令人奇怪的是，江布尔城至伊塞克湖西端实际距离是 440 公里左右，这与玄奘所记大清池至怛逻斯里程（1050 唐里，约合 464 公里）大体符合。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难道这段里程玄奘所言前后有所错简？（参见图 4）

今日实际里程（公里）

玄奘所记（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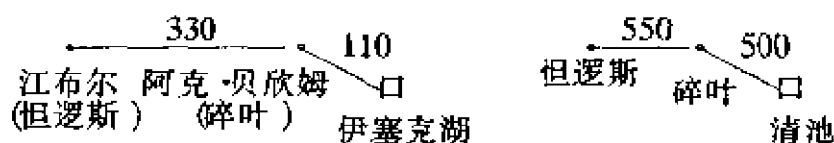


图 4

热海（伊塞克湖）至碎叶里程，实际上约为 110 公里；贾耽记为 280 里（约合 124 公里），比玄奘少记了 220 里，与实际里程相距不大。显然，玄奘多记了 220 里。看来，玄奘有可能把碎叶至怛逻斯的里程数少记了 220 里，并把这段里程数计在大清池至碎叶这段里程上，致使大清池至碎叶段多记了 220 里。否则，就是玄奘所记大清池至碎叶里程数（500 里）不误，玄奘极可能远离伊塞克湖岸而西行（如前所述）；但是，他把碎叶至怛逻斯里程少记了 220 里。无论如何，他把碎叶至怛逻斯里程少记了 220 里，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怛逻斯至白水城，玄奘比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少记了 104.8 公里；从白水城至赭时，玄奘又比后者多记约 72~76.7 公里。而怛逻斯至赭时里程，玄奘记为 650~640 里（287.9~283.5 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 50.6 法尔萨赫（316 公里），玄奘所记少约 28 公里；如果 1 法尔萨赫以 6 公里计，玄奘所记仅少约 16 公里，已基本上接近穆斯林地理学家所记。显然，白水城的方位是关键。如果玄奘错把白水城、恭御城次序记颠倒

了，或是玄奘所记恭御城即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白水城，那么玄奘里程数大体正确；否则，就是玄奘里程数有误（详见前考：“关于恭御城”）。

可以确认的是，碎叶——怛逻斯——白水城里程，玄奘所言有较大错乱。而且，这段行程的走向，玄奘所记也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述略有差异。从碎叶至怛逻斯，玄奘仅言经千泉一地，而且此千泉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千泉”方位不同；两地之间著名的阿史不来城和俱兰城，玄奘只字未提。这其中原因，抑或玄奘省略记述，抑或玄奘未经历这些地方，就非今人所能探究明白的了。值得一提的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道里，与贾耽所记行程走向是一致的。（详见第二章考辨）

至于赭时国以西里程，玄奘所言也颇为不明。研究者一般认定玄奘未到过怛捍（费尔干纳），而由赭时到窣堵利瑟那国^[69]。从赭时到窣堵利瑟那国（苏对沙那）里程，《大唐西域记》卷一、《慈恩传》卷二均记作千余里（443公里以上）；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则称，从赭时经扎敏转西南行至苏对沙那为33法尔萨赫，约合206公里。玄奘等所记多出237公里以上，误差在一倍以上。玄奘所记里程显然太多。

石国至怛捍里程，玄奘说有千余里（约合440公里）。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拔汗那西至石国58法尔萨赫（361.9公里）。从拔汗那 Akhsikath 古城经俱战提至石国（塔什干），实际里程约为395公里。玄奘多记45公里。

窣堵利瑟那至飒秣建国行程及里程数，玄奘所记也颇为不明。《慈恩传》卷二记述：从窣堵利瑟那国“又西北入大磧，无水草，望遗骨而进，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释迦方志·遗迹篇》也记曰：从窣覿（堵）利瑟那国“又西北入大磧，行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周连宽先生考证说：窣堵利瑟那国在今乌拉—求伯（乌拉—秋别）；玄奘从乌拉—求伯向西稍偏北行约130公里，经

扎敏到达季扎克 (Jizak), 然后转西南行, 越塔美兰 (Tamerlan) 关隘, 计行 90 公里, 乃抵飒秣建国, 全程共计 220 公里, 与《慈恩传》、《大唐西域记》所记两地距离 500 余唐里正符 (以 1 公里等于 2.558 唐里计)^[70]。(参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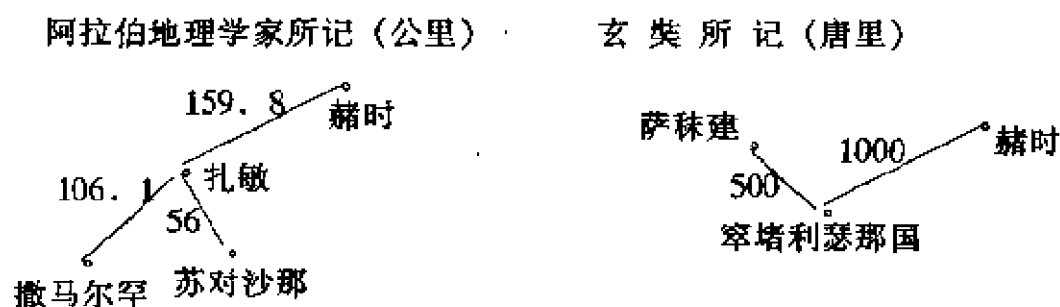


图 5

按: 从苏对沙那 (罕堵利瑟那) 至撒马尔罕, 必经扎敏; 从苏对沙那至扎敏,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均记为 9 法尔萨赫 (约 56 公里); 扎敏至撒马尔罕有 17 法尔萨赫 (约 106 公里)^[71]。玄奘所记行程从疏时至苏对沙那, 再到撒马尔罕, 除非从疏时可以不经扎敏而达苏对沙那, 否则就要在扎敏与苏对沙那之间走一个来回, 多走约 112 公里; 而且, 苏对沙那到撒马尔罕为 26 法尔萨赫, 约合 162 公里, 这与玄奘所言“五百余里” (221.5 公里以上)、与周先生所推定之 220 公里相差甚大。乌拉一秋别经扎敏到季扎公里程, 周连宽先生推算为 130 公里, 这也比实际里程多出 20 公里左右。看来, 周先生之比定有缺陷。而《新唐书·西域传》称: 罕堵利瑟那“北至石、西至康皆四百里许” (约合 177 公里)。这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述和实际里程基本符合 (北至石 400 里许, 少记约 29 公里)。

从撒马尔罕 (飒秣建) 到布哈拉 (捕喝) 的行程, 玄奘记得非常简要, 且言“至”, 不言“行”。季羨林等先生推测, 玄奘极可能是从飒秣建国直接到羯霜那国 (史国, 即渴石, 在撒马尔罕

以南 75 公里处的萨赫里萨布兹；萨赫里·萨布兹西北至布哈拉 161 公里），而未再西行捕喝国^[72]。从石国至怛捍国里程，《隋书·西域传》“石国”条记为 600 里（约合 265.7 公里）^[73]，玄奘则称有千余里（443 公里以上），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曰 60 法尔萨赫（合 374.4 公里，途经扎敏）。玄奘所记比后者多出约 69 公里，《隋书》所记则少了约 109 公里。

飒秣建以西里程和行程，玄奘所记也有疑点。《大唐西域记》记：

劫布咀那国—300 余里（133 公里）—西至屈霜你迦国—200 余里（88 公里）—西至喝捍国—400 余里（177 公里）—捕喝国

劫布咀那，王治瑟底痕城（即 Ishtikhan，或 Ithtakanj 之对音），即今撒马尔罕西北 50 公里的伊什特汗^[74]。屈霜你迦（即库沙尼亚）国都城故址在今撒马尔罕西北 12 法尔萨赫，约合 75 公里^[75]。伊什特汗至库沙尼亚有 25 公里。喝捍，即开尔米尼亚（今克尔米涅市，Kermineh），西距布哈拉 17 法尔萨赫（古达玛说，仅有 14 法尔萨赫），合 106 公里^[76]。今日布哈拉至伊什特汗公路，循泽拉夫善河（那密水）南岸东去，里程约为 210 公里；据此推算，屈霜你迦至喝捍当为 79 公里。《新唐书·东安国传》称：东安东距何二百里许（85 公里以上）^[77]。这与我们的推算基本相同。显然，劫布咀那至屈霜你迦，玄奘多记 108 公里；屈霜你迦至喝捍，玄奘多记 9 公里，与穆斯林地理学家所记基本符合；喝捍至捕喝，玄奘多记 71 公里（如按古达玛所记 14 法尔萨赫计，则玄奘多记约 89.6 公里）。此段路程，玄奘多计凡 188 公里。

萨秣建西行路线，玄奘记曰：萨秣建——弭秣贺国（即米国，此为 Maymurgah 之对音，位于布哈拉至那色波的大路上）——北至劫布咀那国——西至屈霜你迦国。如此走法，似乎在撒马

尔罕以西地区从南到北游历，而非西去之路。据穆斯林地理学家记载^[78]，从伊什特汗到布哈拉，必经撒马尔罕，因此不可能走出玄奘所称撒马尔罕——伊什特汗——库沙尼亚这么一条路线。而且，布哈拉到伊什特汗，绕经撒马尔罕，全程为 293 公里左右；不绕道撒马尔罕，全程为 210 公里左右（今日里程），均与玄奘所说之 900（敦煌写本残卷 S.2659 作 600）唐里不符合。但是，今日撒马尔罕到布哈拉公路，又是从撒马尔罕西北行至伊什特汗，然后向西南行至布哈拉，全程约有 260 公里。这说明玄奘所言路线是可行的，只是里程数有误（参见图 6）。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公里）

玄奘所记（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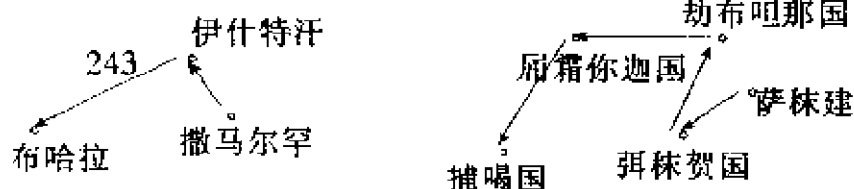


图 6

至于布哈拉以西里程，玄奘并未亲履，其记采自传闻，故错乱在所难免，不一而足。例如，布哈拉至拜坎德（伐地国），古达玛记为 53 公里^[79]，《大唐西域记》记为 400 余里（177 公里以上），《慈恩传》记作百余里（44 公里余）。显然，后者所计较为准确。丁谦把伐地国比定为木鹿，即“隋称穆国者”^[80]。木鹿东距布哈拉 343 公里；穆国应是阿姆河畔的阿穆勒城^[81]。丁谦之说显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 4 点结论：

1. 在众多学者多年竭尽心智求正玄奘所记乃翔实、可靠之后，我们想问一句：玄奘所记是否间或有误，错在哪儿？本于这种求实精神，笔者经过上述辨析而认定：玄奘和阿拉伯地理学家

所记中亚诸城(国),有一些是各自方位不一,如千泉与 Abarjaj (或 Barjaj),双方所记的白水城;有一些则是难以相互勘同,如筱赤建与(下)努舍疆、新城。而且,贾耽所言新城与玄奘所称之筱赤建国、与《新唐书·西域传下》之新城也不能勘同。周连宽先生所比定中亚诸城的方位,均有疑问。从里程上看,玄奘所记白水城之方位,正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千泉相当;而前者所记恭御城,正与后者所记白水城方位相当。显然,或是玄奘把恭御城、白水城前后次序记颠倒,恭御城即突厥语“泉城”(Kuyu)的对音,即穆斯林著述中的千泉(Abarjaj,或 Barjaj);或是玄奘所记这两城的次序未错,“白水”或许即“泉”字之讹,“白水城”应为“泉”城,为穆斯林所记之千泉,而“恭御”并非突厥语 Kuyu 的对音,恭御城即穆斯林所记之白水城。笔者倾向于第一种推测。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我们没有必要否认苏联考古成果,而另比定玄奘所记中亚诸城的地点,以证玄奘所记无误。

2. 在碎叶、怛逻斯、白水城故址分别为阿克·贝欣姆、江布尔和赛拉姆的前提下,玄奘所记碎叶——怛逻斯——白水城的行程及里程有较大错乱;从赭时到飒秣建国行程及里程也颇多疑问,飒秣建国以西里程也是不足凭信。相形之下,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碎叶至布哈拉的行程及里程更为可信。

3. 玄奘所记中亚行程和诸城里程,与《隋书》、《新唐书》有关记述有很大出入,而后者记述相对准确一些。这说明《新唐书》编修者并没有不加分辨地采用玄奘之说。古人也许已经意识到玄奘之误了。

4. 碎叶——怛逻斯段行程,穆斯林所记路线与玄奘所记不一,而与贾耽所言大体一致。贾耽的某些记述,胜于玄奘。但贾耽所记里程数也有错讹,不足一一凭信,留待以后详考。从玄奘与穆斯林舆地学家及贾耽所记不一来看,碎叶至怛逻斯的交通路

线曾发生变化,7 世纪的交通路线与 8 世纪的有所不一。这很可能与西突厥十姓故地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注释

- [1] 敦煌写本残卷 S.2659 作百余里,参见《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向达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12 页。
- [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作《慈恩传》)卷一,作百余里。
- [3] “西南”,《慈恩传》作“西”。
- [4] S.2659 作百余里。
- [5] 《大唐西域记》卷一。据季羨林、张广达等《大唐西域记校注》本(以下称《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
- [6] 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 年第 3 期,第 119~140 页。
- [7] V.Minorsky, *Tamim ibn Bahr's Journey to the Uyghurs*. BSOAS, XII - 2, pp.275~305, p.292 note 1, London, 1948.
- [8]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中译本(以下称胡尔达兹比赫书),宋岷译,第 30~31 页,中华书局 1991 年(附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法尔萨赫(Farsakh)是古波斯及阿拉伯路程单位名。《伊斯兰百科全书》英文第一版,第 3 卷,第 70 页(莱顿,1927 年)云,1 法尔萨赫为马走 1 小时的路程,1 波斯法尔萨赫约合 6.232 公里,1 阿拉伯法尔萨赫为 5.763 公里;同书第二版(莱顿,1983 年),第 2 卷,第 812~813 页称,伊斯兰时期 1 法尔萨赫为 5.985 公里,现代 1 法尔萨赫为 6 公里。宋岷认定,1 法尔萨赫约合 6.24 公里(胡尔达兹比赫书,第 1 页中译注 3)。张广达先生说,中古 1 法尔萨赫约为 6 公里(参见《碎叶城今地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 5 期,第 70~82 页)。章巽先生认为,法尔萨赫折合今制很不规则,约为 3.7~6.7 公里(参见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第 30 页,巴蜀书社 1989 年。以下作《导读》)。考虑到古代道里较为迂曲,以及宋岷先生意见,本文把 1 法尔萨赫折算为 6.24 公

里。

- [9] E.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中世纪东亚史料研究》), Vol. II, p. 94. London, 1967. V. V. Barthold,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中亚史研究四种》), Vol. III, p. 77. Leiden, 1962. 按: 从今代地图上看, 赛拉姆位于奇姆肯特之东南, 而非正东方。又按: 宋岷认定白水城在今奇姆肯特城。参见胡尔达兹比赫书, 第 30 页中译注 2。丁谦认为, 白水城在咀逻斯(奥利阿塔, 今名江布尔)西南, 今名曼特肯城, 城滨阿克苏河; 阿克苏, 译言白水也; 恭御城未详。参见《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 第 3 页, 《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 1915 年。关于此说之误, 详见本文“斡赤建”考。
- [10] 别连尼茨基等:《中亚中世纪城市》俄文本, 第 195~198 页, 列宁格勒 1973 年。(A. M. Беленицки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Город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Ленинград, 1973.)
- [11] 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
- [12] 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以下称《丛稿》), 中华书局 1984 年, 第 97 页。
- [13] 此记有误。苏对沙那并非汉代贰师城地。参见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 289 页之考订, 中华书局 1981 年。
- [14] J. Marqart, *Wehrot und Arang* (《乌浒水与那密水考》), pp. 81, 162, Leiden, 1938. 引自《校注》, 第 86~87 页。V.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 以下作《突厥斯坦》), p. 166, London, 1977. 马迦特、巴托尔德均认为, 苏对沙那国治在今乌拉秋别。刘迎胜先生认为, 唐代苏对沙那城遗址在今乌拉秋别市一高地上, 该城延续时间从公元 5~10 世纪。后来苏对沙那统治中心由此南迁 25 公里, 人们在那里

- [17] *Hudud al - Alam*, pp.22, 112. London, 1970. 另参见《突厥斯坦》，第98页。
- [18] 同[8]书，第28页，及该页中译注4。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宋峴译，中华书局1991年。以下称古达玛书），第216页说，开尔米尼亚西距布哈拉14法尔萨赫。另参见《突厥斯坦》，第98页。
- [19] 《新唐书》，第6245页。
- [20] 引自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28页注二，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
- [21] 参见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
- [22] 古达玛书，第215~216页。
- [23] 〈“草原丝绸之路”考查简记〉。
- [24] 内田吟风：〈吐火罗国史考〉，中译文载《民族译丛》，1981年第2、3期。
- [25] G. Clauson, *Ak Beshim—Suyab*. JRAS, No. 1, 1961, pp. 1~13. 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
- [26] 《丛稿》，第88页。周连宽：〈唐代西域裴罗将军城考〉，《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 [27] 引自《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第114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 [28]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2页。
- [29] 《丛稿》，第88页。
- [30] 参见《校注》所附地图。
- [31] 伯希和：〈玄奘记传中之千泉〉，参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5~6页。
- [32] 参见《导读》，第122页。
- [33]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第8页。
- [34]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0页。
- [35] 古达玛书，第217页。
- [36] 丁谦：《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第3页。
- [37]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44页；木村日纪、小林元、松田寿男合编：

《中央亚细亚史、印度史》附新旧中央亚细亚要图，昭和 15 年，东京，平凡社。引自《丛稿》，第 103 页注释 29。

- [38] 参见《碎叶城今地考》。
- [39] 引自《导读》第 122 页。梅尔克至比什凯克里程，《导读》称有 120 公里；刘迎胜先生实地考察，称公路里程为 100 余公里。参见《“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
- [40] 《丛稿》，第 91 页。
- [41] 林梅村：《西突厥汗庭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 年 3 期，第 82~87 页。
- [42]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 31 页。
- [43] 同上书，第 31~32 页。
- [44]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页 6056。
- [45] 《校注》，第 80 页注释（一）。
- [46] 《丛稿》，第 97 页。
- [47] 道宣：《释迦方志》，第 22 页，范祥雍点校本，中华书局 1983 年。
- [48] Thomas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大唐西域记》英译本) Vol. I, p. 84. London, 1904.
- [49]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 30~31 页。
- [50] 同上；另参见古达玛书，第 216~217 页。
- [51] 此推测乃吸收黄时鉴师意见。
- [52]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I, p. 75~78.
- [53] 《校注》，第 81~82 页；《导读》，第 29, 126 页。努舍疆 (Nushajan) 之名，早在 1889 年即被托玛舍克 (W. Tomaschek) 订正为八儿思罕，也即拔塞干 (Barskhan)。参见托玛舍克《评德·胡耶撰《论思戈与玛果戈墙》一文》，载《维也纳东方学杂志》第 3 卷，第 103~108 页，转引自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注释 17。按：此努舍疆指上努舍疆，而非下努舍疆。另据苏北海先生研究，“拔塞干”之名是由西突厥弩失毕五俟斤中的拔塞干噉沙钵俟斤之名而来的。参见苏北海：《中亚塔拉斯——江布尔地区的历史演变》，载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85~306 页。冯承钧先生也认定新城即斂赤建（弩室羯），也即《新唐书·地理志》

- “姑墨州都督府”条之弩羯城。参见冯承钧《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2年，第69页。
- [54]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0~31页，及31页中译注4。
- [55] 《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第3页。
- [56] 《新唐书》，第6233，6260页。
- [57] 《中亚中世纪城市》俄文本，第198页。
- [58] 《丛稿》，第97页。
- [59] 《导读》，第29页。
- [60] 《新唐书》，第1150页。
- [61]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云，奈瓦契特至碎叶城（Kubal）3法尔萨赫；古达玛则说有4法尔萨赫。参见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2页；古达玛书，第218~219页。关于下努舍疆，尚可参考下列阿拉伯地理学家著述：Istakiri, *BGA*, i, 328~331; Mukaddasi, *BGA*, iii, 48, 264~265。
- [62] 《碎叶城今地考》。
- [63] 主要据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8~35页。宋岷云，拜坎德（Baykand）为《隋书》卷八三之毕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之毕。参见第28页中译注3。
- [64] 布哈拉至拜坎德里程，据古达玛书第215页增补。
- [65] 关于唐代里程长度的不同换算，《丛稿》第101~102页注释8有详细介绍。
- [66] 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34~41页。
- [67] 闻人军：《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载《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第122~132页。
- [68] 《丛稿》，第122页。
- [69] 《校注》所附“玄奘西行路线图一”；《丛稿》第120页；另参见《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第4页。
- [70] 《丛稿》，第101页注解8，第120页。
- [71]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2页；古达玛书，第219~220页。
- [72] 《校注》，第91页。

-
- [73] 《隋书》，第185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
- [74] 《校注》，第91~92页；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9页中译注3。
- [75] 《导读》，第30页。
- [76]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8~29页。
- [77] 《新唐书》，第6245页。
- [78] 同上书，第28~29页。
- [79] 古达玛书，第215页。
- [80]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第14页，《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1915年。
- [81]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7~28页；古达玛书，第215~216页云，木鹿至布哈拉有58.5法尔沙赫（约合365公里）。
-

第二章 8~10 世纪中西陆路交通

——《新唐书·地理志》考辨

公元 8~10 世纪，中亚通往中国之路与玄奘西行时有所不同。而且，中亚九姓胡东来之路，与汉人西行东还之路也有所不同。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新唐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述了这个时期中西陆路交通路线的变化。这些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中亚九姓胡与唐朝的交往的途径及其相互认识。

一、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之记述

公元 8~10 世纪，中亚到中国的道路起于呼罗珊的木鹿 (Merv, 又译作谋夫)。这条道路又称大呼罗珊路。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Ibn Khordādhbeh, 或作 Khurradad-hbih)、古达玛 (Qudāmāh) 等详细记述了这条道路的走向。即：

从谋夫至阿穆勒 (Amāl, 有 36 法尔萨赫路程；1 法尔萨赫约合 6.24 公里)，渡过乌浒水 (阿姆河)，到布哈拉 (阿穆勒到布哈拉路程，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有 19 法尔萨赫，古达玛称有 22.5 法尔萨赫)^[1]，顺“王道”经库克 (Kūk, 距布哈拉 10 法尔

萨赫)至撒马尔罕(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布哈拉至撒马尔罕 39 法尔萨赫;古达玛说,两地相距 37 法尔萨赫)^[2],再东至位于荒野(沙漠)中的扎敏(Zāmīn, 17 法尔萨赫);从扎敏道分两叉,一条通向石国(赭时)、突厥,另一条通向拔汗那。

通石国之路从扎敏出发,渡赭时(石国)河、“突厥河”至赭时(即石国,今塔什干)。撒马尔罕至石国 42 法尔萨赫,扎敏至石国 25 法尔萨赫。从石国至银矿(即伊腊克 [Ilāq] 和比良坎克 [Bilānkank] 两地) 7 法尔萨赫,再至铁门(Bāb al-Hadīd, 2/3 法尔萨赫),至库巴勒(Kubāl, 2 法尔萨赫)^[3],再至鹤尔凯尔德(Gharkard, 6 法尔萨赫)、白水城(Isbijab, 4 法尔萨赫),然后经沙拉布(Shārāb, 4 法尔萨赫)、白都贺开特(Badūkhkat, 5 法尔萨赫)、台姆塔吉(Tamtāj, 4 法尔萨赫)到艾巴尔伽介(Abārjāj, 即千泉? 4 法尔萨赫),过“河上旅馆”(Manzil 'alāal-Nahr, 6 法尔萨赫),渡白尔库阿布河至久维克特(Juwikt, 5 法尔萨赫),再到怛逻斯(Tarāz, 3 法尔萨赫)^[4]。从石国至怛逻斯凡 50.7 法尔萨赫,约合 316 公里;从白水城至怛逻斯计 31 法尔萨赫^[5],约合 193.4 公里。

上述诸地,千泉是疑问之处。千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 Abārjāj,他称此地有丘冈,环丘冒出水泉千眼,汇为东流之河;人们在此地猎取黑雉。此地位于怛逻斯城以西 14 法尔萨赫(约合 175 华里),在怛逻斯与白水城之间,距白水城 17 法尔萨赫(约 212 华里)。古达玛把千泉记为 Bārjaj;关于其方位和道里,古达玛所记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相同。而玄奘则说:千泉位于怛逻斯城以东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唐里处(约合 124~133 华里),千泉往东四百余唐里至素叶水城(即碎叶);“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6]。由此可见,玄奘所记与阿拉伯地理学家之记是不同的。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公里)

玄奘所记(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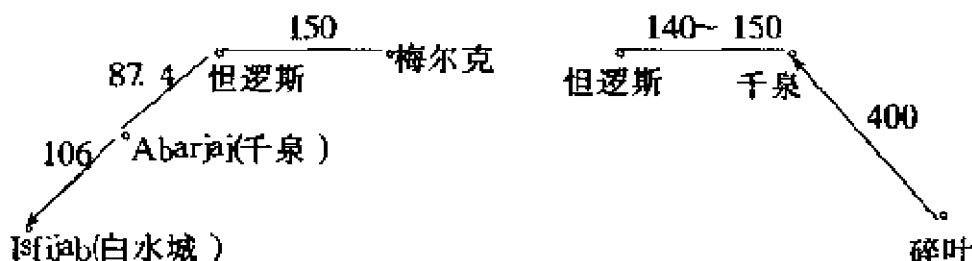


图 7

笔者认为玄奘所言千泉在今哈萨克斯坦的梅尔克 (Merke, 即阿拉伯地理著述中的 Mirkī 或 Bārkin) 附近, 与伊斯兰舆地学家所记 Abārjāj (或 Bārjaj) 不是同一地 (详见第一章第二节考辨)。梅尔克至江布尔城的实际里程, 比玄奘所记千泉至咀逻私 (恒逻斯) 城里程多出 167~176 华里, 比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白尔钦至恒逻斯里程 (21 法尔萨赫) 多 38 华里左右。后者所记与实际里程较为相近。

从恒逻斯又分两道: 一道至库卧义开特 (Kwaykat, 至此地 7 法尔萨赫。《塔米姆行纪》记为 K. Wāk. b, 为 Kīmāk 人——即寄蔑人居留之地)^[7], 然后走 80 天至开义玛克王国 (Mulk Kaymāk, 即寄蔑, 位于巴尔喀什湖西北方); 另一道从恒逻斯至下努舍疆 (Nashajan al-Sufla, 有学者将其比定为《新唐书·波斯传》之弩室羯城, 又曰小石国城, 《大唐西域记》作笈赤建国。因时代变迁, 地域或有变动, 9~10 世纪该城距恒逻斯 3 法尔萨赫)^[8], 再经开苏里巴斯 (Kasrī Bās, 2 法尔萨赫, 这是一块热地, 葛逻禄人在此过冬)^[9]、库勒晓伯 (Kul Shawb, 4 法尔萨赫)、吉勒晓伯 (Jil Shawb, 4 法尔萨赫)、俱兰村 (Kūlān, 4 法尔萨赫)、白尔钦村 (Barkīn, 4 法尔萨赫。松田寿男认为, 此地为古之千泉)、艾斯白拉 (Asbarah, 4 法尔萨赫, 即阿史不来城, 属石国, 山中产绿松石)、努兹开特 (Nūzkat, 8 法尔萨赫)、

胡兰杰瓦 (Khuranjawân, 4 法尔萨赫) 村镇、久勒 (Jûl, 4 法尔萨赫, 学者比定为今伏龙芝附近克留切夫废墟)^[10]、萨利赫村 (Sârigh, 7 法尔萨赫, 有学者比定为伏龙芝东 33~34 公里的克拉斯诺列契村边的废墟)^[11], 到达突骑施 (al-Tunkashî) 的可汗城 (Madînat Khâqân, 4 法尔萨赫。古达玛称此地为突厥可汗村)^[12], 再至奈瓦契特 (Nawâkit, 4 法尔萨赫, 该地位于楚河河谷上游)^[13]、库巴勒 (Kubâl, 3 法尔萨赫, 即碎叶城, 故址在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玛克西南 8~10 公里的阿克·贝欣废墟)^[14], 然后东行至上努舍疆 (即上拔塞干、八儿思罕 [Barskhan])^[15], 它是中国的边界。由碎叶 (库巴勒) 到中国边界 (上努舍疆), 驼队走 15 天, 突厥邮差仅用 3 天即可跑完这段路。从怛逻斯至碎叶城, 全程 59 法尔萨赫, 约合 368 公里^[16]。

以上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记述。古达玛则记述了另一条道路, 即: 从赭时出发, 经过军营 (Mu 'askar, 2 法尔萨赫)、鹤尔凯尔德 (Gharkard, 5 法尔萨赫, 位于沙漠中)、艾斯比沙卜 (Asbîshâb, 4 法尔萨赫)、沙拉布 (Shârâb, 4 法尔萨赫, 位于沙漠中, 该地有两条大河, 即 Mawâ 河及 Yûran 河), 乘小船至白杜贺开特 (Badûkhkat, 4 法尔萨赫)、台姆塔吉 (Tamtâj, 5 法尔萨赫) 及巴尔伽吉 (Bârjâj, 4 法尔萨赫, 即千泉), 再至白尔库阿布 (Barkûâb) 河的河上旅舍 (6 法尔萨赫), 渡河至右岸 (南岸), 然后至沙窝格尔 (Shâwaghar, 3 法尔萨赫)、久维克特 (Juwîkt, 2 法尔萨赫) 及怛逻斯 (2 法尔萨赫)。从巴尔伽吉 (千泉) 至怛逻斯凡 13 法尔萨赫, 约合 81 公里。从怛逻斯城可到下拔塞干 (Nûshajân al-Asfal, 3 法尔萨赫), 再到群山中的开苏里巴斯 (Kasribâs, 2 法尔萨赫), 其地之左侧 (北方) 为古姆 (Qurnn), 古姆是葛逻禄国的第一个去处, 从古姆至开义玛克 (Kaymâk) 国边界 2 法尔萨赫。

古达玛又记: 从开苏里巴斯经库勒晓伯 (Kûl Shawb, 4 法

尔萨赫), 至俱兰 (Kūlān, 4 法尔萨赫, 位于沙漠中, 但逻斯到此地 14 法尔萨赫)^[17], 然后过富庶大城白尔钦 (Barkī, 4 法尔萨赫) 至阿史不来城 (Asbarab, 4 法尔萨赫), 再至大城努兹开特 (Nūzkat, 8 法尔萨赫)、胡兰杰瓦 (Khuranjawān, 4 法尔萨赫)、久勒 (Jūl, 4 法尔萨赫)、萨利赫 (Sārigh, 7 法尔萨赫), 然后到突厥可汗村 (Qaryatu Khāqān al-Turkiyyi, 4 法尔萨赫)^[18], 过开义尔米布拉卧 (Kayrmibrāw, 2 法尔萨赫)、奈瓦契特 (Nawākit, 2 法尔萨赫) 大城、班吉卡 (客) 特 (Banjikt, 2 法尔萨赫) 镇, 再至碎叶水城 (2 法尔萨赫)。奈瓦契特有大路通向上拔塞干 (1 法尔萨赫), 此大路名为泽卡特 (原文作鲁凯布, 张广达先生据加尔迪齐书校改——引注)。碎叶水 (Sūyāb) 城乃是两个镇, 一个叫“库巴勒” (Kubāl), 另一个叫“萨虎尔·库巴勒” (Sāghūr Kubāl)。从萨虎尔·库巴勒到上拔塞干, 驼队在有牧草和水源的路上行走 15 天 (约 75 法尔萨赫——引注), 突厥驿骑可用 3 天跑到。上拔塞干位于中国边界^[19]。

值得注意的是, 据古达玛所记, 萨虎尔·库巴勒往东走到上拔塞干, 要走 15 天; 往西退回到奈瓦契特, 再到上拔塞干仅有 5 法尔萨赫 (31.2 公里)。按: 奈瓦契特到位于伊塞克湖东南岸的上努舍疆 (即上拔塞干), 无论如何也不止 1 法尔萨赫路程。古达玛此处记述看来有误。

据古达玛记述, 通拔汗那 (费尔干纳) 的道路具体走向为: 从扎敏出发, 经萨巴特 (Sābāt, 2 法尔萨赫)、俱战提 (Khujandah, 10 法尔萨赫, 即今塔吉克斯坦苦盏市, 原列宁纳巴德), 然后又分为两叉, 一路通向石国和银矿 (伊腊克和比良坎克), 另一路途经沙姆葛尔 (Sāmghar, 5 法尔萨赫)、哈吉斯坦 (Khājistān, 4 法尔萨赫, 此地产盐, 石国、俱战提的食盐均出自该地)、土尔木甘 (Turmuqān, 6 法尔萨赫,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作 7 法尔萨赫)、巴布 (Bāb,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写作 Madi-

natu Bāb, 意为“门”城, 3 法尔萨赫), 再至拔汗那城 (又称 Akhsikt, 4 法尔萨赫)^[20]。然后从拔汗那到固巴 (Qubā, 10 法尔萨赫) 城、窝什 (Ush, 10 法尔萨赫, 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城。宋岷认为, 它就是汉代的贰师城^[21]) 及乌兹坎德 (Uzkand, 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根城, 靠近中国边界), 再走 2 天 (约 10 法尔萨赫) 到艾特巴什 (Atbāsh, 《元史·西北地附录》作阿忒八失, 其名存至今, 今译阿特巴希), 艾特巴什城位于吐蕃和拔汗那之间的高原 (即葱岭, 帕米尔高原) 山路上, 从这儿走 6 天不见人烟的山路到上努舍疆 (上拔塞干), 从上努舍疆至“土胡兹胡尔” (al-Tughuzghur, 又译托古兹古思, 即九姓乌古斯, 回鹘人的一支) 可汗的地界有 6 天行程^[22];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则说, 从上努舍疆至土胡兹胡尔可汗都城有 3 个月行程, 该城有 12 座铁门, 许多人信奉袄教, 该城左边 (即北方) 是开义玛克王国, 该城距中国 300 法尔萨赫 (约 1872 公里)^[23]。

二、贾耽《皇华四达记》之记述

《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下》摘录了唐德宗贞元年间 (785~805) 宰相贾耽所撰《皇华四达记》, 记载了由安西入碎叶、怛逻斯的道路。贾耽记述:

安西西出柘厥关, 渡白马河, 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磧。经苦井, 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拔换城, 一曰威戎城, 曰姑墨州, 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拔换河、中河, 距思浑河百二十里, 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祝 (原作于闐, 讹矣——引注) 境之葫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 一曰于祝, 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

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频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24]。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逻斯城^[25]。

在上述记载中，安西至热海（伊塞克湖）段学者研究甚多^[26]，勿庸多言。《新唐书·地理志》行文过简，有从略之弊，所记里程总数往往偏少。《太平寰宇记》卷 156 “安西大都护府”条记：安西至碎叶总里程为一千九百六十里；而《新唐书·地理志》所记仅有一千一百里。对后者之谬，岑仲勉先生早有考辨。关于热海以西里程，仍有不少讹误和疑点，实有探究之必要。而探究里程，首先要明了唐代里程长度。

关于唐代里程长度，学者歧异较多^[27]。专治中国科技史的闻人军先生考订，一唐小里等于 442.905 米，与隋里相同；一唐里等于 531.486 米；天文大地测量及道里记载，一般用唐小里^[28]。照此推算，五十唐小里约合 44.29 华里。玄奘和贾耽等所记之“里”，应是唐小里。笔者同意此考。而周连宽先生则认为，1 公里等于 2.558 古汉里，唐里与古汉里相同，即 1 古汉里等于 0.3909 公里^[29]。此说备考。

里程长度既明，则可考里程记述当否。碎叶至热海之距离，贾耽记为二百八十（唐）里（约合 248 华里），再加上叶支城至碎叶川口这段距离。查碎叶（阿克·贝欣废城）至伊塞克湖最西端之距离，约为 110~120 公里，与贾耽所记大体符合。《大唐西域记》则把这两地之距记为五百余里（详见第一章讨论）。

贾耽称裴罗将军城（即托克玛克以南约 15~16 公里处的布拉纳废城）与碎叶城相距二十里（17.7 华里），这与今日考古所证两城相距 12~14 华里之数略有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唐代交通路线较为迂回之故。关于十姓可汗在碎叶城北四十里羯丹山立君长之史实，也为加尔迪齐（Gârdizi）所证实^[30]。

米国城则难以确定。《唐书》所记米国，《大唐西域记》作弭秣贺（位于飒秣建国东南），冯承钧指定该国治在今撒马尔罕东南 96.5 公里的模安（Maghiar）^[31]。然撒马尔罕至碎叶里程约有 945 公里。贾耽所言米国城难与玄奘所记弭秣贺国相等同。其中原因，或是贾耽所记有误，或是米国城与弭秣贺实属两地。从地望上看，贾耽所言米国城似指加尔迪齐所指出的胡特科雅勒（古达玛作胡特科帕勒）村，该村距碎叶城 1 法尔萨赫，约 12.5 华里；该村首领出身于突骑施部^[32]。也可能米国城是指碎叶以西的班吉克特（Banjikt）大镇，该镇东距碎叶 2 法尔萨赫（约 25 华里），西距“奈瓦契特”（Nawakit）城也是 2 法尔萨赫^[33]。

至于“新城”，也是一个颇多疑问的地方。《新唐书》卷 221 下《西域传》记曰：“新城之国。在石东北羸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国。后为葛逻禄所并。“弩室羯城，玄奘称之为笈赤建国（在恭御城以南四五十里）。季羨林、冯承钧等认为，新城即弩室羯城（笈赤建城），为穆斯林地理文献中的 Nujakath、Nujiakth 或 Nūjakth 之对音；Nujakath 即下努舍疆，苏联考古学者将此城比定为塔什干地区的汗阿巴德（Ханабад）^[34]。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皆称，下努舍疆在怛逻斯以东 3 法尔萨赫（18.7 公里）。实际上，“努舍疆”（Nushajan）之拼法，与 Nujakath（Nujikath）尚有较大差异。贾耽所言之“新城”，距碎叶城四十里左右（35.2 华里），正与穆斯林作者所言之碎叶城以西 3 法尔萨赫（18.7 公里）的奈瓦契特（Nawakit）城地望相当^[35]。因此，张广达老师也曾认为，奈瓦契特大城即新城；

Nawākit, 意为“新城”^[36]。值得注意的是, 古达玛也记述, 从碎叶西行至奈瓦契特, 再顺鲁凯布 (或泽卡特) 路走 1 法尔萨赫 (6.24 公里) 可至“上”努舍疆^[37]。也许贾耽把这个努舍疆混同为“新城”了。不管怎样, 贾耽所言之新城与玄奘所称之笈赤建国不是同一地方, 这是可以肯定的。

从新城至阿史不来城的区间里程和路线, 《新唐书》与穆斯林著述相差甚远。两地之间有众多河流, 直线距离也在 370 华里以上。贾耽所记两地里程百十唐里 (约合 97.5 华里), 肯定有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把这两地里程记为 31 法尔萨赫 (约合 387 华里), 与今日里程大体相当。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之久勒城 (距阿史不来城 16 法尔萨赫), 德国学者托玛舍克 (W. Tomaschek) 勘同为今吉尔吉斯斯坦伏龙芝; 伏龙芝距阿史不来城 (Asbarah) 93 公里, 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 (99.8 公里) 大致相符。萨利赫 (克) 村距久勒 4 法尔萨赫 (约 25 公里), 苏联考古学者比定为今伏龙芝东南 33~34 公里处的克拉斯诺列契村 (红水村) 边废城^[38],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里程比今日里程少 8~9 公里。由此看来, 新城至阿史不来城之路线及里程, 以穆斯林地理学家所记较为准确。

至于贾耽所言顿建城 (东距新城六十唐里, 西至阿史不来城五十里), 很难在穆斯林地理著述中勘同。在奈瓦契特以西 4 法尔萨赫的突厥可汗村 (城), 似与顿建城地望相若。“顿建”可能指某个突厥小可汗。而贾耽所称的税建城, 距怛逻斯仅五十里。从距离上看, 该城当指下努舍疆 (下拔塞干); 但下努舍疆在《新唐书·波斯传》中记为弩室羯城。因此, 此税建城不知贾耽所指何处。

阿史不来城因阿史不来河 (至今仍称此名) 而得名。该城至俱兰里程,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均谓 8 法尔萨赫 (约合 100 华里), 贾耽则称仅有七十唐里 (约合 62 华里)。贾耽所记

肯定有误。古达玛说：从怛逻斯城至沙漠中的俱兰（Kūlān），全程为 14 法尔萨赫（87.4 公里），此沙漠及其边缘也被称作俱兰；……从俱兰至沙漠中的阿史不兰城为 8 法尔萨赫（约 50 公里），阿史不来城位于俱兰沙漠的边缘上^[39]。据此记述，俱兰城当在今日莫因库姆沙漠西南边缘的阿克尔托别城附近。

必须指出的是，《新唐书》记有两个俱兰。一为贾耽所言之俱兰，沙畹认为即大食人之 Kulan，位于 Tarty 附近^[40]。天宝元年（742 年），突骑施可汗阿史那昕即在碎叶西南的俱兰城为莫贺咄所杀^[41]。另一个俱兰，为 Kouran 之对音，位于 Kokcha 河上游。《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俱兰，或曰俱罗弩，曰屈浪弩，与吐火罗接，环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鲁河。”^[42]龙朔元年（661 年），唐朝在石汗那国（Saghaniyan）艳（豔）城置悦般州都督府，领双靡州，以俱兰城置^[43]。沙畹认为，悦般州都督府治即在俱兰，位于今阿富汗科克恰河（Kokcha）上流^[44]。而冯承钧则把石汗那比定为中亚阿姆河北支流苏尔汉（Surkhan）河上游，今名迭脑（Denau，意为新村），并认定唐双靡州治俱兰城，其对音为 Kourana^[45]。迭脑（迭纳乌）位于塔什干西南、撒马尔罕东南，肯定不当阿史不来城至怛逻斯城之道。实际上，悦般州都督府治在艳城，而不在俱兰；俱兰（Kouran）为双靡州治所在地。

另外，据唐乾陵石雕“蕃臣像”的衔名，唐朝曾以西突厥阿悉吉厥部置俱兰（州？）都督府^[46]。吴玉贵等认为，此俱兰都督府治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卢格沃伊附近^[47]。但是，我们从地望上看，俱兰都督府应即 Kulan，位于 Tarty 附近。卢格沃伊当是阿史不来城，而不是俱兰都督府所在地。

三、其它汉籍所记西行道路

《新唐书》卷 40《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介绍了自庭州西行至碎叶的大道（《元和郡县图志》卷 40“庭州”条称之为“碎叶路”）：

（庭州）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馮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48]，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黑水守捉，又七十里东林守捉，又七十里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磧，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49]，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磧及入夷播海。（从庭州至碎叶凡一千八百九十里——引者统计。）

根据上述记述，结合《资治通鉴》卷 119《高宗纪》永徽二年七月胡三省注，以及《元和郡县图志》卷 40“庭州”条记述，我们可以推断唐代庭州至碎叶的路线及里程。《资治通鉴》卷 199 胡三省注云：“弓月城在庭州西，千有余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40“庭州”条称：庭州“西至碎叶二千二百二十里。”这样，庭州至弓月城千余（唐）里（886 余华里），弓月至碎叶城约一千二百里（1063 华里）。从布哈拉出来的道路，到了碎叶后又延伸至唐代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国庆乡护堡子旧城遗址）^[50]，与丝绸之路北道相连。从庭州出发的碎叶路，显然比安西——碎叶道（据《太平寰宇记》卷 156，此道里程一千九百六

十里)要远二百六十唐里左右。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吉甫把沿天山北麓西行的庭州——碎叶道称为“碎叶路”,而不称安西至碎叶道为碎叶路,尽管后一条道路要近得多。看来,从庭州出发西行的通道是唐代中后期中国通往碎叶的官道。

在穆斯林地理学家笔下,往东的道路东端总凑碎叶,然后往东北和东南分道。而玄奘、贾耽所记西行路线,也都必经碎叶。因此,碎叶为中亚通往中国道路的咽喉,其地位与敦煌几同。

自8世纪开始,中国人往返中亚,大多取丝路中道、南道进出葱岭。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新罗僧慧超由天竺取道中亚返归安西。慧超由康国(撒马尔罕)往东回返路线为:康国——跋贺那国——骨咄国——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胡蜜国,东行十五日——过大播蜜川——葱岭镇,步行一月——疏勒国——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安西大都护府)——焉耆国^[51]。

跋贺那,即跋贺那,又作拔汗那,即费尔干纳。

骨咄,应是Khottal之对音,《大唐西域记》作珂咄罗,位于护沙河(Wakhsh)与喷赤河(Pandj)之间,其主城为库罗勃(Kulub),在今杜尚别市东南。日本学者长泽和俊把骨咄国比定为今库利亚布附近^[52]。慧超说,骨咄国王原是突厥种族;此国以北是突厥所住境界。玄奘称:“珂咄罗国……东接葱岭至拘谜陀国。”^[53]

吐火罗国,《大唐西域记》作覩货逻。《新唐书·西域传》称:“吐火罗……居葱岭西、鸟浒河之南,古大夏地。……大夏即吐火罗也。”据日本学者内田吟风研究,唐初以后的吐火罗国为突厥族所建,其都城在昆都士(Qunduz,《大唐西域记》作活国)附近的阿缓小城(War-Waliz)^[54]。

拘谜陀国即穆斯林地理书中的Kumādh,其中心城市是位于奥克萨斯河弯曲部的卡拉·依·胡姆。

胡蜜国,《新唐书·西域传》及《悟空行纪》作护密、护蜜,

《西域记》作达摩悉铁帝国，在今阿富汗东北部的瓦罕（Wakhan）溪谷，其都城塞迦审城被长泽和俊比定为阿姆河弯曲处西南方的伊什卡希姆^[55]。

大播蜜川，《西域记》作波谜罗川，即帕米尔川，为帕米尔高原（葱岭）上的八大平川之一，也即与帕米尔河汇合西流的奥克斯斯河上游，又称喷赤河^[56]。葱岭镇，即葱岭守捉。贾耽《入四夷道》记述：“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青山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57]羯盘陀国在蒲犁（塔什库尔干）以西。

慧超归国路线是从拔汗那往西南至昆都士，再往东走。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则是从拔汗那直接往东行。看来，慧超所走之路并不为阿拉伯地理学家所熟悉。贞元年间（785—805）悟空、宋乾德四年（966 年）行勤等都是经由于阗、塔什库尔干而进出的。

安史之乱后，河西为吐蕃所占，西域通中原之路为避吐蕃势力而改取回鹘（鹘）道。贞元二年（786 年），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等就是假道回鹘，得至长安^[58]。贞元五年（789 年）悟空自西天（印度）返国，也是经于阗到安西，再到北庭，取回鹘路归返中原^[59]。

自晚唐大中年间（847—859）甘州回鹘与中原通使后，直至宋朝初年，朔方道之灵州取代了河西道南段。敦煌文书〈西天路竟〉（S.0338，黄盛璋认定此文书写于宋乾德四年，即公元 966 年）^[60]，和田塞语文书〈使河西记〉（写于 925 年），高（平）居海《于阗（国）行程录》（又称《居海记》，当写于出使归返之年，即 942 年后不久）^[61]，都证实了这一点。为求近便，人们有时也走夏州入回鹘道。宋太平兴国六年（981 年）王延德使高昌，就是自夏州渡河，经沙碛，历伊州，至高昌；从夏州至龟兹需 90 天^[62]。

穆卡迪西在谈及中亚各地输出商品种类时,提到“从突厥斯坦和胡塔梁(即骨咄)往这些地方(指中亚各地)赶来马和骡”^[63]。显然,从河中到骨咄的通道一定为当时一些中亚商人所知晓。但奇怪的是,伊斯兰地理学家对这条通道没有详细记述。估计当时中亚很少有人走费尔干纳——骨咄——葱岭——疏勒(或于阗)这条线。这至少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中亚粟特人在传统上一直向突厥草原进行殖民活动;二是喀喇汗王朝的兴起。

早在伊斯兰前时代,粟特人就开始了向突厥草原的殖民活动,建立了众多的商业殖民点。从6世纪开始,粟特人进一步向东深入,沿丝绸之路在罗布泊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以及沙州、凉州、六胡州(灵州、夏州以南之地)和内蒙诸地建立了粟特人聚落^[64]。9世纪以来,河中穆斯林仍继续粟特人的殖民传统,在锡尔河下游修建了三座伊斯兰城市,即毡的(在锡尔河右岸,今哈萨克斯坦克孜尔奥尔达东南)、库瓦拉和养吉干(其废城名为詹干特)。这些移民城市和殖民聚落对扩大河中地区对东方的贸易起了很大作用。锡尔河流域的粟特殖民聚落有道路通往曳至河(额尔齐斯河),在曳至河岸生栖着游牧和半游牧的奇马克人(钦察人的祖先)和寄蔑人;从曳至河往东,可至黠戛斯人居留的地方^[65]。这些游牧民或半游牧民的生活必需品,就通过河中穆斯林和粟特商人的中介而购得或交换得到。与游牧民的贸易成为萨曼朝(820~999年,“萨曼朝”并不等于“萨曼王朝”)统治时期中亚的大宗贸易。所以,草原之路就相对兴盛。

在萨曼朝崛起时,喀喇汗朝(840~1212年)也在东边兴起,称雄七河地区、伊犁河谷和喀什噶尔地区。喀喇汗王朝建立后,副可汗奥古尔恰克一系(先驻怛逻斯,893年后迁到喀什噶尔)与萨曼王朝交恶。双方在893、904、990、992、996、999年多次交战^[66]。于阗大宝王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佛教国家,与萨

曼王朝关系也较为紧张。公元 939 年（于阗王李圣天同庆二十八年），一位“中国君王”派使者到布哈拉，要求萨曼王朝（874~999）君王纳斯尔二世（914~943）称臣纳贡，被后者拒绝。据马雍研究，这位“中国君王”即于阗王李圣天^[67]。

此外，唐王朝在 907 年灭亡，五代十国割据达 70 多年。战乱兵祸，也对中亚与东方的贸易和交往产生很大影响，严重阻碍了商路的畅通。因此，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喀喇汗（黑汗）王朝使节对宋朝皇帝说：“昔日道路尝有剽掠。”^[68]

这样，传统的敦煌——安西（龟兹）——疏勒（或于阗）——中亚之道就被阻隔。

10 世纪初，契丹（辽）兴起。辽朝除了偶尔在河西走廊用兵之外，对西域一向以友好态度相待。辽在上京特置榷场，从事国际贸易^[69]。而且，在 10 世纪 90 年代前，驻在八剌沙衮的喀喇汗王朝大汗巴兹尔一系与萨曼王朝交好，多次得到后者的支持。两者往来较为密切。这样，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就进一步发展，延伸至辽朝上京。《辽史》记载，天赞二年（923 年）波斯国来贡；次年，大食国来贡。辖戛斯（即黠戛斯）人也于公元 931、962、976 年多次来人、来贡^[70]。这儿的“波斯国”当指东伊朗语族的萨曼王朝。因为，此时的伊朗语族王朝仅有萨曼王朝。辽朝对来贡者回赐甚多，“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71]。这种所谓进贡、回赐，其性质与中亚九姓胡对唐朝的朝贡迥然相异，实质上就是商业贸易的一种形式，只是史家记之曰“进贡”罢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公元 9 世纪以前，中亚东来道路西起木鹿（谋夫），东汇碎叶。碎叶为中亚通往中国道路的咽喉，其地位与敦煌不相上下。从碎叶可至安西（龟兹）和庭州，然后东经西州、沙州，沿

河西走廊东至中原。自 9 世纪以降,则主要从碎叶东行,沿天山北麓至庭州,然后走回鹘道至中原或至契丹(辽)辖境。庭州—碎叶道应是该时期唐朝至中亚的官道。

(二)从 8 世纪开始,中国人往返中亚,大多取丝路中道、南道而进出葱岭。具体地说,就是走于阗或疏勒—葱岭—骨咄道。但各种迹象表明,这条通道并不为多数东来中亚诸胡所取。

(三)贾耽所言“米国城”并非《大唐西域记》之“弭秣贺”;贾耽所言之“新城”与玄奘所记之“苾赤建”不能勘合,新城应指穆斯林著述中的奈瓦契特(Nawākit)。贾耽所记新城至阿史不来城区间里程和路线有误,当以阿拉伯地理学家著述为准。

(四)我们必须鉴别汉籍所记两个俱兰城。贾耽所言之俱兰城,当在今日莫因库姆沙漠西南边缘的阿克尔托别城附近;《新唐书·西域传》之俱兰则位于今阿富汗科克恰河(Kokcha)上游。

(五)笔者主张,碎叶以西道路里程以穆斯林地理学家为信,碎叶以东则取中国史籍和出土文书所记较宜。但《新唐书·地理志》等所记里程,不足凭信。从双方所记道里看,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认识比较准确。

注释

- [1]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第 28 页;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以下作古达玛书),第 215 页。
- [2] 古达玛书,第 216 页。库克镇是突厥王征集军队的地方,经过该镇南边的高山,可至中国。
- [3] 此库巴勒(Kubāl)并非后文论及的碎叶(Kubāl)。因为从塔什干到碎叶,肯定不止 10 法尔萨赫。宋岷考订,1 法尔萨赫约合 6.24 公

里；张广达说，1 法尔萨赫约为 6 公里（参见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 年第 5 期）；《伊斯兰百科全书》第 1 版，第 3 卷，第 70 页（*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iden, 1927）说，1 法尔萨赫为马走一小时的距离，1 波斯法尔萨赫约合 6.232 公里，1 阿拉伯法尔萨赫为 5.763 公里；《伊斯兰百科全书》第 2 版（莱顿，1983 年），第 2 卷，第 812~813 页说，1 法尔萨赫（伊斯兰时期）为 5.985 公里，现代 1 法尔萨赫为 6 公里。本文以 6.24 公里为折算基准。

- [4] 以上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参见《道里邦国志》，第 30~31 页。
- [5] 白水城至怛逻斯（荅拉兹）里程总数，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统计为 26 法尔萨赫；从石国至白水城，他又误计为 13 法尔萨赫，应为 19.7 法尔萨赫。
- [6]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 76 页。
- [7] V. Minorsky, "Tamim ibn Barh's Journey to the Uyghurs." *BSOAS*, *XII*-2, London, 1948, pp. 275~305, p. 284.
- [8] 努舍疆（Nushajan）之名，早在 1889 年即为托玛舍克（W. Tomaschek）订正为八儿思罕，即拔塞干（Barskhan），参见托玛舍克〈评德·胡耶撰《论思戈与玛果戈墙》一文〉，《维也纳东方学杂志》卷 3，第 103~108 页，转引自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注释 17，参见其《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1~30 页。苏联考古学者将该城比定为今塔什干地区的汗阿巴德。另据苏北海研究，拔塞干之地名是由西突厥弩失毕五俟斤中的拔塞干噉沙钵俟斤之名而来的。参见苏北海：《中亚塔拉斯—江布尔地区的历史演变》，参见其《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85~306 页。另参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 81~82 页。关于下努舍疆，还可参见下述记载：*Istakhri* 书，*BGA*, i, 328~331; *Mukaddasi* 书，*BGA*, iii, 48, 264~265。
- [9] 古达玛说，开苏里巴斯附近一处地方叫古姆（Qum），它是葛逻禄（Kharlukhiyyah）国的第一个去处；古姆背靠沙漠，至开义玛克国边

界有 2 法尔萨赫。参见古达玛书，第 217~218 页。

- [10] 参见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
- [11] 同上。
- [12] 参见《道里邦国志》，第 32 页；注〔2〕书，第 218 页。
- [13] 张广达师认定，奈瓦契特即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新城”；而冯承钧先生则说，新城是筱赤建（弩室羯）。参见《碎叶城今地考》；冯承钧：《西域地名》（增订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69 页。
- [14] 参见《碎叶城今地考》；另参见 G. Clauson, “AK Beshim - Suyab.” JRAS, vol. 1, 1961, pp. 1~13.
- [15] 塔米姆说，八儿思罕由 4 个大城和 5（4?）个小城组成；从赭时途经怛逻斯到上努舍疆有 40 天路程，但他骑马赶路仅用了一个月。参见 BSOAS, VII-2, pp. 283~292。米诺尔斯基考订：八儿思罕位于伊塞克湖东南岸，该地在下努舍疆以东至少 500 公里；塔米姆错把上努舍疆（八儿思罕）当成九姓回鹘的都城了。
- [16] 里程数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
- [17]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经库勒晓伯、吉勒晓伯到俱兰。古达玛所记则由库勒晓伯直接到俱兰，不经过吉勒晓伯，少走 4 法尔萨赫；从里程看，怛逻斯至俱兰 13 法尔萨赫，但古达玛总计为 14 法尔萨赫，其原因或由于计算错误，或由于开苏里巴斯至古姆可能有 1 法尔萨赫路程。参见《道里邦国志》，第 31 页；注〔2〕书，第 217~218 页。
- [18] 张广达译为“突厥汗廷”。参见《碎叶城今地考》。
- [19] 参见注〔2〕书，第 216~219 页。
- [20] 拔汗那城又称 Akhsikt。古达玛统计里程说，从撒马尔罕至拔汗那为 35 法尔萨赫。误也。按：应当是扎敏至拔汗那为 35 法尔萨赫；撒马尔罕至扎敏为 17 法尔萨赫。参见《道里邦国志》，第 32~33 页；注〔2〕书，第 219~220 页。
- [21] 参见《道里邦国志》，第 33 页，中译注④。古达玛说，从固巴至窝什为 7 法尔萨赫。参见注〔2〕书，第 221 页。《新唐书·西域传》称：窈堵利瑟那“即汉代貳师城也”。按：此记有误。岑仲勉：《汉

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 289~293 页有详考，中华书局，1981 年。岑氏认为，贰师城即今之 Dsizak。

- [22] 古达玛称，从上努舍疆（上拔塞干）到土胡兹胡尔·可汗（九姓乌古斯可汗）地界为 6 天行程。那么，从土胡兹胡尔·可汗都城至该可汗所辖西部边界有 84 天左右行程。参见注〔2〕书，第 221 页。
- [23] 关于九姓乌古斯及其到开义玛克王国路程的记述，据《道里邦国志》第 34 页增补。《世界境域志》第 265 页把九姓乌古思都城记为“脂那城”（Jinanjkath），并说：“它是政府所在地，邻接中国边境。夏季酷热，冬令宜人。”（*Hūdud al - ‘Alam*, Trans.by V.Minorsky, London, 1970.）据华涛博士研究，9 世纪末、10 世纪初的九姓乌古思人（回鹘人）都城当指高昌城（吐鲁番）；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笔下的托古兹古思（土胡兹胡尔）应是漠北回鹘（纥）；而古达玛笔下的托古兹古思则指高昌回鹘。参见华涛：〈穆斯林文献中的托古兹古思〉，《西域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编）1991 年第 2 期。
- [24] 赤山城，即赤谷城。一般认为，该城位于伊塞克湖东南，今别迭里山隘西北的伊什提克。真珠河，指锡尔河上源的纳林河。参见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第 15 页。在中古波斯语（Pahlavi）中，“锡尔河”称为 jaxsarta 或 jaxsaarta，意为“珍珠”、“明珠”。裴罗将军城，王国维考订其为八剌沙衮，即元代的虎思斡耳朵。参见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观堂集林》卷 14，中华书局，1959 年，第 628~634 页。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词汇》卷 1，第 124~126 页也证实此说。张广达考订，八剌沙衮即今托克玛克以南约 15~16 公里处的布拉纳废城，该废城以西 6~7 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又译阿克·贝欣，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 8~10 公里处）即碎叶故城。参见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
- [25] 《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年，第 1149~1150 页。
- [26] 苏北海：〈唐代中亚热海道考〉，《西域历史地理》，第 221~237 页。周连宽书，第 69~90 页。岑仲勉：〈历代西疆路程简疏〉，《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 年，第 696~699 页。
- [27] 周连宽书，第 101~102 页注释⑧详细介绍了中外学者对汉唐“里”

的折算。

- [28] 闻人军：《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 [29] 参见周连宽书，第102页。
- [30] 加尔迪齐（Gardizi）记述奈瓦契特（纳瓦卡特）至潘支卡特的路程时，说：潘支卡特旁有泽卡特村，该村附近有三村，其一即为碎叶，碎叶附近有一山，突厥人奉祀此山，恒指此山之名立誓。他还说，距碎叶1法尔萨赫有胡特科雅勒村，其首领出身于突骑施部。参见加尔迪齐《记述的装饰》俄译文，《巴托尔德文集》卷8，第61~62页，引自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古达玛说，奈瓦契特通向上拔塞干的大道名为鲁凯布。按：鲁凯布即泽卡特。参见古达玛书，第218页。
- [31] 冯承钧：《西域地名》，第61~62页。
- [32] 同注30。
- [33] 参见注〔2〕书，第218页。
- [34] 《大唐西域记》卷一，季羨林等校注本，第81~82页“笈赤建国”注释①。另参见《西域地名》，第69页。
- [35]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奈瓦契特至碎叶城（Kubal）3法尔萨赫；古达玛则说有4法尔萨赫。参见《道里邦国志》，第32页；注〔2〕书，第218~219页。
- [36] 参见《碎叶城今地考》。
- [37] 参见注〔2〕书，第218~219页。
- [38] 伯恩施塔姆：《北部吉尔吉斯考古概述》，第72~75页，伏龙芝，1941年，引自《碎叶城今地考》；别列尼茨基等：《中亚中世纪城市》第207~208页。（А.М.Беленицки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Город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Ленинград, 1973.）刘迎胜博士曾考察“小红溪”（红水村）遗址。他说，“据苏联学者研究，这里就是《皇华四达记》中的新城。这里曾出土唐‘大历通宝’1枚及一些突骑施钱币。”此说与张广达之说相左，存疑。参见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
- [39] 参见注〔2〕书，第218页。

- [40]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 14 页，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 年。
- [41]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第 11372 页，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
- [42] 《新唐书·西域传》，第 6253 页。
- [43]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第 1137 页。
- [44]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 145 页注四，第 253~254 页。
- [45] 冯承钧：《西域地名》，第 80 页；《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七编，第 66 页，中华书局 1962 年。
- [46] 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研究〉，《文物集刊》第二集，1980 年。
- [47] 余太山：《西域通史》，第 164 页。
- [48]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庭州”条（第 1033~1034 页，中华书局，1983 年）称，沙钵镇在（庭）州西五十里当碎叶路；俱六镇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当碎叶路。按：俱六城守捉约在今新疆阜康县。
- [49] 据松田寿男考订，张堡城守捉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之昌八剌城，位于今新疆昌吉县境；黑水即指库尔喀喇乌苏（在突厥语中，“喀喇乌苏”意为黑水），即今奎屯河；黑水、东林、西林守捉分别位于库尔喀喇乌苏、多木达喀喇乌苏（一称济尔噶朗河）、固尔图喀喇乌苏（一称额布图河）河畔；黄草泊，在固尔图喀喇乌苏军台西北方的长苇丛处；大漠、小漠则是黄草泊往西的沙阜，即《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言之“沙场”。伊丽河，即伊犁河，唐代渡河点大概察林河注入伊犁河主流处附近。详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 370，402~403 页，以及第 403 页注①，注③，注④。清镇军城即后来的清海军，宝应元年（762 年）成为北庭都护府管辖下的西海县。《元和郡县图志》“庭州”条（第 1034 页）记：“清海军。在府西七百里。旧名镇城镇。天宝中改名清海军。”清代徐松也考辨了《唐书》所记“碎叶路”，认为清镇军城在今玛纳斯 80 里的乌兰乌苏。参见徐松《西域水道记》卷 3，“额彬格逊淖尔所受水”条，《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第 4 集。王国维考订，弓月城为元代的阿力麻里城，其遗址在今新疆伊宁地区霍尔果斯北之废城。

- 此说已成定论。参见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卷上,《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 [50]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第245页。
- [51] 参见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第140~177页。
- [52] 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以下简称长泽和俊书),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60页。《世界境域志》英译本,第119页记述了Khuttalan及其首都Hulmuk(或作Hulbuk):“Hulmuk是王的住所,是Khuttalan的首都。该城位于山麓,有很多地方,住有很多人。”然而,同书208页又记称:Hulbuk即Hulbag,位于雅夫河的克拉夫之南。斯特朗格《东哈里发国的土地》,第438页(Le Strange, *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London, 1905),将Hulbuk比定为阿赫沙瓦河流域的库利亚布附近。另参见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以下简称《突厥斯坦》), London, 1977, pp. 68~69.
- [53] 《大唐西域记》卷一。
- [54] 内田吟风:《吐火罗国史考》,《民族译丛》1981年第2、3期。
- [55] 长泽和俊书,第550~551页。
- [56] 同上书,第549页。
- [57]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下》。
- [58] 参见《新唐书·回鹘传》。
- [59] 圆照:《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经》后附《悟空行记》。引自长泽和俊书,第560~570页。
- [60] 黄盛璋:《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另参见其《西天路竟笺证》,《敦煌学辑刊》第六辑,兰州大学,1984年。
- [61] 高居海等行程:《自开封到》灵州,过黄河到党项界——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回鹘牙帐)——西北五百里至肃州——西行百里到天门关——西行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入仲云(小月氏遗种)界——大屯城(仲云牙帐所在地,疑即钢和泰文书第二部分的Raurata。参见榎一雄:《关于仲云族牙帐的

- 所在地》，载《史学杂志》卷 72~12，昭和 38 年）——西至绀州（且末？）——安军州——于阗。参见长泽和俊书，第 573~593 页考证。另参见《新五代史》卷七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年；《文献通考》卷三三七〈四裔考十四·于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
- [62] 《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六·高昌》、《龟兹》，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 年；《文献通考》卷三三六《四裔考·车师前后王即高昌》。
- [63] BGA（《阿拉伯舆地丛书》），iii，pp.323~326。引自《突厥斯坦》，第 235~236 页。
- [64] 关于唐代粟特人，详见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1916），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 25~27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羽田亨：〈漠北之地与康国人〉，《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编历史卷；池田温：〈8 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大陆文化研究》I，1965；护雅夫：〈东突厥国家内部的粟特人〉，《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东京，1967 年；蒲立本（E.G.Pulleyblank）：〈内蒙的粟特人聚落〉，《通报》卷 41，第 317~356 页，1952 年；O.I. 斯米尔诺娃《粟特史纲》，莫斯科，1970 年；姜伯勤《敦煌吐蕃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五章，文物出版社，1994 年；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249~279 页；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编）1993 年第 2 期，第 8~15 页。
- [65] 加尔迪齐：《记述的装饰》，王小甫节译，《西北史地》（兰州大学编）1983 年第 4 期；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62 页。
- [66]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0，72~83 页。
- [67] C.E.Bosworth,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Ir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Chap. VII, London, 1977, pp.1~13. 马雍：〈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学习与思考》（中国社科院编）1983 年第 5 期。
- [68]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

-
- [69] 《文献通考》卷三四六〈契丹下〉。
- [70] 《辽史》卷七〇〈属国表〉，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 [71] 《契丹国志》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黄时鉴师推断，《契丹国志》卷二一“诸小国贡进物件”所记“大食国”，是萨曼王朝及其亡后迄至1036年前的河中地区。该大食国与辽朝有物品贡赐关系。参见黄时鉴〈辽与“大食”〉，《新史学》第3卷第1期，第47~67页，台北，1992年3月。

第三章 《新唐书·西域传》所 记中亚史地考辨

《新唐书·西域传》集中保存了唐人对中亚诸胡国的认知以及九姓胡与唐朝交往的基本史实。这些记载既是唐朝与中亚交往的记录，又是双方交往的历史结果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人在与中亚诸胡交往过程中所持的立场、观点。《新唐书·西域传》的许多记述，可补阿拉伯——伊斯兰史料之不足。但是，《西域传》之记述与玄奘等所记有所不一，留有许多讹误和疑问。本世纪以来，法国学者沙畹著《西突厥史料》^[1]，丁谦撰《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2]，岑仲勉著《唐史余瀛》、《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3]，他们都对《新唐书·西域传》做了有益的考辨。不过，他们的研究仍有许多失误和遗漏。

一、康国

康者，一曰萨秣建，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余里，东南属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温，

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王帽氍，饰金杂宝。女子盘髻，幪黑巾，缀金葩。……以十二月为岁首，尚浮图法，祠祆神，出机巧技。……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万岁通天中，以大首领笃娑钵提为王。……^[4]

1. 关于《新唐书·康国传》反映的年代及康国的宗教信仰

女子面蒙黑巾，乃伊斯兰习俗。而且，此习俗早在穆罕默德立国34年（约公元655年）就已为唐人知晓。《唐会要·大食国》记曰：大食“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女子白皙，行必障面。”^[5]《新唐书·大食传》也记：大食“女子白皙，出辄障面。”^[6]由此可见，《康国传》所反映的是康国人已接受伊斯兰教之后的情况。

那么，康国人何时皈依伊斯兰教的呢？

阿拉伯人第一次渡过阿姆河、开始征服河中地区是在公元654年。是年，阿拉伯人攻破米国，围攻康国^[7]。但是，康国等地长期未被阿拉伯人征服。712年，呼罗珊总督屈底波（705—714）率大食军攻占撒马尔罕城，焚毁城内的佛寺，建筑了清真寺，强迫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8]。不过，粟特（Soghd）其它地区仍保持原有宗教信仰，仅在政治上一度承认阿拉伯人的宗主权^[9]。即便是在撒马尔罕，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也不多。726—727年间，慧超在返归中国途中，仍见康、安等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康国尚存一佛寺^[10]。直到喀里斯坦（Khari—stân）之战（738年）以后，阿拉伯人大破突骑施军，伊斯兰文化才开始在粟特地区占优势^[11]。因此，康国女子面蒙黑巾，应是727年以后之事。

那么,《康国传》究竟反映了康国何时的情形呢?中国史籍关于康国历法的记述,使我们有可能判定《康国传》所记述史实的年代。

据《隋书·康国传》记载,在6世纪后半叶~7世纪初,康“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来助祭”^[12]。《唐会要·波斯国》也记载:波斯国“俗事天地水火诸神,西域诸国事火袄者,皆诣波斯受法焉。……以六月一日为岁首。”^[13]显然,同事火袄的康国,其历法与波斯相同,也以六月一日为岁首。所以,《通典》引韦节《西蕃记》说:康国人“以六月一日为岁首。……俗事天神,崇敬甚重。”^[14]而《新唐书》则说,康国以十二月为岁首。这说明康国在唐代曾改历。中亚诸国历法均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康国改历必与其改奉伊斯兰教有关。康国的“以十二月为岁首”之历,应当是伊斯兰教历(即回历)。

回历以354.3671天为一年,以公元622年7月16日为纪元之始。所以,回历岁首可以出现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月。回历以中国农历十二月为岁首的年份有:回历18、19、51、52、85、86\87、118、119\120、152、153\154、186\187年,分别为公元639、640、671、672、704、705、736、737、769、770、802年^[15]。值得注意的是,公元705、737、770、802年的1月和12月,均为农历十二月、回历岁首。就农历年而言,这4年都是连续2年的十二月为回历岁首。《新唐书·康国传》所记年代应是其中的某一年。从《康国传》所记康国习俗、宗教情形看,此时伊斯兰教已在康国有了初步传播,但康人尚未完全皈依伊斯兰教。712年,撒马尔罕才第一次屈服于阿拉伯人的政治统治;738年喀里斯坦之战以后,尤其是751年怛罗斯之战以后,撒马尔罕逐步伊斯兰化。因此,《康国传》所反映的史实在年代上,705年当排除,似应是公元737~770年之事。

从两《唐书·康国传》所记史实,我们也可推定《康国传》

所记史实不晚于公元 754 年。《旧唐书·康国传》记事最晚的一条是天宝十三载（754）康国王咄曷遣使朝贡^[16]；《新唐书·康国传》则是唐朝册封咄曷为钦化王，且未注明年代。《旧唐书·康国传》系咄曷册封于天宝三年（744）；《册府元龟·外臣部》系于天宝三年七月，唯“咄曷”作“咄喝”^[17]。

《新唐书·康国传》记述的年代如上所考，其记康国的宗教状况就显出许多讹误。

按《新唐书》所记，此时康国“尚浮图法，祠祆神”。此记是有疑问的。据巴托尔德研究，在萨珊王朝末期，佛教在中亚地区遭到排斥，祆教压倒佛教而取得统治地位^[18]。贞观二年（628 年）^[19]，玄奘途经飒秣建（康国）时，见当地“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20]。玄奘以佛法化度康国国王。但是，迟至 726～727 年，慧超仍见康、安等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佛）寺，有一僧，又不解敬^[21]。在此以后，康国等中亚诸国逐渐伊斯兰化，根本不可能又改宗佛教，“尚浮图法”。所以，《新唐书》此记不足凭信。《新唐书》编撰者很可能是根据玄奘以佛法化度康国国王一事，推定康国此后必然“尚浮图法”了。

《旧唐书·康国传》则记：康国“有婆罗门为之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这儿的“颇有”比《新唐书》所记“尚”，在程度上减弱了。但是，“颇有佛法”仍与这个时期的康国仅有一寺，且又无人懂得教仪、教规的情况不符。

2. 关于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

多数中外学者对《新唐书·康国传》给出的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永徽年间，即 650～655 年）没有提出异议^[22]。《旧唐书·康国传》未记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按：高宗永徽年间，正值阿史那贺鲁叛乱，安西都护府由龟兹迁回西州。唐朝屡次征讨不捷，战争连年不断。直到显庆二年（657），阿史那贺鲁的叛

乱才被平定。而且，永徽年间康国仅在永徽五年（654）四月与曹国、安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记述这次朝贡时并未言及设置都督府之事^[23]。如果在这次朝贡中仅在康国设置都督府，而弃安、曹国于不顾，这也不合情理。因此，唐朝似不可能于永徽年间在康国设立都督府。另据《册府元龟》卷966〈外臣部·继袭一〉：康国，“唐武德七年，其王曰屋（屈）本（术）支。显庆三年，其王曰拂呼发（纒），是年，高宗列其地为康居府，以拂呼发为都督。”《唐会要》卷99〈康国〉亦记载：“显庆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居城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纒为都督。”拂呼发、拂呼纒肯定是同一人。康居都督府应当设置于显庆三年。《新唐书》所记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如果没有其它史料佐证，不足凭信。

3. 关于康国至周邻国家道里

根据文献及考古材料，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唐代中亚诸国的方位。

隋唐时期，康国都城在今撒马尔罕市东北1.5公里的Afrasiab高地上^[24]。泽拉夫善河从高地下流过。《隋书·康国传》称：康国“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萨宝水当指泽拉夫善河。

史，《大唐西域记》作羯霜那，阿拉伯—波斯语 Kass、Kiss 之对音。城址在今撒马尔罕以南75公里的沙赫里夏勃兹，为中世纪撒马尔罕至缚喝（Balkh）大路中途之大城^[25]。

西曹，隋时曹也，国治瑟底痕城。瑟底痕之对音，当是 Ishtīkhan，即今撒马尔罕西北百里的伊什特汗^[26]。

米，又作弭秣贺，阿拉伯舆地学家记作 Māymurgh，并称该地位于撒马尔罕之西南，当布哈拉至那色波（即小史）的大路上^[27]。实际上，《新唐书》所记之米国，应即撒马尔罕附近的 Māymurgh，而不是那色波至布哈拉大道上的 Māymurgh，其国治在撒马尔罕东南约70公里的喷赤干（详见“米国”考）。

中曹，王治迦底真城。沙畹称：《大唐西域记》之劫布咀那，即曹国，应是中曹，即 Kaboudhandjakath^[28]，后者位于撒马尔罕以东 2 法尔萨赫（约 12.5 公里）^[29]。托玛舍克（W. Tomaschek）则认为，劫布咀那当是 Kapû-tânâ/Kedud 之对音。此观点已为学界所接受^[30]。因此，中曹不应是沙畹所称的劫布咀那。

在确定上述诸城方位之后，我们发现《新唐书·康国传》所记诸城道里参杂可疑之处。

《新唐书·康国传》称，康国距史 150 唐里，约合 66 公里（1 唐里约合 0.88 华里^[31]）。《新唐书·地理志》、《唐会要》卷一百称：史国“西北至康国七百里”^[32]。700（唐）里约合 308 公里。实际上，沙赫里夏勃兹在撒马尔罕以南 75 公里。《新唐书·康国传》少记 9 公里，已基本接近实际里程；《新唐书·地理志》、《唐会要》之记多出 233 公里，显然误差太大。《唐会要》的记载出于鸿胪卿王忠嗣于天宝二年（743 年）四月二十五日所言。当时，唐玄宗询问诸蕃国远近，王忠嗣“谨按《西域图》”而上言。此《西域图》或指唐代许敬宗等《西域图志》（60 卷，约撰成于 658 年），或指王名远《西域图记》（660 年六月十七日进呈）^[33]。《新唐书·地理志》所据或同。

西曹地望与里程，《新唐书》所记与阿拉伯舆地学家所记基本吻合^[34]。

米国方位，据阿拉伯舆地学家说，应在撒马尔罕之西南；这与《新唐书》所记（康国之东南）不一（详见“米国”考）。

中曹方位，《新唐书》称在康国之北五十里，约合 44 华里；阿拉伯舆地学家则称，Kaboudhandjakath 在撒马尔罕以东 12.5 公里^[35]，《新唐书》多记 11.5 公里，且在方位上与穆斯林之记也有出入。

二、安国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君长孺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余。……武德时，遣使入朝。贞观初，献方物，太宗厚尉其使……其王诃陵迦又献名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岁，东安国亦入献，言子姓相承十世云。^[36]

《新唐书·康国传》“东安”条记：

显庆时，以阿滥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37]。

1. 安国的历史变迁

安国，国治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Bukhara）。布哈拉地处泽拉夫善河（那密水）之南。布豁、捕喝即 Bukhara 之对音，玄奘第一次把该词正确地音译为“捕喝”。俄国学者巴托尔德认为，Bukhara 一词是由 Bukhâr 派生出来的；而 Bukhâr 是突厥—蒙古人对梵文 Vihâra 的转写，Vihâra 意为“寺庙”。13 世纪中亚历史学家居瓦尼（Djuwaini）亦曾做出类似的解释^[38]。冯承钧以为《汉书·西域传》之罽城，即《新唐书》之安国^[39]。

《魏书》把安国记为忸蜜。元魏所称“忸蜜”，其对音应是 Numijkat、Nmijkat。这是布哈拉城郊的一个村镇。10 世纪上半叶波斯历史学家纳尔沙喜（Narshakhî）记载：穆罕默德·伊本·纳斯尔曾说，布哈拉有许多名称，他称之为 Numijkat（或 Nmijkat，Nimjkat）^[40]。-kat 为波斯语后缀，意为“城堡、

城”，古人音译时省略了。直到公元 776 年木坎纳（Muqanna）起义爆发时，Numijkat 村仍然存在^[41]。中国人在不同时期对布哈拉的不同称呼，反映了其对布哈拉认识的深入，也反映了布哈拉由村镇发展成为城市的曲折过程。

安国都城阿滥谧、阿滥，其对音应是 Ramīthan（Aryamīthan, Riyāmīthan, 或 Rāmītīn）^[42]。丁谦认为：阿滥谧城，谧当作谥，即《史记》之蓝市，《汉书》之监市，《魏书》之卢监氏，本大月氏故都^[43]。丁说失之臆断，且无任何语音勘同的支持。蓝市、监市，无法与阿滥谧、阿滥相勘同。蓝市、监市，当指古大夏国都城巴尔赫（Bactria，中古作 Balkh）。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至此，建城名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蓝市、监市当是这一名称的译音^[44]。实际上，拉谧丹（Ramīthan）是布哈拉城郊最著名的一个大镇，至今尚存古代遗留下来的城堡。10 世纪伊斯兰地理学家穆卡迪西（Maqdisi）把该地认作“古代的布哈拉”^[45]。纳尔沙喜也说，该村“比布哈拉城的历史悠久，有些书甚至直接称它为布哈拉。古时候，拉谧丹是统治者的居住地；在布哈拉城建立以后，统治者们都迁居到布哈拉，每年只是在拉谧丹过冬，直到伊斯兰时期都是如此”^[46]。至晚于 6 世纪后半期，在西突厥人统治时期，布哈拉地区的统治者已经常年居住在布哈拉城内；7 世纪前期，布哈拉统治者比敦（Bīdūn，其称号为布哈尔·胡达，Bukhār Khudāh）在古代城堡的废墟上重建布哈拉城堡，并在城堡大门之上挂了一块铁券，铁券上刻有其名字^[47]。隋代，隋炀帝曾遣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至其国，得五色盐而返。此时，安国已是“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环以流水，宫殿皆平头”^[48]。因此，《新唐书》称安国治阿滥谧城，这只能是隋以前的状况，而不大可能是唐代布哈拉的实情。看来，布哈拉统治者驻蹕地的变化，并未被唐人所知晓。

但是，纳尔沙喜提及一件饶有趣旨的事情。设伊·吉什瓦尔

(Shîr-i Kishvar) 是突厥统治者喀拉·朱林·突厥 (Qarâ Jûrîn Turk, 马迦特考定此人为室点密^[49]) 的儿子。他应布哈拉贵族的请求, 被其父派到布哈拉统治了 20 年, 然后去世。此后不久, 一位秦国 (Chîn, 即中国^[50]) 国王把公主嫁到布哈拉; 这位公主的嫁妆中有一座宝塔, 该宝塔就被安置在拉谿丹^[51]。马迦特在《斡水与那密水》中考证说: 这位秦国公主或是被唐灭亡的隋朝的公主, 她被唐高祖嫁到安国, 随安国使者一起前往布哈拉; 她也可能是中国突厥斯坦一位信奉佛教统治者的女儿^[52]。这件事不见中国史籍任何记载。无论这位公主是谁, 她的嫁妆被安置在拉谿丹这个事实, 很可能导致了中国人误以为安国王宫在拉谿丹。而实际上, 拉谿丹仅仅是布哈拉统治者的冬季驻地而已。至于这位秦国公主的夫君究竟是布哈尔·胡达, 还是突厥统治者, 今已难以确认。

上面提到的喀拉·朱林·突厥, 当是处罗侯可汗。公元 588 年, 突厥可汗 Schaba 西征波斯, 兵至巴哈吉、赫拉特两地; 可汗中流矢而死, 波斯大将 Bakram Tschoudha 乃进兵拜坎德城, 擒可汗之子巴斯摩哈 (Basmaudha)。岑仲勉考定此突厥可汗为东突厥可汗处罗侯^[53]。这位突厥可汗之子固守拜坎德, 而拜坎德又是布哈拉的属地, 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 喀拉·朱林·突厥 (Qarâ Jûrîn Turk) 就是西征波斯的突厥可汗; 他派其子设伊·吉什瓦尔 (Shîr-i Kishvar) 到布哈拉统治, 这为他发动西征创造了条件。而且, 纳尔沙喜也强调此突厥可汗号称“叶护可汗” (Biyâghû)。《隋书·突厥传》也记: “处罗侯竟立, 是为叶护可汗”。处罗侯 587~588 年在位, 号莫何可汗。

《新唐书》所记安国“大城四十, 小堡千余”, 与布哈拉的史实基本符合。纳尔沙喜引用穆罕默德·伊本·伽法尔的话说: 拜坎德 (Baikand) 有 1000 多个兵站 (ribât), 与布哈拉所属村镇的数目相等^[54]。这些数以千计的村镇, 往往有士兵驻守。它们大

概就是《新唐书》所称千余小堡。布哈拉所属的大村镇很多，著名的有：努尔（Nūr）、塔瓦伊斯（Tawāīs）、伊斯克吉卡特（Iskijkat）、沙尔格（Shargh）、赞丹纳（Zandana）、阿富辛纳（Afshina）、巴尔卡特（Barkad）、拉谟丹（Rāmitīn）、瓦拉赫沙（Varakhsha）、拜坎德、法拉卜（Farab）、开尔米尼亚（Karminiyah）、白米吉卡特（Bamijikath）、瓦尔达纳（Wardānah）等。这些城镇多数都建有自己的城堡、垒墙，定期举行集市；有的城镇，如瓦拉沙赫、拜坎德，其历史比布哈拉还要悠久，规模也很大，并有属于自己的村镇，建有宏伟的宫殿^[55]。这些城镇大概就是《新唐书》所记的“大城四十”。

2. 关于安国诸王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贞观初，安国王诃陵迦献名马于唐朝时，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以一世为20年计，二十二世为440年。据《册府元龟》卷970记载，安国第一次到唐朝贡献是在贞观十二年（638年）十一月^[56]。从此往前推440年左右，约当公元200年。考古证实，最早的布哈拉周边村镇，如瓦拉赫沙，建成于公元3世纪^[57]。布哈拉也是由村镇发展而来，其年代略比瓦拉沙赫晚些。看来，布哈拉约从公元3世纪开始建立起政权，本地王统一直存在下来。布哈拉本地统治者称布哈尔·胡达（Bukhār Khudāh）。即便是在西突厥人、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布哈尔·胡达也依然存在^[58]。《新唐书》此记应当是可信的。

安国与唐朝的关系较为密切。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国即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将阿史那社尔破龟兹，安国与西突厥、焉耆“争犒师”^[59]。如果我们注意到安西四镇尚要在一年以后才建立，就会从安国来到葱岭以东犒劳唐军之事中，看到安国与唐朝的关系比较亲密。安国“争犒师”之举，也说明在647年时唐朝势力已经到达碎叶以西。

据美国学者费叶（R.N.Frye）等研究，布哈拉的统治者很

可能采用了粟特人“王”的形式，因为“Khudāh”与粟特文“𐰽𐰺𐰍𐰏”（“王”）基本相同^[60]。在7世纪中叶，布哈尔·胡达由本地王公比敦（Bīdūn）担当，他属于吐格什哈达（Tughshāda）家族。直到萨曼朝统治者伊斯迈益尔来到布哈拉时（874年），该家族基本控制了布哈尔·胡达一职^[61]。贞观初遣使入唐朝献的安国王河陵迦，应是布哈尔·胡达，他大概也属吐格什哈达家族。马迦特等认定，开元十四年（726年）遣弟朝贡的安国王笃萨波提（《册府元龟》卷971作波婆提），即吐格什哈达（Tughshāda）本人。开元七年（719年）遣使朝贡的安国王，也应是此君^[62]。

那么，显庆时被任命为安息州刺史の昭武杀又是谁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需先明了“昭武”的意义。

关于“昭武”的词源、含义，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见解。岑仲勉先生在评述了这些观点后，认为“昭武”并非地名，而是官职名称，即“叶护”，其对音为jabghu，也即《陀拔纪年》所记公元588年西征波斯之突厥可汗Schāba，《阙特勤碑》东面31行所书之Čub^[63]。张毅先生也同意岑氏之说^[64]。

笔者除了对Čub之含义持有疑义外，基本同意岑仲勉的考定。据《新唐书·西域传下》所记，显庆年间，中亚昭武九姓国仍以“昭武”为姓的仅剩5国，即：安（王昭武杀）、东安（王昭武闭息）、米（王昭武开拙）、何（王昭武婆达地）、史（王昭武失阿喝）。而《阙特勤碑》东面31行记：“余等征alty Čub Soydaq，败之”。马迦特、岑仲勉把alty Čub Soydaq译作“粟特昭武六部”、“六姓Čub及粟特”，把Čub视作官职名，将Čub对应为叶护，即昭武，并将六姓Čub与中亚昭武六姓之国（康、安、东安、米、何、史国）相对应^[65]。但是，《新唐书·康国传》明确记述：康国“君姓温，本月氏人”^[66]。康国王并不姓昭武。苏联学者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和中国张广达先生考定，阙特勤远征的是中国灵州、夏州之间的“六胡州”，而不是中亚的六姓

昭武国；《阙特勤碑》东面 31 行原文“alty Čub soydaq”应译作“六胡州”或“六州粟特人”，Čub 对音为汉语的“州”^[67]。这个考定是正确的。

如此看来，昭武杀应是“叶护”杀，他应是个突厥人。因为，布哈拉本地王公一直都以“胡达”（Khudāh）为自己的称号，不可能采用“叶护”的称号。诚如此，唐朝最初在羁縻州安息州（布哈拉）任命的刺史是一个突厥人，而不是布哈拉本地王公。当时唐朝借助突厥人来实现其在布哈拉的间接统治。至于汉籍所记入唐贡献的安国王，则应当都是布哈拉本地王公。他们以朝贡的形式向唐朝表示其忠顺。

《册府元龟》卷 973〈外臣部·助国讨伐〉提及：天宝十三载（754），安国副王野解与东曹国王设阿以及诸胡九国王共同上表，请求与唐朝共同出击黑衣大食^[68]。这位安国副王如果不是东安国王，那么他很可能是以“胡达”名义上表的安王，唐人将“胡达”译作“副王”。

据《新唐书·地理志》可知：龙朔元年（661 年），唐在乌罗浑城置柁密州。而显庆时所置安息州则不见于西域羁縻府、州建置了^[69]。看来，唐人很快已意识到安与安息的天壤之别，而改安息州为柁密州。柁密州与粟特州一并归属月支都督府（置于吐火罗叶护阿缓城）统辖。遗憾的是，汉籍未载柁密州刺史是谁。从州治改地而置看，很可能柁密州刺史改由布哈拉本地王公担任了。

3. 关于安国的道里

安国四至、道里，《新唐书》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略有出入。

东安，因其在安国之东故名，即阿拉伯舆地学家所记之开尔米尼亚（Karmīniya），今乌兹别克斯坦克尔米涅市。开尔米尼亚至布哈拉里程，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有 17 法尔萨赫，约合 106

公里；古达玛则称，两地相距 14 法尔萨赫，约合 87 公里^[70]。而《新唐书》则称，安国东北至东安为“百里所”（约 44 公里）。《新唐书》所记里程显然太少。毕国，即拜坎德。古达玛说，拜坎德至布哈拉为 8.5 法尔萨赫，约合 53 公里^[71]。拜坎德故址至今布哈拉城的实际里程为 55 公里^[72]。两地之距离，《新唐书》也记为“百里所”，这已基本接近今日实际里程，仅少 11 公里左右。布哈拉西距乌浒水（阿姆河）约有 110 公里。《新唐书》所称安国“西濒乌浒河”，与史实基本符合。

三、东安

东安，或曰小[安]国，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阳，东距何二百里许，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龔斤。……大城二十，小堡百。显庆时，以阿滥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龔斤为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闭息为刺史。开元十四年，其王笃萨波提遣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来朝，纳马豹^[73]。

在上述引文中，丁谦认为，“亦曰龔斤”前脱落“伐地”二字，应是“伐地亦曰龔斤”。其理由是，唐在龔斤置木鹿州；而玄奘所记伐地即木鹿^[74]。

其实，玄奘所言伐地，即《隋书·安国传》之毕国，《新唐书·西域传》安国条也作毕国，康国条误为戊地，火寻条误作戊地，即阿姆河东岸的 Betik (Bitik)^[75]。纳尔沙喜曾提到布哈拉西南的比狄克和法拉卜 (Farab) 两村。比狄克当在法拉卜附近^[76]。法拉卜至布哈拉 18 法尔萨赫（约合 112 公里）^[77]。木鹿，则在今谋夫一带^[78]。唐代伐地（戊地）并非木鹿。此外唐

朝在西域设置羁縻府州，往往以古地名称之。这种称呼常属随意命名，名不符实。例如，大宛都督府（今塔什干）、贵霜州（以何国置，即撒马尔罕西北 75 公里的库沙尼亚），各与大宛国、贵霜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白鸟库吉曾得出结论：“唐代所设四裔的州都督府的名称，乃系当时史官任意采取汉代的名称，所以以历史地理的研究材料而言，并无若何价值。”^[79]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名称来判定某地在何处。丁氏之考定显误。

关于“阿滥”城的地点，沙畹认为“阿滥”即安国治地“阿滥滥”城，也即布哈拉^[80]。吴玉贵等虽采纳沙畹之说，但怀疑阿滥是东安国所属，阿滥似非阿滥滥^[81]。这种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新唐书》安国条并未言及在阿滥滥城置安息州；《新唐书》撰修者又把阿滥置安息州事系于“东安国”条下。要澄清这个疑问，必须首先确定东安国治地点及其与安国（布哈拉）的关系。

东安国，或曰喝捍，又被称为小安，其名称“东”、“小”均相对安国而言。托玛舍克及巴托尔德将其比定为波斯佚名作者所著《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中的 Kharghankath（卡尔干卡特，后称为 Kalkan—ata）^[82]。该城位于那密水（泽拉夫善河）之北。那么，喝捍应是卡尔干卡特。马迦特在《古突厥碑铭年代考》中，把喝捍考定为 Kharghan，并称其城北邻泽拉夫善河，在今 Kerminch 附近^[83]。宋岷先生则把布哈拉以东 22 法尔萨赫（合 141.7 公里，古达玛称仅有 19 法尔萨赫）的代布西亚（Dabusiyah）勘定为喝捍国，未知何据。

东安国实际上是安国的属地。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就明确把开明尼亚归作布哈拉的属地^[84]。开明尼亚与卡尔干卡特相距仅 1 法尔萨赫。卡尔干卡特当也是布哈拉的属地。因此，唐朝政府不可能在安国属地东安国设置两个州，而不在安国设州；也不可能东安国设两州，而在安国仅置一州。《资治通鉴》卷 200 记

载：显庆四年（659年）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85]。大安，即安国；小安，即东安。可见，唐朝在安国、东安国同时设置羁縻州。由于两地曾有所属关系，又是同时置州，并为记事方便，所以《新唐书》撰修者把此事系于东安国条下，而未分别记述。事实上，唐朝在安国的阿滥（即阿滥湫）设安息州，在东安国的窠斤设木鹿州。至于木鹿州刺史昭武闭息，看来是一个突厥人。

唐人对安国有一种误解，认为安国乃汉时安息国。《册府元龟》卷956〈外臣部·种族〉、卷958〈外臣部·国邑二〉均是如此记述^[86]。正是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唐朝政府在布哈拉设州时才会名之曰安息州。可见，阿滥城必属安国无疑。

那么，开元十四年（726年），派遣其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入唐朝贡的笃萨波提（《册府元龟》作波婆提）究竟是谁？从《新唐书·东安国传》记述的顺序看，“其王笃萨波提”似是东安国之王。所以，《全唐文》卷九九九“东安国王笃萨波提”条也记：“笃萨波提氏昭武，与康国同族，其国名东安，亦曰喝汗。开元十四年遣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来朝。后八年，又遣使人贡。”^[87]此记大概录自《新唐书》。

但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载：开元十四年“二月，安国遣使献豹，雌雄各一。……五月，安国王波婆提遣其弟可悉烂达千（干）拂耽发黎来朝，献马及豹。”后八年（开元二十二年）朝献之事，不见《册府元龟》记述。又据《册府元龟》卷九九九，早在开元七年二月，“安王笃萨波提遣使上表”，请击大食，并贡献诸多物品^[88]。可见，波婆提即笃萨波提；《新唐书》所记“其王笃萨波提”，实为安国王，而不是东安国王；开元二十二年朝贡之事，也应系于安国。所以，马迦特等也认定为笃萨波提即安国王吐格什哈达（Tughshāda）^[89]。从笃萨波提朝贡一事被系于东安国条看，阿悉烂达拂耽发黎也可能是东安国的国王。8世

纪上半叶的东安国之王统很可能属布哈拉的吐格什哈达家族。

关于东安国至周边国家里程：

何，又作屈霜你迦，即今撒马尔罕西北 75 公里的库沙尼亚^[90]。库沙尼亚至开尔米尼亚 79 公里^[91]。开尔米尼亚至卡尔干卡特（喝捍）约 6 公里，那么库沙尼亚至喝捍（东安）约 85 公里。《新唐书·东安国传》称东安东距何二百里许（88 公里以上），记载基本正确。《册府元龟》卷 958 称：“何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92]《册府元龟》所记何国至小安国（东安国）里程，多出一百多（唐）里。

《新唐书·西域传》“东安”条称东安西南至大安四百里（约合 176 公里）；同书“安国”条又称，安国东北至东安“百里所”，两记不一。《大唐西域记》所记东安至安国里程，与《新唐书·西域传》“东安”条所记一致。布哈拉至开尔米尼亚，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称有 17 法尔萨赫（约合 106 公里），古达玛称有 14 法尔萨赫（约 87 公里）^[93]。今日布哈拉至克尔米涅市实际里程约为 110 公里。《新唐书·东安传》、《大唐西域记》所记多出约 66 公里。

从《新唐书·东安传》的记述看，安国可经东安国至何国。这条路线也与伊斯兰舆地学家所记相符。

四、东曹、西曹、中曹

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咀那，苏都识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阴，汉貳师城地也。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东北宁远，皆四百里许，南至吐

大罗五百里。……武德中，与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欲隶麾下。”高祖大悦。

西曹者，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覓，治瑟底痕城。……武德中入朝。天宝元年，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即上言：“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十一载，东曹王设阿忽与安王清击黑衣大食，玄宗尉之，不听。

中曹者，居西曹东，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94]

1. 关于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隋代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千余人。……大业中，遣使贡方物。”^[95]从此记载看，曹国起初仅是康国的属地而已。到隋大业年间（605～618年），曹称国，治瑟底痕城（Ishtikhan，当是穆斯林地理文献中的 *Ithtākharj*、*Ishtikhan* 之对音，其地在撒马尔罕西北 50 公里的伊什特汗^[96]）。丁谦认定瑟底痕城在今喀喇苏城^[97]），遂向隋朝贡方物。据《册府元龟》，曹国向隋朝遣使贡方物是在大业十年（614年）七月^[98]。向隋朝遣使的曹国国君，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此君很可能就是康国王子乌建一脉。武德年间（619～626年）遣使入朝的，大概也是乌建一系。值得注意的是，玄奘说，率堵利瑟那国“自有王，附突厥”^[99]；而在隋代、唐初的汉籍记述中，未见有称曹国国君为“王”的。而《新唐书·西域传》“西曹”（即隋之曹国）则明确记载：天宝元年（742），“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这位曹国王哥逻仆罗的太祖，在唐太宗（“天可汗”^[100]）时期已统治曹国。早在唐高祖时期，曹国已遣使朝贡。为什么哥逻仆罗的使者不追溯到唐高祖时期呢？最可能的原因是哥逻仆罗与唐高祖时期的曹国国君并非同祖。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唐

贞观初，曹国统治层发生变故，哥逻仆罗的祖辈取代了康国王子乌建一系，遂独立于康国而称王，并向唐朝遣使称臣。而唐朝则仅视西曹为正统。所以，在东、西、中曹三国中，唐朝仅册封西曹国王（哥逻仆罗）为“王”（怀德王）。

上述推测可从《册府元龟》记述得到佐证。《册府元龟》卷971记：“天宝元年（742年）三月，曹国王哥逻仆罗、石国王特勒（勤）并遣使献马及方物。”同书卷977记：天宝四载（745年），“曹国王哥逻仆遣使上表，自陈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尝受征发。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101〕}哥逻仆罗与哥逻仆应是同一人名之异记，他是西曹国王。不过，《册府元龟》有时也记“西曹”国，而不记作“曹国”。例如，天宝三年七月，“大食国、康国、史国、西曹国、米国……并遣使献马及宝”^{〔102〕}。

而东曹（苏对沙那）的王统则与西曹不同，至迟在玄奘途经其地时（628年），东曹已有自己的王统。正因为如此，在武德年间，东曹才能与康国同遣使人朝。在唐朝看来，东曹的政治地位与康国相等，都是独立的国家。

在显庆年间，唐朝肯定也在曹国设置了羁縻州府。《新唐书·曹国传》阙载。据《资治通鉴》卷200记：“显庆四年（659）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怛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103〕}745年（天宝四载），曹国王向唐玄宗上表说：“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常受征发。”^{〔104〕}可见高宗时唐朝必定在曹国也设置了羁縻州府。

关于西曹国王哥逻仆罗被诏封怀德王的时间，《新唐书·西域传》记为天宝元年（742）；《唐会要》卷98记作天宝三载；《册府元龟》卷965记载，天宝三年七月，“赐曹国王号为怀德王，米国王为恭顺王，康国王为钦化王”^{〔105〕}。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述，曹国王是与米国王、康国王一起被赐封的。看来，《册府

元龟》不大可能把如此重大事件的时间记错。当以《册府元龟》、《唐会要》此记为信从。

2. 关于曹、东曹、西曹的区别

在隋代，仅有曹国一名，不分东曹、西曹、中曹。唐代的东曹实际上与隋代曹国没有什么联系。《新唐书》的编撰者对东曹与西曹的情形不甚了了，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这首先反映在他们对东曹不同称谓的误解上。

《新唐书》说：“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咀那，苏都识匿。”率都沙那，《隋书·米国传》仅作苏对沙那^[106]；玄奘记作宰堵利瑟那。率都沙那、苏对沙那、苏都识匿三种称呼，皆梵语 Sutrēna 的对音，意为“干燥”，阿拉伯语作 Sutrūshana；在穆斯林文献中有几种转写法，最常见的是 Ushrūsana 和 Ustrūshanah^[107]。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考证，此名仍以转写为 Sutrūshana 较妥当^[108]。该地位于锡尔河以南，地当费尔干纳盆地西部出口处。《新唐书》所称之为波悉山，即今 Hissar 山脉所属（丁谦认为，波悉山为前阿赖山^[109]）。巴托尔德考定，苏对沙那国治在今乌拉秋别^[110]。乌拉秋别在撒马尔罕以东 220 公里；苏对沙那城遗址就在今乌拉秋别市一高地上，高约 20 米，面积 2.5 平方公里^[111]。9~10 世纪，苏对沙那首府又被称为 Būnjikath (Banjakath, Bunūjkath)；Būn-jikath 易与撒马尔罕以东的 Banjikath 相混淆^[112]。

劫布咀那，托玛舍克考定其对音是 Kapūtānā/Kedud。《大唐西域记》卷一夹行注称：劫布咀那国，“唐言曹国”^[113]。玄奘说，劫布咀那西至屈霜你迦国（唐言何国）300 余里；劫布咀那位于弭秣贺国（米国）以北；弭秣贺国位于飒秣建之东南^[114]。《释迦方志·遗迹篇》记：劫布咀那国（曹国也）位于弭末贺国西北^[115]。那么，玄奘所言之劫布咀那应当位于飒秣建之东或东北。如果玄奘所言不虚，玄奘从石国至西南方的飒秣建途中，应

当路过劫布咀那；但是，玄奘并未路过此地。从方位上看，玄奘所言之劫布咀那与《新唐书》之中曹更接近。所以，沙畹认为，玄奘所言之劫布咀那，应是中曹，其对音为 Kaboudhand-jakath^[116]。章巽等先生也认为，劫布咀那之对音是 Kabūdhanjakath，即曹国，都城故址在那密水北，距撒马尔罕 2 法尔萨赫，今名 Gubdan 村。^[117]可是，据《新唐书》，唐代曹国（即西曹）的国治是瑟底痕城。如果玄奘所称劫布咀那国即“唐言曹国”不虚，那么劫布咀那国治并不是劫布咀那（城），而是瑟底痕城。据《隋书》说，曹国都城在那密水之南。章巽所考定曹国都城 Gubdan 在那密水北，这与《隋书》所记不符。除非《大唐西域记》所称劫布咀那即“唐言曹国”有误，否则章先生之考定有缺陷。

《隋书·曹国传》称：曹国方位在“那密水南。……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千六百里。”^[118]《隋书》所记曹国当位于康国之西北，西至何国 150 里，这与玄奘所记之劫布咀那国的方位和道里不一致。而《新唐书·康国传》称：康国西北距西曹百余里，北距中曹五十里。《隋书》所记之曹国，与《新唐书》所记西曹，其方位基本一致；玄奘所记之劫布咀那与《新唐书》之中曹更接近。但是，玄奘称，劫布咀那西至屈霜你迦国（唐言何国）为三百余里^[119]。这与《新唐书》、《隋书》所记均不一致^[112]。

无论劫布咀那的对音为何，该地与东曹（率都沙那^[121]）不是同一地方，这是可以肯定的。劫布咀那国应即西曹，国治在撒马尔罕西北的伊什特汗；东曹在撒马尔罕以东。东曹、西曹之称谓，大体上是以飒秣建为基点来区别的。看来，《新唐书》编撰者没有注意玄奘对劫布咀那与苏对沙那的区分，而把两地相混淆了^[122]。考虑到撒马尔罕以东不远的地方另有一个 Banjikath，此地名极易与苏对沙那首府 Būnjikath (Banjakath) 相混淆，《新唐

书》很可能误把东曹等同于 Banjikath, 并进一步把 Banjikath 与 Būnjikath 相混淆了。

《新唐书》的另一个错误, 就是把东曹视作汉贰师城地。苏对沙那并非汉代贰师城。据岑仲勉考定, 汉代贰师城当在今 Dsizak^[123]。吉扎克 (Dsizak, 或 Jizak) 位于撒马尔罕至乌拉秋别的中间, 西距撒马尔罕 102 公里, 东南至乌拉秋别 132 公里^[124]。常征则认为, 汉代贰师城乃大宛王城, 即吉尔吉斯奥什城^[125]。

东曹与曹国的区别, 《册府元龟》和《唐会要》也未加注意。《册府元龟》卷 170〈帝王部·来远〉记: 武德“七年七月, 康国、曹国并遣使来朝。……曹国使者曰: ‘臣本国以臣为健儿, 闻秦王神武, 愿在麾下。’高祖大悦, 因厚遇之。”此记与《新唐书·东曹传》所记应是同一事件。《册府元龟》卷 973 记: 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 “东曹国王设阿及安国副王野解及诸胡九国王并遣上表, 请同心击黑衣, 辞甚切至。”同书卷 971 则记: 天宝十四载三月, “康国副王、火寻国王稍芬、曹国王设阿忽并遣使朝贡。”^[126]设阿忽显然就是设阿。但是, “东曹国王”被径记为“曹国王”了。《唐会要》卷 98〈曹国〉则把东曹视为“曹国”: “曹国居埋那密水南, 古康居之地。俗与康国同。……又有中曹国, 在西曹国之东, 康国之北。其所治谓之迦布底真城, 在平川。……又有西曹国, 治那密水南瑟底痕城, 东南去康国一百里, 西北至何国二百里, 南与史国界接, 北与波览国接。……”^[127]埋那密水, 即那密水, “埋”应是衍文。按: 曹国 (西曹) 无论如何不会位于“东南去康国一百里, 西北至何国二百里”这样的方位。由于观念上的错讹, 《唐会要》卷 98 把曹国 (西曹)、东曹记事混记“曹国”条下: “武德七年七月, (曹国) 朝贡使至, 云: ‘本国以臣为健儿, 闻秦王神武, 愿在麾下。’高祖大悦。……天宝元年, 其王哥逻仆罗使献方物。三载, 诏封其

王为怀德王。四载，哥逻仆罗上表……十一载，其王设阿忽与（安）国副王野解及九国王并上表，请同心击黑衣大食，玄宗宴赐慰谕遣之。”武德七年（624年）、天宝十一载（应是十三载）记事，应归于东曹，余为西曹之事。

3. 关于东曹、西曹的道里

东曹至周边国家道里，《新唐书》所记多数与实际道里接近。这在《新唐书》所记中亚诸国道里中是少见的。

俱战提，即今苦盏（忽毡），位于乌拉秋别东北62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古达玛均称，苏对沙那东至俱战提为17法尔萨赫，约合106公里^[128]。他们所记道里走向，要绕道扎敏附近的萨巴特，多走7法尔萨赫（约合43.7公里）。《新唐书》称，苏对沙那“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200唐里合88公里，与今日里程相差约26公里。这可能是唐代里程较为迂曲之故。《新唐书》所记这两地方位大体正确。

石国，即今塔什干，位于乌拉秋别正北方，公元605~750年，石国宫廷所在地为今塔什干市中心东南方15公里处的阿克·特帕（Ak-Tepa）遗址^[129]。乌拉秋别至塔什干里程，今日约160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34法尔萨赫，约合210公里^[130]；《新唐书》记为400（唐）里，约合176公里，与今日实际里程大体吻合。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道路走向是从撒马尔罕出发，苏对沙那至赭时（Shāsh，即石国）要绕道萨巴特、扎敏，里程多走9法尔萨赫左右（56公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称，赭时（石）国西千余里至罕堵利瑟那国^[131]。此记显误。罕堵利瑟那位于石国之南，而非之西；两地之距约为400唐里，而不是千余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可能也把罕堵利瑟那误为曹国（西曹）了。

苏对沙那至撒马尔罕，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称有26法尔萨赫，约合162公里^[132]；《新唐书》记有400里（约合176公

里)。两者所记基本相符。

宁远，即拔汗那，或曰钹汗，即 Akhsikath 古城，在浩罕东北约 60 公里处，西距俱战提约 170 公里，距乌拉秋别约 232 公里。《新唐书》称，苏对沙那东北至宁远 400 里许（176 公里），比实际里程（232 公里）少了 56 公里。

《新唐书·吐火罗传》称：“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靺货罗，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显庆中，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133]。显然，唐人视阿缓城为吐火罗的政治中心。苏对沙那“南至吐火罗 500 里”，似指苏对沙那至阿缓城的距离。阿缓城（Warwaliz），《旧唐书·地理志》作遏换城，并称该城为吐火罗国治所在^[134]，地当今阿富汗东北之昆都士^[135]。乌拉秋别到昆都士，至少也有 400 公里。《新唐书》所记显然太少。吐火罗国北境在著名的铁门关。玄奘说：“出铁门至靺货罗国故地”^[136]。铁门，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州的达尔本脱（Derbent）西约 13 公里处^[137]，至今仍为穿越拜孙套山脉的唯一孔道。铁门距撒马尔罕里程，玄奘称有 800 余里^[138]；两地实际里程 240 公里左右（途经史国）。因此，《新唐书》所记苏对沙那至吐火罗里程肯定有误。

五、石国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部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圆千余里，右涯素叶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窟匿城地。……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勒匐职统其国。武德、贞观间，数献方物。显庆三

年，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於屈昭穆都督。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有功，为石国王。二十八年，又册顺义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属天可汗，惟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天子不许。天宝初，封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赐铁券。久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勅其无蕃臣礼，请讨之。……石东南千余里，有怖捍者……西千里距堵利瑟那……

1. 几个名称的考释

柘支、柘折、赭时三名，粟特语作 C'c，乃波斯语 Chach (Chāch)、Chāj 或 Jaj、阿拉伯语 Shash 之音译，意为“石”^[139]。公元 8~9 世纪，Chaj 这一名称常出现在阿拉伯、波斯史料文献中。阿尔·比鲁尼 (973~1048 年) 说：Chaj 一名是借自这座城市的突厥语名称，也就是塔什干城，意即石头城^[140]。11 世纪 70 年代，维吾尔族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语大词典》(抄本第 1 卷，413, 577 页) 说：塔什干，在阿拉伯文献中称 Xax，在塔吉克—波斯文献里作 Qaq，突厥语文献则写作 Tarkend；Tarkend 意为“附属的”，“可汗统治者把隶属于他们的省称做 Tarkend”。^[141]石国位于锡尔河支流齐尔齐克河冲积形成的绿洲上。公元 605~750 年，石国宫廷所在地为今塔什干市中心东南方 15 公里处的阿克·特帕 (Ak-Tepa) 遗址；750 年~12 世纪上半叶，石国政治中心迁至今塔什干市中心的宾卡特 (Binkath) 遗址所在地^[142]。

瞰 (Kàn) 羯城，有学者将其对音为 Binkatn^[143]。但是，Binkath (n) 要晚至 8 世纪中叶才成为石国政治中心；而且，该词很难与“瞰羯”审音勘同。所以，瞰 (Kàn) 羯城对音似是 Qaq。

窳 (yù) 匿城，原为汉代康居五小王之一的窳匿王所治，

《汉书·西域传》记为麻城。该城位于康居组成部分的乐越匿地区，后者即今塔什干地区。^[144]

素叶河，《释迦方志》同，《大唐西域记》作叶河。素叶河的方位，上引二书均称在赭时（石）之西邻；《新唐书》称石国右涯素叶河。“右”为北方南视之右，即西方。阿拉伯人、波斯人记东部地区方位，则以东望定左右，以右为南。《隋书·石国传》、《北史·石国传》并记：“石国，居于药杀水”。杜环《经行记》则称：石“国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质河，并西北流。”^[145]真珠河，即药杀水^[146]；质河，应即赭时河。

素叶河之对音，沙畹认定为 Tchou，并把此河与药杀水（Yaxartes，中古波斯语作 Jaxðarta，即锡尔河）相区别，认为此处素叶河误也，应为药杀水^[147]。但是，Tchou 之对音应是楚河。沙畹之说有误。季羨林等先生则把素叶河直接勘定为锡尔河^[148]。考虑到玄奘曾亲临石国，以及上引各书均记作素叶河（叶河），素叶河之称必是有所据。唐人不大可能把楚河与锡尔河相混淆。《世界境域志》把流经赭时（Châch）边界的河称作 Parak 河，并称该河汇入赭时河；大食人（Tâziyân）把赭时河称为 Sayhûn 河^[149]。Parak 河，今名 Chirchik 河。杜环所称之真珠河，似指 Parak 河。“素叶”，古读 sou - iäp，我们很难在上述诸河河名中找到其对音。

2. 关于大宛都督府设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资治通鉴》卷 200 记：显庆四年（659 年）“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怛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150]《新唐书·康国传》“石国”条、《唐会要》卷 99 “石国”条则把唐朝在石国瞰羯城置大宛都督府的年代系于显庆三年（658 年）^[151]。

那么，大宛都督府究竟置于何年？

大宛都督府的设立，与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有关。《旧

《唐书·高宗本纪》记：显庆三年二月，唐将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贺鲁败走石国，唐军副将萧嗣业追擒之；三月，西域平，唐朝以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152]。同书《突厥传下》述：显庆二年，苏定方率萧嗣业等征讨（阿史那）贺鲁；几经征战，贺鲁败遁石国；萧嗣业追至，石国（突厥统治者）鼠麴设把被石国苏咄城（即 Shoturkath 城，距塔什干 5 法尔萨赫^[153]）城主伊涅达于拘执的贺鲁交给萧嗣业；贺鲁被送往长安；唐朝分贺鲁种落“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其所役属诸国，皆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154]。《旧唐书·地理志三》也称：“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平贺鲁，分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于是，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都护府。”^[155]

《册府元龟》卷 967〈外臣部·继袭二〉称：“显庆二年既平贺鲁，三年诏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乃册阿史那弥射为兴昔可汗兼崑陵都护，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156]同书卷 986〈外臣部·征讨五〉记：显庆二年“十二月，苏定方大破贺鲁金牙山，尽收其所居之地，西域悉平。……定方于是悉兵，命诸部归其所居，开凿道路，列置馆驿，埋瘞骸骨，所在问疾苦，分其疆界，复其产业，贺鲁所虏掠者悉括还之。于是，西域诸国安堵如故。”^[157]又，《唐会要》卷 73 记：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西域诸国，安堵如故，擒贺鲁以归。十一月，分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其月十七日，又分其种落，列置州县。……其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同书卷 99 记：显庆三年，以石国噉（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158]。此记把二都护府和诸州府县置立时间记为同年同月。石国为阿史那贺鲁所役属诸胡国，大宛都督府置立时间应在十一月十七日。但是，此十一月是在平定贺鲁之乱的显庆二年，还是在

擒贺鲁以归的显庆三年呢？

《资治通鉴》卷 200 称：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乙卯朔，乙丑日），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仍命（阿史那）弥射、步真与承庆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次年十一月，萧嗣业押贺鲁至京师长安，“甲午，献于昭陵。赦免其死，分其种落为六都督府，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159]。可见，崑陵、濛池都护府应置于显庆二年十二月^[160]；唐朝并未同时在贺鲁种落（五咄陆部）之地置都督府；六都督府应置于显庆三年十一月。《册府元龟》所记濛池、崑陵二都护府诏置时间（显庆三年），《旧唐书·高宗本纪》所记两都护府置立时间（显庆三年二月），可能是高宗正式下诏置立时间。《旧唐书·地理志》所记有误。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濛池都护府”条记：“显庆二年禽贺鲁，分其地，置都护府二、都督府八，其役属诸胡皆为州。”^[161]此记有三点疑问。其一，唐朝在贺鲁旧地（五咄陆部之地）置都督府数，《唐会要》卷 73、《资治通鉴》卷 200 均作六个，并详列了其称名^[162]；其二，显庆二年，唐朝并未在贺鲁旧地置都督府。因为，《资治通鉴》卷 200 明确记述册命使卢承庆仅册封刺史以下官。第三，两都护府的隶属，《旧唐书》和唐乾陵石人像衔名并称归安西都护府统辖。从唐乾陵石人像衔名看，濛池都护府属下有千泉都督府、俱兰都督府、颉利都督府（以西突厥拔塞干部置）、碎叶州等^[163]；石国不归属濛池都护府统辖，而与康、吐火罗、波斯等一道，属安西都护府统辖^[164]。

《新唐书·艺文志二》著录《西域图志》60 卷，注云：“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165]同年，高宗派遣果毅董寄生将康王所居城列为康居都督府，以康王拂呼缦为都督。^[166]高宗

遣使康国等地，应在贺鲁被擒之后；而董寄生西行，估计是在高宗御览《西域图志》之后。如果大宛都督府置于显庆三年（658年），那极可能是董寄生西行时所置。所以，唐乾陵石人像才会把石国与康国、吐火罗同列。千泉、俱兰、颉利三都督府及碎叶州属于贺鲁种落之地，应是与大宛都督府同置于显庆三年。它们大概属于在贺鲁“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之列。所谓“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肯定是指显庆三年董寄生置府州之后之情形。但令人不解的是，高宗显庆四年下诏，仅有石国，而没有康国；似乎石国置于康国之后。而且，《新唐书·地理志》在著录龙朔元年（661年）“于阗以西，波斯以东”的羁縻府州时，未列昭武九姓诸羁縻府州。

所以，《册府元龟》卷966〈外臣部·继袭一〉明确记载，“石国，唐显庆三年列其地为大宛府，以其王瞰吐屯摄舍提於屈昭穆为都督。”

从唐乾陵石人像衔名看，石国不归属濠池都护府统辖，而与康、吐火罗、波斯等一道，属安西都护府统辖^[167]。从地域上看，濠池都护府比安西都护府更靠近大宛都督府（石国）。可是，唐朝却绕过濠池都护府，而让安西都护府统辖大宛都督府。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濠池都护为突厥人（首任濠池都护是阿史那步真；686年，其子阿史那斛瑟罗袭父职爵^[168]）。濠池都护府所辖基本上是在碎叶以西的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落之地。唐在河中地区设置羁縻府州时，不可能把它们完全交由西突厥人统治；它们只能由唐中央政府直属的西域最高机构安西都护府统辖。唐朝在石国置都督府，反映了石国在唐朝的西域统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河中地区，唐朝仅设置了康居都督府、大宛都督府和休循州都督府。

3. 关于石国诸王

据《新唐书·石国传》所记，大业初年统领石国的是“特勒

匐职”。此君显然是一个突厥人。特勤，应作特勤，乃突厥人的官职之一。突厥汗国设有叶护、特勤（勤）、乙斤屈利啜、闾洪达、颉（俟）利发、吐屯、俟斤等 28 等官爵^[169]。匐职，《北史》卷 97、《隋书》卷 83 均作甸职^[170]。据《隋书·石国传》说：石国“其王姓石，名涅。……其俗尚战，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兴兵灭之，令特勤甸职摄其国事。……甸职以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171]甸职在大业五年（609 年）最后一次朝贡，可见甸职之摄政石国是在 609 年以前。这次朝贡和贞观年间（八、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年，即公元 634、646、647、648 年）数次朝贡，《册府元龟》均有记述；武德年间石国的朝贡，则不见《册府元龟》记载^[172]。室点密系射匮可汗虽然在位晚至 611~618 年，但据章巽先生研究，射匮可汗早就承袭了祖父达头可汗的称号及其在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领地。^[173]

贞观十四年（640），石国受西突厥节制。是年，西突厥弩失毕部落酋豪迎立薄布特勤（咥力失可汗之侄）为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乙毗沙钵罗叶护“建庭与睢合水北，谓之南庭。东以伊利河为界，自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国、史国、何国、穆国、康国，皆受其节度”^[174]。

《旧唐书·突厥下》记：贞观十五年（641 年），西突厥汗国咄陆可汗与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相互攻击，“咄陆遣石国吐屯攻叶护，擒之，送于咄陆，寻为所杀。”^[175]这里提到的石国吐屯就是西突厥委任监统石国的吐屯。吐屯，对音为 Toudoun（或 Tudun）。《太平广记》卷 250 引《唐御史台记》说：“突厥谓御史为吐屯。”看来，这时监统石国的突厥人之官职已由“特勤”降为吐屯。《册府元龟》卷 970 称，永徽六年（655 年）六月，大石国盐莫念遣使朝贡^[176]；显庆年间的石国王，《新唐书》记作瞰土屯摄舍提於屈昭穆。土屯，又作吐屯；摄舍提，为西突厥五咄陆（六）部落之一，《旧唐书·突厥下》记作摄舍提瞰

(噶)^[177]。据松田寿男研究,汉人在表示突厥人的名字时,通常是在其名字前冠以所属部落之名^[178]。显庆年间石王之名,应是於屈昭穆;此人应是一个突厥人。永徽年间的石国统治者盐莫念看来已被於屈昭穆所取代。囿于史料,我们很难判定盐莫念的族别。

既然突厥人在大业年间杀了石王,并以特勒(勤)统其国,看来石国在一个时期内不会有自己的国王,而由突厥人统领。突厥人一定非常重视石国。所以,阿波系处罗可汗(603/604~611年)“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179]。统叶护可汗(618~628年)“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180]。玄奘西行至素叶时,曾拜见过突厥叶护可汗^[181]。永徽年间(650~655年),沙钵罗可汗阿史那贺鲁也曾在千泉和双河建牙^[182]。置身于石国以北的突厥小可汗和建牙于千泉的西突厥可汗,一定牢牢控制着石国。

开元初(约713年),被唐朝册封为石国王的莫贺咄吐屯,从名字上看,也是一个突厥人。因此,《唐会要》把他称为“蕃王”^[183]。马小鹤认为,莫贺咄吐屯即中亚穆格山粟特文书A—14所记“赭时领主”;伊捺吐屯屈勒即A—14文书所记“吐屯”^[184]。唐朝册封一个突厥吐屯为石国王,一方面说明唐朝长期利用突厥人控制塔什干地区;另一方面也说明突厥人长期控制着塔什干地区。贞观年间,石国吐屯受西突厥可汗之调遣;显庆二年,伊丽道行军总管苏定方率萧嗣业等征讨阿史那贺鲁,贺鲁逃至石国苏咄城,该城城主伊涅达干把贺鲁等拘送石国。当时,石国由突厥统治者鼠耨设控制^[185]。以上材料说明,石国诸城长期受石国突厥统治者节制、号令。

关于莫贺咄吐屯册封的缘由和时间。《新唐书·突厥传下》记:突骑施大首领莫贺达干与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率石王莫贺咄

吐屯、史王斯谨提共击突骑施苏祿之子吐火仙，破之碎叶城；吐火仙弃旗走，擒之。因此功，莫贺咄吐屯被册为顺义王，史王斯谨提加拜为特进^[186]。不过，《新唐书·突厥传下》没有明确给出此事发生的年代。另据《资治通鉴》，莫贺达干助安西都护盖嘉运擒吐（又作咄）火仙事发生在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八月（参见本文“史国”考）^[187]。查《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开元初唐朝并未给莫贺咄吐屯册封；莫贺咄吐屯受封之事，在开元二十八年三月。是年三月，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俘吐火仙可汗来献；唐朝“以石国蕃王莫贺咄吐屯有功，封为石国王，加特进，仍赐旌节。翌日，又册为顺义王。”莫贺咄吐屯被册封为顺义王是在此年的三月二十二日^[188]。《全唐文》卷39收录〈册顺义王莫贺咄吐屯文〉一文，该册文也称莫贺咄吐屯被册封事系开元二十八年三月^[189]。因此，莫贺咄吐屯因功被册封为石王和顺义王之事，应发生在开元二十八年三月。

关于开元初莫贺咄吐屯册封一事，不为《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所记。《唐会要》卷99“石国”条记：“开元初，其蕃王莫贺咄吐屯有功，封为石国王，加特进，寻又册为顺义王。”^[190]《太平寰宇记》卷186“石国”条照录此记^[191]。此记与《新唐书》之记几乎一致。两者很可能出自同一材料来源，其特点是把开元初莫贺咄吐屯册封为石国王的缘由记为“因功”，且把莫贺咄吐屯封为石国王、顺义王记在一起。

另据《册府元龟》卷966记载，“石国……开元初，封其王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九年（721）其王曰伊吐屯屈勒。天宝五载，封其王子那偈〔俱〕车鼻施为怀化王。”^[192]

《全唐文》卷999“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也记：“石国王伊捺吐屯屈勒氏昭武，与康国同族，别姓石。开元初，封其父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九年，伊捺吐屯屈勒嗣立，请讨大食，不许。”^[193]

以上两条记载均未言及开元初年莫贺咄吐屯封为石国王的缘由。

考虑到以上史料记载时间、人物的一致性，看来在开元初年（约713年），唐朝也曾册封伊捺吐屯屈勒的父亲莫贺咄吐屯为石国王。但是，《唐会要》、《新唐书·石国传》把开元二十八年册封的缘由“因功”误系于开元初年册封之事上了。

从唐朝册封制度上看，也时有多次册封一人同一种封号的事例。746年，唐朝册封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753年，唐朝又册封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196]。

从汉籍记载看，石国在8世纪上半叶仍实行双王制。开元九年（721），伊捺吐屯屈勒嗣立，但其父莫贺咄吐屯仍在，处于类似“太上皇”的地位。从穆格山粟特文书36A—14的内容看，当时掌握实权的是伊捺吐屯屈勒^[195]。他在嗣立伊始，即代表石国上表唐朝，“请讨大食”^[196]。开元二十八年（740），莫贺咄吐屯又被册封为石国王、顺义王之后，伊捺吐屯屈勒仍然有自己的权力。据《册府元龟》记述，741年，石王伊（捺）吐屯屈勒遣使上表，请击大食；746年三月，石国副王伊捺吐屯屈（勒）与石王分别遣使朝献^[197]。对于石国的这种双王制，唐朝很可能有所了解，所以把伊捺吐屯屈勒记作“石国副王”，以示区别。从汉籍记载看，石国正王号称“特勒（勤）”，742、743、745年，石王特勒（勤）遣使朝贡；副王为吐屯一系，伊捺吐屯屈勒即属该系。“伊捺”，如同“移涅”、“伊涅”，是突厥语“inal”的译音，意为“小”。

关于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册封之事。据《册府元龟》卷965〈外臣部·封册三〉，以及《全唐文》卷39〈赐故石国王男那俱车鼻施进封怀化王并赐铁券文〉^[198]，那俱车鼻施被册封一事发生在天宝十二载（753年）。《新唐书·石国传》把此事记作天宝初，且系于怛罗斯战之前，显误。

石国王子那俱车鼻施是石王长男。天宝元年(742)正月,石王上表,乞授长男官职。唐朝诏拜石王长男那俱车鼻施大将军,赐一年俸料^[199]。值得注意的是,那俱车鼻施虽是王太子,开元九年嗣立的却是伊捺吐屯屈勒。

4. 关于石国道里、四至

在“昭武九姓”诸国中,唯有石国至唐朝都城长安的里程见于《新唐书·西域传》“石国”条记载(《隋书·西域传》则记有石、米、史、曹、何、穆诸国至隋瓜州里程)。“石国”条称,石国至长安9000(唐)里。两地计程路线似是《新唐书·龟兹传》所记:

长安7000余里^[200] 龟兹600 跋禄迦300 凌山500 素叶水城400 千泉100 咀逻斯200 白水城50 笈赤建200 石国^[201], 总计9350余里。

显然,“石国”条比《龟兹传》少计350里。《龟兹传》所记极西里程,至石国而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安西都护府以石国为控制河中地的桥头堡。上述计程路线,实际上也是唐朝对石国的行政管理路线。

《隋书》卷83、《通典》卷193、《册府元龟》卷958并称,石国东南去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6000里。^[202]《唐会要》卷99“石国”条则称:石国“西北去瓜州六千里”。^[203]“西北”显为“东南”之误。《册府元龟》卷958仅记康居国(康国)至安西都护府里程(5550里),未记石国至安西都护府里程。《旧唐书·地理志三》称,瓜州东至京师长安3310里^[204]。那么,石国至长安为:

$6000(\text{石国} \sim \text{瓜州}) + 3310(\text{瓜州} \sim \text{长安}) = 9310(\text{唐里})$
这与《新唐书·龟兹传》所记基本相合,仅差40里。但是,此记是否正确呢?

《元和郡县图志》卷40称:伊州至上都4430里^[205]。唐魏

王李泰等编撰的《括地志》记：“伊州在京（长安）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206]这说明贞观年间（627～649）至元和年间（806～820），唐人关于伊州至长安里程的记载没有什么变化。

敦煌经卷 P.2009《西州图经》称：“西州东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207]S.367《沙州伊州地志》称：伊吾军东南去上都四千八百里，东南去伊州三百里；西南去西州八百里^[208]。那么，伊州西至西州为：300 里（伊州～伊吾军）+ 800 里（伊吾军）= 1100（唐）里。伊州东至沙州里程为：1360（西州～沙州）- 1100（伊州～沙州）= 260（唐）里。那么，伊州东至上都里程为：4780（伊吾军～上都）- 300（伊吾军～伊州）= 4480（唐）里。伊州至上都里程在 4416～4480 里之间。《元和郡县图志》之记与敦煌地志残卷所记基本符合。如果以 4430 里（《元和郡县图志》所记）作为伊州至上都标准里程，那么沙州至上都里程为：4430（伊州～上都）- 260（伊州～沙州）= 4170 唐里。

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瓜州西至沙州 300 里^[209]。那么，瓜州至上都里程：4170（沙州～上都）- 330（沙州～瓜州）= 3840 唐里。可见，《旧唐书·地理志三》所记瓜州至长安里程（3310 里），少记了 530 里。但是，《旧唐书》之记与《元和郡县图志》“瓜州”条基本相符。后者称，瓜州东南至上都 3400 里^[210]。

《太平寰宇记》卷 156“安西大都护府”条记：安西都护府（龟兹）至碎叶总里程为 1960 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赭时（石）至碎叶（Kubāi）有 109.7 法尔萨赫^[211]，约合 684.5 公里，1545 唐里^[212]。那么，石国至龟兹里程为：1545（石～碎叶）+ 1960（碎叶～龟兹）= 3505 唐里。《新唐书·西域传上》称，龟兹至石国里程为 2350 里^[213]。这比上式少记了 1155（唐）里。

《册府元龟》卷 958 说：龟兹国王治居延城，去长安 7480 里^[214]。《通典》卷 191 称：龟兹东去长安 7500 里^[215]。那么，石国至长安应为：3505（石国～龟兹）+ 7480/7500（龟兹～长安）= 10985～11005（唐）里。可见，石国至长安里程，《新唐书·石国传》少记 1985～2005（唐）里；《新唐书·龟兹传》少记 1635～1655 里。

唐魏王李泰等的《括地志》称：康居国在京西一万六百里^[216]。石国在康国东北 500 里。那么，石国至长安 10100 里。《括地志》之记比较准确。

《新唐书·石国传》所记石国至瓜州里程，很可能录自《隋书·石国传》。后者也记称，石国至瓜州六千里^[217]。值得注意的是，《隋书》所记里程，是走石国——钹汗（拔汗那）——葱岭——疏勒一线。《隋书·钹汗传》说，钹汗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隋书·疏勒传》说，疏勒西去钹汗国千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218]。这条路比石国——碎叶——龟兹线要近得多。看来，唐代交通路线变化所导致的里程变化，唐人并未予以重视。《册府元龟·外臣部·国邑二》所记石国、钹汗、疏勒之间里程，也与《隋书》一样^[219]。《新唐书·宁远传》称，宁远（钹汗）去京师八千里；《新唐书·石国传》称，石至拔汗那一千余里。这说明《新唐书·石国传》很可能是按隋代交通路线记载道里。

关于石国的四至。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赭时至撒马尔罕 42 法尔萨赫，约合 262 公里；赭时至俱战提 37 法尔萨赫，约合 231 公里；赭时至拔汗那 60 法尔萨赫，约合 374 公里；赭时至苏对沙那 34 法尔萨赫，约合 202 公里^[220]。相比之下，《新唐书·石国传》所记石国至康国里程（500 里，约合 222 公里），少记 40 公里；石国至俱战提（200 里，约合 88 公里）里程，《新唐书》少记 143 公里；石至拔汗那（1000 余里，约合 443 余公

里)，多记 69 公里；石至窠堵利瑟那（《石国传》误作“堵利瑟那”，1000 余里），多记 241 公里。（关于石国至拔汗那道里，详见本章第十节“宁远”之考述）

《新唐书·地理七下》称，“石国东至拔汗那国百里”^[221]。此记肯定有误。

六、米国

米，或曰弥末，曰弭秣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谿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自是朝贡不绝。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领末野门来朝。天宝初，封其君为恭顺王，母可敦郡夫人。^[222]

1. 关于米国、东米国的方位

米国，北魏时称作“迷密国”。《魏书》记称：“迷密国，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万二千六百里。正平元年（451 年）遣使献一峰黑橐驼。……悉万斤国，都悉万斤城，在迷密西，去代一万二千七百二十里。……”^[223]据此，迷密国与悉万斤（撒马尔罕）相距 120 里。

《隋书·西域传》“米国”条记载：“米国，都那密水西，旧康居之地也。无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国王之支庶，字闭拙。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224]迷密国在悉万斤（撒马尔罕）东南 120 里，与隋代关于米国与康国（北魏所谓悉万斤者）的方位距离的记载大致吻合。北魏时的迷

密国当为隋代的米国无疑。

米国,《大唐西域记》卷一作弭秣贺(唐言米国),并称该国位于飒秣建国之东南,劫布咀那国(唐言曹国)之南^[225]。《释迦方志·遗迹篇四》则称,米国位于飒秣建国之东南,劫布咀那国(唐言曹国)之西北^[226]。《新唐书·康国传》称康国“东南属米百里”;《册府元龟》卷958〈外臣部·国邑二〉记述:“米国,都那密水西,旧康居之地,都城方二里,胜兵数千人。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227]除了米国“胜兵”之数由数百人增至数千人而外,《册府元龟》之记与《隋书·米国传》几同。以上各书所记均把米国视作康国之东南。《新唐书·米国传》把米国记作康国之南,与上述记载有所不同。而杜环《经行记》记称:“康国在米国西南三百余里。”^[228]杜环把米国置于康国之东北,肯定有误。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引贾耽《皇华四达记》:“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从方位上看,“米国城”并非米国。米国的具体方位,许多学者作过考证,主要有三说:

一说为朱马巴扎尔(Ġumā-a-Bazar),即阿拉伯舆地学家所记 Māymurgh(又转写为 Māmarg,或 Māimargh)。此说为沙畹、巴托尔德、汤马斯彻克、白鸟库吉所持。^[229]

一说为麻坚(Maghin,又译马江)或模安(Moughian)。M. 圣—马丁(M. Saint—Martin)、章巽等持此说。^[230]麻坚在古撒马尔罕东南大约60英里(约96公里)。这与汉籍所记米国至康国距离(100~120唐里)相差甚远。所以,《大唐西域记》英译者瓦特斯也对此说表示怀疑^[231]。

第三说为马小鹤所提出。他结合汉籍所记和撒马尔罕周边地区的考古成果,提出米国都城钵息德城即喷赤干之说^[232]。喷赤干(Panjikand, Penjakath或Pyandjikent)的语源是伊朗语族东支的粟特语,其粟特语的拉丁字母转写是 pncyknδh,阿拉伯文

作 Bunjikath (或 Panjikath)。“喷赤干”的意思是“五城”。“钵息德”的上古音,高本汉构拟为 pwāt (puāt) siək tcy,中古音构拟为 puāt siək tək^[233],与 Panjikand (喷赤干)对音吻合。喷赤干在撒马尔罕以东约 70 公里,位于泽拉夫善河南岸。喷赤干古城遗址包括城堡、内城、外城等部分;内城实测 19 公顷,周围 1750 米^[234]。《隋书》说米国都城方二里,比内城实测要大一些,可能指包括城堡、外城在内的整个城区。值得注意的是,《隋书·西域传》和《册府元龟·外臣部·国邑二》都把米国方位指在那密水(泽拉夫善河)以西,而喷赤干在泽拉夫善河南岸,《隋书》和《册府元龟》所记米国方位与喷赤干的地理位置有所不一。

实际上,沙畹、巴托尔德、马小鹤等都同意迷密、米、弥末、弭秣贺的译音是 Māymurgh。而沙畹、巴托尔德等忽略了米国都城钵息德的对音,并把 Māymurgh 指证为米国都城所在。从上述学者的考述和喷赤干考古发掘成果来看,Māymurgh 为“米密”、“米”等对音无疑,并为米国所统辖;米国都城钵息德城应是喷赤干。

值得注意的是,《魏书》记称:“迷密国,都迷密城”,距悉万斤(撒马尔罕)120 里;《隋书·西域传》“米国”条记载:米国,都那密水西,西北去康国百里;《新唐书·米国传》则记:米国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由此看来,米国很可能有一个迁都的过程:元魏时期,迷密(米)国都城在迷密城;唐代米国都城在钵息德城;迷密城距撒马尔罕 120 里,钵息德城距撒马尔罕 100 里。隋代米国都城距撒马尔罕 100 里,很可能已经从迷密城迁至钵息德城。

飒秣建(撒马尔罕)地区共有 12 个乡,其中泽拉夫善河以南 6 乡,从东向西排列是喷赤干,瓦拉格赛尔,弥秣贺,桑贾费盖恩,达格姆与艾卜加。穆格山栗特文书“20B17”表明,喷赤

于爵爷迪瓦什梯奇对达格姆所属的哈赫塞尔村具有一定的控制力。哈赫塞尔村西距撒马尔罕 2 法尔萨赫（约 12.4 公里）^[235]。这大概也是迪瓦什梯奇权力所及最西之地。弥秣贺位于飒秣建和喷赤干之间，它与飒秣建的距离应比喷赤干与飒秣建的距离要近些。如果喷赤干即钵息德城，米密城即弥秣贺，那么汉籍所记米密城（至悉万斤 120 里）、钵息德城（至康国 100 里）道里有偏差。

汉籍中又有关于“东米国”的记载。《唐会要》卷 100 引《西域图》记：石国“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里，西南至石国一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国一千五百里。”^[236]在这两条记述中，东米国的方位不一：一为石国西南 500 里；一为石国东北 1500 里。而且，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安国（布哈拉）位于石国以西偏南 505 公里左右^[237]。因此，东米国不可能在石国东北 1500 里、安国西北 2000 里之方位。《唐会要》有关东米国的第二条记述肯定有误。石国以西偏南 500 里，应是康国，而不是“东米国”。如果《唐会要》所引石国“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之记不误，那么东米国应当位于康国之东或以东偏南。这与《新唐书》所记“米国”方位略有不同。看来，《唐会要》的第一条引述也是有疑问的。也许《唐会要》所引述的东米国不是米国，而是另有所指。值得注意的是，《唐会要》所记“东米国”以石国为参照座标；而上引其余有关“米国”的记述均以康国为参照座标；《唐会要》所引述的两条东米国方位之记，误差极大。在同一处记载中，唐人怎么会如此粗心呢？然而，《新唐书·地理志七下》也记：石国“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东米国在安国西北二千里，东至碎叶国五千里，西南至石国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国千五百里。”此记当与《唐会要》之记一样出自《西域图》。这不仅使我们产生疑问：难道有两个东米国？

要明了这个问题,就必须明确 Māymurgh 的地理方位。据阿拉伯舆地学家伊斯塔赫里说, Māymurgh 为距离那色波 (Nasaf, 即《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之小史) 一大站 (一日程) 之村镇; 撒马阿尼 (Samānī) 曾亲历该镇, 指出该镇位于康国之南, 位于布哈拉至那色波的大路上。^[238] 这就是巴托尔德等人所指的 Māymurgh。那色波在撒马尔罕之西南。因此, Māymurgh 应在撒马尔罕之西南。看来, 7~10 世纪中外史家所称之米国并不一致。但是, 伊斯塔赫里另有一条有关 Māymurgh 的记述。伊斯塔赫里曾提及, 在撒马尔罕附近还有一个 Māymurgh^[239]。《新唐书》所记之米国, 应即撒马尔罕附近的 Māymurgh, 而不是那色波至布哈拉大道上的 Māymurgh。巴托尔德等人所指的 Māymurgh, 实际上不是米国。也许正是由于两个 Māymurgh 的存在, 导致了《唐会要》和《新唐书》的有关两个东米国的记述。无论另一个东米国位于何处, 《唐会要》和《新唐书》有关位于石国东北 1500 里、安国西北 2000 里的东米国之记述, 肯定有误。

2. 米国的政治状况

1933 年, 苏联考古学家们在喷赤干以东约 70 公里的穆格山城堡废墟中发掘出 90 余件文书, 其中大部分是粟特文书。据苏联学者斯米尔诺娃 (О.И.Смирнова)、里夫什茨 (В.А.Лившиц)、弗列依曼 (А.А.Фрейман) 等人的研究, 穆格山文书的主人是迪瓦什梯奇 (Divāštīch), 此人是喷赤干的领主。在这些文书中, 提到喷赤干的统治者尚有毕丘特 (pnČy - tt)、其子奇金·噉·毗伽 (ck'yn - cwr βyðk'n)。迪瓦什梯奇的族谱中多次出现“噉”这个突厥称号。从上述人名构成、尊号来看, 里夫什茨认为他们大概是突厥族出身^[240]。由于斯米尔诺娃认定“喷赤干及这一地区在中文史书中没有提到过”^[241], 因此她没有把喷赤干、穆格山的考古资料与中文史料中关于米国的记

述联系起来考察。

那么，这些出身突厥族的喷赤干统治者从何而来，他们又是如何入主喷赤干的呢？汉文史籍对此有所记述。

据《隋书》记载，隋代的米国尚无国主，其统治者称“城主”而不称王，乃康国王之支庶，姓昭武，字闭拙^[242]。在隋代，米国尚未立国，其主被称作“城主”，而不是“国君”；从昭武闭拙为康王支庶看，此时的米国还是康国的属地。到唐武德年间，米国仍无国君。《太平寰宇记》记载：米国“惟有城长，属康国。唐武德九年，城长康数姿遣使献玉盘。”^[243]从此时米国仍属康国看来，康数姿很可能也是康王支庶。

到贞观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据《新唐书》卷215下记载，约在贞观十六年（642），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率军攻打康居，中途攻破米国，“系虏其人，取货口不以与下，其将泥孰啜怒夺取之，咄陆新以徇。泥孰啜之将胡禄屋举兵袭咄陆可汗，多杀士。国大乱，将归保吐火罗。”不久，乙毗咄陆可汗退居白水胡城^[244]。《旧唐书·突厥传》的记载稍简，只是把“胡禄屋”作“胡禄居”。

“胡禄屋（居）”这个人名来自突厥部落名称。《旧唐书》卷194下记载（西突厥）“其咄陆五啜，一曰处木昆律啜，二曰胡禄居厥啜，贺鲁以女妻之……”由此看来，很可能是咄陆五啜之一的胡禄屋（居）部落的一部分人在642年进占了米国。喷赤干统治者毕丘特、奇金啜毗伽很可能与胡禄屋（居）部有某种联系。

关于《新唐书》所记永徽年间米国为大食所破之事，《册府元龟》卷995〈外臣部·交侵〉也有记载：永徽五年（654年）五月，“大食引兵击波斯及米国，皆破之。波斯五〔王〕伊嗣侯为大食所杀，伊嗣侯之子卑路斯〔斯〕走投吐火罗，遣使来告难。上以路远不能救之。寻而大食兵退。吐火罗遣兵援立之而

还。”^[245]据英国学者吉布(H.A.R.Gibb)说,在阿拉伯史料中,此事仅见阿布·乌拜达(Abū ‘Ubayda)的记载;此事发生在回历33/公元654年。吉布认为,此时大食攻掠的粟特之Māymurgh即汉籍中的米国^[246]。中文、阿拉伯文史料记载可互为印证。

《唐会要》卷99“康国”条称:“永徽中,其国频遣使,告为大食所破,兼征赋税。”^[247]康国这次被大食所破,显然与米国被破在同一年。这也旁证米国当靠近康国。

看来,永徽五年(654年)大食军东征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波斯。兵祸兼及米国和康国。大食人完成其战略目的,很快就撤出了米、康国等地。而在大食渡过阿姆河、东征中亚,波斯王子卑路斯遣使求救于唐朝时,唐朝并无暇与大食争夺中亚。唐朝忙于应付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因为,早在永徽二年(651年),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举兵叛唐,自号沙钵罗可汗,建牙于双河、千泉,统西突厥十姓之地,拥兵数十万,并进寇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迫使唐朝把安西都护府从龟兹撤回西州。“西域诸国,亦多附隶焉”^[248]。唐朝一旦平息了阿史那贺鲁之乱,立即就在中亚河中地区设置起羁縻府州。

显庆三年(658年),唐朝在米国设置南谿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到显庆三年,唐人已把昭武开拙称作米国国君了。显然,在7世纪上半叶的50年间,米国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从康国的属地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了。

南谿州应与安息州(布哈拉)、木鹿州置于同时。《新唐书·东安传》说:显庆时,以阿谿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龔斤为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闭息为刺史^[249]。

此后几十年间米国王统不见汉籍记载。马小鹤在认定喷赤干即钵息德城的前提下,认为穆格山粟特文书中提及的毕丘特统治喷赤干时间大约在691年前不久,其子奇金啜毗伽统治喷赤干至

少15年，可能从691年到706年。迪瓦什梯奇统治喷赤干约14年，大约从706年到720年。^[250]

长期以来，学者们对穆格山文书的主人迪瓦什梯奇的身世，一直争论不休。克拉奇柯夫斯基夫妇在研究了穆格山文书中唯一一份阿拉伯文书以后，认定迪瓦什梯奇在722年被阿拉伯人所杀。此观点已被学者们广泛接受^[251]。

1936年，弗列伊曼提出，迪瓦什梯奇即位第一年、第二年称粟特王、萨末鞬城主，也就是中文和阿拉伯史料中有记载的康国王突昏，他在710年后被乌勒伽夺去王位，降为喷赤干领主，直到722年被杀。他的观点受到斯米尔诺娃、克里亚什托内依及美国学者弗莱等人的批评。^[252]

马小鹤据穆格山阿拉伯文书B—12与B—29、粟特文书20B17和粟特文书1.1分析，迪瓦什梯奇统治喷赤干约14年，大约从706年到720年。他势力渐强，于721年称粟特王、萨末鞬领主，并得到了阿拉伯人的承认。《册府元龟》卷971所记开元六年（718年）二月、四月遣使来朝的米国王，当即喷赤干领主迪瓦什梯奇。迪瓦什梯奇入唐朝献，很可能是寻求唐朝对他称粟特王的承认。实际上，720～722年萨末鞬（飒秣建）由阿拉伯人控制，康国王乌勒伽逃往萨末鞬西北方、西曹方向的费兰凯特；迪瓦什梯奇在萨末鞬东面的钵息德。乌勒伽和迪瓦什梯奇尽管同时称粟特王、飒秣建城主，其实都不能控制飒秣建，更不用说控制全粟特了。迪瓦什梯奇的领地范围大约包括喷赤干、泽拉夫善河上游地区、亚格诺布河谷地、派塔曼（布塔曼）、吉萨尔等地。722年，迪瓦什梯奇为阿拉伯人所杀^[253]。

迪瓦什梯奇被杀后，米国大概由大首领末野门统治。因为在开元十八年（730年），米国大首领末野门曾到唐朝献贡^[254]。末野门很可能是到唐朝寻求支持的。但是，唐朝支持迪瓦什梯奇的对手康国王乌勒伽。据《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十九年（731

年)四月,“康国王乌勒遣使上表,请封其子咄褐(曷)为曹国王,默啜为米王。并许之”^[255]。看来,至晚在731年,米国又为康国统领,成为康国的附庸,由康国王子默啜担当米国王。米国一度丧失了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地位。开元二十七年(739年),乌勒伽卒,唐朝册封乌勒伽之子咄褐继承其父位^[256]。但是,在天宝年间,米国又恢复了独立地位。《册府元龟》卷965记载,天宝三年(744年)七月,唐朝封米国君为恭顺王,母可敦郡夫人;米国王与曹国王(怀德王)、康国王(钦化王)一起被册封^[257]。

《册府元龟》卷971记载:天宝九载(750年)正月,“康国王咄褐遣大首领末野门献马十匹及方物”^[258]。这个“末野门”与开元十八年(730年)到唐朝贡献的米国大首领末野门名字相近,两名或为一人。如果确系同一人,那么米、康两国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七、何国

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贞观十五年,遣使者入朝。永徽时上言:‘闻唐出师西讨,愿输粮于军。’俄以其地为贵霜州,授其君昭武婆达地刺史。遣使者钵底失入谢。^[259]

何国,《隋书·西域传》也作何国。屈霜你迦,乃梵语化词 Kusānika、中古波斯语 Kusānik、阿拉伯语 Kusāniyya (库沙尼

亚)之对音。马迦特认为,“何”乃阿拉伯语 Qayy 或 Qayyi 之音译,并举出穆斯林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记载说,贵霜匿为“粟特的文化最高之城,粟特诸城之心脏”;伊本·豪加勒也说,Qayy 或 Qayyi 为粟特一个区,乃“粟特之心脏”。^[260]

何国城楼壁画上的列王图,使人联想起佛教《十二游经》所记“四天子”传说。道宣《释迦方志》也著录了此传说^[261]。所谓“四天子”,又称“四主”,即“人主”中国(至那国),“象主”印度,“宝主”波斯或拂(胡国),“马主”月支或突厥,分别统治东、南、西、北四方^[262]。何国城楼位于都城之南(“城左”),楼南墙为外墙,不便何王礼拜。所以,城楼仅有东、西、北三墙分别绘画。蔡鸿生先生以为,何国都城重楼上的壁画是供国王从南面朝拜的,故画面不可能向四方展开,只能作左、中、右配置^[263]。此说忽略了城楼的方位。

所以,《通典》卷 193、《太平寰宇记》卷 183 皆记:何国“城楼北壁画华夏天子,西壁则画波斯、拂林诸国王,东壁则画突厥、婆罗门诸国王。”^[264]可见,这些绘画是分别画在城楼北、西、东壁上的。

据《通典》卷 193 说,何国“大业中及大唐武德、贞观中,皆遣使来贡。”^[265]另据《册府元龟》卷 970 记载,何国早在贞观元年(627)五月即遣使朝贡^[266]。《通典》所记武德年间何国人朝之事,以及《新唐书》所记贞观十五年何国遣使人朝之事,则不见于《册府元龟》之记。在九姓胡中,何国的入朝不能说晚,但朝贡次数却是较少的。何国入唐朝贡次数仅有 4 次。何国对唐朝非常仰敬。“若中国使至,散花迎之,王东面拜,又以麝香涂使人额,以此重。”^[267]但不知为何,显庆年(656~660)以后,不见有何国来朝、朝贡的记载。

从何国欢迎唐朝使者的仪式,我们可以看出何国信奉祆教的痕迹。《唐会要》卷 100〈波斯国〉记曰:波斯国“俗事天地水

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袄者，皆诣波斯受法。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耳鼻，用以为敬。”^[268]何国的欢迎仪式与波斯相似。大食东侵以后，何国改宗伊斯兰教，这并不为唐朝所了解。

永徽年间出师西讨之唐军，当是征讨贺鲁之唐军。永徽二年（651）正月，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唐，自号沙钵罗可汗，胜兵数十万，建牙于双河及千泉，统西突厥十姓可汗之地，处月、处密及西域诸国多附之。同年七月，唐高宗命左武卫大将军梁建方、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弓月道行军总管，率府兵三万、回纥五万骑征讨贺鲁。永徽六年（655）五月，又命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总管，以伐贺鲁。次年八、九月，程知节与贺鲁部战于榆慕谷、怛笃城，败之^[269]。何国在永徽年间上言是否践言，不见史籍记载。何国既然遣使上言，大概不会言而无信。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唐朝尚未在河中地设置羁縻州府，而且贺鲁势力正盛，西域诸国多附之，唯有何国愿输粮于西征唐军。看来，早在唐朝在河中地区建立羁縻统治之前，何国已经以唐朝的附属国自居了。这说明，至迟在永徽年间唐朝的声望已达碎叶以西的中亚地区。

关于贵霜州设置的时间，不见《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史籍记载。据《册府元龟》卷966〈外臣部·继袭一〉、《唐会要》卷99记述，显庆三年（658），唐高宗遣果毅董寄生至河中地区，在康国置康居都督府，史国置佉沙州；《新唐书·西域传》亦记，显庆三年，唐朝在石国瞰羯城置大宛都督府，在米国置南谧州；显庆时，唐在安国置安息州，东安国置木鹿州。贵霜州应与上述诸州置于同时——显庆三年，也为董寄生所置。

何国的周邻道里，不见《新唐书·西域传》记载。这在《新唐书·西域传》诸国传记中是少见的。《通典》卷193、《册府元龟》卷958、《太平寰宇记》卷183皆记：何国“东去曹国百五

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上述道里记载与《隋书·何国传》只字不差，说明它们皆沿袭《隋书》之记。而玄奘则称，屈霜你迦国西二百余里至喝捍国（唐言东安国）^[270]；《新唐书·东安传》也称，东安东距何二百里许。

小安国即东安国，即卡尔干卡特（西距布哈拉约 112 公里）。据阿拉伯舆地学家所记，库沙尼亚至卡尔干卡特（东安）85 公里，这与《大唐西域记》、《新唐书·东安传》所记（二百唐里，约合 88 公里）大体符合。

《新唐书·曹国传》称，曹国西北至何国二百里；《唐会要》卷 98〈曹国〉记：西曹国，“西北至何国二百里。”这与《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所记方位、里程均有所不同。何国（库沙尼亚）东至曹国（治瑟底痕城，今伊斯特汗）实际里程为 25 公里。汉籍所记均有较大出入，以《隋书》、《通典》等所记（150 唐里，约合 66 公里）之误差小一些。

上引汉籍所记何国至瓜州里程，大概是以石国至瓜州 6000（唐）里为基准推算出来的：6000（石～瓜州）+ 500（石国～康国）+ 100（康国～曹国）+ 150（曹国～何国）= 6750（唐里）。这大概也是何国入唐的主要路线。其里程之误，详见诸国道里考辨。

八、史国

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居独莫水南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西百五十里距那色波，北二百里属米，南四百里吐火罗也。有铁门山，左右峻峭，石色如铁，为关以限二国，以金铜阖。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类先祷乃行。国有城

五百。……贞观十六年，君沙瑟毕献方物。显庆时，以其地为佉沙洲，授君昭武失阿曷刺史。开元十五年，君忽必多献舞女、文豹。后君长数死，立，然首领时时入朝。天宝中，诏改史为来威国^[271]。

史，佉沙，皆为阿拉伯—波斯语 Kass、Kass 之对音；羯霜那（《大唐西域记》也作羯霜那），乃梵文 Kasanna 或 Kusāna 之对音，故城在今撒马尔罕以南 75 公里的沙赫里夏勃兹，为中世纪撒马尔罕至缚喝（Balkh）大路中途之大城，该城每边长约 1/3 法尔萨赫（约 2 公里）。^[272]在波斯语（塔吉克语）中，“沙赫里夏勃兹”意为“绿城”^[273]。那色波，“亦曰小史”^[274]，乃 Nasaf 之对音。Nasaf 一词是阿拉伯人对当地地名 Nakhshab 的转写^[275]。独莫水，沙碗比定为 Kaichi daria；苏雍，似是 Soghd（粟特）之对音。佉沙一度为粟特之都城^[276]。看来，《唐会要》称史国“与康国同域”^[277]，是有一定道理的。

史国都城规模与米国、曹国相仿。据《册府元龟》卷 958 记载，史国“都城方二里，胜兵千余人。”米国“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曹国“都城方三里，胜兵千余人”^[278]。

从“城有神祠，每祭必千羊，用兵类先祷乃行”之记看，此时史国尚崇信祆教。大食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征服后，史国等地百姓逐渐改奉了伊斯兰教。看来，唐人对此情并不了解。

佉沙州应置于显庆三年（658），由董寄生所置。这在《唐会要》卷 99〈史国〉有明确记述：“显庆三年，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治为佉沙州，以其王昭武失阿曷为刺史。”史王昭武失阿曷（曷）被唐朝委任为首任佉沙州刺史，这说明史国与其它九姓胡国家一样，唐朝是利用当地统治者实现其羁縻统治的。

史国诸王中，只有显庆年间的国王以昭武为“姓”。贞观十六年（642）史君沙瑟毕遣使献方物一事，也见于《册府元龟》

卷970之记载^[279]。开元十五年(727)遣使入唐朝献舞女、文豹的史君忽必多,《唐会要》卷99记为阿忽必多延屯。开元二十六年(738)十月,由于史王(阿忽必多)延屯卒,唐朝册立其子(阿)忽钵继嗣(《唐会要》卷99〈史国〉记册立时间在开元二十七年。误)。然而,次年(739)四月,遣使入朝献表起居的史王是斯谨提(鞬)^[280]。这说明738年十月~739年四月,史国曾发生王位更迭。忽钵册封不到半年,斯谨提所遣使者已经来到唐朝。忽钵不大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传位给斯谨提。斯谨提大概是通过政变而夺取王位的。由于这次政变有悖唐朝册命,所以僭主斯谨提一夺取政权就遣使唐朝,献表起居(意问候,一意听进止)。这是文献记载九姓胡唯一一次献表起居。看来,唐朝的认可对于斯谨提是不可或缺的。唐朝大约在741年(开元二十九年)初,承认了斯谨提的地位^[281]。741年三月,斯谨提所遣使者来朝贺正。斯谨提的身份,《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封册二〉记作“拓羯王”^[282]。拓羯,意为“战士”^[283]。斯谨提显然是一个军事首领。他大概是通过军事政变而夺取王位的。沙畹把“拓羯王”视作史王阿忽钵的王号,把“拓羯王”与阿忽钵视为同一人^[284]。但是,没有任何史料或语音勘同可以说明,阿忽钵就是斯谨提。他们应是两个人无疑。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史国与唐朝的联系松弛。据《册府元龟》卷970~971统计,643~726年间,史国未入朝一次。在开元年间,史国与唐朝的关系密切起来。727~746年,史国入朝6次。开元二十七年(739),史王斯谨提、石王莫贺咄吐屯率军助唐碛西节度使盖嘉运共击突骑施苏禄之子吐火仙。次年三月,玄宗“加拓羯王斯谨鞬特进,赏平苏禄之功”^[285]。

《旧唐书·突厥下》把盖嘉运等擒吐火仙事系于开元二十六年夏^[286]。按:此时史国王尚是阿忽必多延屯一系,斯谨提尚未登位,不可能与石国王一道督师助战。《旧唐书》之记有误。《资治

通鉴》卷214记曰：开元二十六年六月，玄宗命碛西节度使盖嘉运招集突骑施、拔汗那以西诸国，以对付吐火仙等。次年（739）八月，盖嘉运擒突骑施可汗吐火仙^[287]。史王斯谨提应是参加了739年的战役。

唐玄宗诏改史国为来威国的时间是在744年（天宝三载）十月^[288]。在九姓胡中，史国是唯一被唐朝授予国号的国家。

关于史国道里。《新唐书·康国传》称，康国距史150唐里，约合66公里。《新唐书·地理志》、《唐会要》卷一百称：史国“西北至康国七百里”^[289]。700（唐）里约合308公里。《册府元龟·外臣部·国邑二》记载，史国“北去康国二百四十里，南去那色波二百里，东北去米国二百里”。实际上，沙赫里夏勃兹在撒马尔罕以南75公里。《新唐书·康国传》少记9公里，已基本符合实际里程；《新唐书·地理志》、《唐会要》之记多出233公里，显然错得太多。但是，《新唐书·米国传》称，米国北至康国百里；同书《史国传》又记史国北至米国为二百里。那么，史国北至康国为三百里，约合132公里。这与玄奘所记里程吻合（“从飒秣建西南行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国”^[290]），但比实际里程多出57公里左右。而《册府元龟》所记史国至康国里程（“二百四十里”，合106.3公里），则比沙赫里夏勃兹至撒马尔罕实际里程多出约31公里。

铁门，位于今天的布兹伽拉（Buzgala）峡谷，今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州的达尔本脱（Derbent）西约13公里处^[291]，至今仍为穿越拜孙套山脉的唯一孔道。波斯语称作 Dar - I Ahanin，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斯塔赫里、马伽达西等称之为 Bāb - al - hadid^[292]。玄奘对铁门的描述，与《新唐书》所述基本相同：“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峭峻，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旁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纲，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293]出铁门即入吐火罗故地。据阿拉伯地理学家

所记，史至铁门有4天路程^[294]，以每天行程42公里（约7法尔萨赫）计，约合168公里。《新唐书》称，史国“南四百里吐火罗也”，400唐里约合176公里。《新唐书》之记基本正确。

九、火寻

“火寻，或曰货利习弥，曰过利，居乌浒水之阳。东南六百里距戍地，西南与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萨，乃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颰遮城。诸胡惟其国有车马，商贾乘以行诸国。天宝十载，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献黑盐。宝应时复入朝。”^[295]

火寻，货利习弥，过利，《大唐西域记》作货利习弥伽，《新唐书·波斯传》、《唐会要》卷100作火辞弥，为中古波斯语 Khwraizmik (Khrāizmi)、亚美尼亚史料中的 Khorozm、梵文 Horismika 之音译^[296]。该国位于阿姆河（乌浒水）下游两岸地区，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火寻的古都喀特（Kath），位于阿姆河右岸的台地上，距火寻后来的首府希瓦（Khwā）约6公里。在伊斯塔赫里生活的年代里（10世纪上半叶），喀特老城由于阿姆河水的侵蚀，而被迫完全放弃了^[297]。苏联学者认为，古玉龙杰赤即奥鞬城故地^[298]。

火寻国是九姓胡中最晚被唐朝所认知的国家。据《新唐书·波斯传》记载，“贞观后，远小国君遣使者来朝献，有司未尝参考本末者”，就有火辞弥国。贞观十八年（644）三月，该国与摩罗游使者一起来朝献方物^[299]。此时，九姓胡其它国家均已来朝。火辞弥这次来朝后，一直到751年（天宝十载）九月才重新入朝。显庆、龙朔年间（656～663），唐朝在中亚、吐火罗置立

羁縻州府，也未在火寻置州府。

戊地，《大唐西域记》记为伐地，冯承钧等将其比定为 Bitik (Bitik)^[300]。纳尔沙喜《布哈拉史》提及布哈拉以西有 Bitik 及 Farab 两村^[301]。火寻国方位，玄奘把货利习弥伽记为伐地西南五百里；《新唐书》记为火寻东南六百里至戊地。火寻不可能在戊地西南。玄奘所记有误。从希瓦到 Bitik 实际里程约有 320 公里。《新唐书》、《大唐西域记》所记里程均有误。

十、宁远

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拔汗，元魏时谓破洛那。去京师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真珠河之北。有大城六，小城百。人多寿。其王自魏、晋相承不绝。……

贞观中，王契苾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鼠匿死，子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参为王，治呼罔城；遏波之治渴塞城。显庆初，遏波之遣使朝贡，高宗厚慰谕。三年，以渴塞城为休循州都督，授阿了参刺史，自是岁朝贡。玄宗开元二十七年，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册拜奉化王。天宝三载，改其国号宁远，帝以外家姓赐其王曰实，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降之。十三载，王忠节遣子薛裕朝，请留宿卫，习华礼，听之，授左武卫将军。其事唐最谨。^[302]

1. 关于拔汗那、呼罔城、西鞬城、渴塞城、俱战提

拔汗那位于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 (Farghana) 盆地，北边为 Cotkal 山脉，南边为阿赖山脉，盆地东西长 350 公里，南北宽 150 公里，锡尔河自东向西横穿盆地。^[303]

拔汗那，《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及《晋书》称大宛国，《魏书·西域传》作破洛那，《隋书·西域传》作𣹵汗（古渠搜国），《大唐西域记》作忸捍，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跋贺那、跋贺那。拔汗那对音为东伊朗语 Parghana（或 Barghana），意为“仅有一个出口的山间谷地”。阿拉伯人入侵该地后，由于阿拉伯语中没有“p”音，相应地也就没有表示这个音的辅音字母，所以就以“f”替代“p”，把 Parghana 读成 Farghanah。这两种拼写形式并存了较长一个时期。后来，随着阿拉伯文化影响的扩大，以“f”音起首的形式逐渐通行于世^[304]。《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三》记载，咸亨二年（671）三月，拔汗那遣使贡方物；八月，富那国王尸利提婆跋摩遣使贡方物^[305]。“富那”即 Farghana 最早的中译名。上述记载真实地反映了拔汗那、富那两名并存的情况。不过，在唐代文献中，主要以拔汗那、𣹵汗称呼该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隋代以前，汉籍是把大宛和𣹵汗记为两个国家的。《北史·西域传》“破洛那”条记：“破洛那国，故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万四千四百五十里。”同传“𣹵汗国”条记：“𣹵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柴。……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可汗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306]《隋书》无〈破洛那传〉，其〈𣹵汗传〉与《北史·𣹵汗国传》之记基本一致。《凉州异物志》称：“古渠搜国，当大宛北界。”^[307]显然，渠搜国与大宛国不是同一个国家。𣹵汗国，为古渠搜国；破洛那，为汉之大宛国。《册府元龟·外臣部·国邑二》也是把𣹵汗与破洛那相区别：“𣹵汗国在葱岭之西五百里，古渠搜国也。”“〔破〕洛那国，古大宛国也。都贵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一万〕四千四百五十里”^[308]看来，《册府元龟》之记抄自《北史》。《大唐西域记》也没有明言忸捍为汉之大

宛国。而《新唐书》则称,“宁远者,本拔汗那,或曰钹汗,元魏时谓破洛那。”《新唐书》把钹汗与破洛那等同起来。

李泰《括地志》卷四“西域”条则称,“率都沙那国亦名苏对沙那国,本汉之大宛国”^[309]。此说未见其它汉籍记载。《资治通鉴》则把拔汗那与古乌孙相联系:“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310]

真珠河,应即赭时河,该河汇入锡尔河。据马迦特考证,在中古波斯语(Pahlavi)中,“锡尔河”称为jaxsarta或jaxsaarta,即“药杀水”,意为“珍珠”、“明珠”^[311]。苏北海认为,汉籍所记真珠河,特指锡尔河上源的纳林(伦)河^[312]。

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拔汗那城为Anūsharwān(即波斯萨珊王朝国王库思老一世,531~578年在位)所建。后者把该城称为Azhar Khānah(意为“来自各家各户的”)。另据塔巴里《年代记》(I, 899)记载,库思老一世在晚年,曾出兵击啞哒人为其祖父卑路斯报仇,当他杀死啞哒王及其族人后,率军越过巴尔黑城及其以外的地方,驻军拔汗那。^[313]据此,拔汗那建城约在6世纪70年代。

又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古达玛的记载,拔汗那所属城市自西向东有:俱战提(Khujandah)、刷姆伽尔(Sāmghār,距前站俱战提5法尔萨赫)、哈吉斯坦(Khājistān,4法尔萨赫)、土尔木甘(Turmuqān,7法尔萨赫)、“门”城(Madīnatu Bāb,又称Bāb城,3法尔萨赫)及拔汗那(4法尔萨赫),共计6城。^[314]《新唐书》所称“大城六”,应指上述6城。《新唐书》所记西鞬城、呼闷城、渴塞城,也当在上述6城之中。10世纪后期的阿拉伯舆地学家穆卡迪西(Maqdisī,或Mukaddasī,卒于公元985或1000年)统计费尔干纳建有大清真寺的城镇和村子有40个^[315]。《新唐书》所记拔汗那有“小城百”,看来是个约数。

据古达玛说,俱战提位于“赭时”(Shāsh)河畔;刷姆伽尔是一个大城,位于荒野中;哈吉斯坦是一个驻屯卫戍部队的地方,其内有碉堡,有一个大盐池,产盐输往俱战提、赭时等地;Bāb城(“门”城)是拔汗那诸城中的一座大城;拔汗那也叫 Akhsik(e)t^[316]。

从以上记述看,呼闷城,很可能即土尔木甘。“呼”,《玉篇》作火胡切、火故切^[317],可能是土尔木干首音“Tur”的音转。Qān,即 kand,突厥语意为“城”。而藤田丰八认为,呼闷城(突厥语作 γwmp'n)即俱战提^[318]。亨宁则指出,粟特文 γwmp'n 可能与“呼闷”有关^[319]。

关于西鞬城。沙畹认为,“西鞬”是 Akhsikath 之省译^[320]。藤田丰八则以“西鞬”为 Uzkand 省略头母音之译^[321]。但是,藤田把“z”对音为“西”,缺乏语音勘同的有力支持。

渴塞城,沙畹及布莱士乃德(E. Bretschneider)均认作 Kāsān^[322],藤田丰八则定为 Aksikath,认为汉译往往省略首母音,Aksi 与渴塞音近^[323]。Aksikath 也即古达玛所言 Akhsikt。11 世纪阿拉伯舆地学家伊德里西(Edrisi,或 Idrīsī,卒于 1015 年)称:拔汗那除乡村外,有大城 7 座,其重要者为 Akhsikath,该城在赭时河北。^[324]

白鸟库吉《大宛国考》认为,拔汗都城所在,(锡尔)河北只 Kāsān(贵山)、Akhsiket,河南只安集延(Andi jan)、玛尔噶朗(Margelan,《元史·西北地附录》作麻耳亦囊)具有此资格。^[325]他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四城中,Akhsiket 为拔汗都城所在。

据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勒(Ibn Hawkal, 977 年写成《诸地形胜》)说,Akhsikath 是一座大城,城内有一座城堡,星期五大清真寺,总督的宫殿和监狱,以及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引水渠;该城由内城和外城构成,内城大小约合 1 平方英里,有

五座城门，其中一座城门叫“Kāsān”门。^[326]13世纪初，该城被穆罕默德·花刺子模沙赫所毁。

岑仲勉兼取众说，认为西鞬、渴塞均为 Akhsikath 之对音。西鞬，《切韵》作 siei kiem; kath 即中亚语中的 kand，因此西鞬的对音是 sikand，即 Akhsikath 省去首音组之译法。渴塞，《切韵》作 k ‘ât sek，也是(A)khsik(ath)之略译。《新唐书》之所以译法不同，是由于它集合数种史料之故。贞观年间，遏波之即位，仍居故都而已。^[327]

冯承钧接受沙畹之说，认为 Akhsikath 即西鞬城，位于今中亚纳曼干(Namangan)，在 Kassan 河与锡尔河汇合处；渴塞，在今中亚塔什干东南的 Kassan，即《汉书·大宛传》中的贵山城之所在。^[328]

1991年5月，南京大学刘迎胜博士曾亲临阿克西肯特(Akhsikath)古城考察。他说，该古城距今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市(以西)25公里，位于锡尔河的右岸，古城遗址面积达40公顷，它是唐代的西鞬城。^[329]

马雍认为，大宛都城贵山城在今卡散德(卡散)附近。贵山城名实由渠搜古国名演变而来，贵山的对音为 kūsān，而 kūsān 似从 kūsau 变来。唐代休循州治渴塞城即汉代贵山城。渴塞可能为 kosei 的对音。而 kosei 似乎也是由 kūsau 变来的。^[330]卡散位于锡尔河北。

贵山，岑仲勉认为其对音为 Kasānā，位于纳林河(即真珠河)之北，在霍阐(忽毡)东北约130英里(208公里)^[331]。巴布尔(Bābur, 1483~1530)称，贵山城旁有小河，河与城同名，流至钹汗首府 Axsikath 附近而入药杀水^[332]。据此，贵山在 Axsikath 之北，两城肯定不是同地。

巴托尔德认为，Kāsān 城位于 Akhsikath 以北5法尔萨赫(约31公里)的 Kāsān 河畔，这个小城与老城废墟至今犹存。8

世纪末、9世纪初，Kāsān 城是费尔干纳（拔汗那）王公的都城所在。^[333]

无论 Akhsikath 对音为何城，多数学者均承认它是拔汗那（宁远）的都城所在地。它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纳曼干市以西 25 公里处，位于锡尔河的右岸。笔者认为，沙畹、藤田丰八等人把西鞬和渴塞视作两城是有道理的，《新唐书》不大可能把一国都城按两种译名来记；西鞬城即 Akhsikath，渴塞城即 Kassan (küsan, 或 Kasānā)。西鞬城是宁远国的都城所在，渴塞城是休循都督府所在。

关于俱战提 (Khojend)。巴托尔德说，俱战提城是河中大城之一，它在较晚的时候才偶然地被算入费尔干纳。该城在 10 世纪时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塔巴里曾提到一位前伊斯兰时代的“俱战提王公 (malik)”，这位王公看来依赖于费尔干纳王公。^[334]

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十记载，“俱振提国，尚鬼神，城北隔真珠江二十里有神，春秋祠之时，国王所需什物、金银器，神厨中自然而出，”^[335]从俱振提（即俱战提）“尚鬼神”之情形看，俱振提此时尚未伊斯兰化。这说明该地在 9 世纪以前已是一个独立的政权。因为据巴托尔德研究，俱战提的伊斯兰化要到 9 世纪才完成。^[336]看来，俱战提并非在 10 世纪才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从段成式的记述看，俱战提在 7~8 世纪似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权的都城。

2. 拔汗那的政治状况

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记载，就像布哈拉王叫“布哈拉·胡达”那样，拔汗那王也有一个专门称呼，叫“伊赫希德” (Ikhshīd)^[337]。

根据汉籍记述，在 6 世纪下半叶，拔汗那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变故。这种变故也为玄奘所注意。贞观二年 (628)，玄奘途经忸

捍附近^[338]，闻听该国：“自数十年无大君长，酋豪力兢，不相宾伏，依川据险，画野分都。”这说明，早在隋朝时期拔汗那已经发生政治上的分裂。《新唐书》所记西突厥瞰莫贺咄杀拔汗那王契苾诸事，似应发生在玄奘西行之后。

玄奘称怛捍（拔汗那）数十年无大君长。而《新唐书》则说，贞观年间拔汗那有一个叫契苾的“王”。两记似有矛盾。由于材料不够，我们不足以判断两记的正误。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无法如季羨林等先生那样，以《新唐书》的记述来证明玄奘关于怛捍之记的正确^[339]。

那么，《新唐书》所记瞰莫贺咄、阿瑟那鼠匿是何许人呢？

贞观二年（628），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在位 617～628）被自己的伯父莫贺咄杀害，莫贺咄自立为“屈利俟毗可汗”。统叶护可汗之子啜力特勤逃亡至康居，弩失毕部泥孰莫贺设迎立啜力特勤为肆叶护可汗。两可汗相互攻杀。“由是西域诸国悉叛之，国大虚耗，众悉附肆叶护可汗。”贞观四年（630），莫贺咄为肆叶护所败，在金山被泥孰所杀^[340]。杀害拔汗那王契苾的“西突厥瞰莫贺咄”应当就是莫贺咄。莫贺咄大概是因为拔汗那王契苾不听号令而杀害他的。那么，拔汗那王契苾大约是在 628～630 年间被杀的。如果《大唐西域记》所记无误，契苾也可能是在玄奘西行后（628 年）不久登上王位的。

至于阿瑟那鼠匿，从姓氏上看，他应是东突厥阿史那系的人。“阿瑟那”，应即“阿史那”。然而，东突厥怎么会入侵西突厥统领的拔汗那的呢？

莫贺咄被杀后，泥孰与肆叶护可汗反目，泥孰夺得西突厥大可汗之位，是为咄陆可汗。在泥孰与肆叶护可汗争夺大可汗位期间，东突厥阿史那社尔（处罗可汗之子）扬言要投降肆叶护可汗，从可汗浮图城一带“引兵西上，因攻破西蕃。半有其国，得众十余万，自称都布可汗”^[341]。阿史那社尔西侵西突厥统治的

时间史料阙载，大体上在贞观五年（631）^[342]。阿史那社尔西侵的时间很短，西侵取胜后，他即率兵5万，进军漠北的薛延陀部。阿瑟那鼠匿大概是阿史那社尔的部属。阿瑟那鼠匿夺取的城应是拔汗那王城。如此看来，《新唐书》所记拔汗那“王契苾为西突厥瞰莫贺咄所杀，阿瑟那鼠匿夺其城”，似是两个历史事件。

阿史那社尔大军的很快东撤，致使阿瑟那鼠匿之子遏波之势力单薄，他不得不立契苾兄之子阿了参为王，遏波之与拔汗那本地统治者阿了参各据一城，对拔汗那分而治之。看来，阿了参的地位最初是低于遏波之的。

拔汗那的分裂，又为《资治通鉴》所证实：拔汗那“居西鞞城，在真珠河北，后分为二：一治呼闷城，一治遏塞城。”^[343]

最初，遏塞城的地位大概高于呼闷城，显庆三年（658）唐朝才把休循州设在遏塞城，而不设在呼闷城。看来，休循州都督为遏波之一系担任，州刺史一职则由拔汗那本地统治者阿了参担任。唐朝承认拔汗那政治的既成事实，在拔汗那实行二元统治形式。拔汗那的双元制，一直存在到8世纪初以后。726年，慧超东归路过跋贺那（拔汗那）时，尚见其地“有两王”，（锡尔）河南一王属大食，河北一王属突厥。^[344]穆格山粟特文书也说明拔汗那同时存在着拔汗那都督和拔汗那王。穆格山粟特文书36A—14第8~11行记述说：“……爵爷（指喷赤干领主迪瓦什梯奇——引注）给可汗和给拔汗那王（Bry'nk MLk'-）的信，我通过那位拔汗那都督（twttk'y）之手给拔汗那王送去了。”^[345]马小鹤把该文书写成年代定为公元722年春，并推定文书所记的“可汗”即突骑施苏禄可汗；拔汗那王是当地王族，即阿了达王（塔巴里，II，1440记为al-Tar），府治在锡尔河南的呼闷城；拔汗那都督是突厥族，治锡尔河北的遏塞城，与突骑施可汗关系比较密切。^[346]

3、拔汗那与唐朝的交往

在唐代，拔汗那与唐朝的直接交往始于显庆初年（约 656 年）。显庆初，遏波之遣使朝贡一事，不见《旧唐书·高宗纪》、《新唐书·高宗纪》、《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之记载。《新唐书》所记当另有所本。但是，《新唐书·拔汗那传》既记遏波之显庆初年“遣使朝贡”，又称拔汗那于显庆三年“自是岁朝贡”，不知何故。

拔汗那对唐朝大概没有任何经济上的义务。据《旧唐书·郭元振传》记载，在神龙年间（705~707），唐将郭虔瓘入拔汗那税甲税马以充军用，但不得一甲入军。拔汗那胡不胜侵扰，南勾吐蕃，即将倭子重扰四镇。^[347]

《新唐书·拔汗那传》漏书著名的“拔汗那之战”。据《资治通鉴》卷 211 记载，玄宗开元三年（715），“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拔汗那王兵败，奔安西求救。（张）孝嵩谓都护吕休璟曰：‘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遂率旁侧戎落兵万余人，出龟兹西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十一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巳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孝嵩传檄诸国，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宾等八国皆遣使请降”^[348]。

另据阿拉伯史料记载，713 年，屈底波攻掠石国和拔汗那；715 年，又入侵拔汗那，击败拔汗那王。正当大食的征服事业不断发展时，屈底波在 715 年被部下杀死，大食从拔汗那退兵^[349]。大食军撤出拔汗那是在回历 96 年都尔黑哲月（Zilhidje，十二月），相当于公元 715 年 8 月 7 日至 9 月 4 日^[350]。

王小甫认为，大食不大可能与吐蕃共立阿了达为王。历史真实很可能是：715 年 9 月以前，屈底波被杀，大食撤兵，吐蕃趁虚而入，继大食之后而成为阿了达的宗主。唐朝出兵时，大食军已从拔汗那撤退，因此唐军是针对拔汗那的吐蕃人而出兵的。^[351]

按：就此事件对唐与大食关系而言，重要的不是阿了达王是否由吐蕃、大食共立，而是唐朝出师之名义。从新罗僧慧超返程看，拔汗那至安西（龟兹）至少需 70 天^[352]。而唐军在 715 年十一月（公历 12 月）已经到达拔汗那。唐军至晚在 10 月初已经开拔。看来，拔汗那王离开拔汗那、奔龟兹求援的时间在同年 8 月以前，当时大食尚未从拔汗那退兵。正因为如此，拔汗那王才会向张孝嵩等告以吐蕃、大食之罪。龟兹与拔汗那相隔数千里，唐军出兵之时，张孝嵩等不大可能及时了解大食从拔汗那撤兵之消息。所以，唐军出击目标应是吐蕃、大食两者。唐军的这次行动对于抵制穆斯林征服拔汗那一定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拔汗那直到 9 世纪才被穆斯林最终征服。^[353]

塔巴里《年代记》卷 2，第 1276 页称，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在征讨拔汗那后，东侵略什噶尔^[354]。万伯里（A. Vámbéry）完全接受了塔巴里的记述^[355]。但是，屈底波东侵的真实性已为吉布所否定^[356]。巴托尔德也接受了吉布的考证结论^[357]。我们在汉籍中也未见大食军东侵略什噶尔一事之记述。

在中亚诸胡中，拔汗那与唐朝的关系虽然建立较晚，但两者的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这从拔汗那的入唐朝贡就可以看出来。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新唐书·西域传》等汉籍记载，拔汗那自显庆初年入唐朝贡，在 656～762 年间，共来朝贡献 27 次（详见第四章统计）。其中，拔汗那在 655 年以前未进一贡；656～679 年间，拔汗那来朝 6 次（包括富那来朝 1 次），其来朝次数与同期中亚九姓胡来朝总数（6 次）相等；680～732 年间，拔汗那未进一贡；732～762 年，拔汗那朝贡 21 次（包括宁远 15 次、可汗那 2 次），这个时期拔汗那的来朝次数、密度超过九姓胡中的任何国家（政权）。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在 732～762 年间，拔汗那与唐朝的关系要紧密得多。所以，《新唐书》说宁远“事唐最谨”。正因为如此，唐玄宗才会天宝三载（744）赐外

家姓“窈”给拔汗那王，又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下嫁宁远（拔汗那）王。《册府元龟·外臣部》也证实《新唐书》所记。

和义公主下嫁宁远（拔汗那）王，是唐朝与中亚诸胡唯一一次和亲，其意义自是非同一般。拔汗那地当吐蕃进出中亚之交通孔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面对吐蕃在西域咄咄逼人的攻势，唐朝对拔汗那的恩宠具有特殊意义。拔汗那在唐朝的西域防御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正因为宁远“事唐最谨”，所以在安史之乱发生后，756年（至德元载）九月唐肃宗在征发拔汗那兵马之时，又使拔汗那“转谕城郭诸国，许以厚赏，使从安西兵入援”^{〔358〕}。“城郭诸国”即是西域诸国。看来，唐朝有意让拔汗那领袖中亚诸胡。

开元二十七年（739）八月，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与石国莫贺咄吐屯一起助碛西节度使盖嘉运平突骑施吐火仙一事，见《资治通鉴》记载^{〔359〕}（参见前“石国”、“史国”考）。是役，盖嘉运“分遣疏勒镇守使夫蒙灵与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潜引兵突入怛逻斯城，擒黑姓可汗尔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发之民数万以与拔汗那王，威震西陲”^{〔360〕}。通过这次战役，拔汗那由于获得数万“散发之民”，政治势力大大增加。

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被册封一事不见《册府元龟》记载。阿悉烂达干应与石国莫贺咄吐屯一起被册封。据《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开元二十八年（740）三月，碛西节度使盖嘉运俘吐火仙可汗来献；唐朝“以石国蕃王莫贺咄吐屯有功，封为石国王，加特进，仍赐旌节。翌日，又册为顺义王。”莫贺咄吐屯被册封为顺义王是在本年的三月二十二日。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被册封也应在此时。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助平吐火仙”一事与“册拜奉化王”一事并非如《新唐书》所记，发生在同一年（开元二十七年），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被册拜奉化王的时间是在开元二十八年。

744年唐朝改拔汗那国为宁远国，同年十二月唐朝以和义公主嫁拔汗那王诸事，均为《资治通鉴》卷215、《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二》所证实。

762年以后，由于吐蕃称霸西域东部地区，唐朝国势萎缩，加上拔汗那逐渐伊斯兰化，中亚本地王朝崛起（820年，萨曼朝阿赫麦德被呼罗珊总督伽桑·本·阿巴德任命为费尔干纳总督；822年塔赫尔王朝建立）^[361]，拔汗那不再入唐朝贡。

4. 拔汗那的四至

关于拔汗那的四至，《新唐书·宁远传》阙载。《新唐书·康国传》“曹国”条说，东曹东北四百里（176公里）至宁远；“石国”条称，石国南二百里（88公里）抵俱战提，南至拔汗那千余里（440公里）。《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说，石国东至拔汗那国百里^[362]。

《隋书·拔汗传》记：“拔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胜兵数千人。……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牙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363]《册府元龟》卷958“拔汗”条，与《隋书》此记基本相同^[364]。

《大唐西域记》称：石国东南千余里至忸捍国^[365]。

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拔汗那西至苏对沙那（东曹）40法尔萨赫（约249.6公里），拔汗那至石国58法尔萨赫（361.9公里）；从撒马尔罕到俱战提有29法尔萨赫（181公里）；俱战提到拔汗那23法尔萨赫（143.5公里）^[366]。

从今日实际里程看，苦盏（俱战提）位于乌拉秋别（东曹）东北62公里^[367]；浩罕，在苦盏以东偏北约110公里处；宁远，即Akhsikath古城，在浩罕东北约60公里处，西距俱战提约170公里。拔汗那至石国有两条路，一为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从Akhsikath经俱战提、扎敏至石国，全长约374公里（今日实际

里程约 395 公里)；二是今天的公路路线，从 Akhsikatin 经帕普城（即“门城”，此地为费尔干纳盆地东北部入口）西北行至塔什干，全长约 235 公里。从撒马尔罕到苦盏公路里程为 282 公里^[368]，苦盏至塔什干约有 225 公里^[369]。

因此，宁远至东曹里程，《新唐书·康国传》所记（176 公里）比实际里程（232 公里）少了 56 公里；《册府元龟》之记（220 公里）以及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之记（约 250 公里）则与实际里程大致相同。

宁远至俱战提（苦盏），《新唐书·康国传》所记（88 公里）比实际里程（170 公里）少 82 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之记（约 144 公里）少了 26 公里。

宁远至石国（塔什干）里程，《新唐书·西域传》“石国”条和《大唐西域记》所记（440 公里）比第一条路线的实际里程（395 公里）多了 45 公里；《册府元龟》之记（220 公里）比第一条路线的实际里程少了 175 公里，但与第二条路线（拔汗那—门城—转向西北—石国）实际里程相接近。《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所记（44 公里）则差距太大，“百里”疑是“千里”之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等人所记第一条路线，是从“门城”继续西行，绕道俱战提、萨巴特和扎敏，所以路程要远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康国传》所记宁远至东曹里程，与浩罕至乌拉秋别实际里程相差无几。《新唐书·康国传》所记宁远至俱战提里程（88 公里），与浩罕至苦盏实际里程（60 公里）更接近。这提示我们：《新唐书·康国传》是否视浩罕为宁远都城？

《册府元龟》卷 971 记载，开元二十一年（733）三月、十二月，可汗那王易米施遣使来朝，并献马^[370]。可汗那，即 Khokand，地当今浩罕^[371]。看来，唐人把可汗那与拔汗那视为一体，《新唐书·康国传》所记宁远里程似以可汗那（浩罕）为基准点。

《隋书·拔汗传》记，拔汗那（拔汗）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隋书·疏勒传》称，疏勒西去拔汗国千里，东北去突厥牙千余里，东去龟兹千五百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372]《旧唐书·地理志三》称，疏勒至龟兹二千里，至瓜州四千六百里。疏勒至龟兹里程，《旧唐书》比《隋书》多记五百里，但两书所记疏勒至瓜州里程是一样的。所以，拔汗那至瓜州里程为 5500～5600 唐里，其计程路线是：拔汗那 500 葱岭 500 疏勒 1500 龟兹 3000～3100 瓜州。

《新唐书·地理志四》记载，隋代瓜州，武德五年（622）改名西沙州，贞观七年（633）改称沙州。在武德五年，唐朝又析沙州之常乐置瓜州^[373]。隋之瓜州即唐之沙州。又据《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瓜州西至沙州 300 里，唐代沙州至长安里程为 3700 里^[374]。

因此，拔汗那至长安里程为：5500（拔汗那～隋瓜州）+ 3700（唐沙州～长安）= 9200（唐里）

《册府元龟》卷 958 记：龟兹国王治居延城，去长安 7480 里。《通典》卷 191 说：龟兹东去长安 7500 里。可见，拔汗那至长安里程为：2000（拔汗那～龟兹）+ 7500（龟兹～长安）= 9500（唐里），比上式多出 300 里。这可能就是瓜州与沙州之间距离的误差。两式基本接近。

《新唐书·宁远传》称，宁远去京师八千里。这比上两式少了 1200～1500 里。此记肯定有误。

但是，《旧唐书·地理志三》称：龟兹去瓜州 3000 里；瓜州东至京师长安 3310 里，沙州东至长安 3650 里^[375]。《唐会要》卷 73 也说，龟兹去瓜州 3000 里^[376]（据此，沙州至龟兹仅有 3300 里）。那么，龟兹至长安为 6310 里。据此计算，拔汗那至长安里程：2000（拔汗那～龟兹）+ 6300（龟兹～长安）= 8300（唐里）。这比《新唐书·宁远传》仅多出 300 里。《新唐书·宁远

传》很可能是根据这种里程计算方法得出 8000 里之数的。

《汉书·西域传》记：焉耆国，王治员渠城，去长安七千三百里^[377]。此记已为松田寿男所考定^[378]。所以，地处焉耆以西的龟兹至长安里程，无论如何也在 7300 里以上。《旧唐书·地理志》之记有误。

《新唐书·西域传上》记，疏勒距京师长安九千里^[379]。那么，拔汗那至长安里程为：1000（拔汗那～疏勒）+ 9000（疏勒～长安）= 10000（唐里）。

《旧唐书·地理志三》记载，疏勒至瓜州四千六百里，瓜州至京师长安三千三百一十里^[380]。据此，拔汗那至长安里程：1000 + 4600 + 3310 = 8910（唐里）。

由此可见，汉籍所记疏勒、龟兹、瓜州、沙州、长安之间里程差距较大。

实际上，拔汗那至疏勒无论如何也不止 1000 唐里（440 公里）。据贾耽《皇华四达记》的记载，从疏勒西南入剑末关、青山岭、青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开元年间置，即慧超所经葱岭镇）^[381]。从葱岭镇西行，过大播密川（即玄奘所称波谜罗川）。玄奘称，波谜罗川“东西千余里”^[382]。看来，《新唐书·大宛传》所记拔汗那至疏勒里程并不包括葱岭本身的里程。拔汗那至疏勒里程当在 2000 里以上。

由此可见，《汉书·西域传》之记最接近真实：“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383]

十一、关于汉籍记述的史源

北朝至唐，汉籍保留了许多有关中亚诸国道里的记述。这些

记述有许多相雷同的地方。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些记述的史源关系并不清楚。通过对相关史籍记述的系统整理,我们可以列出下表:

汉籍所记中亚诸国道里对照表

(单位:唐里)

		康	小安	曹	东曹	石	米	何	史	赭汗	瓜州
康	北史										
	隋书										
	新唐书			100			100		150		
	通典						300			2000	
	册府元龟										
小安	北史										
	隋书										
	新唐书							200			
	册府元龟										
曹	北史	100						150			6600
	隋书	100						150			6600
	新唐书										
	通典	100						150			6600
	册府元龟										
东曹	北史										
	隋书										
	新唐书	400				400				400	
	册府元龟										
石	北史								600	6000	
	隋书								600	6000	
	新唐书	500			1000				1000		
	通典								600	6000	
	册府元龟								600	6000	

续表

		康	小安	曹	东曹	石	米	何	史	黠汗	瓜州
米	北史			500				200		6400	
	隋书	100		500				200		6400	
	新唐书										
	册府元龟	100		500				200		6400	
何	北史		300	150							6750
	隋书		300	150							6750
	新唐书										
	通典		300	150							6750
	册府元龟		300	150							6750
史	北史	240					200				6500
	隋书	240					200				6500
	新唐书						200				
	通典	240					200				6000
	册府元龟	240					200				6500
黠汗	北史				500	500					5500
	隋书				500	500					5500
	新唐书										
	册府元龟				500	500					5500

上表材料来源：《北史·西域传》；《隋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下》；《通典》卷193《边防九·西戎五》；《册府元龟·外臣部·国邑二》。“小安”，即东安；“东曹”，即指苏对沙那；“黠汗”，包括黠汗、拔汗那、宁远及大宛。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安国、火寻国至中亚诸国的道里，不为以上各书所记；小安、东曹、米、黠汗（大宛）诸国的道里和风土也不为《通典》所记。《北史·西域传》罗列中亚诸胡国至瓜州里程较全；《北史·西域传》所记中亚诸胡国道里为《隋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外臣部》所沿袭。《北史·西域传》成为后三书的主要史源。例如，《北史·石国传》称：石国

南去钹汗六百里；同书〈钹汗传〉则称：钹汗西北去石国五百里。此误也为《隋书·西域传》、《新唐书·西域传》、《册府元龟》等所沿袭。《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诸国之间道里较少，但是东曹至康、石、钹汗道里仅见于《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述；《新唐书·西域传》所记石国至康（500里）、东曹（1000）、钹汗（1000）道里，也不为其它汉籍所载；东安国记述也仅见于《新唐书·西域传》。可见《新唐书》的史源还是有所补充的。《新唐书·西域传》不记中亚诸国至瓜州里程，这似说明唐人不再以瓜州为计程起点。《通典》所记康国至米国（300里）、钹汗里程（2000里），不为其它史籍所载；《通典》所记史国至瓜州里程（6000）也与其它汉籍不同。《通典》当有独自の史源（如杜环《经行记》）。

《新唐书》、《册府元龟》所记中亚诸胡至瓜州里程，与《北史》、《隋书》相同。这说明唐《新唐书》、《册府元龟》在记述中亚诸国至瓜州里程时，仍视隋代瓜州为唐代瓜州；隋唐两朝瓜州治地的变迁，为《新唐书》、《册府元龟》编撰者所忽略。（据《旧唐书·地理志三》，武德五年，唐在隋敦煌郡常乐县置瓜州下都督府。武德八年，罢都督。贞观中，复为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晋昌郡。乾元元年，复为瓜州。武德七年，唐朝改隋瓜州为晋昌郡。）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第1155页）记：石国东至拔汗那国一百里，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史国在疏勒西二千里，西北至康国七百里。可见《新唐书·地理志七》与《新唐书·西域传》有不同的史源。

据《唐会要》卷100，天宝二年四月二十五日，鸿胪卿王忠嗣按《西域图》上言：石国东至拔汗那一百里，西南至东米国五百里。史国在疏勒西四千里，西北至康国七百里。看来，《新唐书·地理志七》和《唐会要》卷100所记石国、史国方位，曾参

考《西域图》。此《西域图》或为许敬宗领之《西域图志》(约撰成于658年),或为王名远的《西域图记》(660年六月十七日进呈)。^[384]

而《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诸国里程、方位,与《新唐书》、《唐会要》、和《册府元龟》均有所不同。显然,《大唐西域记》并不为后来的史家所重视。

几点结论:

(一)《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诸胡政治状况基本可信,且可补中亚史料、阿拉伯—伊斯兰史料记载之不足。汉籍记载年代学上的相对准确性,使我们可以推断九姓胡的政治演变和王统变化。从《新唐书》有关记述看,曹国、米国在贞观年以前尚未独立称国,这反映了河中地区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但是,唐人对九姓胡的宗教信仰及中亚的伊斯兰化基本上并不了解。唐人对九姓胡宗教信仰的认知程度,基本上仍停留在《隋书》的水平。

(二)从《新唐书·西域传》看,唐人对九姓胡中的康、安、石国认识较为清楚,而对曹与东曹、西曹认知较为混乱,对火寻认知较晚;唐人所记米国方位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不一。从唐代开始,拔汗那与大宛被认作一体。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对汉籍所记曹国、东曹史实要加以区别。

(三)《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九姓胡诸国道里、方位,有许多讹误。这与曹国、东曹、米国的方位有一定关系。《新唐书》所记道里与《隋书·西域传》较相近,而与《大唐西域记》有较大差异。看来,《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里程并不为唐人重视;显庆、龙朔年间,唐朝对中亚的调查和了解(许敬宗《西域图志》,王名远《西域图记》^[385])并不细致、准确。我们对汉籍所记石国、拔汗那至长安里程不能妄信。

(四)唐代九姓胡仍以昭武为姓的国家仅有安、东安、米、

何、史五国。在唐人看来，汉代康居五小王居地与昭武九姓国有某种联系（安国，康居小君长鬬王故地；石，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何，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史，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火寻，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

（五）唐朝是追随西突厥的足迹而进入中亚的。658～659年，唐朝在石、康、安、东安、曹、米、何、史、拔汗那诸国设置了羁縻府州。唐朝采取和平方式进入中亚，取代了西突厥较为残暴的统治，因而得到当地政权的支持和配合。唐朝以册命中亚本地王公为官的方式，实现其对中亚的羁縻统治，中亚本地政权得以保留和尊重。中亚诸胡完全接受了唐朝的册命，唐朝所册命的官职、王号一般可以世袭。在8世纪50年代以前，突厥人在中亚诸国（如石、安、米国）仍保持较大政治影响；对于中亚诸胡来说，唐朝的册命具有很大政治意义。在中亚诸胡中，拔汗那与唐朝的关系最为密切。从贞观年以来西曹“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安国犒师，约651～656年（永徽年间）何国愿输粮予唐军，739年（开元二十一年）石王、史王助盖嘉运破吐火仙等事例看，中亚诸国与唐朝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军事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早在高宗显庆年以前即已逐步建立。唐朝羁縻统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义务。上述西曹、安国、何国的事例说明，在贞观末年至永徽年间，唐朝声威确已到达中亚。我们不能以此时唐朝势力尚未到达碎叶一线为由，否认唐朝于648年设置了碎叶镇。以上史实充分说明，唐朝对中亚诸胡国实现了有效的羁縻管辖。

注释

- 〔1〕 沙畹：《西突厥史料》（1903年），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
- 〔2〕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第

六册, 1915 年。

- [3] 岑仲勉:《唐史余瀝》, 中华书局 1960 年;《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 中华书局 1958 年;《突厥集史》, 中华书局 1958 年。
- [4]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第 6243~6244 页。
- [5] 《唐会要》卷一百, 第 2125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 1991 年。
- [6]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 第 6262 页。但是,《旧唐书·大食传》仅记大食“妇人白皙”, 未记以黑巾障面之事。
- [7] 《唐会要》卷九九, 第 2105 页;《新唐书》, 第 6247 页;《册府元龟》卷九九五, 第 11686 页, 中华书局 1960 年明刻本影印本。
- [8] 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巴托尔德《迄至蒙古人侵的突厥斯坦》, 以下称《突厥斯坦》), London, 1977., pp. 185~187.
- [9] H. A. R. Gibb, *Arab Conquests in Central Asia* (吉布《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 London, 1923, pp. 46~48.)
- [10]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 第 118 页, 张毅笺释本, 中华书局 1994 年。
- [11] 《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 第 81~85 页。
- [12] 《隋书》卷八三, 第 1848~1849 页。
- [13] 《唐会要》卷一百, 第 2118 页。
- [14] 杜佑:《通典》卷一九三, 第 5256 页, 王文锦、谢方等点校本, 中华书局 1988 年。隋炀帝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诸国, 韦节等至罽宾、王舍城、史国而返。参见《隋书》卷八三, 第 1841 页。
- [15] 参见王焕春等编:《公农回傣彝藏佛历和儒略日对照表》, 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第 12~19 页。
- [16] 《旧唐书》卷一九八, 第 5310~5311 页, 中华书局点校本。
- [17] 《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外臣部·封册三〉, 第 11346、11349 页。
- [18] 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 罗致平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第 42~43 页。
- [19] 杨廷福:《玄奘年谱》, 中华书局 1988 年, 第 126 页。
- [20] 慧立、彦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中华书局 1983 年, 第 30

导 言

1985年8月，我徘徊在丝绸之路（中国境内）考察之行的终点伊犁河畔，举目西望，试图追溯玄奘的足迹，回到唐代的中亚……

一、研究现状

唐代，在以河中（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为中心的中亚地区，主要生栖着被中国史籍记之为“昭武九姓胡”的康、安等国和拔汗那。从武德七年（624）到大历七年（772），中亚诸国与唐朝发生了长达149年的交往。在吐蕃、东西突厥、突骑施前后雄起，大食不断东扩，东西文明不断交流的历史大背景中，在传统的丝绸之路上，金戈铁马之声不绝于耳，中亚诸胡使者、商人以及唐朝使者、僧人相继于道，成为中亚与唐朝文化交流的使者。在唐代那些令人热血沸腾的岁月里，唐朝政治势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越过葱岭，在河中、吐火罗等地设置了羁縻州府；中亚诸胡与唐朝确立起政治附属关系，并企图依赖唐朝抗击大食；西域文明对唐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乃至社会生活发生了

深刻的影响。

面对内容如此丰富的、色彩如此斑斓的历史篇章，众多学者不禁深深为之吸引，写出了许多与“唐朝与中亚”课题相关的传世之作。学术界关于“唐朝与中亚”和中亚学方面研究成果的积累，已为我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十分可贵的基础。这些成果大体上可分为三类：

1. 有关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方面的成果

法国学者沙畹(E. Chavannes)《西突厥史料》(1903)，系统整理、翻译了两《唐书》及《册府元龟》有关西突厥的史料，并对上述汉籍中所涉及的中亚地名、相关史实做了简单考释。本书高明之处在于，作者注意以伊斯兰舆地文献来考辨汉籍所记。由于本书论述重点是西突厥史以及唐朝与西突厥的关系，所以作者没有利用中外文献来系统研究“唐朝与中亚”这一课题。作者尽管摘录了《册府元龟》有关中亚诸胡人唐朝贡的部分记述，但并没有展开研究，且对中亚九姓胡的朝贡性质定性不准。

英国学者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在翻译《世界境域志》(Hudūd al-‘Alam, London, 1937)时，以其良好的语言修养，大量使用伊斯兰文献，对8~10世纪中亚历史地理做了详细考释。我们在确定中亚众多地名的确切地点时，往往要借助他的研究成果。遗憾的是，他没有涉及汉籍记述。

荷兰学者德·胡耶(M. J. de Goeje)系统整理了古典时期(8~10世纪)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编成《阿拉伯舆地丛书》8卷(Leiden, 1870~1894)。在本世纪，一批法国学者又重新译校了这些舆地文献^[1]。我国学者宋巍也翻译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1991)。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7~10世纪的中亚历史地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英国学者亨利·玉尔(H. Yule)收罗、节译了一批伊斯兰舆地文献，并做了初步的研究工作，写成《契丹行程》(London,

1913—15)。中国学者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有许多资料译自玉尔的书。

1933年，在中亚撒马尔罕以东约140公里的穆格山城堡陆续发现了约90件文书，大部分是粟特文书，也有汉文、阿拉伯文和古突厥卢尼文书。穆格山文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使我们能够不再局限于从外部，即从汉人、阿拉伯人或突厥人的记述来研究粟特史，而可以从粟特人内部来观察历史。经学者们整理、释读和研究，确认这批文书主要是喷赤干领主迪瓦什梯奇的档案。围绕着文书的定年、文书所记人名、地名的考释、迪瓦什梯奇的身分及其统治年代、迪瓦什梯奇与康国王突昏、乌勒伽的关系、迪瓦什梯奇何时称粟特王、8世纪初粟特地区的政治状况诸问题，苏联学者克拉契柯夫斯基夫妇（В.А.И.Ю.Крачковские）、弗列依曼（А.А.Фреиман）、里夫什茨（В.А.Лившиц）、斯米尔诺瓦（О.И.Смирнова）、克里亚什托尔内（С.Г.Кляшторный）、美国学者费赖（R.N.Frye）、日本学者岩佐精一郎展开了长期的讨论。中国学者马小鹤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汉籍记述，考定喷赤干即米国都城钵息德城，迪瓦什梯奇就是开元六年（718）遣使来朝的米国王。他还对穆格山粟特文书所反映的公元8世纪初期的粟特政治状况作了详尽的研究^[2]。

中国学者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1915），对《唐书》、《大唐西域记》所记西域史地做了考证，有筚路蓝缕之功。但是，丁谦忽视了汉籍有关西域史地记载因袭抄补的情况，以汉籍互校的方法来考辨西域史地，有“以讹校误”之嫌。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1930），编注了大量中外文史料，并对西域史地的相关记述做了部分考释。其书与唐代有关的部分主要在第四册，论题主要有“唐代中国与中亚之交通”，“唐

代在中国之中亚人及其后裔”，“唐人所记中亚之动植物”，“唐代西域人组成之军队考”。该书主要缺陷在于，外文史料出处不明或混乱，审音勘同不甚了了，没有把中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也没有考辨汉籍所记是否正确。对该书缺陷，冯承钧先生有专门论述^[3]。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1958)，把沙畹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化，对西突厥史以及西突厥与唐朝的关系史提出了系统的见解。他还考证了公元588年西征波斯的突厥可汗，“昭武”的对音，唐朝所置西域十六国都督府州治地。由于选题所限，作者并没有涉及西突厥在中亚诸国的活动情况，以及突厥人在唐朝的中亚防御战略中的作用等问题。

长期以来，《大唐西域记》以记载详实、可靠而为中外学者所称道。对该书的整理、研究，历来为中外学者所注重。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1984)、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1985)、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1989)，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全译》(1995)堪称“《大唐西域记》研究”的代表作。四书各有所长，但在中亚地名勘同方面，尤以季书为善。季羨林等融汇各国学者研究成果，充分利用了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及中亚当地的考古成果，对《大唐西域记》所记各地的历史、地理、物产及文物制度逐地做了详细考释。他们的研究，代表了当今中外学者研究《大唐西域记》的最高成就。但是，他们没有把玄奘的中亚行程在整体上加以考辨，致使他们的研究出现了一些失误和空白，诸如：玄奘所记中亚行程是否有误；千泉、笈赤建、白水城、曹国、米国等地究竟地处何方。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真正明了唐初丝绸之路中亚段的走向，不可能真正确定《大唐西域记》的可信度。正因为十分确信玄奘所记道里的正确，周连宽的研究才会漏洞颇多。他把碎叶、千泉、白水城、笈赤建、石国都城南勘异地，以求证玄奘所记之正

确。

国外学者研究《大唐西域记》的代表作应是 T. 瓦特斯 (Thomas Watters) 的《大唐西域记》英译本 (1904)^[4]。瓦特斯注意到玄奘所记中亚道里有所错乱, 白水城、千泉的地点有疑问。但是, 他没有系统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来验证玄奘所记, 也没有把玄奘的中亚行程从全程上加以考辨, 致使发现玄奘之记有误的机遇失之交臂。

对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研究, 重要的成果有韩国学者梁翰承、冉云华的校释本 (伯克利、汉城, 1984)^[5], 日本学者桑山正进的《慧超往五天竺国研究》(京都, 1992), 以及中国学者张毅的《往五天竺国传笺释》(1994)。桑山正进的研究分为释文、译文、译注三部分, 并有附论、参考文献、索引, 其研究较为深入。张毅主要依据汉籍记述, 对中亚的安、曹、史、米、康、跋贺那 (拔汗那) 等国史地做了粗略考辨。

苏联学者克利亚什托尔内 (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 在《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1964。中译本, 1991) 中, 分析了汉籍史料与突厥鲁尼文碑铭, 大大推进了 6~8 世纪中亚史地及突厥人与唐朝关系史之研究。此书尤为令人注意的一个贡献是, 作者考定《毗伽可汗碑》(大铭文第 24~25 行) 和《阙特勤碑》(大铭文第 31~33 行) 所记默噶在公元 701 年前后征讨的 alty Ćub Soıydaq, 并不是如马迦特 (J. Marqart) 所说的“粟特昭武六部”, 而是唐朝的六胡州; Ćub 为汉语“州”的对音, 而不是“昭武”的对音^[6]。中国学者张广达也接受了此观点, 并加以考辨^[7]。

2. 有关唐代西域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

俄国学者巴托尔德 (V. Barthold) 在充分挖掘、整理和利用阿拉伯—伊斯兰史料的基础上, 著《七河史》(1893)、《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1900)^[8], 《中亚突厥史十二讲》(1927), 拨去了 7~12 世纪中亚历史上的厚重迷雾。他对中亚诸城 (如怛

逻斯、白水城、撒马尔罕、布哈拉、苏对沙那等)定位、城市沿革、道里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他的探究成果已为中亚考古资料和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他和其他学者对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的研究成果,使我们有可能以这些文献为参照系,以验证汉籍记述的正确与否。遗憾的是,巴托尔德(又译巴尔托里德)没有能力利用汉文文献,因而无法研究7~8世纪中亚诸国与唐朝的关系,无法对该时期中亚诸国与阿拉伯、突厥、唐朝的关系作出卓有成效的研究。

G. Le. 斯特拉吉(G. Le. Strange)系统梳理了阿拉伯—伊斯兰文献的有关记述,对7~9世纪阿拉伯哈里发国的东部地区各城,逐地进行了考释,写成《东部哈里发国的土地》(剑桥,1905)。对于唐代汉籍记述,他几乎没有利用和涉及。

法国学者伯希和(P. Pelliot)对西域史地有许多精湛的研究。他的《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1916),《四天子说》(1923),《中亚史地丛考》(1929),《玄奘记传中之千泉》(1930)等著述,大大推进了学术界对唐代粟特人、唐与中亚历史地理之研究。

日本学者松田寿男依据中国文献记述,对汉唐时期天山地区历史地理做了审慎的考证,写成《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1956年修订)。他的研究成果对“汉唐时期天山地区历史地理研究”具有奠基性意义。他的研究方法也给后学以启迪。

白鸟库吉《康居粟特考》(中译本,1936),利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汉籍记述,简要地考辨了河中诸城的方位和道里,辨析了康居与粟特之间的区别。

A. M. 别连尼茨基(A. M. Беленицкий)等主编的《中亚中世纪城市》(列宁格勒,1973),反映了苏联中亚地区考古发掘和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成果。作者对怛逻斯、白水城、石国都城等城的考定,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但是,作者把托克玛克西南的

阿克·贝希姆废城比定为八刺沙袞，而不是碎叶（上书，页 208~209）。此结论已为中国学者张广达所推翻。

张广达结合汉籍和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记载及中亚地区考古成果，对碎叶等城做了精当的考辨（〈碎叶城今地考〉，1979；《西域史地丛稿初编》，1995）。他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可以把碎叶（阿克·贝希姆）作为道里计量的一个基准点。

余太山在《塞种史研究》（1992）中，主要依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和《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述，考辨了“康居”的地理位置、族名、族属和源流，分辨了“康居”、“康”及“Sogdiana”之间的区别，把白鸟库吉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此外，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1962）、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1988）等，也对西域历史地理研究作出了贡献。

西域史地研究的另一个重点是丝绸之路研究。岑仲勉《历代西疆路程简疏》（1962），日本学者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中译本，1990），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1994），主要依据汉文文献，对葱岭以东丝绸之路考证较详，对葱岭以西的道里则几乎没有涉及。苏北海《唐代中亚热海道考》（1988），把考证的终点延伸到热海（伊塞克湖）。史念海在《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1988）^[9]一文中，回顾了魏晋以来汉人对西域的探索，以及汉籍所记通往域外的道路走向。对于汉籍所记的真伪，史先生几乎未作考辨。

3. 唐朝与中亚关系史研究成果

英国学者吉布（H.A.R.Gibb）的《阿拉伯在中亚的征服》（伦敦，1923），从阿拉伯征服史的角度，探讨了阿拉伯对中亚的征服进程，中亚诸国的抵抗以及它们与唐朝、突厥人、突骑施汗国的关系。吉布主要利用了阿拉伯历史名家塔巴里的《年代记》、白拉祖里的《诸国征服者史》和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由于

没有大量利用汉文史料，因此对于下述问题吉布无力作出回答：唐朝在中亚设置羁縻府州的历史影响如何，唐朝在中亚诸国抗击阿拉伯人的斗争中究竟起什么作用，中亚诸国为什么屡屡向唐朝、突厥人求援，等等。

美国学者白桂思（Ch.I.Beckwith）主要依据阿拉伯史料、吐蕃史料以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写成《中亚的吐蕃帝国》（普林斯顿大学，1987）。白桂思探讨了吐蕃势力在中亚的进退，阿拉伯人、突骑施汗国与唐朝、吐蕃的关系，吐蕃与阿拉伯人、唐朝在中亚的争夺等问题。此书的突出贡献在于，综合利用了多语种资料，开拓了吐蕃史研究的新领域，对吐蕃、唐朝、阿拉伯及突骑施之间的关系，做了全景式的综合探讨。由于作者研究的角度是以吐蕃为本位，因而对于中亚诸国与唐朝关系之演变，汉籍记述的真伪及价值，他并没有深入探讨。

北京大学王小甫博士继白桂思之后，以唐朝为本位，探讨了唐与吐蕃、大食在西域争夺的历史过程，写成博士论文《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1989年写成，1992年出版）。他考证了吐蕃进出西域的交通路线（食盐之路，五俟斤路等），安西四镇的置废，并通过对汉、阿两种史料的认真比勘，否定了唐朝与大食曾在中亚对抗的说法，否定了长期流行的突厥人支持中亚诸国反抗大食入侵的说法，认为唐朝并没有支持突骑施抗击大食，突厥人只是力图恢复其对南部绿洲的传统控制，因而多次与吐蕃连兵袭扰西域，成为唐朝和大食的共同敌人。中亚诸国向唐朝遣使求援、诉苦，“主要不是由于侵略战争，而是由于与新宗主（阿拉伯）发生了矛盾”^[10]。不过，他并没有充分利用《册府元龟》等史料，来系统研究唐朝与中亚诸胡的关系。

薛宗正在《突骑施汗国的兴亡》（1984）、《康王乌勒伽向唐求援表文疏证》（1988）、《波斯萨珊王裔联合吐火罗抗击大食始末》（1988）、《石国考述》（1989）、《突厥史》（1992）、《安西与

北庭——唐代西陲边政研究》(1995)等著述中,主要依据汉文史籍及吐鲁番出土文书,探讨了突厥人(东、西突厥)与唐朝的关系,唐朝势力在中亚的进退,中亚诸国与唐朝的关系,唐朝对西域的经营和统治诸问题。对于中亚诸国与唐朝关系的演变,丝绸之路的走向,薛先生几乎没有涉及。他也没有以阿拉伯—伊斯兰文献来验证汉籍之记。

王治来的《中亚史纲》(1986)从中亚史的角度,谈及7~8世纪中亚诸国与唐朝的关系,唐朝在中亚所置羁縻府州的治地等。在汉籍中,王先生主要使用了两《唐书》的记述,而几乎没有利用《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史料。

日本学者伊濑仙太郎主要依据《册府元龟》、《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写成《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1955,东京)。在是书第八章,伊濑编制了“西域诸国朝贡表”,详列了西域诸国人唐朝贡时间、贡使、贡品和唐朝回赐的情况,探讨了西域诸国对唐朝的羁縻关系,以及唐朝的西域经营策略。本书可以说是国外学者系统研究唐朝与中亚关系史的代表作。但令人遗憾的是,伊濑的“西域诸国朝贡表”有许多遗漏,且有一些讹误。由于没有使用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没有参考中亚考古成果,伊濑没有对唐代文献记述的真伪和可信度展开讨论。

蔡鸿生在《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1988)中,据《册府元龟》、《新唐书》,制成“唐代九姓胡入贡年表”。蔡鸿生着重于贡品的类释,并注意到九姓胡朝贡频率与中亚政治形势之间的联系。但是,朝贡频率、内容所反映的九姓胡与唐朝关系之亲疏、变化,唐朝的西域经营战略对九姓胡的影响,蔡先生均未做探讨。而且,蔡先生所编“年表”遗漏甚多。

关于中亚诸国与唐朝关系的重要论文尚有:吉布《公元715年阿拉伯对喀什噶尔的人侵》(1922)^[1],台湾学者张日铭《开元年间(713~741)唐大食关系之研究》(1975),卢苇《唐代中

国和大食在中亚地区斗争的发展和变化》(1985), 吴玉贵《唐代西域羁縻府州建置年代及其与唐朝的关系》(1986), 等等。

黄时鉴师主编的《解说插图中西关系史年表》(1994), 对汉籍记述进行了一番爬梳、整理工作, 并融汇了大量的中外学术研究成果, 以概述、条目解说、地图和插图, 扼要地、具体地勾勒出中西关系史的总貌和各个关节。其中, 第三编“隋唐时期中西关系史年表”(卢向前编制), 具列了隋唐时期中亚诸胡与唐朝交往的史事。但囿于体例等原因, 对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之演变, 《年表》未作探讨。

我国最新论述唐代西域历史的著作是余太山主编的《西域通史》(1996)。其中, 第四编“突厥汗国及其对西域的统治”、第五编“唐代西域”由吴玉贵撰写。作者清晰地剖析了唐代西域政治形势的发展, 叙述了唐朝在中亚建立羁縻州府的过程以及各羁縻州府的名称、辖地, 对唐朝的羁縻统治方式也有所涉及。作者依据《新唐书·王孝杰传》、《玉海》卷133所引《武经七书》的记述, 认定贞观末年唐朝势力已达碎叶, 648年设置了安西四镇, 且其中有碎叶镇。此外, 作者鉴别出《隋书·西突厥传》是记阿波系突厥, 《通典》、《旧唐书》、《新唐书》误将室点密系突厥(即西突厥汗国)和阿波系突厥合为一传^[12]。由于本书所论“西域”乃狭义的, 仅指中国新疆地区, 所以对中亚诸胡与唐朝的关系很少涉及。作者对下列课题均未作系统探讨: 中亚羁縻州府设置之前, 中亚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如何; 羁縻州府的设置, 对中亚九姓胡与唐朝关系、九姓胡与大食的关系又有什么影响; 中亚九姓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什么变化, 各国与唐朝的亲疏关系是否有别, 等等。

关于中亚诸国与唐朝的物质文化交流之代表作, 有劳费尔(B. Laufer)《中国伊朗编: 中国对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贡献》(中译本, 1964), 谢弗(E. H. Schafer)《撒马尔罕的金桃》(1985;

中译本作《唐代的外来文明》，1995）。

二、问题的提出

综观上述这些著述，不难发现只有极少数研究者对唐代汉文文献有关中亚史地的记述加以整理和研究。即便是这些研究者，他们也很少把文献加以系统研究，致使文献的史料意义限于一时、一地、一事。考虑到有些汉籍记述甚至是7~8世纪中亚诸国史地状况的唯一记述，辨别汉籍记述的真伪，确立汉籍记述的可信度，就显得更为重要起来^{〔13〕}。在构架“唐与中亚”课题研究的宏大体系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平心静气地考辨唐代文献中有关中亚以及中亚与唐朝交往的记述，才能使我们的研究视角全面起来，避免使用史料的割裂性和随意性，客观地评价中亚诸国入唐朝贡的性质，准确地判断唐朝在中亚是否有抵制大食东侵的策略。

从上述中外学者著述中可以看出，唐代文献所记中亚诸胡国历史、地理状况是否有误，唐人对中亚的认识是否准确，唐代文献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有什么不同，中亚诸国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什么变化，它们与唐朝的亲疏关系是否有别，7~9世纪丝绸之路中亚段的走向如何，中外学者鲜有人详加辨析。而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必须先从研究唐代文献着手。

唐朝国势强盛，盛行探索域外的风气。不但西行僧侣、官员、士卒写出许多有关西域历史、地理、风俗、物产的著述，而且朝廷也派员调查西域诸胡国，编撰出一批有关西域的图志。其中，记述唐代中亚诸胡历史、地理及唐与中亚九姓胡关系的著述

有^[14]：

輿地类文献：李泰《括地志》凡 555 卷；《贞观方物录》；程士章《西域道里记》3 卷；《西域图志》（显庆三年撰成）；王名远《西域图记》；许敬宗等《西域图志》60 卷^[15]；盖嘉运《西域记》；《十道四蕃志》；戴斗《诸蕃记》；贾耽《皇华四达记》10 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40 卷；高少逸《四夷朝贡录》10 卷；吕述《黠戛斯朝贡图传》。以上诸书、图志，除了《括地志》残文辑存 4 卷^[16]，《皇华四达记》序文残留在《新唐书·地理志》，余皆不存原书。行纪类文献：玄奘《大唐西域记》；道宣《释迦方志》；王玄策《中天竺国行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杜环《经行记》。还有《新唐书·西域传》，《旧唐书·西戎传》，《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乐史《太平寰宇记》，以及两《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通典》、《册府元龟》的有关记述。此外，敦煌、吐鲁番文书，唐代碑铭，唐人文集中也保存了一些记述。

上述这些文献详实记述了中亚九姓胡与唐朝的交往、唐朝政治势力在中亚的进退以及唐代不同时期中亚诸胡国历史和地理等基本史实，反映了唐人对中亚诸胡的认识以及唐朝对它们的态度。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我们可以确切明了唐代丝绸之路中亚段的走向及其变化，中亚九姓胡对唐朝附属关系的建立、变化及其特点，九姓胡入唐朝贡的性质、意义，唐朝在九姓胡抗击大食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唐人对中亚认识的正确程度，并确立对汉文史料相关记载的可信度，使“唐朝与中亚”课题研究具有坚实、可靠的基础。

上述这些著述的作者有一些（如玄奘，王名远，慧超）甚至亲自到过中亚。唐人对中亚诸胡的了解，理应是比较全面的。但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在实际上，唐人对中亚的了解相当有限。早在玄宗天宝二年（743），唐朝鸿胪卿王忠嗣所掌握的材料仅知

西域十几国，且错讹很多^[17]，以至于贾耽需要在9世纪初重新编撰舆地著作。这一方面说明7世纪唐人有关中亚的著述流传不广，另一方面提示我们：唐代文献记述是否有误？

面对如此浩瀚的文献，要在短短几年内做系统研究是常人所不可能完成的。综览诸多文献，我发现与本课题相关的记述，主要集中在《大唐西域记》卷1、《新唐书·地理志》、《新唐书·西域传》和《册府元龟·外臣部》四篇文献中。前两篇文献详细记述了唐代丝绸之路的走向，以及中亚诸国的相对位置；而且，《大唐西域记》是唐代最早记述西域史地的文献，详细记述了唐初丝绸之路走向和中亚诸胡的情况，《新唐书·地理志》保留了8世纪末中西交道状况，两者各具代表性。后两篇文献则集中保存了唐人对中亚诸胡国的认知以及九姓胡与唐朝交往的基本史实。这些记载既是唐朝与中亚交往的记录，又是双方交往的历史结果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人在与中亚诸胡交往过程中所持的立场、观点。而且，前三篇文献文字上的整理已经完成，《册府元龟》（明本）也基本不需要版本校勘，便于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前人在研究这四部史籍时，又留下许多空白，出现一些失误。因此，我决定以这四篇文献为中心，兼及其它汉籍记载，对唐代文献所记中亚史地加以考辨。以文献研究为中心，可以避免研究者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研究过程中取舍史料的主观随意性，从而可以进一步客观、全面地探寻中亚诸胡和唐人活动的历史轨迹。

为了避免与前人研究相重复，我把研究重点放在中亚河中地区。由于文献的相对独立性，以致本书各章也具有了相对独立性。

三、研究方法及基本概念

(一) 研究方法

我们从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研究汉籍有关西域记述的正确与否,关键在于建立一个参照系,即以境外史料和考古材料来验证汉籍记述。长期以来,丁谦等前辈忽视了汉文典籍有关西域史地记载因袭抄补的情况,以汉籍互校的方法来考辨西域史地,有“以讹校误”之嫌;也有的学者(如周连宽)以汉籍记述为信史,仅以汉籍记述来验证中亚史地,削足适履,指证中亚考古材料之不确。

我在研究方法上,力图避免重蹈复辙。对于《大唐西域记》、《新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西域传》的有关记述,我从怀疑汉籍所记的研究角度出发,以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中亚考古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来验证之。而对汉籍有关中亚诸胡朝贡的记述(主要保存在《册府元龟》中),由于确乏境外资料可资验证,只能做文献意义上的研究。我的研究原则是:“有疑则考,中外互证,其余从略。”对本人学识及掌握资料尚不足考辨者,只有留待来日和贤者了。

有关唐代中亚史地的域外文献资料,主要是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的史料价值很高,尤其是有关道里、方位的记述。这是因为,在伊斯兰世界,出于宗教上的需要(穆斯林每日五次礼拜的朝向;赴麦加朝圣;寻求知识的圣训之鼓励),征收赋税的需要,以及经商的需要,舆地学特别发达。自8世纪中叶以来,涌现出一大批内容丰富、记述详实的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著述。这些地理文献既包括地理资料本身,

又包含了许多历史史料。这些文献除了对边远地区的情况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或出于猎奇心理撷拾了奇异传闻因而流于荒诞之外,大部分事实记述是翔实可靠的,其关于伊斯兰世界道里的记述尤为可信。中亚的考古成果及各城镇的实际里程,充分证明了这些记述的可信性。这些舆地文献(如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中外文对比的史料,以验证汉文典籍的记载,而且告诉我们许多西域城镇变迁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巴托尔德、马迦特、米诺尔斯基、张广达等名家无不强调利用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文献。这类文献的主要缺陷在于,后代作者经常随意抄袭前人记述而不予说明,导致有年代模糊不清之弊。汉籍记述年代学上的相对准确性,正可补伊斯兰文献之不足,两者相得益彰。

(二) 基本概念

西域 (Western Lands)

包括中国新疆地区(西域东部地区)和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地区(西域西部地区)两部分。

中亚 (Central Asia)

本文所指“中亚”为狭义的。所谓“中亚”,主要指葱岭以西的西域地区,包括楚河流域及河中地区。铁门以南的吐火罗故地,不在本书讨论的范畴。

河中 (Transoxania)

“河中”是 Māwarā - al - Nahr 一词的意译,又译“河外”地。Māwarā - al - Nahr 一词最早见于 9~10 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地理著述中,它是指从巴格达东望,阿姆河彼岸、阿姆河以东的地区。具体地说,它是指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地域。也有学者把它音译为“马维兰纳赫尔”之地。古代希腊人把阿姆河称之为奥克斯河或奥克苏斯河,把阿姆河彼岸(东岸)之地称之为 Transoxania^[18]。此词大致与“河中”相应。西辽曾在撒马尔罕

设河中府，所辖大致上是撒马尔罕绿洲、布哈拉绿洲。耶律楚材称，河中乃“西域寻思干城，西辽目为河中府”^[19]。13世纪伊朗史学家志费尼（Juvaini）说：“河中包括很多郡邑、区域、州县、城镇，其精华和核心是不花刺（布哈拉）和撒麻耳干（撒马尔罕）。”^[20]中国学者一般称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区为河中地区，但范围并不十分确定，一般是指两河之间的撒马尔罕（元代寻思干）绿洲和布哈拉绿洲，有时并含与其邻近的地区^[21]。本文所论“河中”，是指布哈拉、撒马尔罕绿洲以及拔汗那地区。

九姓胡和中亚诸胡

“九姓胡”即指中亚昭武九姓国。据《新唐书·康国传》所记，在唐代，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22]。陈寅恪先生把杜甫诗中的“杂种胡”皆视作“中亚昭武九姓胡”^[23]。实际上，唐人对“九姓胡”的界定也是不相一致的。杜佑《通典·边防九·西戎五》“康居”称：康国“枝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凡九国，皆其种类，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24]上列九国，加上康国，已经超过“九姓”之数。

本文中所讨论的“九姓胡”，以《新唐书·康国传》为基准。但由于《新唐书》编撰者没有注意劫布咀那（西曹）与苏对沙那（东曹）的区分，把两地相混淆了，致使我们无法一一鉴别汉籍所记史事是西曹的抑或东曹的，所以我把苏对沙那也包括进“九姓胡”中。此外，由于《新唐书·康国传》把中曹与西曹同传，把“东安”记事系于“安国”条下，所以我把中曹、东安也归入九姓胡。这样归类的目的在于，我们尽可能地接近唐人的认识轨迹。

“中亚诸胡”是指九姓胡（康、安、东安、曹、中曹、东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和拔汗那。由于唐代文献置拔汗

那于“九姓胡”之外，所以我在研究中亚诸胡与唐朝的关系时，有意识地把拔汗那与九姓胡相比较。

朝贡

在唐代，中亚诸胡往往向唐朝“贡献”和“上表”（请封、请求内附、请援等），这种“贡献”和“上表”，就是所谓朝贡。唐朝也往往对中亚朝贡国有赏赐、册封之举，这种赏赐和封册往往是与朝贡活动一起完成的，它们与朝贡活动构成了一种朝贡制度，但前者又不能说就是朝贡活动本身。此外，还有宗主国在蕃属国、羁縻政权当时没有朝贡的情形下，主动册封后者的。这种册封也构成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但它也不是朝贡活动本身。唐朝对朝贡活动的管理制度，也构成为朝贡制度的一部分。通过朝贡活动，朝贡双方结成一定的政治、经济关系。通过分析朝贡活动、贡使、贡品，我们可以了解朝贡国与宗主国之间以及朝贡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

册封

本文所指的“册封”，是指唐朝帝王以一定的方式（如遣使持册书前往，当朝宣册），把封爵授给中亚诸胡国；或者，中亚诸胡国新王继嗣，主动遣使来唐朝请求承认、求封，而且唐朝满足其请求之类的活动。在册封活动中，是否有封玺、册文并不是定性的标准。本文所讨论的“册封”，主要是《册府元龟·外臣部·封册》所记的册封活动，以及其它汉籍所记唐朝对中亚诸胡的“封”、“册”之举。由于《册府元龟》把“册封”归之于《外臣部·封册》，所以我们一般并不严格区分“册封”与“封册”之间的差别。

四、各章研究的基本问题及贡献

本书研究的中心是“唐朝与中亚的交往”这一课题。这一课题从不同角度可有不同的表述，如唐朝与中亚的交通及其变化；唐人对中亚的认识，中外文献所记中亚诸国方位、道里之差异；唐朝在中亚诸国设置羁縻府州的经过；羁縻州府的设置，对中亚诸胡与唐朝、大食关系的影响；中亚诸胡各国与唐朝的亲疏关系；中亚诸胡与唐朝政治关系的演变及其原因；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性质，等等。

第一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着重研究《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行程。通过对《大唐西域记》的研究，我发现在人们竭尽心智求证其翔实、可靠之后，玄奘所记中亚行程多数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记述及中亚考古成果不相符合；玄奘所记千泉不能与 Abarjaj（或 Barjaj）相勘同，筱赤建不能与（下）努舍疆、新城相勘同；玄奘所记白水城、恭御城的方位也有疑问；白水城与 Isfijab 方位不一。这说明早在唐朝初年，唐人对中亚诸胡国史地等基本情况的了解就有偏差。

第二章，考虑到中外学者（如岑仲勉、苏北海、松田寿男）对《新唐书·地理志》所记道里的研究局限在碎叶以东地区，我把研究视野伸向碎叶以西，着重研究《新唐书·地理志》所记中亚行程。从《新唐书·地理志》所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残文看，贾耽所记碎叶——怛逻斯里程比玄奘之记准确，而且路线有所不一。这一方面说明唐人认识的进步，以致《新唐书》编撰者也没有采纳玄奘之说；另一方面说明 7~8 世纪西域交通路线有所变化。遗憾的是，贾耽所记也有诸多遗误。从玄奘到贾耽，

唐人对中亚诸胡认知均存在偏差。

第三章，结合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中亚史籍，着重考辨《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诸胡史地状况。这种考辨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确定《新唐书·西域传》所记史实的相对年代，确定《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诸胡国的方位，辨析汉籍与阿拉伯—伊斯兰文献记述的差异，明了唐人对中亚认识的正确程度，并确立对汉文史料相关记载的可信度，避免使用汉籍记述时张冠李戴的现象。本章的贡献在于：

(1) 以更多的材料探讨唐朝在中亚建立羁縻统治的历史过程及其统治形式。唐朝以册命中亚本地王公为官的方式，实现其对中亚的羁縻统治，中亚本地政权得以保留和尊重。中亚诸胡完全接受了唐朝的册命，唐朝所册命的官职、王号一般可以世袭。在8世纪50年代以前，突厥人在中亚诸国（如石、安、米国）仍保持较大政治影响；对于中亚诸胡来说，唐朝的册命具有很大政治意义。中亚诸国与唐朝保持着一定的政治、军事义务，而且这种义务早在显庆年以前即已建立。唐朝羁縻统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这种义务。史实充分说明，唐朝对中亚诸胡国实现了有效的羁縻管辖。从贞观年以来西曹“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647年（贞观二十一年）安国犒师，约651～656年（永徽年间）何国愿输粮予唐军等事例看，在贞观末年至永徽年间，唐朝声威确已到达中亚。我们不能以此时唐朝势力尚未到达碎叶一线为由，否认唐朝于648年设置了碎叶镇。

(2) 就政治而言，唐人和唐朝政府对九姓胡的王统非常关注。《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中亚九姓胡政治状况基本可信，且可补中亚史料、阿拉伯——伊斯兰史料记载之不足。汉籍记载年代学上的相对准确性，使我们推断九姓胡的政治演变和王统变化。从《新唐书》有关记述看，曹国、米国在贞观年以前尚未独立称国，这反映了河中地区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

(3) 从《新唐书·西域传》看,唐人对九姓胡中的康、安、石国认识较为清楚,而对曹与东曹、西曹认知较为混乱,对火寻认知较晚。通过中外文献记载的比较研究,我发现唐人所记米国方位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所记 Māymurgh 不能相勘合;唐人把曹国(西曹)与东曹(苏对沙那)相混淆。就地理方位看,《新唐书》所记康、安、东安、石、史、何、火寻诸国均与阿拉伯—伊斯兰文献所记基本相同,但诸国周邻道里有较大偏差;唐代文献对中亚诸胡国物产的记述,也比较详实可信。

必须注意的是,对汉籍所记曹国、东曹史实要加以区别。《新唐书·西域传》所记九姓胡诸国道里、方位,有许多讹误。这与曹国、东曹、米国的方位有一定关系。《新唐书》所记道里与《隋书·西域传》较相近,而与《大唐西域记》有较大差异。看来,《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里程并不为唐人重视;显庆、龙朔年间,唐朝对中亚的调查和了解(许敬宗《西域图志》,王名远《西域图记》)并不细致、准确。

(4) 唐人对九姓胡的宗教信仰及中亚的伊斯兰化基本上并不了解。唐人对九姓胡宗教信仰的认知程度,基本上仍停留在《隋书》的水平。8世纪以来中亚诸国的伊斯兰化,并不为唐朝所了解。《新唐书》、《册府元龟》几乎没有记述九姓胡的改宗之举。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8世纪中叶以前,唐人对中亚的伊斯兰化程度所知甚少。唐代九姓胡仍以昭武为姓的国家仅有安、东安、米、何、史五国。在唐人看来,汉代康居五小王居地与昭武九姓国有某种联系(安国,康居小君长闾王故地;石,故康居小王窳匿城地;何,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史,康居小王苏薤城故地;火寻,康居小王奥鞬城故地)。

第四章,通过整理《册府元龟》等汉籍记述,讨论中亚诸胡朝贡与唐朝的册封,探讨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政治关系及其演变,是中亚学界一直关注且未解决的问

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唐朝、大食与中亚诸胡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个课题的关键是如何找准双方关系的表现形式。中亚诸胡与唐朝的朝贡关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双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中亚诸胡入唐朝贡的记述，主要保存在《册府元龟》中，并散见于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等史籍。我通过汉籍的梳理，统计出九姓胡入唐朝贡凡 134 次，比伊濑仙太郎的统计多出 34 次，比蔡鸿生的统计多出 40 次^[25]。我发现，早在唐贞观年间，在唐朝设置羁縻府州之前，九姓胡即已与唐朝建立起较为稳固的朝贡关系，并负有一定的政治、军事义务。唐朝在中亚羁縻统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使这种义务制度化。唐朝是追随西突厥的足迹，采取和平方式进入中亚的。唐朝以册命中亚本地王公为官的方式，实现其对中亚等地的羁縻统治，中亚本地政权得以保留和尊重。唐朝的册命，还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曹、米等国政治上的独立和发展。

九姓胡朝贡的频率、时机及贡品的质量与西域东、西部的政治形势及唐朝势力的进退，有密切的关系。在不同时期，九姓胡的贡次、贡品种类及贡使身分有变化。贡次的变化，说明九姓胡与唐朝的关系有亲疏之分；唐朝在中亚设置羁縻州府并没有加强九姓胡与唐朝的朝贡关系。九姓胡贡品的质量，往往与九姓胡入朝动机有关。汉籍记为“遣使”朝贡的使者，具有九姓胡的国使身分。从九姓胡及西蕃诸国朝贡所请看，九姓胡对唐朝的朝贡关系主要是一种政治关系。九姓胡朝贡的政治性质，在不同时期有逐步加强的趋势。九姓胡的朝贡，基本上不是如沙畹所称的“以献为名”的商业性朝贡。九姓胡及西蕃诸国的入唐朝贡说明，面对大食的东扩，唐朝有一套应付大食的策略，即：利用突骑施的力量，通过赐封、慰抚等手段扶持中亚诸胡的势力，试图组织中亚诸胡抵抗大食的征服，以最少的军事代价维系唐朝在中亚的羁

糜统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朝道义上的支持,促使了中亚本地民族意识的觉醒。在751年前的西域东、西部地区,虽然唐朝与大食曾有过军事联合(734~736年),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尚不能定性为同盟友好关系。

注释

- [1] G. Wiet: Yakūbi《诸国志》法译本,开罗,1937; J. H. Kramers & G. Wiet: Ibn Hawkal《诸地形胜》法译本,莱顿,1938; A. Miquel: Mukaddasi《诸国知识的最佳分类》法文节译本,大马士革,1963; H. Mass' e: Ibn al-Fakih《诸国志》法译本,大马士革,1973; Ch. Pellat: Mas' udi《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法译本,巴黎,1962; 耿昇中译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 [2] 马小鹤:〈米国钵息德城考〉,《中亚学刊》第二辑,中华书局1987年,第65~75页;〈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中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9~138页。(本书以〈〉标识论文,以《》标识专著。)
- [3] 冯承钧:〈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17~326页。
- [4] T. Watters, *On Yuan Chuang's Travels in India*, London, 1904.
- [5] Yang Han-Sung, Jan Yün, etc., *The Hye Chó Diary: Memoir of the Pilgrimage to the Five Riegiions of India*, Berkeley/Seoul, 1984.
- [6] C. Г. 克利亚什托尔内《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李佩娟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96~100页。
- [7] 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9~279页。
- [8] 巴托尔德用了很多时间,从当时仅以抄本、写本形式流传于世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文献中选辑重要段落,汇编为《原始史料选辑》,作为《突厥斯坦》一书的第一编刊行。关于《突厥斯坦》一书,参见伯希和:〈《蒙古侵略时代之土耳其斯坦》评注〉(T' oung Pao,

- 1930), 中译文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 商务印书馆 1962 年, 第 1~53 页。另参见张锡彤、张广达:〈试论俄国东方学家瓦·弗·巴托尔德对蒙古史的研究及其《突厥斯坦》一书〉,《元史论丛》第一辑, 中华书局 1982 年。
- [9] 史念海:〈隋唐时期域外地理的探索及世界认识的再扩大〉, 陕西师大主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 年第二辑, 第 73~110 页。
- [10] 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第 178 页。
- [11] H.A.R.Gibb, *The Arab Invasion of Kashgar in A.D.715. BSOS*, vol. II—3, 1922, pp.467~474.
- [12] 余太山主编:《西域通史》,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第 119, 156~160 页。
- [13] 汉文文献对于 7~9 世纪中亚史地研究的价值, 巴托尔德有极高评价, 认为汉文文献甚至是中亚许多历史事件唯一的记述。参见 V.Barthold, *History of the Semirechye, Four Studies on Central Asia*, Vol. I, p.86 note 2, tr.by V. & T.Minorsky, Leiden, 1956.
- [14] 参见《新唐书·艺文志二》; 王应麟《玉海》卷一四、一五、一六, 四库全书本。
- [15] 《新唐书·艺文志二》记作《西域国志》;《玉海》卷一六、《唐会要》卷七三记作《西域图志》。
- [16] 李泰:《括地志辑校》, 贺次君辑校, 中华书局 1980 年。
- [17] 《唐会要》卷一百;《玉海》卷一五。
- [18] 参见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 罗致平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页 59; 另参见 A. 阿格扎莫娃:〈论地名“马维兰纳赫尔”和“突厥斯坦”〉, 新疆社科院中亚所编《中亚研究》1989 年 1、2 期合刊, 第 65~70 页。
- [19] 耶律楚材:〈再用韵记西辽事〉,《湛然居士文集》, 谢方点校, 中华书局 1986 年, 第 67 页。
- [20]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何高济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第 113 页。
- [21] 黄时鉴师:〈辽与“大食”〉,《新史学》第三卷第一期, 台北 1992

年3月,第47~67页。

[22]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康国〉。

[23] 陈寅恪:〈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2~53页。

[24]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点校本,1988年,第5255页。

[25] 蔡鸿生所定“朝贡”概念较狭窄。这可能是他统计朝贡数较少的原因之一。

第一章 7 世纪的中西交通

——《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行程辨析

《大唐西域记》是唐代最早记述西域史地的文献，详细记述了 7 世纪上半叶中西交通状况，反映了唐人对中亚诸胡最早的认知。此书影响之大，唐代其余舆地文献难出其右。该书流传 1300 多年，注疏、研究不乏其人。然细检玄奘所记之中亚行程和里程，仍有诸多疑问之处；诸多研究者不乏疏误之处。据此，让我们的研究就从《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行程开始吧。

一、玄奘所记路线和里程

据《大唐西域记》记述，大清池（伊塞克湖）至捕喝国（布哈拉）的行程和里程可概述如下：

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

素叶（水）城西行四百余里，至千泉；

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咀逻私城；

咀逻私南行十余里有小孤城，从此西南行二百余里至白水城；

西南行二百余里，至恭御城；

恭御城南行四五十里，至筱赤建国；

从筱赤建国西行二百余里，至赭时国（唐言石国）；

从赭时东南千余里，至怛捍国；从此西行千余里，至窆堵利瑟那国；

从窆堵利瑟那西北入大沙漠，行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

飒秣建东南至弭秣贺国（唐言米国），从此北至劫布旦那国（唐言曹国）；

飒秣建国西南行三百余里，至羯霜那国（唐言史国）；

从劫布旦那国西三百余里，至屈霜你迦国（唐言何国）；

从屈霜你迦国西二百余里，至喝捍国（唐言东安国）；

从喝捍国西四百余里^[1]，至捕喝国（唐言中安国）；

从捕喝国西四百余里^[2]，至伐地国（唐言西安国）；

从伐地国西南^[3]五百余里，至货利习弥迦国；

从羯霜那西南行二百余里，入山；东南山行三百余里^[4]，入铁门；出铁门，至覲货逻国故地^[5]。

上述这些地方，有许多已被中外学者明确勘定。怛逻私，《唐书·突厥传》作怛罗斯，又作怛逻斯，均为波斯语 Taraz 之音译，意为“装饰品”、“服饰”。怛逻斯故城遗址位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原名奥利阿塔）以西 18 公里处，西距奇姆肯特约 162 公里^[6]。米诺尔斯基（V.Minorsky）说，怛逻斯废城位于今塔什干东北约 280 公里处^[7]；9 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曰，怛逻斯至石国有 50.7 法尔萨赫（约合 316 公里）^[8]。这可能是由于后者所记道里较为迂回之故。

白水城，位于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城以东约 13~15 公里处的赛拉姆村（Sairam）。《元史》称之为赛兰城。布莱脱胥乃德（E.Bretschneider）、巴托尔德（V.Barthold）对赛兰城都有详考。^[9]

赭时国大致范围在锡尔河支流 Barak (又作 Parak) 河 (今名乞儿乞克 Chirchik) 流域。70 年代, 苏联学者认定, 古赭时都城在今乞儿乞克河附近的 Binkath 废城^[10]。1991 年 5 月, 南京大学刘迎胜先生与“草原丝绸之路”考察队的各国学者考察了塔什干地区, 认定公元 605~750 年石国的宫廷所在地即阿克·特帕 (Ak-Tepa) 遗址, 该遗址位于塔什干市中心东南方 15 公里处; 从公元 750 年~12 世纪上半叶, 塔什干政治中心迁至今塔什干市中心的宾卡特 (Binkat) 遗址所在地; 从 12 世纪下半叶——蒙古时代, 又迁至塔什干市西南约 50 公里的班那卡特 (Benakat) 遗址所在地^[11]。周连宽先生则把古赭时国都定在今塔什干城以西约 50 公里的旧石城^[12]。看来, 周先生是指班那卡特遗址。

怛怛国, 即《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之拔汗那 (位于“石国以东百里”),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三五作跋贺那国,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作跋汗 (位于“石国之南六百里”), 其都城 Akhsikath 古城, 在浩罕东北约 60 公里处。

率堵利瑟那, 即《隋书》卷六七〈裴矩传〉、卷八五〈西域传〉之苏对沙那国 (位于“跋汗东五百里”);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又作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勃布旦那、苏都识匿, 又称东曹国, “即汉代貳师城地也”^[13]。率堵利瑟那、苏对沙那等名, 应是穆斯林文献中的 Usrusana 或 Usrushana, 其国治在今塔吉克斯坦乌拉秋别 (Uratube, 西距撒马尔罕约 220 公里); 乌拉秋别以南 25 公里有著名的半制城 (Bunjikath, 今名彭吉肯特 Panjikand, 在半制城附近的穆格山古堡曾出土一批粟特文书)^[14]。

屈霜你迦国, 即《隋书·西域传》之何国, 《新唐书·西域传》记: “何, 或曰屈霜你迦国, 曰贵霜匿, 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屈霜你迦, 为中古波斯语地名 Kusanik、阿拉伯语地名 Ku-

saniyya 之对音。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撒马尔罕领有的地方中有 Kusaniyya^[15]。屈霜你迦国都城故址在今撒马尔罕西北 12 法尔萨赫(约 75 公里)^[16],即今乌兹别克斯坦克尔米涅市。

喝捍国,又名东安国,言其在安国(布哈拉)之东也,托玛舍克及巴托尔德将其比定为波斯佚名作者所著《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中的 Kharghankath(卡尔干卡特,后称为 Kalkanata)^[17]。该城位于那密水(泽拉夫善河)之北,那密水之南为开尔米尼亚(Karminiya,又译开尔米尼亚,西距布哈拉 17 法尔萨赫,约合 106 公里),两城相距仅 1 法尔萨赫。交通干道从开尔米尼亚之南侧经过^[18]。《新唐书·西域传》称:东安国在那密水之阳^[19]。那么,喝捍应是卡尔干卡特。马迦特在《古突厥碑铭年代考》中,也把喝捍考定为 Kharghan,并称其城北邻泽拉夫善河,在今 Kernineh 附近^[20]。宋岷先生把布哈拉以东 22 法尔萨赫(合 141.7 公里,古达玛谓 19 法尔萨赫)的代布西亚(Dabusiyah)勘定为喝捍国。宋说存疑。

萨秣建,都城故址在今撒马尔罕市中心东北 1.5 公里的 Afrasiab 高地^[21]。

捕喝,《新唐书·西域传》又作布豁,安国,即布哈拉。

伐地国,《新唐书·西域传》康国条误为戊地,学者一般将其比定为布哈拉西南的拜坎德(Betik,或 Bitik,又作 Bilkad,或 Baykand);据 10 世纪上半叶阿拉伯舆地学家古达玛说,拜坎德至布哈拉的里程为 8.5 法尔萨赫^[22],约合 53 公里。考古材料证实,拜坎德遗址到布哈拉有 55 公里^[23]。

货利习弥伽国,《新唐书·西域传》作货利习弥国,又作火辞弥、火寻,并称该国居乌浒水之阳,东南 6 百里至戊地。古波斯语作花刺子模(Khwarizmik),在今中亚咸海南之基发(Khiva)一带。

靺货逻,即吐火罗。据日本学者内田吟风研究^[24],唐初以

来的吐火罗国为突厥族所建，其都城在昆都士（即《大唐西域记》中的活国）附近的阿缓小城（War-waliz）。《新唐书·西域传》称：“吐火罗……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其王号‘叶护’。”

二、诸城方位

在玄奘记载的中亚地名中，碎叶、千泉、恭御城、笈赤建国四城的方位和地点仍有疑问，难以与穆斯林著述和实际道里相吻合。

1. 关于碎叶

碎叶城故址，学者们勘定为今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玛克西南 8~10 公里的阿克·贝欣姆（Ak—Beshim）废城。中外学者多数赞成此说，苏联考古成果也证实此说^[25]。这基本上已成铁案，似乎勿庸再议。

然细检玄奘所记，不难发现素叶（碎叶）与大清池（伊塞克湖）之间的距离（500 余唐里），与阿克·贝欣姆至伊塞克湖西端的距离（约 110 公里）相差太大。由于中国学者大多依据碎叶城来确定《大唐西域记》所记中亚诸城（国）的相对方位，因此碎叶城与伊塞克湖的相对关系就显得格外重要。

对于玄奘“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之记述，周连宽解释说：玄奘先到达清池东端，然后顺该湖北岸西行；从大清池西端向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碎叶；大清池本身的长度并不包括在“五百余里”之内。这是因为，《大唐西域记》的计程方法，由甲地至乙地，只计两地之间的距离里数，而不包括甲地或乙地本身的长度或宽度。据此，周先生在伊塞克湖西端以西 500 唐里寻找

碎叶故城，认定该城当在前苏联中亚的哈喇波尔多（Карабалты）与哈林宁斯克（Калининское）之间或其附近地区^[26]。遗憾的是，迄今尚无考古材料证实周先生的结论。

《大唐西域记》的计程方法，确如周先生所证。那么，“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作何解呢？

贾耽《皇华四达记》说，热海（伊塞克湖）至碎叶里程为280（唐）里^[27]。这比玄奘所记少了220里。贾耽所记（约合248华里）与今日阿克·贝欣姆遗址至伊塞克湖西端的里程（约110公里）大体符合，仅多出约14公里。这可能是唐代道路曲折之故。

显然，玄奘所记碎叶至清池里程有疑问。这可能是由以下三个原因之一造成的：一是玄奘可能到达伊塞克湖南岸中间某一点（在伊塞克湖西端以东约100公里处），然后离开湖岸甚远，往西北而行。这样，与湖岸大体平行的这段行程（约100公里），由于并非沿湖而行，因而也计入总里程。这样，玄奘所称“五百余里”则所言不虚了。法国学者沙畹（E. Chavannes）考证：寻常通道在此湖之北，可以俄文地图证之；湖之南通行甚难，最近欧洲诸旅行家业已证实其事；所以，玄奘必沿湖之北岸而行^[28]。可是，湖南岸难行，为什么就不能离开湖岸，寻路西行？《大唐西域记》、道宣《释迦方志》均无“循湖”、“沿湖”西北行字样，或可佐证。《慈恩传》卷二则有“循海（指热海——引注）西北行五百余里”字样。《慈恩传》之记如果无误，那么玄奘也有循湖南岸西行之可能。笔者询问曾于1991年考察过伊塞克湖的刘迎胜先生（南京大学），证实该湖南岸与湖畔高山之间有较宽的缓坡，可以沿湖从东到西通行，湖南岸并非不能通行。关键是南岸高山峻岭中是否有通向伊塞克湖的山口。再者，如果玄奘确沿湖北岸而行500余里，则有两种可能性，即或是把湖的长度也计算在内，但这与玄奘的计程方法不相符合；或是如周连宽先生所

推测的那样^[29]，不把湖的长度计算在内，在湖西端以西 500 唐里勘定碎叶故址。所以，第二个原因是，碎叶城确在伊塞克湖西端以西 500 唐里，贾耽所记和今日学者的考定均错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和考古成果看，这种原因并不成立。原因之三，则可能是玄奘所记里程数有误。

看来，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周连宽先生的考定很难成立。玄奘不可能沿伊塞克湖北岸而行，碎叶城也不在该湖以西 500 唐里处。所以，季羨林等也认为，玄奘西行路线在清池南岸^[30]。

2. 关于千泉

千泉，《慈恩传》卷二作屏聿，两《唐书》均作千泉。1930 年，法国学者伯希和考证说：屏聿当是突厥语 Bing-yul 的对音，该词意为“千泉”^[31]。也有学者认为，屏聿当为屏笔，为东突厥语（畏吾尔语）Ming bulaq 之对音，意义亦为千泉^[32]。岑仲勉谓，屏聿当为屏律，对音为东突厥语 Bing-bulaq^[33]。

千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 Abarjaj。他称此地有丘冈，环丘冒出水泉千眼，汇为东流之河；人们在此地猎取黑雉。此地位于怛逻斯与白水城之间，在怛逻斯以西，距白水城 17 法尔萨赫（约 212 华里）^[34]。古达玛把千泉记为 Barjaj；关于该地方位和道里，古达玛所记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相同^[35]。而玄奘则记述：千泉位于怛逻斯城以东 140～150 唐里（约 124～133 华里）处，从千泉往东 400 余唐里至素叶城（碎叶）：“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由此可见，玄奘所记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不同（参见图 1）。要明了个中原委，必需先确定千泉地点。

丁谦认为：千泉，地今无考；从该地西距怛逻私城百四五十里计之，千泉当在今俄属库穆阿雷；然自素叶至千泉断不止四百余里^[36]。日本学者松田寿男认定，千泉在今哈萨克斯坦的梅尔克（又译麦尔基，Merke 或 Mepke，即阿拉伯地理著述中的 Mir-

ki 或 Barki) 附近; 在隋末唐初,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置牙帐于千泉, 这在《旧唐书·西突厥传》中有记载^[37]。梅尔克西至江布尔城(但逻斯)约 150 公里, 东距比什凯克城(原名伏龙芝, 此城附近的克留切夫废墟即阿拉伯地理著述中 Jul 城^[38])约 100 余公里, 那里至今仍是吉尔吉斯人在楚河与锡尔河之间最好的避暑胜地, 拥有良好的牧场和清澈的泉水。19 世纪后期, 舒勒尔(Schuyler)曾亲自考察梅尔克, 认定该地即古之千泉^[39]。而周连宽先生则认为, 千泉在江布尔城以东 140~150 (华) 里的阿该尔托布与泼得果尔诺之间及其附近地区^[40]。林梅村说, 千泉在塔拉斯河上游德米特里耶夫村附近^[41]。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公里)

玄奘所记(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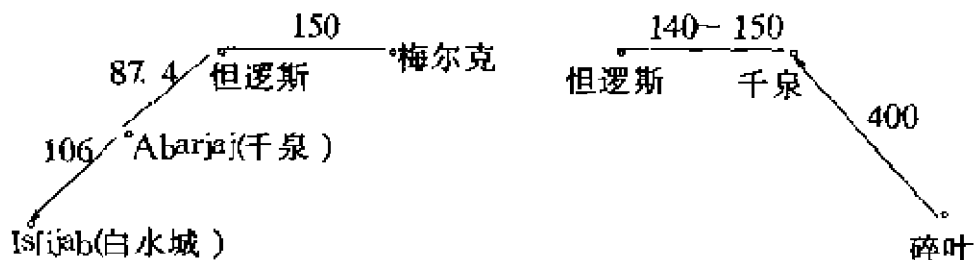


图 1

按: 梅尔克至江布尔城的实际里程 (150 公里), 比玄奘所记千泉至但逻斯城里程要多出 167~176 华里, 比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白尔钦 (Barki, 即梅尔克) 至但逻斯里程 (21 法尔萨赫, 约合 131 公里^[42]) 多出约 19 公里。梅尔克至碎叶故城 (阿克·贝欣姆) 里程, 今日实际约为 172 公里, 玄奘记为 400 余唐里 (约合 177 公里),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 38 法尔萨赫 (约 237 公里)^[43]。不过,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道路, 要从白尔钦往东北走, 绕道阿史不来城再往东南行, 所以里程要远 4 法尔萨赫 (约 25 公里) 左右。

综合上述材料, 玄奘所言“千泉”, 当在梅尔克一带, 玄奘

所记碎叶（素叶）至千泉里程大体准确；玄奘所记千泉西至怛逻私（怛逻斯）里程则有错简，少记约 85 公里。另外必须指出的是，玄奘所言千泉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千泉（Abarjaj，或 Barjaj），并非指称同一地方。至于屏聿（Bing-yul，或 Ming bu-laq）如何与白尔钦（Mirki，或 Barki，即梅尔克）相勘同，尚待有识之士作出解释。

而周连宽先生所考定之千泉方位则有误。这是因为，他注重于千泉与怛逻斯的相对位置，忽略了千泉与碎叶、伊塞克湖的相对位置。阿该尔托布、泼得果尔诺一线至碎叶故城当在 260 公里左右，这与玄奘所记碎叶至千泉里程（400 余唐里）大大不符。丁谦也犯了相同的错误。考虑到伊塞克湖及碎叶城位置的相对固定性，我们应该注重的是千泉与碎叶、伊塞克湖的对应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突厥下》的一条记述：“统叶护可汗……控弦数十万，徙廷石国北之千泉，遂霸西域诸国……”^[44]。这个“千泉”位于石国之北，而非怛逻斯之东，它以石国为参照座标；其地理位置与玄奘所记不同，而与阿拉伯—伊斯兰舆地学家所记相近。它的方位较为可信。

3. 关于恭御城

玄奘所记恭御城的具体地点，目前考古发掘成果尚不足以确认。季羨林等先生认为，此城大体上在今锡尔河支流乞儿乞克河与安格林河（Angren）流域，当在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说的“察赤（赭时）—伊腊克”（Chach—Ilak）地区之内^[45]。周连宽先生则认定该城在乞儿乞克（齐儿齐克）与帕尔塔拉齐克之间^[46]。以上两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把恭御城视为一个独自存在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只记恭御城而无白水城^[47]；在《新唐书·西域传》里，则只载白水城而没有恭御城。《释迦方志》和《新唐书·西域传》的有关记述都据自《大唐西域记》。所以，英国学者瓦特斯（T. Wattors）在《大唐西域

记》英译本中提出,“恭御”可能是突厥语 kuyu (意为泉城) 的译音;“泉”字可能是“白水”竖写时合二为一,白水城就是泉城,也就是恭御城;恭御城(白水城)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称的伊斯比(菲)加卜(Isbijab, 或为 Isfijab, “白水”之义)相同,故址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奇姆肯特东南约 8 英里(约 13 公里)的赛拉姆村(Sayram, 即赛兰城)^[48]。但是,瓦特斯未能解释玄奘为何把恭御城和白水城分作两地记述之原因,也未能从里程上考定恭御城即白水城。

我们可以从里程上探寻相关诸城的方位。从怛逻斯至白水城,玄奘记为 200 唐里,约合 88.6 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 31 法尔萨赫^[49],约合 193.4 公里,两者相差 104.8 公里,相差一倍以上。今查两地实际直线距离,在 150 公里以上。玄奘所记肯定有误。而怛逻斯至恭御城,玄奘记为 400 唐里(约合 177 公里);这与穆斯林作家所记怛逻斯至白水城距离相比,仅少 16.4 公里(40 唐里)左右。难怪瓦特斯认为恭御城即白水城(参见图 2)。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公里)

玄奘所记(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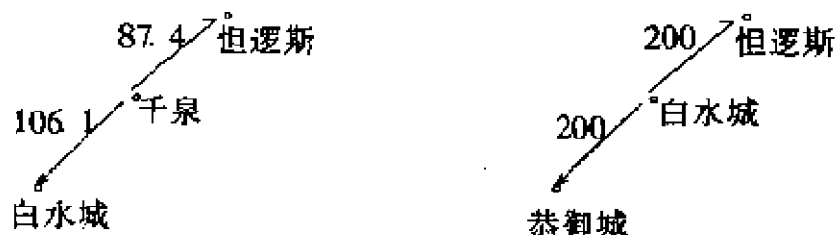


图 2

白水城至赭时里程,玄奘记为 440~450 里(约合 194.7~199.3 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则记为 19.7 法尔萨赫(约合 122.6 公里),玄奘所记比后者多出 72~76.7 公里。为解决此矛盾,周连宽先生把古赭时国都定在今塔什干以西约 50 公里的旧

石城。但如此勘定又使玄奘以后的行程不符。所以，苏联考古学者把古赭时国都定在今乞儿乞克河附近的 Binkath 废城（详见前述）。看来，问题仍出在白水城和恭御城上。

按：如果恭御城即白水城，则玄奘所记恭御城至赭时的里程（240~250 唐里，约合 106.3~110.7 公里），与穆斯林著述中白水城至赭时国里程相比，仅少 12 公里左右，两者大体吻合；这也与今日里程相符。但玄奘为何把这两个地名分作两地来记呢？

赛拉姆（白水城）至塔什干城北实际直线距离约为 120 公里，与穆斯林地理学家所记相符。另外，从怛逻斯至赭时的总里程，中外双方所记大体相符：玄奘记为 650 唐里，约合 287.4 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有 50.7 法尔萨赫（约合 316 公里），而古达玛记述的捷径（中途乘船）仅有 41 法尔萨赫（255.8 公里）^[50]。

从里程上看，玄奘所记白水城之方位，正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千泉相当；而前者所记恭御城，正与后者所记白水城方位相当。显然，或是玄奘把恭御城、白水城前后次序倒错，恭御城即突厥语“泉城”（kuyu）的对音，即穆斯林著述中的千泉^[51]；或是玄奘所记两城次序未错，“白水”或许即“泉”字之讹，“白水城”应为“泉城”，为穆斯林所记之千泉（Abarjaj，或 Barjaj），而“恭御”并非突厥语 kuyu 的对音，恭御城即穆斯林所记之白水城。第三种可能则是，玄奘所记白水城即 Isfijab，而其记里程有误，应另比定恭御城之方位。但这种可能微乎其微。

4. 关于筱赤建城

筱赤建，又作弩室羯。瓦特斯将其对应为 Nujikkend，并认为该词有可能代表了突厥语复合词 Nujabahkend，意为“贵人之地”^[52]。但更为流行的观点是：筱赤建是中世纪阿拉伯地理著述中 Nujakath、Nujikath 或 Nujkath 等词的音译，为突厥语“新城”之意^[53]。宋岷先生把“筱赤建”对应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道里邦国志》所记之“下努舍疆”(Nashsjan al-Sufla);下努舍疆西距怛逻斯3法尔萨赫(18.7公里),西距白水城34法尔萨赫(212公里)^[54]。丁谦认定,笈赤建即《西游记》之赛兰,《西使记》作赛蓝,即琛姆罕特(奇姆肯特)城东之赛喇穆(赛拉姆)城^[55]。

显然,丁谦把笈赤建和白水城的方位搞混淆了。赛拉姆应是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白水城的所在地,而非笈赤建国。可能由于今本《大唐西域记》所记白水城和恭御城的方位、里程之混乱,丁谦未能确定恭御城之方位。这导致他误定笈赤建方位。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载,白水城(赛拉姆)东至怛逻斯有31法尔萨赫(193.4)公里;玄奘说,笈赤建至怛逻斯440~450唐里(194.6~199公里)。从里程上看,笈赤建确与赛拉姆(白水城)相当。但是,“笈赤建”很难与Isbijab(或Isfijab,白水城)相勘同。而且,如果把赛拉姆勘定为笈赤建,那么玄奘所记白水城、恭御城无法与穆斯林所记和实际里程相对应。

《新唐书·西域传上》记载:“白水城……南五十里有笈赤建国,广千里,地沃宜稼,多蒲陶。又二百里即石国。”《新唐书·西域传下》则曰:“新城之国,在石东北羸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国城。后为葛逻禄所并。”^[56]

上述两条记述误差约有100里(与石国之距)。从方位上看,“笈赤建”条记述更为明确,但这条记述与玄奘所记“笈赤建国”方位不符。玄奘说,笈赤建国在恭御城以南五十里;而《新唐书·西域传》则称,笈赤建国在白水城以南五十里。如果恭御城即白水城之说成立,那么《新唐书》和《西域记》关于“笈赤建国”方位之记述,大体上是吻合的。苏联考古学者把笈赤建城比定为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地区的汗阿巴德(Ханабад)^[57]。汗阿巴德与白水城、塔什干的距离,大致与《新唐书·西域传上》“笈赤建”条所记相符。这进一步证明恭御城即白水城之说(参

见图 3)。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 (公里)

玄奘所记 (唐里)



图 3

可是，为证实玄奘所记无误，周连宽先生把窳赤建城认定为今塔什干以东约 25 公里的养吉—巴沙儿^[58]。章巽先生等则把窳赤建国都城故址定为今哈萨克斯坦之奇姆肯特^[59]。

按：养吉—巴沙儿至周连宽先生所比定之赭时国都（塔什干以西约 50 公里的旧石城）为 150 华里；而玄奘称，窳赤建国西至赭时国 200 余唐里（177 华里以上）。养吉—巴沙儿东至赛拉姆（白水城，或玄奘所言之恭御城）约 97 公里，这与《大唐西域记》所记恭御城至窳赤建里程（40～50 唐里）相差太大。周先生之误显而易见。究其原因，他把玄奘所记白水城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白水城相等同。

赛拉姆位于奇姆肯特之东南；玄奘称，恭御城（穆斯林著述中的白水城）在窳赤建国之北。因此，章先生之说也难以成立。我们应当在赛拉姆（白水城）之西南去勘定窳赤建国故址，而不是在赛拉姆之北。相形之下，苏联学者之说较为可信。

至于“窳赤建”、“新城”与“下努舍疆”三个地名，显然不能勘同。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下努舍疆，远在白水城（赛拉姆）以东约 212 公里，尚在怛逻斯以东约 18.7 公里；玄奘所言之窳赤建，在怛逻斯以西 440～450（唐）里，在恭御城之西（南）40～50 里。因此，窳赤建与下努舍疆不能相勘同。而“新城”一地，在《新唐书》中又有两说：一是《西域传》中所记

“新城之国，在石东北羸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国”。二是《地理志》摘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中的记述：碎叶西四十里至新城，再二百四十里至怛逻斯^[60]。贾耽所言之“新城”，距碎叶城仅40唐里左右（约35华里），正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言之奈瓦契特（Nawakit）城地望相当；奈瓦契特位于碎叶城以西3法尔沙赫（18.7公里）^[61]。因此，张广达师也认为，奈瓦契特城即新城；Nawakit，其意为“新城”^[62]。值得注意的是，从碎叶西行3法尔萨赫至奈瓦契特，再顺鲁凯布（或泽卡特）路走1法尔萨赫，可至“上”努舍疆。也许贾耽把“上”努舍疆（八儿思罕）混同为“下”努舍疆，从而把上努舍疆等同为新城了。

不管怎样，贾耽所言之新城与玄奘所称之筱赤建国不是同一地方，与《新唐书·西域传》之新城也不是同一地方，这是可以肯定的。

三、玄奘行程考辨

玄奘所记，除了上述诸城方位与伊斯兰地理学家所记不一，与今日考古成果不相符合以外，其道里走向及里程也与穆斯林著述有较大差异。试比较如下：

玄奘之记述：（单位：唐里）

碎叶—400—千泉—140～150—怛逻私城—200—白水城—
200—恭御城—40～50—筱赤建国—200—赭时—1000—窳堵
利瑟那国（苏对沙那）—500—飒秣建国—900以上—捕喝
国—400余—伐地国
飒秣建—300余—羯霜那国

阿拉伯地理学家：(单位：公里)^[63]

碎叶（库巴勒）—212.2—阿史不来城—49.9—俱兰—
87.4—下努舍疆

——18.7—怛逻斯—87.4—千泉（Abarjaj）—106—白水城
—122.6—

—赭时—156—扎敏—106.1—撒马尔罕—243.4—布哈拉—
53.4—拜坎德（伐地国）^[64]

赭时—156—扎敏—218.4—费尔干纳

扎敏—56.2—苏对沙那

要明了上述记载的异同，首先要确定唐代里程长度。关于唐代里程长度，学者歧异较多^[65]。唐里有大、小里之分。胡戟先生分析了存世 17 把唐尺的长度和有关文献记载，考定 1 唐大里为 531 米，当今 1.06 华里；1 唐小里为 442.5 米，当今 0.88 华里；度地一般用唐大里（如唐长安城周长），也有袭用旧法而用唐小里者（如《元和郡县志》卷 1 所记京兆西安至东都洛阳里程）；小里还用于测晷景^[66]。专治中国科技史的闻人军考定，1 唐大里为 531.486 米；1 唐小里为 442.905 米，与隋里相同，50 唐小里合 44.29 华里；天文大地测量及道里记载一般用唐小里^[67]。玄奘等所记之“里”，应是唐小里。而周连宽先生则认为，唐里与古汉里相同，1 古汉里合 0.3909 公里，1 公里等于 2.558 古汉里^[68]。后说备考。笔者从闻人军说。

按 50 唐里为 44.29 华里计，碎叶至怛逻斯段，玄奘所记里程数太少，仅有 550（唐）里左右，约合 243.6 公里；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里程则有 368.1 公里，两者相差约 124.5 公里。若以 1 古汉里等于 0.3909 公里计，两者相差更大，达到 153.1 公里。即便以唐大里折算，玄奘之记折合 291.5 公里，也

相差 76.6 公里。从今日实际里程看，阿克·贝欣姆废城（碎叶故城）至江布尔城（怛逻斯），距离当在 330 公里以上。玄奘所记里程数太少，显然有误。但令人奇怪的是，江布尔城至伊塞克湖西端实际距离是 440 公里左右，这与玄奘所记大清池至怛逻斯里程（1050 唐里，约合 464 公里）大体符合。这不禁使人产生疑问：难道这段里程玄奘所言前后有所错简？（参见图 4）

今日实际里程（公里）

玄奘所记（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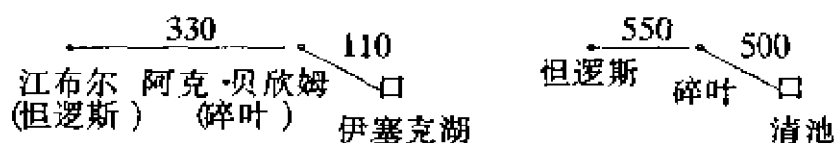


图 4

热海（伊塞克湖）至碎叶里程，实际上约为 110 公里；贾耽记为 280 里（约合 124 公里），比玄奘少记了 220 里，与实际里程相距不大。显然，玄奘多记了 220 里。看来，玄奘有可能把碎叶至怛逻斯的里程数少记了 220 里，并把这段里程数计在大清池至碎叶这段里程上，致使大清池至碎叶段多记了 220 里。否则，就是玄奘所记大清池至碎叶里程数（500 里）不误，玄奘极可能远离伊塞克湖岸而西行（如前所述）；但是，他把碎叶至怛逻斯里程少记了 220 里。无论如何，他把碎叶至怛逻斯里程少记了 220 里，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怛逻斯至白水城，玄奘比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少记了 104.8 公里；从白水城至赭时，玄奘又比后者多记约 72~76.7 公里。而怛逻斯至赭时里程，玄奘记为 650~640 里（287.9~283.5 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 50.6 法尔萨赫（316 公里），玄奘所记少约 28 公里；如果 1 法尔萨赫以 6 公里计，玄奘所记仅少约 16 公里，已基本上接近穆斯林地理学家所记。显然，白水城的方位是关键。如果玄奘错把白水城、恭御城次序记颠倒

了，或是玄奘所记恭御城即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之白水城，那么玄奘里程数大体正确；否则，就是玄奘里程数有误（详见前考：“关于恭御城”）。

可以确认的是，碎叶——怛逻斯——白水城里程，玄奘所言有较大错乱。而且，这段行程的走向，玄奘所记也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述略有差异。从碎叶至怛逻斯，玄奘仅言经千泉一地，而且此千泉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千泉”方位不同；两地之间著名的阿史不来城和俱兰城，玄奘只字未提。这其中原因，抑或玄奘省略记述，抑或玄奘未经历这些地方，就非今人所能探究明白的了。值得一提的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道里，与贾耽所记行程走向是一致的。（详见第二章考辨）

至于赭时国以西里程，玄奘所言也颇为不明。研究者一般认定玄奘未到过怛捍（费尔干纳），而由赭时到窣堵利瑟那国^[69]。从赭时到窣堵利瑟那国（苏对沙那）里程，《大唐西域记》卷一、《慈恩传》卷二均记作千余里（443公里以上）；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则称，从赭时经扎敏转西南行至苏对沙那为33法尔萨赫，约合206公里。玄奘等所记多出237公里以上，误差在一倍以上。玄奘所记里程显然太多。

石国至怛捍里程，玄奘说有千余里（约合440公里）。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拔汗那西至石国58法尔萨赫（361.9公里）。从拔汗那 Akhsikath 古城经俱战提至石国（塔什干），实际里程约为395公里。玄奘多记45公里。

窣堵利瑟那至飒秣建国行程及里程数，玄奘所记也颇为不明。《慈恩传》卷二记述：从窣堵利瑟那国“又西北入大磧，无水草，望遗骨而进，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释迦方志·遗迹篇》也记曰：从窣覩（堵）利瑟那国“又西北入大磧，行五百余里至飒秣建国”。周连宽先生考证说：窣堵利瑟那国在今乌拉—求伯（乌拉—秋别）；玄奘从乌拉—求伯向西稍偏北行约130公里，经

扎敏到达季扎克 (Jizak), 然后转西南行, 越塔美兰 (Tamerlan) 关隘, 计行 90 公里, 乃抵飒秣建国, 全程共计 220 公里, 与《慈恩传》、《大唐西域记》所记两地距离 500 余唐里正符 (以 1 公里等于 2.558 唐里计)^[70]。(参见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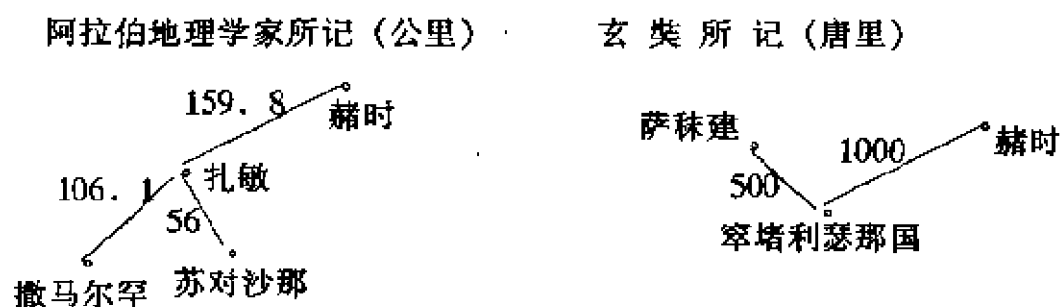


图 5

按: 从苏对沙那 (罕堵利瑟那) 至撒马尔罕, 必经扎敏; 从苏对沙那至扎敏,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均记为 9 法尔萨赫 (约 56 公里); 扎敏至撒马尔罕有 17 法尔萨赫 (约 106 公里)^[71]。玄奘所记行程从疏时至苏对沙那, 再到撒马尔罕, 除非从疏时可以不经扎敏而达苏对沙那, 否则就要在扎敏与苏对沙那之间走一个来回, 多走约 112 公里; 而且, 苏对沙那到撒马尔罕为 26 法尔萨赫, 约合 162 公里, 这与玄奘所言“五百余里” (221.5 公里以上)、与周先生所推定之 220 公里相差甚大。乌拉一秋别经扎敏到季扎公里程, 周连宽先生推算为 130 公里, 这也比实际里程多出 20 公里左右。看来, 周先生之比定有缺陷。而《新唐书·西域传》称: 罕堵利瑟那“北至石、西至康皆四百里许” (约合 177 公里)。这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记述和实际里程基本符合 (北至石 400 里许, 少记约 29 公里)。

从撒马尔罕 (飒秣建) 到布哈拉 (捕喝) 的行程, 玄奘记得非常简要, 且言“至”, 不言“行”。季羨林等先生推测, 玄奘极可能是从飒秣建国直接到羯霜那国 (史国, 即渴石, 在撒马尔罕

以南 75 公里处的萨赫里萨布兹；萨赫里·萨布兹西北至布哈拉 161 公里），而未再西行捕喝国^[72]。从石国至怛捍国里程，《隋书·西域传》“石国”条记为 600 里（约合 265.7 公里）^[73]，玄奘则称有千余里（443 公里以上），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曰 60 法尔萨赫（合 374.4 公里，途经扎敏）。玄奘所记比后者多出约 69 公里，《隋书》所记则少了约 109 公里。

飒秣建以西里程和行程，玄奘所记也有疑点。《大唐西域记》记：

劫布咀那国—300 余里（133 公里）—西至屈霜你迦国—200 余里（88 公里）—西至喝捍国—400 余里（177 公里）—捕喝国

劫布咀那，王治瑟底痕城（即 Ishtikhan，或 Ithtakanj 之对音），即今撒马尔罕西北 50 公里的伊什特汗^[74]。屈霜你迦（即库沙尼亚）国都城故址在今撒马尔罕西北 12 法尔萨赫，约合 75 公里^[75]。伊什特汗至库沙尼亚有 25 公里。喝捍，即开尔米尼亚（今克尔米涅市，Kermineh），西距布哈拉 17 法尔萨赫（古达玛说，仅有 14 法尔萨赫），合 106 公里^[76]。今日布哈拉至伊什特汗公路，循泽拉夫善河（那密水）南岸东去，里程约为 210 公里；据此推算，屈霜你迦至喝捍当为 79 公里。《新唐书·东安国传》称：东安东距何二百里许（85 公里以上）^[77]。这与我们的推算基本相同。显然，劫布咀那至屈霜你迦，玄奘多记 108 公里；屈霜你迦至喝捍，玄奘多记 9 公里，与穆斯林地理学家所记基本符合；喝捍至捕喝，玄奘多记 71 公里（如按古达玛所记 14 法尔萨赫计，则玄奘多记约 89.6 公里）。此段路程，玄奘多计凡 188 公里。

萨秣建西行路线，玄奘记曰：萨秣建——弭秣贺国（即米国，此为 Maymurgah 之对音，位于布哈拉至那色波的大路上）——北至劫布咀那国——西至屈霜你迦国。如此走法，似乎在撒马

尔罕以西地区从南到北游历，而非西去之路。据穆斯林地理学家记载^[78]，从伊什特汗到布哈拉，必经撒马尔罕，因此不可能走出玄奘所称撒马尔罕——伊什特汗——库沙尼亚这么一条路线。而且，布哈拉到伊什特汗，绕经撒马尔罕，全程为 293 公里左右；不绕道撒马尔罕，全程为 210 公里左右（今日里程），均与玄奘所说之 900（敦煌写本残卷 S.2659 作 600）唐里不符合。但是，今日撒马尔罕到布哈拉公路，又是从撒马尔罕西北行至伊什特汗，然后向西南行至布哈拉，全程约有 260 公里。这说明玄奘所言路线是可行的，只是里程数有误（参见图 6）。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公里）

玄奘所记（唐里）



图 6

至于布哈拉以西里程，玄奘并未亲履，其记采自传闻，故错乱在所难免，不一而足。例如，布哈拉至拜坎德（伐地国），古达玛记为 53 公里^[79]，《大唐西域记》记为 400 余里（177 公里以上），《慈恩传》记作百余里（44 公里余）。显然，后者所计较为准确。丁谦把伐地国比定为木鹿，即“隋称穆国者”^[80]。木鹿东距布哈拉 343 公里；穆国应是阿姆河畔的阿穆勒城^[81]。丁谦之说显误。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 4 点结论：

1. 在众多学者多年竭尽心智求正玄奘所记乃翔实、可靠之后，我们想问一句：玄奘所记是否间或有误，错在哪儿？本于这种求实精神，笔者经过上述辨析而认定：玄奘和阿拉伯地理学家

所记中亚诸城（国），有一些是各自方位不一，如千泉与 Abarjaj（或 Barjaj），双方所记的白水城；有一些则是难以相互勘同，如筱赤建与（下）努舍疆、新城。而且，贾耽所言新城与玄奘所称之筱赤建国、与《新唐书·西域传下》之新城也不能勘同。周连宽先生所比定中亚诸城的方位，均有疑问。从里程上看，玄奘所记白水城之方位，正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千泉相当；而前者所记恭御城，正与后者所记白水城方位相当。显然，或是玄奘把恭御城、白水城前后次序记颠倒，恭御城即突厥语“泉城”（Kuyu）的对音，即穆斯林著述中的千泉（Abarjaj，或 Barjaj）；或是玄奘所记这两城的次序未错，“白水”或许即“泉”字之讹，“白水城”应为“泉”城，为穆斯林所记之千泉，而“恭御”并非突厥语 Kuyu 的对音，恭御城即穆斯林所记之白水城。笔者倾向于第一种推测。必须指出的是，如果没有可靠的证据，我们没有必要否认苏联考古成果，而另比定玄奘所记中亚诸城的地点，以证玄奘所记无误。

2. 在碎叶、怛逻斯、白水城故址分别为阿克·贝欣姆、江布尔和赛拉姆的前提下，玄奘所记碎叶——怛逻斯——白水城的行程及里程有较大错乱；从赭时到飒秣建国行程及里程也颇多疑问，飒秣建国以西里程也是不足凭信。相形之下，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碎叶至布哈拉的行程及里程更为可信。

3. 玄奘所记中亚行程和诸城里程，与《隋书》、《新唐书》有关记述有很大出入，而后者记述相对准确一些。这说明《新唐书》编修者并没有不加分辨地采用玄奘之说。古人也许已经意识到玄奘之误了。

4. 碎叶——怛逻斯段行程，穆斯林所记路线与玄奘所记不一，而与贾耽所言大体一致。贾耽的某些记述，胜于玄奘。但贾耽所记里程数也有错讹，不足一一凭信，留待以后详考。从玄奘与穆斯林舆地学家及贾耽所记不一来看，碎叶至怛逻斯的交通路

线曾发生变化,7 世纪的交通路线与 8 世纪的有所不一。这很可能与西突厥十姓故地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

注释

- [1] 敦煌写本残卷 S.2659 作百余里,参见《大唐西域记古本三种》,向达辑,中华书局 1981 年,第 12 页。
- [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作《慈恩传》)卷一,作百余里。
- [3] “西南”,《慈恩传》作“西”。
- [4] S.2659 作百余里。
- [5] 《大唐西域记》卷一。据季羨林、张广达等《大唐西域记校注》本(以下称《校注》),中华书局 1985 年。
- [6] 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 年第 3 期,第 119~140 页。
- [7] V.Minorsky, *Tamim ibn Bahr's Journey to the Uyghurs*. BSOAS, XII - 2, pp.275~305, p.292 note 1, London, 1948.
- [8]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中译本(以下称胡尔达兹比赫书),宋岷译,第 30~31 页,中华书局 1991 年(附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法尔萨赫(Farsakh)是古波斯及阿拉伯路程单位名。《伊斯兰百科全书》英文第一版,第 3 卷,第 70 页(莱顿,1927 年)云,1 法尔萨赫为马走 1 小时的路程,1 波斯法尔萨赫约合 6.232 公里,1 阿拉伯法尔萨赫为 5.763 公里;同书第二版(莱顿,1983 年),第 2 卷,第 812~813 页称,伊斯兰时期 1 法尔萨赫为 5.985 公里,现代 1 法尔萨赫为 6 公里。宋岷认定,1 法尔萨赫约合 6.24 公里(胡尔达兹比赫书,第 1 页中译注 3)。张广达先生说,中古 1 法尔萨赫约为 6 公里(参见《碎叶城今地考》,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 5 期,第 70~82 页)。章巽先生认为,法尔萨赫折合今制很不规则,约为 3.7~6.7 公里(参见章巽、芮传明《大唐西域记导读》,第 30 页,巴蜀书社 1989 年。以下作《导读》)。考虑到古代道里较为迂曲,以及宋岷先生意见,本文把 1 法尔萨赫折算为 6.24 公

里。

- [9] E. Bretschneider, *Medi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 (《中世纪东亚史料研究》), Vol. II, p. 94. London, 1967. V. V. Barthold, *Four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中亚史研究四种》), Vol. III, p. 77. Leiden, 1962. 按: 从今代地图上看, 赛拉姆位于奇姆肯特之东南, 而非正东方。又按: 宋岷认定白水城在今奇姆肯特城。参见胡尔达兹比赫书, 第 30 页中译注 2。丁谦认为, 白水城在咀逻斯(奥利阿塔, 今名江布尔)西南, 今名曼特肯城, 城滨阿克苏河; 阿克苏, 译言白水也; 恭御城未详。参见《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 第 3 页, 《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二集, 1915 年。关于此说之误, 详见本文“斡赤建”考。
- [10] 别连尼茨基等:《中亚中世纪城市》俄文本, 第 195~198 页, 列宁格勒 1973 年。(A. M. Беленицки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Город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Ленинград, 1973.)
- [11] 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
- [12] 周连宽:《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以下称《丛稿》), 中华书局 1984 年, 第 97 页。
- [13] 此记有误。苏对沙那并非汉代贰师城地。参见岑仲勉:《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 289 页之考订, 中华书局 1981 年。
- [14] J. Marqart, *Wehrot und Arang* (《乌浒水与那密水考》), pp. 81, 162, Leiden, 1938. 引自《校注》, 第 86~87 页。V.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迄至蒙古入侵的突厥斯坦》, 以下作《突厥斯坦》), p. 166, London, 1977. 马迦特、巴托尔德均认为, 苏对沙那国治在今乌拉秋别。刘迎胜先生认为, 唐代苏对沙那城遗址在今乌拉秋别市一高地上, 该城延续时间从公元 5~10 世纪。后来苏对沙那统治中心由此南迁 25 公里, 人们在那里

- [17] *Hudud al - Alam*, pp.22, 112. London, 1970. 另参见《突厥斯坦》，第98页。
- [18] 同[8]书，第28页，及该页中译注4。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宋峴译，中华书局1991年。以下称古达玛书），第216页说，开尔米尼亚西距布哈拉14法尔萨赫。另参见《突厥斯坦》，第98页。
- [19] 《新唐书》，第6245页。
- [20] 引自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28页注二，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年。
- [21] 参见刘迎胜：〈“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
- [22] 古达玛书，第215~216页。
- [23] 〈“草原丝绸之路”考查简记〉。
- [24] 内田吟风：〈吐火罗国史考〉，中译文载《民族译丛》，1981年第2、3期。
- [25] G. Clauson, *Ak Beshim—Suyab*. JRAS, No. 1, 1961, pp. 1~13. 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
- [26] 《丛稿》，第88页。周连宽：〈唐代西域裴罗将军城考〉，《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
- [27] 引自《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第1149页，中华书局标点本。
- [28]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12页。
- [29] 《丛稿》，第88页。
- [30] 参见《校注》所附地图。
- [31] 伯希和：〈玄奘记传中之千泉〉，参见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五编，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5~6页。
- [32] 参见《导读》，第122页。
- [33] 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中华书局1958年，第8页。
- [34]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0页。
- [35] 古达玛书，第217页。
- [36] 丁谦：《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第3页。
- [37] 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陈俊谋译，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344页；木村日纪、小林元、松田寿男合编：

《中央亚细亚史、印度史》附新旧中央亚细亚要图，昭和 15 年，东京，平凡社。引自《丛稿》，第 103 页注释 29。

- [38] 参见《碎叶城今地考》。
- [39] 引自《导读》第 122 页。梅尔克至比什凯克里程，《导读》称有 120 公里；刘迎胜先生实地考察，称公路里程为 100 余公里。参见《“草原丝绸之路”考察简记》。
- [40] 《丛稿》，第 91 页。
- [41] 林梅村：《西突厥汗庭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 年 3 期，第 82~87 页。
- [42]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 31 页。
- [43] 同上书，第 31~32 页。
- [44] 《新唐书》卷二一五下，页 6056。
- [45] 《校注》，第 80 页注释（一）。
- [46] 《丛稿》，第 97 页。
- [47] 道宣：《释迦方志》，第 22 页，范祥雍点校本，中华书局 1983 年。
- [48] Thomas Watters,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大唐西域记》英译本) Vol. I, p. 84. London, 1904.
- [49]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 30~31 页。
- [50] 同上；另参见古达玛书，第 216~217 页。
- [51] 此推测乃吸收黄时鉴师意见。
- [52] *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 Vol. I, p. 75~78.
- [53] 《校注》，第 81~82 页；《导读》，第 29, 126 页。努舍疆 (Nushajan) 之名，早在 1889 年即被托玛舍克 (W. Tomaschek) 订正为八儿思罕，也即拔塞干 (Barskhan)。参见托玛舍克《评德·胡耶撰《论思戈与玛果戈墙》一文》，载《维也纳东方学杂志》第 3 卷，第 103~108 页，转引自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注释 17。按：此努舍疆指上努舍疆，而非下努舍疆。另据苏北海先生研究，“拔塞干”之名是由西突厥弩失毕五俟斤中的拔塞干噉沙钵俟斤之名而来的。参见苏北海：《中亚塔拉斯——江布尔地区的历史演变》，载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85~306 页。冯承钧先生也认定新城即斂赤建（弩室羯），也即《新唐书·地理志》

- “姑墨州都督府”条之弩羯城。参见冯承钧《西域地名》，中华书局1982年，第69页。
- [54]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0~31页，及31页中译注4。
- [55] 《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第3页。
- [56] 《新唐书》，第6233，6260页。
- [57] 《中亚中世纪城市》俄文本，第198页。
- [58] 《丛稿》，第97页。
- [59] 《导读》，第29页。
- [60] 《新唐书》，第1150页。
- [61]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云，奈瓦契特至碎叶城（Kubal）3法尔萨赫；古达玛则说有4法尔萨赫。参见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2页；古达玛书，第218~219页。关于下努舍疆，尚可参考下列阿拉伯地理学家著述：Istakiri, *BGA*, i, 328~331; Mukaddasi, *BGA*, iii, 48, 264~265。
- [62] 《碎叶城今地考》。
- [63] 主要据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8~35页。宋岷云，拜坎德（Baykand）为《隋书》卷八三之毕国，《新唐书》卷二二一之毕。参见第28页中译注3。
- [64] 布哈拉至拜坎德里程，据古达玛书第215页增补。
- [65] 关于唐代里程长度的不同换算，《丛稿》第101~102页注释8有详细介绍。
- [66] 胡戟：《唐代度量衡与亩里制度》，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第34~41页。
- [67] 闻人军：《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载《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第122~132页。
- [68] 《丛稿》，第122页。
- [69] 《校注》所附“玄奘西行路线图一”；《丛稿》第120页；另参见《大唐西域记地理考证》，第4页。
- [70] 《丛稿》，第101页注解8，第120页。
- [71]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32页；古达玛书，第219~220页。
- [72] 《校注》，第91页。

-
- [73] 《隋书》，第1850页，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
- [74] 《校注》，第91~92页；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9页中译注3。
- [75] 《导读》，第30页。
- [76]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8~29页。
- [77] 《新唐书》，第6245页。
- [78] 同上书，第28~29页。
- [79] 古达玛书，第215页。
- [80] 丁谦：《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第14页，《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1915年。
- [81] 胡尔达兹比赫书，第27~28页；古达玛书，第215~216页云，木鹿至布哈拉有58.5法尔沙赫（约合365公里）。
-

第二章 8~10 世纪中西陆路交通

——《新唐书·地理志》考辨

公元 8~10 世纪，中亚通往中国之路与玄奘西行时有所不同。而且，中亚九姓胡东来之路，与汉人西行东还之路也有所不同。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和《新唐书·地理志》等文献记述了这个时期中西陆路交通路线的变化。这些记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时期中亚九姓胡与唐朝的交往的途径及其相互认识。

一、阿拉伯-伊斯兰舆地文献之记述

公元 8~10 世纪，中亚到中国的道路起于呼罗珊的木鹿 (Merv, 又译作谋夫)。这条道路又称大呼罗珊路。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Ibn Khordādhbeh, 或作 Khurradad-hbih)、古达玛 (Qudāmāh) 等详细记述了这条道路的走向。即：

从谋夫至阿穆勒 (Amāl, 有 36 法尔萨赫路程；1 法尔萨赫约合 6.24 公里)，渡过乌浒水 (阿姆河)，到布哈拉 (阿穆勒到布哈拉路程，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有 19 法尔萨赫，古达玛称有 22.5 法尔萨赫)^[1]，顺“王道”经库克 (Kūk, 距布哈拉 10 法尔

萨赫)至撒马尔罕(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布哈拉至撒马尔罕 39 法尔萨赫;古达玛说,两地相距 37 法尔萨赫)^[2],再东至位于荒野(沙漠)中的扎敏(Zāmīn, 17 法尔萨赫);从扎敏道分两叉,一条通向石国(赭时)、突厥,另一条通向拔汗那。

通石国之路从扎敏出发,渡赭时(石国)河、“突厥河”至赭时(即石国,今塔什干)。撒马尔罕至石国 42 法尔萨赫,扎敏至石国 25 法尔萨赫。从石国至银矿(即伊腊克 [Ilāq] 和比良坎克 [Bilānkank] 两地) 7 法尔萨赫,再至铁门(Bāb al-Hadīd, 2/3 法尔萨赫),至库巴勒(Kubāl, 2 法尔萨赫)^[3],再至鹤尔凯尔德(Gharkard, 6 法尔萨赫)、白水城(Isbijab, 4 法尔萨赫),然后经沙拉布(Shārāb, 4 法尔萨赫)、白都贺开特(Badūkhkat, 5 法尔萨赫)、台姆塔吉(Tamtāj, 4 法尔萨赫)到艾巴尔伽介(Abārjāj, 即千泉? 4 法尔萨赫),过“河上旅馆”(Manzil 'alāal-Nahr, 6 法尔萨赫),渡白尔库阿布河至久维克特(Juwikt, 5 法尔萨赫),再到怛逻斯(Tarāz, 3 法尔萨赫)^[4]。从石国至怛逻斯凡 50.7 法尔萨赫,约合 316 公里;从白水城至怛逻斯计 31 法尔萨赫^[5],约合 193.4 公里。

上述诸地,千泉是疑问之处。千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 Abārjāj,他称此地有丘冈,环丘冒出水泉千眼,汇为东流之河;人们在此地猎取黑雉。此地位于怛逻斯城以西 14 法尔萨赫(约合 175 华里),在怛逻斯与白水城之间,距白水城 17 法尔萨赫(约 212 华里)。古达玛把千泉记为 Bārjaj;关于其方位和道里,古达玛所记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相同。而玄奘则说:千泉位于怛逻斯城以东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唐里处(约合 124~133 华里),千泉往东四百余唐里至素叶水城(即碎叶);“千泉者,地方二百余里,南面雪山,三陲平陆。……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来避暑”^[6]。由此可见,玄奘所记与阿拉伯地理学家之记是不同的。

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公里)

玄奘所记(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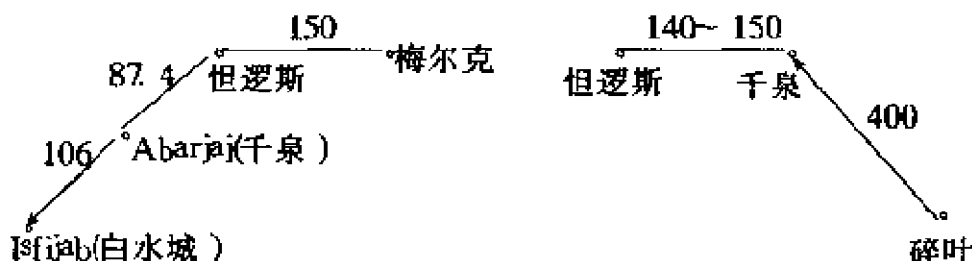


图 7

笔者认为玄奘所言千泉在今哈萨克斯坦的梅尔克 (Merke, 即阿拉伯地理著述中的 Mirkī 或 Bārkin) 附近, 与伊斯兰舆地学家所记 Abārjāj (或 Bārjaj) 不是同一地 (详见第一章第二节考辨)。梅尔克至江布尔城的实际里程, 比玄奘所记千泉至咀逻私 (但逻斯) 城里程多出 167~176 华里, 比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白尔钦至但逻斯里程 (21 法尔萨赫) 多 38 华里左右。后者所记与实际里程较为相近。

从但逻斯又分两道: 一道至库卧义开特 (Kwaykat, 至此地 7 法尔萨赫。《塔米姆行纪》记为 K. Wāk. b, 为 Kīmāk 人——即寄蔑人居留之地)^[7], 然后走 80 天至开义玛克王国 (Mulk Kaymāk, 即寄蔑, 位于巴尔喀什湖西北方); 另一道从但逻斯至下努舍疆 (Nashajan al-Sufla, 有学者将其比定为《新唐书·波斯传》之弩室羯城, 又曰小石国城, 《大唐西域记》作笈赤建国。因时代变迁, 地域或有变动, 9~10 世纪该城距但逻斯 3 法尔萨赫)^[8], 再经开苏里巴斯 (Kasrī Bās, 2 法尔萨赫, 这是一块热地, 葛逻禄人在此过冬)^[9]、库勒晓伯 (Kul Shawb, 4 法尔萨赫)、吉勒晓伯 (Jil Shawb, 4 法尔萨赫)、俱兰村 (Kūlān, 4 法尔萨赫)、白尔钦村 (Barkīn, 4 法尔萨赫。松田寿男认为, 此地为古之千泉)、艾斯白拉 (Asbarah, 4 法尔萨赫, 即阿史不来城, 属石国, 山中产绿松石)、努兹开特 (Nūzkat, 8 法尔萨赫)、

胡兰杰瓦 (Khuranjawân, 4 法尔萨赫) 村镇、久勒 (Jûl, 4 法尔萨赫, 学者比定为今伏龙芝附近克留切夫废墟)^[10]、萨利赫村 (Sârigh, 7 法尔萨赫, 有学者比定为伏龙芝东 33~34 公里的克拉斯诺列契村边的废墟)^[11], 到达突骑施 (al-Tunkashî) 的可汗城 (Madînat Khâqân, 4 法尔萨赫。古达玛称此地为突厥可汗村)^[12], 再至奈瓦契特 (Nawâkit, 4 法尔萨赫, 该地位于楚河河谷上游)^[13]、库巴勒 (Kubâl, 3 法尔萨赫, 即碎叶城, 故址在吉尔吉斯斯坦之托克玛克西南 8~10 公里的阿克·贝欣废墟)^[14], 然后东行至上努舍疆 (即上拔塞干、八儿思罕 [Barskhan])^[15], 它是中国的边界。由碎叶 (库巴勒) 到中国边界 (上努舍疆), 驼队走 15 天, 突厥邮差仅用 3 天即可跑完这段路。从怛逻斯至碎叶城, 全程 59 法尔萨赫, 约合 368 公里^[16]。

以上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记述。古达玛则记述了另一条道路, 即: 从赭时出发, 经过军营 (Mu 'askar, 2 法尔萨赫)、鹤尔凯尔德 (Gharkard, 5 法尔萨赫, 位于沙漠中)、艾斯比沙卜 (Asbîshâb, 4 法尔萨赫)、沙拉布 (Shârâb, 4 法尔萨赫, 位于沙漠中, 该地有两条大河, 即 Mawâ 河及 Yûran 河), 乘小船至白杜贺开特 (Badûkhkat, 4 法尔萨赫)、台姆塔吉 (Tamtâj, 5 法尔萨赫) 及巴尔伽吉 (Bârjâj, 4 法尔萨赫, 即千泉), 再至白尔库阿布 (Barkûâb) 河的河上旅舍 (6 法尔萨赫), 渡河至右岸 (南岸), 然后至沙窝格尔 (Shâwaghar, 3 法尔萨赫)、久维克特 (Juwîkt, 2 法尔萨赫) 及怛逻斯 (2 法尔萨赫)。从巴尔伽吉 (千泉) 至怛逻斯凡 13 法尔萨赫, 约合 81 公里。从怛逻斯城可到下拔塞干 (Nûshajân al-Asfal, 3 法尔萨赫), 再到群山中的开苏里巴斯 (Kasribâs, 2 法尔萨赫), 其地之左侧 (北方) 为古姆 (Qurnn), 古姆是葛逻禄国的第一个去处, 从古姆至开义玛克 (Kaymâk) 国边界 2 法尔萨赫。

古达玛又记: 从开苏里巴斯经库勒晓伯 (Kûl Shawb, 4 法

尔萨赫), 至俱兰 (Kūlān, 4 法尔萨赫, 位于沙漠中, 但逻斯到此地 14 法尔萨赫)^[17], 然后过富庶大城白尔钦 (Barkī, 4 法尔萨赫) 至阿史不来城 (Asbarab, 4 法尔萨赫), 再至大城努兹开特 (Nūzkat, 8 法尔萨赫)、胡兰杰瓦 (Khuranjawān, 4 法尔萨赫)、久勒 (Jūl, 4 法尔萨赫)、萨利赫 (Sārigh, 7 法尔萨赫), 然后到突厥可汗村 (Qaryatu Khāqān al-Turkiyyi, 4 法尔萨赫)^[18], 过开义尔米布拉卧 (Kayrmibrāw, 2 法尔萨赫)、奈瓦契特 (Nawākit, 2 法尔萨赫) 大城、班吉卡 (客) 特 (Banjikt, 2 法尔萨赫) 镇, 再至碎叶水城 (2 法尔萨赫)。奈瓦契特有大路通向上拔塞干 (1 法尔萨赫), 此大路名为泽卡特 (原文作鲁凯布, 张广达先生据加尔迪齐书校改——引注)。碎叶水 (Sūyāb) 城乃是两个镇, 一个叫“库巴勒” (Kubāl), 另一个叫“萨虎尔·库巴勒” (Sāghūr Kubāl)。从萨虎尔·库巴勒到上拔塞干, 驼队在有牧草和水源的路上行走 15 天 (约 75 法尔萨赫——引注), 突厥驿骑可用 3 天跑到。上拔塞干位于中国边界^[19]。

值得注意的是, 据古达玛所记, 萨虎尔·库巴勒往东走到上拔塞干, 要走 15 天; 往西退回到奈瓦契特, 再到上拔塞干仅有 5 法尔萨赫 (31.2 公里)。按: 奈瓦契特到位于伊塞克湖东南岸的上努舍疆 (即上拔塞干), 无论如何也不止 1 法尔萨赫路程。古达玛此处记述看来有误。

据古达玛记述, 通拔汗那 (费尔干纳) 的道路具体走向为: 从扎敏出发, 经萨巴特 (Sābāt, 2 法尔萨赫)、俱战提 (Khujandah, 10 法尔萨赫, 即今塔吉克斯坦苦盏市, 原列宁纳巴德), 然后又分为两叉, 一路通向石国和银矿 (伊腊克和比良坎克), 另一路途经沙姆葛尔 (Sāmghar, 5 法尔萨赫)、哈吉斯坦 (Khājistān, 4 法尔萨赫, 此地产盐, 石国、俱战提的食盐均出自该地)、土尔木甘 (Turmuqān, 6 法尔萨赫,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作 7 法尔萨赫)、巴布 (Bāb,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写作 Madi-

natu Bāb, 意为“门”城, 3 法尔萨赫), 再至拔汗那城 (又称 Akhsikt, 4 法尔萨赫)^[20]。然后从拔汗那到固巴 (Qubā, 10 法尔萨赫) 城、窝什 (Ush, 10 法尔萨赫, 即今吉尔吉斯斯坦奥什城。宋岷认为, 它就是汉代的贰师城^[21]) 及乌兹坎德 (Uzkand, 即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根城, 靠近中国边界), 再走 2 天 (约 10 法尔萨赫) 到艾特巴什 (Atbāsh, 《元史·西北地附录》作阿忒八失, 其名存至今, 今译阿特巴希), 艾特巴什城位于吐蕃和拔汗那之间的高原 (即葱岭, 帕米尔高原) 山路上, 从这儿走 6 天不见人烟的山路到上努舍疆 (上拔塞干), 从上努舍疆至“土胡兹胡尔” (al-Tughuzghur, 又译托古兹古思, 即九姓乌古斯, 回鹘人的一支) 可汗的地界有 6 天行程^[22];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则说, 从上努舍疆至土胡兹胡尔可汗都城有 3 个月行程, 该城有 12 座铁门, 许多人信奉袄教, 该城左边 (即北方) 是开义玛克王国, 该城距中国 300 法尔萨赫 (约 1872 公里)^[23]。

二、贾耽《皇华四达记》之记述

《新唐书》卷 43 下《地理志下》摘录了唐德宗贞元年间 (785~805) 宰相贾耽所撰《皇华四达记》, 记载了由安西入碎叶、怛逻斯的道路。贾耽记述:

安西西出柘厥关, 渡白马河, 百八十里西入俱毗罗磧。经苦井, 百二十里至俱毗罗城。又六十里至阿悉言城。又六十里至拔换城, 一曰威戎城, 曰姑墨州, 南临思浑河。乃西北渡拔换河、中河, 距思浑河百二十里, 至小石城。又二十里至于祝 (原作于闐, 讹矣——引注) 境之葫芦河。又六十里至大石城, 一曰于祝, 曰温肃州。又西北三十里至粟楼

烽。又四十里度拔达岭。又五十里至频多城，乌孙所治赤山城也。又三十里渡真珠河，又西北度乏驿岭，五十里渡雪海，又三十里至碎卜戍，傍碎卜水五十里至热海。又四十里至冻城，又百一十里至贺猎城，又三十里至叶支城，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24]。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自碎叶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逻斯城^[25]。

在上述记载中，安西至热海（伊塞克湖）段学者研究甚多^[26]，勿庸多言。《新唐书·地理志》行文过简，有从略之弊，所记里程总数往往偏少。《太平寰宇记》卷 156 “安西大都护府”条记：安西至碎叶总里程为一千九百六十里；而《新唐书·地理志》所记仅有一千一百里。对后者之谬，岑仲勉先生早有考辨。关于热海以西里程，仍有不少讹误和疑点，实有探究之必要。而探究里程，首先要明了唐代里程长度。

关于唐代里程长度，学者歧异较多^[27]。专治中国科技史的闻人军先生考订，一唐小里等于 442.905 米，与隋里相同；一唐里等于 531.486 米；天文大地测量及道里记载，一般用唐小里^[28]。照此推算，五十唐小里约合 44.29 华里。玄奘和贾耽等所记之“里”，应是唐小里。笔者同意此考。而周连宽先生则认为，1 公里等于 2.558 古汉里，唐里与古汉里相同，即 1 古汉里等于 0.3909 公里^[29]。此说备考。

里程长度既明，则可考里程记述当否。碎叶至热海之距离，贾耽记为二百八十（唐）里（约合 248 华里），再加上叶支城至碎叶川口这段距离。查碎叶（阿克·贝欣废城）至伊塞克湖最西端之距离，约为 110~120 公里，与贾耽所记大体符合。《大唐西域记》则把这两地之距记为五百余里（详见第一章讨论）。

贾耽称裴罗将军城（即托克玛克以南约 15~16 公里处的布拉纳废城）与碎叶城相距二十里（17.7 华里），这与今日考古所证两城相距 12~14 华里之数略有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唐代交通路线较为迂回之故。关于十姓可汗在碎叶城北四十里羯丹山立君长之史实，也为加尔迪齐（Gārdizi）所证实^[30]。

米国城则难以确定。《唐书》所记米国，《大唐西域记》作弭秣贺（位于飒秣建国东南），冯承钧指定该国治在今撒马尔罕东南 96.5 公里的模安（Maghiar）^[31]。然撒马尔罕至碎叶里程约有 945 公里。贾耽所言米国城难与玄奘所记弭秣贺国相等同。其中原因，或是贾耽所记有误，或是米国城与弭秣贺实属两地。从地望上看，贾耽所言米国城似指加尔迪齐所指出的胡特科雅勒（古达玛作胡特科帕勒）村，该村距碎叶城 1 法尔萨赫，约 12.5 华里；该村首领出身于突骑施部^[32]。也可能米国城是指碎叶以西的班吉克特（Banjikt）大镇，该镇东距碎叶 2 法尔萨赫（约 25 华里），西距“奈瓦契特”（Nawakit）城也是 2 法尔萨赫^[33]。

至于“新城”，也是一个颇多疑问的地方。《新唐书》卷 221 下《西域传》记曰：“新城之国。在石东北羸百里，有弩室羯城，亦曰新城，曰小石国。后为葛逻禄所并。“弩室羯城，玄奘称之为笈赤建国（在恭御城以南四五十里）。季羨林、冯承钧等认为，新城即弩室羯城（笈赤建城），为穆斯林地理文献中的 Nujakath、Nujiakth 或 Nūjakth 之对音；Nujakath 即下努舍疆，苏联考古学者将此城比定为塔什干地区的汗阿巴德（Ханабад）^[34]。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皆称，下努舍疆在怛逻斯以东 3 法尔萨赫（18.7 公里）。实际上，“努舍疆”（Nushajan）之拼法，与 Nujakath（Nujikath）尚有较大差异。贾耽所言之“新城”，距碎叶城四十里左右（35.2 华里），正与穆斯林作者所言之碎叶城以西 3 法尔萨赫（18.7 公里）的奈瓦契特（Nawakit）城地望相当^[35]。因此，张广达老师也曾认为，奈瓦契特大城即新城；

Nawākit, 意为“新城”^[36]。值得注意的是, 古达玛也记述, 从碎叶西行至奈瓦契特, 再顺鲁凯布 (或泽卡特) 路走 1 法尔萨赫 (6.24 公里) 可至“上”努舍疆^[37]。也许贾耽把这个努舍疆混同为“新城”了。不管怎样, 贾耽所言之新城与玄奘所称之笪赤建国不是同一地方, 这是可以肯定的。

从新城至阿史不来城的区间里程和路线, 《新唐书》与穆斯林著述相差甚远。两地之间有众多河流, 直线距离也在 370 华里以上。贾耽所记两地里程百十唐里 (约合 97.5 华里), 肯定有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把这两地里程记为 31 法尔萨赫 (约合 387 华里), 与今日里程大体相当。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之久勒城 (距阿史不来城 16 法尔萨赫), 德国学者托玛舍克 (W. Tomaschek) 勘同为今吉尔吉斯斯坦伏龙芝; 伏龙芝距阿史不来城 (Asbarah) 93 公里, 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 (99.8 公里) 大致相符。萨利赫 (克) 村距久勒 4 法尔萨赫 (约 25 公里), 苏联考古学者比定为今伏龙芝东南 33~34 公里处的克拉斯诺列契村 (红水村) 边废城^[38],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里程比今日里程少 8~9 公里。由此看来, 新城至阿史不来城之路线及里程, 以穆斯林地理学家所记较为准确。

至于贾耽所言顿建城 (东距新城六十唐里, 西至阿史不来城五十里), 很难在穆斯林地理著述中勘同。在奈瓦契特以西 4 法尔萨赫的突厥可汗村 (城), 似与顿建城地望相若。“顿建”可能指某个突厥小可汗。而贾耽所称的税建城, 距怛逻斯仅五十里。从距离上看, 该城当指下努舍疆 (下拔塞干); 但下努舍疆在《新唐书·波斯传》中记为弩室羯城。因此, 此税建城不知贾耽所指何处。

阿史不来城因阿史不来河 (至今仍称此名) 而得名。该城至俱兰里程,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均谓 8 法尔萨赫 (约合 100 华里), 贾耽则称仅有七十唐里 (约合 62 华里)。贾耽所记

肯定有误。古达玛说：从怛逻斯城至沙漠中的俱兰（Kūlān），全程为 14 法尔萨赫（87.4 公里），此沙漠及其边缘也被称作俱兰；……从俱兰至沙漠中的阿史不来城为 8 法尔萨赫（约 50 公里），阿史不来城位于俱兰沙漠的边缘上^[39]。据此记述，俱兰城当在今日莫因库姆沙漠西南边缘的阿克尔托别城附近。

必须指出的是，《新唐书》记有两个俱兰。一为贾耽所言之俱兰，沙畹认为即大食人之 Kulan，位于 Tarty 附近^[40]。天宝元年（742 年），突骑施可汗阿史那昕即在碎叶西南的俱兰城为莫贺咄所杀^[41]。另一个俱兰，为 Kouran 之对音，位于 Kokcha 河上游。《新唐书·西域传》记载：“俱兰，或曰俱罗弩，曰屈浪弩，与吐火罗接，环地三千里，南大雪山，北俱鲁河。”^[42]龙朔元年（661 年），唐朝在石汗那国（Saghaniyan）艳（豔）城置悦般州都督府，领双靡州，以俱兰城置^[43]。沙畹认为，悦般州都督府治即在俱兰，位于今阿富汗科克恰河（Kokcha）上流^[44]。而冯承钧则把石汗那比定为中亚阿姆河北支流苏尔汉（Surkhan）河上游，今名迭脑（Denau，意为新村），并认定唐双靡州治俱兰城，其对音为 Kourana^[45]。迭脑（迭纳乌）位于塔什干西南、撒马尔罕东南，肯定不当阿史不来城至怛逻斯城之道。实际上，悦般州都督府治在艳城，而不在俱兰；俱兰（Kouran）为双靡州治所在地。

另外，据唐乾陵石雕“蕃臣像”的衔名，唐朝曾以西突厥阿悉吉厥部置俱兰（州？）都督府^[46]。吴玉贵等认为，此俱兰都督府治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卢格沃伊附近^[47]。但是，我们从地望上看，俱兰都督府应即 Kulan，位于 Tarty 附近。卢格沃伊当是阿史不来城，而不是俱兰都督府所在地。

三、其它汉籍所记西行道路

《新唐书》卷 40《地理志》“北庭大都护府”条介绍了自庭州西行至碎叶的大道（《元和郡县图志》卷 40“庭州”条称之为“碎叶路”）：

（庭州）西六十里有沙钵城守捉，又有冯洛守捉，又八十里有耶勒城守捉，又八十里有俱六城守捉^[48]，又百里至轮台县，又百五十里有张堡城守捉，又渡里移得建河，七十里乌宰守捉，又渡白杨河，七十里清镇军城，又渡叶叶河，七十里叶河守捉，又渡黑水，七十里黑水守捉，又七十里东林守捉，又七十里西林守捉。又经黄草泊、大漠、小碛，渡石漆河，逾车岭，至弓月城。过思浑川、蛰失蜜城，渡伊丽河^[49]，一名帝帝河，至碎叶界。又西行千里至碎叶城，水皆北流入碛及入夷播海。（从庭州至碎叶凡一千八百九十里——引者统计。）

根据上述记述，结合《资治通鉴》卷 119《高宗纪》永徽二年七月胡三省注，以及《元和郡县图志》卷 40“庭州”条记述，我们可以推断唐代庭州至碎叶的路线及里程。《资治通鉴》卷 199 胡三省注云：“弓月城在庭州西，千有余里。”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 40“庭州”条称：庭州“西至碎叶二千二百二十里。”这样，庭州至弓月城千余（唐）里（886 余华里），弓月至碎叶城约一千二百里（1063 华里）。从布哈拉出来的道路，到了碎叶后又延伸至唐代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国庆乡护堡子旧城遗址）^[50]，与丝绸之路北道相连。从庭州出发的碎叶路，显然比安西——碎叶道（据《太平寰宇记》卷 156，此道里程一千九百六

十里)要远二百六十唐里左右。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吉甫把沿天山北麓西行的庭州——碎叶道称为“碎叶路”,而不称安西至碎叶道为碎叶路,尽管后一条道路要近得多。看来,从庭州出发西行的通道是唐代中后期中国通往碎叶的官道。

在穆斯林地理学家笔下,往东的道路东端总凑碎叶,然后往东北和东南分道。而玄奘、贾耽所记西行路线,也都必经碎叶。因此,碎叶为中亚通往中国道路的咽喉,其地位与敦煌几同。

自8世纪开始,中国人往返中亚,大多取丝路中道、南道进出葱岭。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新罗僧慧超由天竺取道中亚返归安西。慧超由康国(撒马尔罕)往东回返路线为:康国——跋贺那国——骨咄国——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胡蜜国,东行十五日——过大播蜜川——葱岭镇,步行一月——疏勒国——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安西大都护府)——焉耆国^[51]。

跋贺那,即跋贺那,又作拔汗那,即费尔干纳。

骨咄,应是Khottal之对音,《大唐西域记》作珂咄罗,位于护沙河(Wakhsh)与喷赤河(Pandj)之间,其主城为库罗勃(Kulub),在今杜尚别市东南。日本学者长泽和俊把骨咄国比定为今库利亚布附近^[52]。慧超说,骨咄国王原是突厥种族;此国以北是突厥所住境界。玄奘称:“珂咄罗国……东接葱岭至拘谜陀国。”^[53]

吐火罗国,《大唐西域记》作覩货逻。《新唐书·西域传》称:“吐火罗……居葱岭西、鸟浒河之南,古大夏地。……大夏即吐火罗也。”据日本学者内田吟风研究,唐初以后的吐火罗国为突厥族所建,其都城在昆都士(Qunduz,《大唐西域记》作活国)附近的阿缓小城(War-Waliz)^[54]。

拘谜陀国即穆斯林地理书中的Kumādh,其中心城市是位于奥克萨斯河弯曲部的卡拉·依·胡姆。

胡蜜国,《新唐书·西域传》及《悟空行纪》作护密、护蜜,

《西域记》作达摩悉铁帝国，在今阿富汗东北部的瓦罕（Wakhan）溪谷，其都城塞迦审城被长泽和俊比定为阿姆河弯曲处西南方的伊什卡希姆^[55]。

大播蜜川，《西域记》作波谜罗川，即帕米尔川，为帕米尔高原（葱岭）上的八大平川之一，也即与帕米尔河汇合西流的奥克斯斯河上游，又称喷赤河^[56]。葱岭镇，即葱岭守捉。贾耽《入四夷道》记述：“自疏勒西南入剑末谷、青山岭、不忍岭，六百里至葱岭守捉，故羯盘陀国。”^[57]羯盘陀国在蒲犁（塔什库尔干）以西。

慧超归国路线是从拔汗那往西南至昆都士，再往东走。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则是从拔汗那直接往东行。看来，慧超所走之路并不为阿拉伯地理学家所熟悉。贞元年间（785—805）悟空、宋乾德四年（966 年）行勤等都是经由于阗、塔什库尔干而进出的。

安史之乱后，河西为吐蕃所占，西域通中原之路为避吐蕃势力而改取回鹘（鹘）道。贞元二年（786 年），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等就是假道回鹘，得至长安^[58]。贞元五年（789 年）悟空自西天（印度）返国，也是经于阗到安西，再到北庭，取回鹘路归返中原^[59]。

自晚唐大中年间（847—859）甘州回鹘与中原通使后，直至宋朝初年，朔方道之灵州取代了河西道南段。敦煌文书〈西天路竟〉（S.0338，黄盛璋认定此文书写于宋乾德四年，即公元 966 年）^[60]，和田塞语文书〈使河西记〉（写于 925 年），高（平）居海《于阗（国）行程录》（又称《居海记》，当写于出使归返之年，即 942 年后不久）^[61]，都证实了这一点。为求近便，人们有时也走夏州入回鹘道。宋太平兴国六年（981 年）王延德使高昌，就是自夏州渡河，经沙碛，历伊州，至高昌；从夏州至龟兹需 90 天^[62]。

穆卡迪西在谈及中亚各地输出商品种类时,提到“从突厥斯坦和胡塔梁(即骨咄)往这些地方(指中亚各地)赶来马和骡”^[63]。显然,从河中到骨咄的通道一定为当时一些中亚商人所知晓。但奇怪的是,伊斯兰地理学家对这条通道没有详细记述。估计当时中亚很少有人走费尔干纳——骨咄——葱岭——疏勒(或于阗)这条线。这至少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中亚粟特人在传统上一直向突厥草原进行殖民活动;二是喀喇汗王朝的兴起。

早在伊斯兰前时代,粟特人就开始了向突厥草原的殖民活动,建立了众多的商业殖民点。从6世纪开始,粟特人进一步向东深入,沿丝绸之路在罗布泊地区和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以及沙州、凉州、六胡州(灵州、夏州以南之地)和内蒙诸地建立了粟特人聚落^[64]。9世纪以来,河中穆斯林仍继续粟特人的殖民传统,在锡尔河下游修建了三座伊斯兰城市,即毡的(在锡尔河右岸,今哈萨克斯坦克孜尔奥尔达东南)、库瓦拉和养吉干(其废城名为詹干特)。这些移民城市和殖民聚落对扩大河中地区对东方的贸易起了很大作用。锡尔河流域的粟特殖民聚落有道路通往曳至河(额尔齐斯河),在曳至河岸生栖着游牧和半游牧的奇马克人(钦察人的祖先)和寄蔑人;从曳至河往东,可至黠戛斯人居留的地方^[65]。这些游牧民或半游牧民的生活必需品,就通过河中穆斯林和粟特商人的中介而购得或交换得到。与游牧民的贸易成为萨曼朝(820~999年,“萨曼朝”并不等于“萨曼王朝”)统治时期中亚的大宗贸易。所以,草原之路就相对兴盛。

在萨曼朝崛起时,喀喇汗朝(840~1212年)也在东边兴起,称雄七河地区、伊犁河谷和喀什噶尔地区。喀喇汗王朝建立后,副可汗奥古尔恰克一系(先驻怛逻斯,893年后迁到喀什噶尔)与萨曼王朝交恶。双方在893、904、990、992、996、999年多次交战^[66]。于阗大宝王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佛教国家,与萨

曼王朝关系也较为紧张。公元 939 年（于阗王李圣天同庆二十八年），一位“中国君王”派使者到布哈拉，要求萨曼王朝（874~999）君王纳斯尔二世（914~943）称臣纳贡，被后者拒绝。据马雍研究，这位“中国君王”即于阗王李圣天^[67]。

此外，唐王朝在 907 年灭亡，五代十国割据达 70 多年。战乱兵祸，也对中亚与东方的贸易和交往产生很大影响，严重阻碍了商路的畅通。因此，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 年），喀喇汗（黑汗）王朝使节对宋朝皇帝说：“昔日道路尝有剽掠。”^[68]

这样，传统的敦煌——安西（龟兹）——疏勒（或于阗）——中亚之道就被阻隔。

10 世纪初，契丹（辽）兴起。辽朝除了偶尔在河西走廊用兵之外，对西域一向以友好态度相待。辽在上京特置榷场，从事国际贸易^[69]。而且，在 10 世纪 90 年代前，驻在八剌沙衮的喀喇汗王朝大汗巴兹尔一系与萨曼王朝交好，多次得到后者的支持。两者往来较为密切。这样，传统的草原丝绸之路就进一步发展，延伸至辽朝上京。《辽史》记载，天赞二年（923 年）波斯国来贡；次年，大食国来贡。辖戛斯（即黠戛斯）人也于公元 931、962、976 年多次来人、来贡^[70]。这儿的“波斯国”当指东伊朗语族的萨曼王朝。因为，此时的伊朗语族王朝仅有萨曼王朝。辽朝对来贡者回赐甚多，“至少亦不下四十万贯”^[71]。这种所谓进贡、回赐，其性质与中亚九姓胡对唐朝的朝贡迥然相异，实质上就是商业贸易的一种形式，只是史家记之曰“进贡”罢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公元 9 世纪以前，中亚东来道路西起木鹿（谋夫），东汇碎叶。碎叶为中亚通往中国道路的咽喉，其地位与敦煌不相上下。从碎叶可至安西（龟兹）和庭州，然后东经西州、沙州，沿

河西走廊东至中原。自 9 世纪以降,则主要从碎叶东行,沿天山北麓至庭州,然后走回鹘道至中原或至契丹(辽)辖境。庭州——碎叶道应是该时期唐朝至中亚的官道。

(二)从 8 世纪开始,中国人往返中亚,大多取丝路中道、南道而进出葱岭。具体地说,就是走于阗或疏勒—葱岭—骨咄道。但各种迹象表明,这条通道并不为多数东来中亚诸胡所取。

(三)贾耽所言“米国城”并非《大唐西域记》之“弭秣贺”;贾耽所言之“新城”与玄奘所记之“苾赤建”不能勘合,新城应指穆斯林著述中的奈瓦契特(Nawākit)。贾耽所记新城至阿史不来城区间里程和路线有误,当以阿拉伯地理学家著述为准。

(四)我们必须鉴别汉籍所记两个俱兰城。贾耽所言之俱兰城,当在今日莫因库姆沙漠西南边缘的阿克尔托别城附近;《新唐书·西域传》之俱兰则位于今阿富汗科克恰河(Kokcha)上游。

(五)笔者主张,碎叶以西道路里程以穆斯林地理学家为信,碎叶以东则取中国史籍和出土文书所记较宜。但《新唐书·地理志》等所记里程,不足凭信。从双方所记道里看,穆斯林地理学家的认识比较准确。

注释

- [1]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第 28 页;古达玛:《税册及其编写》(以下作古达玛书),第 215 页。
- [2] 古达玛书,第 216 页。库克镇是突厥王征集军队的地方,经过该镇南边的高山,可至中国。
- [3] 此库巴勒(Kubāl)并非后文论及的碎叶(Kubāl)。因为从塔什干到碎叶,肯定不止 10 法尔萨赫。宋岷考订,1 法尔萨赫约合 6.24 公

里；张广达说，1 法尔萨赫约为 6 公里（参见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 年第 5 期）；《伊斯兰百科全书》第 1 版，第 3 卷，第 70 页（*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iden, 1927）说，1 法尔萨赫为马走一小时的距离，1 波斯法尔萨赫约合 6.232 公里，1 阿拉伯法尔萨赫为 5.763 公里；《伊斯兰百科全书》第 2 版（莱顿，1983 年），第 2 卷，第 812~813 页说，1 法尔萨赫（伊斯兰时期）为 5.985 公里，现代 1 法尔萨赫为 6 公里。本文以 6.24 公里为折算基准。

- [4] 以上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参见《道里邦国志》，第 30~31 页。
- [5] 白水城至怛逻斯（荅拉兹）里程总数，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统计为 26 法尔萨赫；从石国至白水城，他又误计为 13 法尔萨赫，应为 19.7 法尔萨赫。
- [6]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 76 页。
- [7] V.Minorsky, “*Tamim ibn Barh' s Journey to the Uyghurs.*” *BSOAS*, *XII*-2, London, 1948, pp.275~305, p.284.
- [8] 努舍疆（Nushajan）之名，早在 1889 年即为托玛舍克（W.Tomaschek）订正为八儿思罕，即拔塞干（Barskhan），参见托玛舍克〈评德·胡耶撰《论思戈与玛果戈墙》一文〉，《维也纳东方学杂志》卷 3，第 103~108 页，转引自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注释 17，参见其《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1~30 页。苏联考古学者将该城比定为今塔什干地区的汗阿巴德。另据苏北海研究，拔塞干之地名是由西突厥弩失毕五俟斤中的拔塞干噉沙钵俟斤之名而来的。参见苏北海：《中亚塔拉斯—江布尔地区的历史演变》，参见其《西域历史地理》，新疆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285~306 页。另参见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第 81~82 页。关于下努舍疆，还可参见下述记载：*Istakhri* 书，*BGA*, i, 328~331; *Mukaddasi* 书，*BGA*, iii, 48, 264~265。
- [9] 古达玛说，开苏里巴斯附近一处地方叫古姆（Qum），它是葛逻禄（Kharlukhiyyah）国的第一个去处；古姆背靠沙漠，至开义玛克国边

界有 2 法尔萨赫。参见古达玛书，第 217~218 页。

- [10] 参见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
- [11] 同上。
- [12] 参见《道里邦国志》，第 32 页；注〔2〕书，第 218 页。
- [13] 张广达师认定，奈瓦契特即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新城”；而冯承钧先生则说，新城是筱赤建（弩室羯）。参见《碎叶城今地考》；冯承钧：《西域地名》（增订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69 页。
- [14] 参见《碎叶城今地考》；另参见 G. Clauson, “AK Beshim - Suyab.” JRAS, vol. 1, 1961, pp. 1~13.
- [15] 塔米姆说，八儿思罕由 4 个大城和 5（4？）个小城组成；从赭时途经怛逻斯到上努舍疆有 40 天路程，但他骑马赶路仅用了一个月。参见 BSOAS, VII-2, pp. 283~292。米诺尔斯基考订：八儿思罕位于伊塞克湖东南岸，该地在下努舍疆以东至少 500 公里；塔米姆错把上努舍疆（八儿思罕）当成九姓回鹘的都城了。
- [16] 里程数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
- [17]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述，经库勒晓伯、吉勒晓伯到俱兰。古达玛所记则由库勒晓伯直接到俱兰，不经过吉勒晓伯，少走 4 法尔萨赫；从里程看，怛逻斯至俱兰 13 法尔萨赫，但古达玛总计为 14 法尔萨赫，其原因或由于计算错误，或由于开苏里巴斯至古姆可能有 1 法尔萨赫路程。参见《道里邦国志》，第 31 页；注〔2〕书，第 217~218 页。
- [18] 张广达译为“突厥汗廷”。参见《碎叶城今地考》。
- [19] 参见注〔2〕书，第 216~219 页。
- [20] 拔汗那城又称 Akhsikt。古达玛统计里程说，从撒马尔罕至拔汗那为 35 法尔萨赫。误也。按：应当是扎敏至拔汗那为 35 法尔萨赫；撒马尔罕至扎敏为 17 法尔萨赫。参见《道里邦国志》，第 32~33 页；注〔2〕书，第 219~220 页。
- [21] 参见《道里邦国志》，第 33 页，中译注④。古达玛说，从固巴至窝什为 7 法尔萨赫。参见注〔2〕书，第 221 页。《新唐书·西域传》称：窈堵利瑟那“即汉代贰师城也”。按：此记有误。岑仲勉：《汉

书《西域传地里校释》第 289~293 页有详考，中华书局，1981 年。岑氏认为，贰师城即今之 Dsizak。

- [22] 古达玛称，从上努舍疆（上拔塞干）到土胡兹胡尔·可汗（九姓乌古斯可汗）地界为 6 天行程。那么，从土胡兹胡尔·可汗都城至该可汗所辖西部边界有 84 天左右行程。参见注〔2〕书，第 221 页。
- [23] 关于九姓乌古斯及其到开义玛克王国路程的记述，据《道里邦国志》第 34 页增补。《世界境域志》第 265 页把九姓乌古思都城记为“脂那城”（Jinanjkath），并说：“它是政府所在地，邻接中国边境。夏季酷热，冬令宜人。”（*Hūdud al - ‘Alam*, Trans.by V.Minorsky, London, 1970.）据华涛博士研究，9 世纪末、10 世纪初的九姓乌古思人（回鹘人）都城当指高昌城（吐鲁番）；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笔下的托古兹古思（土胡兹胡尔）应是漠北回鹘（纥）；而古达玛笔下的托古兹古思则指高昌回鹘。参见华涛：〈穆斯林文献中的托古兹古思〉，《西域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编）1991 年第 2 期。
- [24] 赤山城，即赤谷城。一般认为，该城位于伊塞克湖东南，今别迭里山隘西北的伊什提克。真珠河，指锡尔河上源的纳林河。参见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第 15 页。在中古波斯语（Pahlavi）中，“锡尔河”称为 jaxsarta 或 jaxsaarta，意为“珍珠”、“明珠”。裴罗将军城，王国维考订其为八剌沙衮，即元代的虎思斡耳朵。参见王国维《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考》，《观堂集林》卷 14，中华书局，1959 年，第 628~634 页。马合木·喀什噶里《突厥语词汇》卷 1，第 124~126 页也证实此说。张广达考订，八剌沙衮即今托克玛克以南约 15~16 公里处的布拉纳废城，该废城以西 6~7 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又译阿克·贝欣，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 8~10 公里处）即碎叶故城。参见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
- [25] 《新唐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 年，第 1149~1150 页。
- [26] 苏北海：〈唐代中亚热海道考〉，《西域历史地理》，第 221~237 页。周连宽书，第 69~90 页。岑仲勉：〈历代西疆路程简疏〉，《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 年，第 696~699 页。
- [27] 周连宽书，第 101~102 页注释⑧详细介绍了中外学者对汉唐“里”

的折算。

- [28] 闻人军：《中国古代里亩制度概述》，《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 [29] 参见周连宽书，第102页。
- [30] 加尔迪齐（Gardizi）记述奈瓦契特（纳瓦卡特）至潘支卡特的路程时，说：潘支卡特旁有泽卡特村，该村附近有三村，其一即为碎叶，碎叶附近有一山，突厥人奉祀此山，恒指此山之名立誓。他还说，距碎叶1法尔萨赫有胡特科雅勒村，其首领出身于突骑施部。参见加尔迪齐《记述的装饰》俄译文，《巴托尔德文集》卷8，第61~62页，引自张广达《碎叶城今地考》。古达玛说，奈瓦契特通向上拔塞干的大道名为鲁凯布。按：鲁凯布即泽卡特。参见古达玛书，第218页。
- [31] 冯承钧：《西域地名》，第61~62页。
- [32] 同注30。
- [33] 参见注〔2〕书，第218页。
- [34] 《大唐西域记》卷一，季羡林等校注本，第81~82页“笈赤建国”注释①。另参见《西域地名》，第69页。
- [35]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奈瓦契特至碎叶城（Kubal）3法尔萨赫；古达玛则说有4法尔萨赫。参见《道里邦国志》，第32页；注〔2〕书，第218~219页。
- [36] 参见《碎叶城今地考》。
- [37] 参见注〔2〕书，第218~219页。
- [38] 伯恩施塔姆：《北部吉尔吉斯考古概述》，第72~75页，伏龙芝，1941年，引自《碎叶城今地考》；别列尼茨基等：《中亚中世纪城市》第207~208页。（А.М.Беленицки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Город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Ленинград, 1973.）刘迎胜博士曾考察“小红溪”（红水村）遗址。他说，“据苏联学者研究，这里就是《皇华四达记》中的新城。这里曾出土唐‘大历通宝’1枚及一些突骑施钱币。”此说与张广达之说相左，存疑。参见刘迎胜：《丝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3页。
- [39] 参见注〔2〕书，第218页。

- [40]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 14 页，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 年。
- [41]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继袭二》，第 11372 页，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
- [42] 《新唐书·西域传》，第 6253 页。
- [43]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第 1137 页。
- [44] 沙畹：《西突厥史料》，第 145 页注四，第 253~254 页。
- [45] 冯承钧：《西域地名》，第 80 页；《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七编，第 66 页，中华书局 1962 年。
- [46] 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研究〉，《文物集刊》第二集，1980 年。
- [47] 余太山：《西域通史》，第 164 页。
- [48]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庭州”条（第 1033~1034 页，中华书局，1983 年）称，沙钵镇在（庭）州西五十里当碎叶路；俱六镇在州西二百四十里当碎叶路。按：俱六城守捉约在今新疆阜康县。
- [49] 据松田寿男考订，张堡城守捉即《长春真人西游记》之昌八剌城，位于今新疆昌吉县境；黑水即指库尔喀喇乌苏（在突厥语中，“喀喇乌苏”意为黑水），即今奎屯河；黑水、东林、西林守捉分别位于库尔喀喇乌苏、多木达喀喇乌苏（一称济尔噶朗河）、固尔图喀喇乌苏（一称额布图河）河畔；黄草泊，在固尔图喀喇乌苏军台西北方的长苇丛处；大漠、小漠则是黄草泊往西的沙阜，即《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言之“沙场”。伊丽河，即伊犁河，唐代渡河点大概察林河注入伊犁河主流处附近。详见松田寿男《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第 370，402~403 页，以及第 403 页注①，注③，注④。清镇军城即后来的清海军，宝应元年（762 年）成为北庭都护府管辖下的西海县。《元和郡县图志》“庭州”条（第 1034 页）记：“清海军。在府西七百里。旧名镇城镇。天宝中改名清海军。”清代徐松也考辨了《唐书》所记“碎叶路”，认为清镇军城在今玛纳斯 80 里的乌兰乌苏。参见徐松《西域水道记》卷 3，“额彬格逊淖尔所受水”条，《皇朝藩属舆地丛书》第 4 集。王国维考订，弓月城为元代的阿力麻里城，其遗址在今新疆伊宁地区霍尔果斯北之废城。

- 此说已成定论。参见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卷上,《王国维遗书》第13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
- [50] 苏北海:《西域历史地理》,第245页。
- [51] 参见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中华书局,1994年,第140~177页。
- [52] 长泽和俊:《丝绸之路史研究》(以下简称长泽和俊书),钟美珠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60页。《世界境域志》英译本,第119页记述了Khuttalan及其首都Hulmuk(或作Hulbuk):“Hulmuk是王的住所,是Khuttalan的首都。该城位于山麓,有很多地方,住有很多人。”然而,同书208页又记称:Hulbuk即Hulbag,位于雅夫河的克拉夫之南。斯特朗格《东哈里发国的土地》,第438页(Le Strange, *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London, 1905),将Hulbuk比定为阿赫沙瓦河流域的库利亚布附近。另参见W. Barthold, *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 (以下简称《突厥斯坦》), London, 1977, pp. 68~69.
- [53] 《大唐西域记》卷一。
- [54] 内田吟风:《吐火罗国史考》,《民族译丛》1981年第2、3期。
- [55] 长泽和俊书,第550~551页。
- [56] 同上书,第549页。
- [57]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下》。
- [58] 参见《新唐书·回鹘传》。
- [59] 圆照:《大唐贞元新译十地经》后附《悟空行记》。引自长泽和俊书,第560~570页。
- [60] 黄盛璋:《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另参见其《西天路竟笺证》,《敦煌学辑刊》第六辑,兰州大学,1984年。
- [61] 高居海等行程:《自开封到》灵州,过黄河到党项界——凉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回鹘牙帐)——西北五百里至肃州——西行百里到天门关——西行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入仲云(小月氏遗种)界——大屯城(仲云牙帐所在地,疑即钢和泰文书第二部分的Raurata。参见榎一雄:《关于仲云族牙帐的

- 所在地》，载《史学杂志》卷 72~12，昭和 38 年）——西至绀州（且末？）——安军州——于阗。参见长泽和俊书，第 573~593 页考证。另参见《新五代史》卷七四，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 年；《文献通考》卷三三七〈四裔考十四·于阗〉，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年。
- [62] 《宋史》卷四九〇《外国传六·高昌》、《龟兹》，中华书局点校本，1985 年；《文献通考》卷三三六《四裔考·车师前后王即高昌》。
- [63] BGA（《阿拉伯舆地丛书》），iii，pp.323~326。引自《突厥斯坦》，第 235~236 页。
- [64] 关于唐代粟特人，详见伯希和：〈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蒲昌海之康居聚落〉（1916），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 25~27 页，中华书局，1957 年；羽田亨：〈漠北之地与康国人〉，《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编历史卷；池田温：〈8 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欧亚大陆文化研究》I，1965；护雅夫：〈东突厥国家内部的粟特人〉，《古代突厥民族史研究》，东京，1967 年；蒲立本（E.G.Pulleyblank）：〈内蒙的粟特人聚落〉，《通报》卷 41，第 317~356 页，1952 年；O.I. 斯米尔诺娃《粟特史纲》，莫斯科，1970 年；姜伯勤《敦煌吐蕃番文书与丝绸之路》第五章，文物出版社，1994 年；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第 249~279 页；荣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粟特移民〉，《西域研究》（新疆社会科学院编）1993 年第 2 期，第 8~15 页。
- [65] 加尔迪齐：《记述的装饰》，王小甫节译，《西北史地》（兰州大学编）1983 年第 4 期；巴托尔德《中亚突厥史十二讲》，罗致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62 页。
- [66] 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50，72~83 页。
- [67] C.E.Bosworth, *The Medieval History of Ir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Chap. VII, London, 1977, pp.1~13. 马雍：〈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学习与思考》（中国社科院编）1983 年第 5 期。
- [68]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

-
- [69] 《文献通考》卷三四六〈契丹下〉。
- [70] 《辽史》卷七〇〈属国表〉，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
- [71] 《契丹国志》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黄时鉴师推断，《契丹国志》卷二一“诸小国贡进物件”所记“大食国”，是萨曼王朝及其亡后迄至1036年前的河中地区。该大食国与辽朝有物品贡赐关系。参见黄时鉴〈辽与“大食”〉，《新史学》第3卷第1期，第47~67页，台北，1992年3月。

第三章 《新唐书·西域传》所 记中亚史地考辨

《新唐书·西域传》集中保存了唐人对中亚诸胡国的认知以及九姓胡与唐朝交往的基本史实。这些记载既是唐朝与中亚交往的记录，又是双方交往的历史结果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人在与中亚诸胡交往过程中所持的立场、观点。《新唐书·西域传》的许多记述，可补阿拉伯——伊斯兰史料之不足。但是，《西域传》之记述与玄奘等所记有所不一，留有许多讹误和疑问。本世纪以来，法国学者沙畹著《西突厥史料》^[1]，丁谦撰《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2]，岑仲勉著《唐史余瀛》、《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3]，他们都对《新唐书·西域传》做了有益的考辨。不过，他们的研究仍有许多失误和遗漏。

一、康国

康者，一曰萨秣建，亦曰飒秣建，元魏所谓悉万斤者。其南距史百五十里，西北距西曹百余里，东南属米百里，北中曹五十里。在那密水南，大城三十，小堡三百。君姓温，

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王帽氈，饰金杂宝。女子盘髻，幘黑巾，缀金葩。……以十二月为岁首，尚浮图法，祠祆神，出机巧技。……高宗永徽时，以其地为康居都督府，即授其王拂呼缦为都督。万岁通天中，以大首领笃娑钵提为王。……^[4]

1. 关于《新唐书·康国传》反映的年代及康国的宗教信仰

女子面蒙黑巾，乃伊斯兰习俗。而且，此习俗早在穆罕默德立国34年（约公元655年）就已为唐人知晓。《唐会要·大食国》记曰：大食“自云有国已三十四年，历三主矣。……女子白皙，行必障面。”^[5]《新唐书·大食传》也记：大食“女子白皙，出辄障面。”^[6]由此可见，《康国传》所反映的是康国人已接受伊斯兰教之后的情况。

那么，康国人何时皈依伊斯兰教的呢？

阿拉伯人第一次渡过阿姆河、开始征服河中地区是在公元654年。是年，阿拉伯人攻破米国，围攻康国^[7]。但是，康国等地长期未被阿拉伯人征服。712年，呼罗珊总督屈底波（705—714）率大食军攻占撒马尔罕城，焚毁城内的佛寺，建筑了清真寺，强迫当地人信奉伊斯兰教^[8]。不过，粟特（Soghd）其它地区仍保持原有宗教信仰，仅在政治上一度承认阿拉伯人的宗主权^[9]。即便是在撒马尔罕，信奉伊斯兰教的人也不多。726—727年间，慧超在返归中国途中，仍见康、安等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康国尚存一佛寺^[10]。直到喀里斯坦（Khari—stân）之战（738年）以后，阿拉伯人大破突骑施军，伊斯兰文化才开始在粟特地区占优势^[11]。因此，康国女子面蒙黑巾，应是727年以后之事。

那么,《康国传》究竟反映了康国何时的情形呢?中国史籍关于康国历法的记述,使我们有可能判定《康国传》所记述史实的年代。

据《隋书·康国传》记载,在6世纪后半叶~7世纪初,康“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来助祭”^[12]。《唐会要·波斯国》也记载:波斯国“俗事天地水火诸神,西域诸国事火袄者,皆诣波斯受法焉。……以六月一日为岁首。”^[13]显然,同事火袄的康国,其历法与波斯相同,也以六月一日为岁首。所以,《通典》引韦节《西蕃记》说:康国人“以六月一日为岁首。……俗事天神,崇敬甚重。”^[14]而《新唐书》则说,康国以十二月为岁首。这说明康国在唐代曾改历。中亚诸国历法均与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康国改历必与其改奉伊斯兰教有关。康国的“以十二月为岁首”之历,应当是伊斯兰教历(即回历)。

回历以354.3671天为一年,以公元622年7月16日为纪元之始。所以,回历岁首可以出现在一年中的任何一个月。回历以中国农历十二月为岁首的年份有:回历18、19、51、52、85、86\87、118、119\120、152、153\154、186\187年,分别为公元639、640、671、672、704、705、736、737、769、770、802年^[15]。值得注意的是,公元705、737、770、802年的1月和12月,均为农历十二月、回历岁首。就农历年而言,这4年都是连续2年的十二月为回历岁首。《新唐书·康国传》所记年代应是其中的某一年。从《康国传》所记康国习俗、宗教情形看,此时伊斯兰教已在康国有了初步传播,但康人尚未完全皈依伊斯兰教。712年,撒马尔罕才第一次屈服于阿拉伯人的政治统治;738年喀里斯坦之战以后,尤其是751年怛罗斯之战以后,撒马尔罕逐步伊斯兰化。因此,《康国传》所反映的史实在年代上,705年当排除,似应是公元737~770年之事。

从两《唐书·康国传》所记史实,我们也可推定《康国传》

所记史实不晚于公元 754 年。《旧唐书·康国传》记事最晚的一条是天宝十三载（754）康国王咄曷遣使朝贡^[16]；《新唐书·康国传》则是唐朝册封咄曷为钦化王，且未注明年代。《旧唐书·康国传》系咄曷册封于天宝三年（744）；《册府元龟·外臣部》系于天宝三年七月，唯“咄曷”作“咄喝”^[17]。

《新唐书·康国传》记述的年代如上所考，其记康国的宗教状况就显出许多讹误。

按《新唐书》所记，此时康国“尚浮图法，祠祆神”。此记是有疑问的。据巴托尔德研究，在萨珊王朝末期，佛教在中亚地区遭到排斥，祆教压倒佛教而取得统治地位^[18]。贞观二年（628 年）^[19]，玄奘途经飒秣建（康国）时，见当地“王及百姓不信佛法，以事火为道。有寺两所，迥无僧居，客僧投者，诸胡以火烧逐不许停住”^[20]。玄奘以佛法化度康国国王。但是，迟至 726～727 年，慧超仍见康、安等六国总事火祆，不识佛法；唯康国有一（佛）寺，有一僧，又不解敬^[21]。在此以后，康国等中亚诸国逐渐伊斯兰化，根本不可能又改宗佛教，“尚浮图法”。所以，《新唐书》此记不足凭信。《新唐书》编撰者很可能是根据玄奘以佛法化度康国国王一事，推定康国此后必然“尚浮图法”了。

《旧唐书·康国传》则记：康国“有婆罗门为之占星候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这儿的“颇有”比《新唐书》所记“尚”，在程度上减弱了。但是，“颇有佛法”仍与这个时期的康国仅有一寺，且又无人懂得教仪、教规的情况不符。

2. 关于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

多数中外学者对《新唐书·康国传》给出的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永徽年间，即 650～655 年）没有提出异议^[22]。《旧唐书·康国传》未记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按：高宗永徽年间，正值阿史那贺鲁叛乱，安西都护府由龟兹迁回西州。唐朝屡次征讨不捷，战争连年不断。直到显庆二年（657），阿史那贺鲁的叛

乱才被平定。而且，永徽年间康国仅在永徽五年（654）四月与曹国、安国并遣使朝贡。《册府元龟》记述这次朝贡时并未言及设置都督府之事^[23]。如果在这次朝贡中仅在康国设置都督府，而弃安、曹国于不顾，这也不合情理。因此，唐朝似不可能于永徽年间在康国设立都督府。另据《册府元龟》卷966〈外臣部·继袭一〉：康国，“唐武德七年，其王曰屋（屈）本（术）支。显庆三年，其王曰拂呼发（纁），是年，高宗列其地为康居府，以拂呼发为都督。”《唐会要》卷99〈康国〉亦记载：“显庆三年，高宗遣果毅董寄生列其所居城为康居都督府，仍以其王拂呼纁为都督。”拂呼发、拂呼纁肯定是同一人。康居都督府应当设置于显庆三年。《新唐书》所记康居都督府设置的年代，如果没有其它史料佐证，不足凭信。

3. 关于康国至周邻国家道里

根据文献及考古材料，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唐代中亚诸国的方位。

隋唐时期，康国都城在今撒马尔罕市东北1.5公里的Afrasiab高地上^[24]。泽拉夫善河从高地下流过。《隋书·康国传》称：康国“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萨宝水当指泽拉夫善河。

史，《大唐西域记》作羯霜那，阿拉伯—波斯语 Kass、Kiss 之对音。城址在今撒马尔罕以南75公里的沙赫里夏勃兹，为中世纪撒马尔罕至缚喝（Balkh）大路中途之大城^[25]。

西曹，隋时曹也，国治瑟底痕城。瑟底痕之对音，当是 Ishtīkhan，即今撒马尔罕西北百里的伊什特汗^[26]。

米，又作弭秣贺，阿拉伯舆地学家记作 Māymurgh，并称该地位于撒马尔罕之西南，当布哈拉至那色波（即小史）的大路上^[27]。实际上，《新唐书》所记之米国，应即撒马尔罕附近的 Māymurgh，而不是那色波至布哈拉大道上的 Māymurgh，其国治在撒马尔罕东南约70公里的喷赤干（详见“米国”考）。

中曹，王治迦底真城。沙畹称：《大唐西域记》之劫布咀那，即曹国，应是中曹，即 Kaboudhandjakath^[28]，后者位于撒马尔罕以东 2 法尔萨赫（约 12.5 公里）^[29]。托玛舍克（W. Tomaschek）则认为，劫布咀那当是 Kapû-tânâ/Kedud 之对音。此观点已为学界所接受^[30]。因此，中曹不应是沙畹所称的劫布咀那。

在确定上述诸城方位之后，我们发现《新唐书·康国传》所记诸城道里参杂可疑之处。

《新唐书·康国传》称，康国距史 150 唐里，约合 66 公里（1 唐里约合 0.88 华里^[31]）。《新唐书·地理志》、《唐会要》卷一百称：史国“西北至康国七百里”^[32]。700（唐）里约合 308 公里。实际上，沙赫里夏勃兹在撒马尔罕以南 75 公里。《新唐书·康国传》少记 9 公里，已基本接近实际里程；《新唐书·地理志》、《唐会要》之记多出 233 公里，显然误差太大。《唐会要》的记载出于鸿胪卿王忠嗣于天宝二年（743 年）四月二十五日所言。当时，唐玄宗询问诸蕃国远近，王忠嗣“谨按《西域图》”而上言。此《西域图》或指唐代许敬宗等《西域图志》（60 卷，约撰成于 658 年），或指王名远《西域图记》（660 年六月十七日进呈）^[33]。《新唐书·地理志》所据或同。

西曹地望与里程，《新唐书》所记与阿拉伯舆地学家所记基本吻合^[34]。

米国方位，据阿拉伯舆地学家说，应在撒马尔罕之西南；这与《新唐书》所记（康国之东南）不一（详见“米国”考）。

中曹方位，《新唐书》称在康国之北五十里，约合 44 华里；阿拉伯舆地学家则称，Kaboudhandjakath 在撒马尔罕以东 12.5 公里^[35]，《新唐书》多记 11.5 公里，且在方位上与穆斯林之记也有出入。

二、安国

安者，一曰布豁，又曰捕喝，元魏谓忸蜜者。东北至东安，西南至毕，皆百里所。西濒乌浒河，治阿滥谧城，即康居小君长孺王故地。大城四十，小堡千余。……武德时，遣使入朝。贞观初，献方物，太宗厚尉其使……其王诃陵迦又献名马，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云。是岁，东安国亦入献，言子姓相承十世云。^[36]

《新唐书·康国传》“东安”条记：

显庆时，以阿滥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37]。

1. 安国的历史变迁

安国，国治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Bukhara）。布哈拉地处泽拉夫善河（那密水）之南。布豁、捕喝即 Bukhara 之对音，玄奘第一次把该词正确地音译为“捕喝”。俄国学者巴托尔德认为，Bukhara 一词是由 Bukhâr 派生出来的；而 Bukhâr 是突厥—蒙古人对梵文 Vihâra 的转写，Vihâra 意为“寺庙”。13 世纪中亚历史学家居瓦尼（Djuwaini）亦曾做出类似的解释^[38]。冯承钧以为《汉书·西域传》之罽城，即《新唐书》之安国^[39]。

《魏书》把安国记为忸蜜。元魏所称“忸蜜”，其对音应是 Numijkat、Nmijkat。这是布哈拉城郊的一个村镇。10 世纪上半叶波斯历史学家纳尔沙喜（Narshakhî）记载：穆罕默德·伊本·纳斯尔曾说，布哈拉有许多名称，他称之为 Numijkat（或 Nmijkat，Nimjkat）^[40]。-kat 为波斯语后缀，意为“城堡、

城”，古人音译时省略了。直到公元 776 年木坎纳（Muqanna）起义爆发时，Numijkat 村仍然存在^[41]。中国人在不同时期对布哈拉的不同称呼，反映了其对布哈拉认识的深入，也反映了布哈拉由村镇发展成为城市的曲折过程。

安国都城阿滥谧、阿滥，其对音应是 Ramīthan（Aryamīthan, Riyāmīthan, 或 Rāmītīn）^[42]。丁谦认为：阿滥谧城，谧当作谥，即《史记》之蓝市，《汉书》之监市，《魏书》之卢监氏，本大月氏故都^[43]。丁说失之臆断，且无任何语音勘同的支持。蓝市、监市，无法与阿滥谧、阿滥相勘同。蓝市、监市，当指古大夏国都城巴尔赫（Bactria，中古作 Balkh）。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东征至此，建城名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蓝市、监市当是这一名称的译音^[44]。实际上，拉谧丹（Ramīthan）是布哈拉城郊最著名的一个大镇，至今尚存古代遗留下来的城堡。10 世纪伊斯兰地理学家穆卡迪西（Maqdisi）把该地认作“古代的布哈拉”^[45]。纳尔沙喜也说，该村“比布哈拉城的历史悠久，有些书甚至直接称它为布哈拉。古时候，拉谧丹是统治者的居住地；在布哈拉城建立以后，统治者们都迁居到布哈拉，每年只是在拉谧丹过冬，直到伊斯兰时期都是如此”^[46]。至晚于 6 世纪后半期，在西突厥人统治时期，布哈拉地区的统治者已经常年居住在布哈拉城内；7 世纪前期，布哈拉统治者比敦（Bīdūn，其称号为布哈尔·胡达，Bukhār Khudāh）在古代城堡的废墟上重建布哈拉城堡，并在城堡大门之上挂了一块铁券，铁券上刻有其名字^[47]。隋代，隋炀帝曾遣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至其国，得五色盐而返。此时，安国已是“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环以流水，宫殿皆平头”^[48]。因此，《新唐书》称安国治阿滥谧城，这只能是隋以前的状况，而不大可能是唐代布哈拉的实情。看来，布哈拉统治者驻蹕地的变化，并未被唐人所知晓。

但是，纳尔沙喜提及一件饶有趣旨的事情。设伊·吉什瓦尔

(Shîr-i Kishvar) 是突厥统治者喀拉·朱林·突厥 (Qarâ Jûrîn Turk, 马迦特考定此人为室点密^[49]) 的儿子。他应布哈拉贵族的请求, 被其父派到布哈拉统治了 20 年, 然后去世。此后不久, 一位秦国 (Chîn, 即中国^[50]) 国王把公主嫁到布哈拉; 这位公主的嫁妆中有一座宝塔, 该宝塔就被安置在拉谿丹^[51]。马迦特在《斡水与那密水》中考证说: 这位秦国公主或是被唐灭亡的隋朝的公主, 她被唐高祖嫁到安国, 随安国使者一起前往布哈拉; 她也可能是中国突厥斯坦一位信奉佛教统治者的女儿^[52]。这件事不见中国史籍任何记载。无论这位公主是谁, 她的嫁妆被安置在拉谿丹这个事实, 很可能导致了中国人误以为安国王宫在拉谿丹。而实际上, 拉谿丹仅仅是布哈拉统治者的冬季驻地而已。至于这位秦国公主的夫君究竟是布哈尔·胡达, 还是突厥统治者, 今已难以确认。

上面提到的喀拉·朱林·突厥, 当是处罗侯可汗。公元 588 年, 突厥可汗 Schaba 西征波斯, 兵至巴哈吉、赫拉特两地; 可汗中流矢而死, 波斯大将 Bakram Tschoudha 乃进兵拜坎德城, 擒可汗之子巴斯摩哈 (Basmaudha)。岑仲勉考定此突厥可汗为东突厥可汗处罗侯^[53]。这位突厥可汗之子固守拜坎德, 而拜坎德又是布哈拉的属地, 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 喀拉·朱林·突厥 (Qarâ Jûrîn Turk) 就是西征波斯的突厥可汗; 他派其子设伊·吉什瓦尔 (Shîr-i Kishvar) 到布哈拉统治, 这为他发动西征创造了条件。而且, 纳尔沙喜也强调此突厥可汗号称“叶护可汗” (Biyâghû)。《隋书·突厥传》也记: “处罗侯竟立, 是为叶护可汗”。处罗侯 587~588 年在位, 号莫何可汗。

《新唐书》所记安国“大城四十, 小堡千余”, 与布哈拉的史实基本符合。纳尔沙喜引用穆罕默德·伊本·伽法尔的话说: 拜坎德 (Baikand) 有 1000 多个兵站 (ribât), 与布哈拉所属村镇的数目相等^[54]。这些数以千计的村镇, 往往有士兵驻守。它们大

概就是《新唐书》所称千余小堡。布哈拉所属的大村镇很多，著名的有：努尔（Nūr）、塔瓦伊斯（Tawāīs）、伊斯克吉卡特（Iskijkat）、沙尔格（Shargh）、赞丹纳（Zandana）、阿富辛纳（Afshina）、巴尔卡特（Barkad）、拉谥丹（Rāmitīn）、瓦拉赫沙（Varakhsha）、拜坎德、法拉卜（Farab）、开尔米尼亚（Karminiyah）、白米吉卡特（Bamijikath）、瓦尔达纳（Wardānah）等。这些城镇多数都建有自己的城堡、垒墙，定期举行集市；有的城镇，如瓦拉沙赫、拜坎德，其历史比布哈拉还要悠久，规模也很大，并有属于自己的村镇，建有宏伟的宫殿^[55]。这些城镇大概就是《新唐书》所记的“大城四十”。

2. 关于安国诸王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贞观初，安国王诃陵迦献名马于唐朝时，自言“一姓相承二十二世”。以一世为20年计，二十二世为440年。据《册府元龟》卷970记载，安国第一次到唐朝贡献是在贞观十二年（638年）十一月^[56]。从此往前推440年左右，约当公元200年。考古证实，最早的布哈拉周边村镇，如瓦拉赫沙，建成于公元3世纪^[57]。布哈拉也是由村镇发展而来，其年代略比瓦拉沙赫晚些。看来，布哈拉约从公元3世纪开始建立起政权，本地王统一直存在下来。布哈拉本地统治者称布哈尔·胡达（Bukhār Khudāh）。即便是在西突厥人、阿拉伯人统治时期，布哈尔·胡达也依然存在^[58]。《新唐书》此记应当是可信的。

安国与唐朝的关系较为密切。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国即遣使朝贡。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将阿史那社尔破龟兹，安国与西突厥、焉耆“争犒师”^[59]。如果我们注意到安西四镇尚要在一年以后才建立，就会从安国来到葱岭以东犒劳唐军之事中，看到安国与唐朝的关系比较亲密。安国“争犒师”之举，也说明在647年时唐朝势力已经到达碎叶以西。

据美国学者费叶（R.N.Frye）等研究，布哈拉的统治者很

可能采用了粟特人“王”的形式，因为“Khudāh”与粟特文“𐰽𐰺𐰍𐰏”（“王”）基本相同^[60]。在7世纪中叶，布哈尔·胡达由本地王公比敦（Bīdūn）担当，他属于吐格什哈达（Tughshāda）家族。直到萨曼朝统治者伊斯迈益尔来到布哈拉时（874年），该家族基本控制了布哈尔·胡达一职^[61]。贞观初遣使入唐朝献的安国王河陵迦，应是布哈尔·胡达，他大概也属吐格什哈达家族。马迦特等认定，开元十四年（726年）遣弟朝贡的安国王笃萨波提（《册府元龟》卷971作波婆提），即吐格什哈达（Tughshāda）本人。开元七年（719年）遣使朝贡的安国王，也应是此君^[62]。

那么，显庆时被任命为安息州刺史の昭武杀又是谁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需先明了“昭武”的意义。

关于“昭武”的词源、含义，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见解。岑仲勉先生在评述了这些观点后，认为“昭武”并非地名，而是官职名称，即“叶护”，其对音为jabghu，也即《陀拔纪年》所记公元588年西征波斯之突厥可汗Schāba，《阙特勤碑》东面31行所书之Čub^[63]。张毅先生也同意岑氏之说^[64]。

笔者除了对Čub之含义持有疑义外，基本同意岑仲勉的考定。据《新唐书·西域传下》所记，显庆年间，中亚昭武九姓国仍以“昭武”为姓的仅剩5国，即：安（王昭武杀）、东安（王昭武闭息）、米（王昭武开拙）、何（王昭武婆达地）、史（王昭武失阿喝）。而《阙特勤碑》东面31行记：“余等征alty Čub Soydaq，败之”。马迦特、岑仲勉把alty Čub Soydaq译作“粟特昭武六部”、“六姓Čub及粟特”，把Čub视作官职名，将Čub对应为叶护，即昭武，并将六姓Čub与中亚昭武六姓之国（康、安、东安、米、何、史国）相对应^[65]。但是，《新唐书·康国传》明确记述：康国“君姓温，本月氏人”^[66]。康国王并不姓昭武。苏联学者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和中国张广达先生考定，阙特勤远征的是中国灵州、夏州之间的“六胡州”，而不是中亚的六姓

昭武国；《阙特勤碑》东面 31 行原文“alty Ćub soydaq”应译作“六胡州”或“六州粟特人”，Ćub 对音为汉语的“州”^[67]。这个考定是正确的。

如此看来，昭武杀应是“叶护”杀，他应是个突厥人。因为，布哈拉本地王公一直都以“胡达”（Khudāh）为自己的称号，不可能采用“叶护”的称号。诚如此，唐朝最初在羁縻州安息州（布哈拉）任命的刺史是一个突厥人，而不是布哈拉本地王公。当时唐朝借助突厥人来实现其在布哈拉的间接统治。至于汉籍所记入唐贡献的安国王，则应当都是布哈拉本地王公。他们以朝贡的形式向唐朝表示其忠顺。

《册府元龟》卷 973〈外臣部·助国讨伐〉提及：天宝十三载（754），安国副王野解与东曹国王设阿以及诸胡九国王共同上表，请求与唐朝共同出击黑衣大食^[68]。这位安国副王如果不是东安国王，那么他很可能是以“胡达”名义上表的安王，唐人将“胡达”译作“副王”。

据《新唐书·地理志》可知：龙朔元年（661 年），唐在乌罗浑城置柁密州。而显庆时所置安息州则不见于西域羁縻府、州建置了^[69]。看来，唐人很快已意识到安与安息的天壤之别，而改安息州为柁密州。柁密州与粟特州一并归属月支都督府（置于吐火罗叶护阿缓城）统辖。遗憾的是，汉籍未载柁密州刺史是谁。从州治改地而置看，很可能柁密州刺史改由布哈拉本地王公担任了。

3. 关于安国的道里

安国四至、道里，《新唐书》与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记略有出入。

东安，因其在安国之东故名，即阿拉伯舆地学家所记之开尔米尼亚（Karminiya），今乌兹别克斯坦克尔米涅市。开尔米尼亚至布哈拉里程，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说有 17 法尔萨赫，约合 106

公里；古达玛则称，两地相距 14 法尔萨赫，约合 87 公里^[70]。而《新唐书》则称，安国东北至东安为“百里所”（约 44 公里）。《新唐书》所记里程显然太少。毕国，即拜坎德。古达玛说，拜坎德至布哈拉为 8.5 法尔萨赫，约合 53 公里^[71]。拜坎德故址至今布哈拉城的实际里程为 55 公里^[72]。两地之距离，《新唐书》也记为“百里所”，这已基本接近今日实际里程，仅少 11 公里左右。布哈拉西距乌浒水（阿姆河）约有 110 公里。《新唐书》所称安国“西濒乌浒河”，与史实基本符合。

三、东安

东安，或曰小[安]国，曰喝汗，在那密水之阳，东距何二百里许，西南至大安四百里。治喝汗城，亦曰龔斤。……大城二十，小堡百。显庆时，以阿滥为安息州，即以其王昭武杀为刺史；龔斤为木鹿州，以其王昭武闭息为刺史。开元十四年，其王笃萨波提遣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来朝，纳马豹^[73]。

在上述引文中，丁谦认为，“亦曰龔斤”前脱落“伐地”二字，应是“伐地亦曰龔斤”。其理由是，唐在龔斤置木鹿州；而玄奘所记伐地即木鹿^[74]。

其实，玄奘所言伐地，即《隋书·安国传》之毕国，《新唐书·西域传》安国条也作毕国，康国条误为戊地，火寻条误作戊地，即阿姆河东岸的 Betik (Bitik)^[75]。纳尔沙喜曾提到布哈拉西南的比狄克和法拉卜 (Farab) 两村。比狄克当在法拉卜附近^[76]。法拉卜至布哈拉 18 法尔萨赫（约合 112 公里）^[77]。木鹿，则在今谋夫一带^[78]。唐代伐地（戊地）并非木鹿。此外唐

朝在西域设置羁縻府州，往往以古地名称之。这种称呼常属随意命名，名不符实。例如，大宛都督府（今塔什干）、贵霜州（以何国置，即撒马尔罕西北 75 公里的库沙尼亚），各与大宛国、贵霜国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白鸟库吉曾得出结论：“唐代所设四裔的州都督府的名称，乃系当时史官任意采取汉代的名称，所以以历史地理的研究材料而言，并无若何价值。”^[79]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名称来判定某地在何处。丁氏之考定显误。

关于“阿滥”城的地点，沙畹认为“阿滥”即安国治地“阿滥滥”城，也即布哈拉^[80]。吴玉贵等虽采纳沙畹之说，但怀疑阿滥是东安国所属，阿滥似非阿滥滥^[81]。这种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新唐书》安国条并未言及在阿滥滥城置安息州；《新唐书》撰修者又把阿滥置安息州事系于“东安国”条下。要澄清这个疑问，必须首先确定东安国治地点及其与安国（布哈拉）的关系。

东安国，或曰喝捍，又被称为小安，其名称“东”、“小”均相对安国而言。托玛舍克及巴托尔德将其比定为波斯佚名作者所著《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中的 Kharghankath（卡尔干卡特，后称为 Kalkan—ata）^[82]。该城位于那密水（泽拉夫善河）之北。那么，喝捍应是卡尔干卡特。马迦特在《古突厥碑铭年代考》中，把喝捍考定为 Kharghan，并称其城北邻泽拉夫善河，在今 Kerminch 附近^[83]。宋岷先生则把布哈拉以东 22 法尔萨赫（合 141.7 公里，古达玛称仅有 19 法尔萨赫）的代布西亚（Dabusiyah）勘定为喝捍国，未知何据。

东安国实际上是安国的属地。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就明确把开明尼亚归作布哈拉的属地^[84]。开明尼亚与卡尔干卡特相距仅 1 法尔萨赫。卡尔干卡特当也是布哈拉的属地。因此，唐朝政府不可能在安国属地东安国设置两个州，而不在安国设州；也不可能东安国设两州，而在安国仅置一州。《资治通鉴》卷 200 记

载：显庆四年（659年）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85〕}。大安，即安国；小安，即东安。可见，唐朝在安国、东安国同时设置羁縻州。由于两地曾有所属关系，又是同时置州，并为记事方便，所以《新唐书》撰修者把此事系于东安国条下，而未分别记述。事实上，唐朝在安国的阿滥（即阿滥湍）设安息州，在东安国的窠斤设木鹿州。至于木鹿州刺史昭武闭息，看来是一个突厥人。

唐人对安国有一种误解，认为安国乃汉时安息国。《册府元龟》卷956〈外臣部·种族〉、卷958〈外臣部·国邑二〉均是如此记述^{〔86〕}。正是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唐朝政府在布哈拉设州时才会名之曰安息州。可见，阿滥城必属安国无疑。

那么，开元十四年（726年），派遣其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入唐朝贡的笃萨波提（《册府元龟》作波婆提）究竟是谁？从《新唐书·东安国传》记述的顺序看，“其王笃萨波提”似是东安国之王。所以，《全唐文》卷九九九“东安国王笃萨波提”条也记：“笃萨波提氏昭武，与康国同族，其国名东安，亦曰喝汗。开元十四年遣弟阿悉烂达拂耽发黎来朝。后八年，又遣使人贡。”^{〔87〕}此记大概录自《新唐书》。

但据《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载：开元十四年“二月，安国遣使献豹，雌雄各一。……五月，安国王波婆提遣其弟可悉烂达千（干）拂耽发黎来朝，献马及豹。”后八年（开元二十二年）朝献之事，不见《册府元龟》记述。又据《册府元龟》卷九九九，早在开元七年二月，“安王笃萨波提遣使上表”，请击大食，并贡献诸多物品^{〔88〕}。可见，波婆提即笃萨波提；《新唐书》所记“其王笃萨波提”，实为安国王，而不是东安国王；开元二十二年朝贡之事，也应系于安国。所以，马迦特等也认定为笃萨波提即安国王吐格什哈达（Tughshāda）^{〔89〕}。从笃萨波提朝贡一事被系于东安国条看，阿悉烂达拂耽发黎也可能是东安国的国王。8世

纪上半叶的东安国之王统很可能属布哈拉的吐格什哈达家族。

关于东安国至周边国家里程：

何，又作屈霜你迦，即今撒马尔罕西北 75 公里的库沙尼亚^[90]。库沙尼亚至开尔米尼亚 79 公里^[91]。开尔米尼亚至卡尔干卡特（喝捍）约 6 公里，那么库沙尼亚至喝捍（东安）约 85 公里。《新唐书·东安国传》称东安东距何二百里许（88 公里以上），记载基本正确。《册府元龟》卷 958 称：“何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92]《册府元龟》所记何国至小安国（东安国）里程，多出一百多（唐）里。

《新唐书·西域传》“东安”条称东安西南至大安四百里（约合 176 公里）；同书“安国”条又称，安国东北至东安“百里所”，两记不一。《大唐西域记》所记东安至安国里程，与《新唐书·西域传》“东安”条所记一致。布哈拉至开尔米尼亚，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称有 17 法尔萨赫（约合 106 公里），古达玛称有 14 法尔萨赫（约 87 公里）^[93]。今日布哈拉至克尔米涅市实际里程约为 110 公里。《新唐书·东安传》、《大唐西域记》所记多出约 66 公里。

从《新唐书·东安传》的记述看，安国可经东安国至何国。这条路线也与伊斯兰舆地学家所记相符。

四、东曹、西曹、中曹

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咀那，苏都识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阴，汉貳师城地也。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东北宁远，皆四百里许，南至吐

大罗五百里。……武德中，与康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国以臣为健儿，闻秦王神武，欲隶麾下。”高祖大悦。

西曹者，隋时曹也，南接史及波覓，治瑟底痕城。……武德中入朝。天宝元年，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即上言：“祖考以来，奉天可汗，愿同唐人受调发，佐天子征讨。”十一载，东曹王设阿忽与安王清击黑衣大食，玄宗尉之，不听。

中曹者，居西曹东，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94]

1. 关于曹国的政治状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隋代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千余人。……大业中，遣使贡方物。”^[95]从此记载看，曹国起初仅是康国的属地而已。到隋大业年间（605～618年），曹称国，治瑟底痕城（Ishtikhan，当是穆斯林地理文献中的 *Ithtākharj*、*Ishtikhan* 之对音，其地在撒马尔罕西北 50 公里的伊什特汗^[96]）。丁谦认定瑟底痕城在今喀喇苏城^[97]），遂向隋朝贡方物。据《册府元龟》，曹国向隋朝遣使贡方物是在大业十年（614年）七月^[98]。向隋朝遣使的曹国国君，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此君很可能就是康国王子乌建一脉。武德年间（619～626年）遣使入朝的，大概也是乌建一系。值得注意的是，玄奘说，率堵利瑟那国“自有王，附突厥”^[99]；而在隋代、唐初的汉籍记述中，未见有称曹国国君为“王”的。而《新唐书·西域传》“西曹”（即隋之曹国）则明确记载：天宝元年（742），“王哥逻仆罗遣使者献方物，诏封怀德王”。这位曹国王哥逻仆罗的太祖，在唐太宗（“天可汗”^[100]）时期已统治曹国。早在唐高祖时期，曹国已遣使朝贡。为什么哥逻仆罗的使者不追溯到唐高祖时期呢？最可能的原因是哥逻仆罗与唐高祖时期的曹国国君并非同祖。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唐

贞观初，曹国统治层发生变故，哥逻仆罗的祖辈取代了康国王子乌建一系，遂独立于康国而称王，并向唐朝遣使称臣。而唐朝则仅视西曹为正统。所以，在东、西、中曹三国中，唐朝仅册封西曹国王（哥逻仆罗）为“王”（怀德王）。

上述推测可从《册府元龟》记述得到佐证。《册府元龟》卷971记：“天宝元年（742年）三月，曹国王哥逻仆罗、石国王特勒（勤）并遣使献马及方物。”同书卷977记：天宝四载（745年），“曹国王哥逻仆遣使上表，自陈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尝受征发。望乞慈恩，将奴国土同为唐国小州。所须驱遣，奴身一心忠赤，为国征讨。”^{〔101〕}哥逻仆罗与哥逻仆应是同一人名之异记，他是西曹国王。不过，《册府元龟》有时也记“西曹”国，而不记作“曹国”。例如，天宝三年七月，“大食国、康国、史国、西曹国、米国……并遣使献马及宝”^{〔102〕}。

而东曹（苏对沙那）的王统则与西曹不同，至迟在玄奘途经其地时（628年），东曹已有自己的王统。正因为如此，在武德年间，东曹才能与康国同遣使人朝。在唐朝看来，东曹的政治地位与康国相等，都是独立的国家。

在显庆年间，唐朝肯定也在曹国设置了羁縻州府。《新唐书·曹国传》阙载。据《资治通鉴》卷200记：“显庆四年（659）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怛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103〕}745年（天宝四载），曹国王向唐玄宗上表说：“宗祖以来，向天可汗忠赤，常受征发。”^{〔104〕}可见高宗时唐朝必定在曹国也设置了羁縻州府。

关于西曹国王哥逻仆罗被诏封怀德王的时间，《新唐书·西域传》记为天宝元年（742）；《唐会要》卷98记作天宝三载；《册府元龟》卷965记载，天宝三年七月，“赐曹国王号为怀德王，米国王为恭顺王，康国王为钦化王”^{〔105〕}。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述，曹国王是与米国王、康国王一起被赐封的。看来，《册府

元龟》不大可能把如此重大事件的时间记错。当以《册府元龟》、《唐会要》此记为信从。

2. 关于曹、东曹、西曹的区别

在隋代，仅有曹国一名，不分东曹、西曹、中曹。唐代的东曹实际上与隋代曹国没有什么联系。《新唐书》的编撰者对东曹与西曹的情形不甚了了，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这首先反映在他们对东曹不同称谓的误解上。

《新唐书》说：“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咀那，苏都识匿。”率都沙那，《隋书·米国传》仅作苏对沙那^[106]；玄奘记作宰堵利瑟那。率都沙那、苏对沙那、苏都识匿三种称呼，皆梵语 Sutrēna 的对音，意为“干燥”，阿拉伯语作 Sutrūshana；在穆斯林文献中有几种转写法，最常见的是 Ushrūsana 和 Ustrūshanah^[107]。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考证，此名仍以转写为 Sutrūshana 较妥当^[108]。该地位于锡尔河以南，地当费尔干纳盆地西部出口处。《新唐书》所称之为波悉山，即今 Hissar 山脉所属（丁谦认为，波悉山为前阿赖山^[109]）。巴托尔德考定，苏对沙那国治在今乌拉秋别^[110]。乌拉秋别在撒马尔罕以东 220 公里；苏对沙那城遗址就在今乌拉秋别市一高地上，高约 20 米，面积 2.5 平方公里^[111]。9~10 世纪，苏对沙那首府又被称为 Būnjikath (Banjakath, Bunūjkath)；Būn-jikath 易与撒马尔罕以东的 Banjikath 相混淆^[112]。

劫布咀那，托玛舍克考定其对音是 Kapūtānā/Kedud。《大唐西域记》卷一夹行注称：劫布咀那国，“唐言曹国”^[113]。玄奘说，劫布咀那西至屈霜你迦国（唐言何国）300 余里；劫布咀那位于弭秣贺国（米国）以北；弭秣贺国位于飒秣建之东南^[114]。《释迦方志·遗迹篇》记：劫布咀那国（曹国也）位于弭末贺国西北^[115]。那么，玄奘所言之劫布咀那应当位于飒秣建之东或东北。如果玄奘所言不虚，玄奘从石国至西南方的飒秣建途中，应

当路过劫布咀那；但是，玄奘并未路过此地。从方位上看，玄奘所言之劫布咀那与《新唐书》之中曹更接近。所以，沙畹认为，玄奘所言之劫布咀那，应是中曹，其对音为 Kaboudhand-jakath^[116]。章巽等先生也认为，劫布咀那之对音是 Kabūdhanjakath，即曹国，都城故址在那密水北，距撒马尔罕 2 法尔萨赫，今名 Gubdan 村。^[117]可是，据《新唐书》，唐代曹国（即西曹）的国治是瑟底痕城。如果玄奘所称劫布咀那国即“唐言曹国”不虚，那么劫布咀那国治并不是劫布咀那（城），而是瑟底痕城。据《隋书》说，曹国都城在那密水之南。章巽所考定曹国都城 Gubdan 在那密水北，这与《隋书》所记不符。除非《大唐西域记》所称劫布咀那即“唐言曹国”有误，否则章先生之考定有缺陷。

《隋书·曹国传》称：曹国方位在“那密水南。……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千六百里。”^[118]《隋书》所记曹国当位于康国之西北，西至何国 150 里，这与玄奘所记之劫布咀那国的方位和道里不一致。而《新唐书·康国传》称：康国西北距西曹百余里，北距中曹五十里。《隋书》所记之曹国，与《新唐书》所记西曹，其方位基本一致；玄奘所记之劫布咀那与《新唐书》之中曹更接近。但是，玄奘称，劫布咀那西至屈霜你迦国（唐言何国）为三百余里^[119]。这与《新唐书》、《隋书》所记均不一致^[112]。

无论劫布咀那的对音为何，该地与东曹（率都沙那^[121]）不是同一地方，这是可以肯定的。劫布咀那国应即西曹，国治在撒马尔罕西北的伊什特汗；东曹在撒马尔罕以东。东曹、西曹之称谓，大体上是以飒秣建为基点来区别的。看来，《新唐书》编撰者没有注意玄奘对劫布咀那与苏对沙那的区分，而把两地相混淆了^[122]。考虑到撒马尔罕以东不远的地方另有一个 Banjikath，此地名极易与苏对沙那首府 Būnjikath (Banjakath) 相混淆，《新唐

书》很可能误把东曹等同于 Banjikath, 并进一步把 Banjikath 与 Būnjikath 相混淆了。

《新唐书》的另一个错误, 就是把东曹视作汉贰师城地。苏对沙那并非汉代贰师城。据岑仲勉考定, 汉代贰师城当在今 Dsizak^[123]。吉扎克 (Dsizak, 或 Jizak) 位于撒马尔罕至乌拉秋别的中间, 西距撒马尔罕 102 公里, 东南至乌拉秋别 132 公里^[124]。常征则认为, 汉代贰师城乃大宛王城, 即吉尔吉斯奥什城^[125]。

东曹与曹国的区别, 《册府元龟》和《唐会要》也未加注意。《册府元龟》卷 170〈帝王部·来远〉记: 武德“七年七月, 康国、曹国并遣使来朝。……曹国使者曰: ‘臣本国以臣为健儿, 闻秦王神武, 愿在麾下。’高祖大悦, 因厚遇之。”此记与《新唐书·东曹传》所记应是同一事件。《册府元龟》卷 973 记: 天宝十三载闰十一月, “东曹国王设阿及安国副王野解及诸胡九国王并遣上表, 请同心击黑衣, 辞甚切至。”同书卷 971 则记: 天宝十四载三月, “康国副王、火寻国王稍芬、曹国王设阿忽并遣使朝贡。”^[126]设阿忽显然就是设阿。但是, “东曹国王”被径记为“曹国王”了。《唐会要》卷 98〈曹国〉则把东曹视为“曹国”: “曹国居埋那密水南, 古康居之地。俗与康国同。……又有中曹国, 在西曹国之东, 康国之北。其所治谓之迦布底真城, 在平川。……又有西曹国, 治那密水南瑟底痕城, 东南去康国一百里, 西北至何国二百里, 南与史国界接, 北与波览国接。……”^[127]埋那密水, 即那密水, “埋”应是衍文。按: 曹国 (西曹) 无论如何不会位于“东南去康国一百里, 西北至何国二百里”这样的方位。由于观念上的错讹, 《唐会要》卷 98 把曹国 (西曹)、东曹记事混记“曹国”条下: “武德七年七月, (曹国) 朝贡使至, 云: ‘本国以臣为健儿, 闻秦王神武, 愿在麾下。’高祖大悦。……天宝元年, 其王哥逻仆罗使献方物。三载, 诏封其

王为怀德王。四载，哥逻仆罗上表……十一载，其王设阿忽与（安）国副王野解及九国王并上表，请同心击黑衣大食，玄宗宴赐慰谕遣之。”武德七年（624年）、天宝十一载（应是十三载）记事，应归于东曹，余为西曹之事。

3. 关于东曹、西曹的道里

东曹至周边国家道里，《新唐书》所记多数与实际道里接近。这在《新唐书》所记中亚诸国道里中是少见的。

俱战提，即今苦盏（忽毡），位于乌拉秋别东北62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古达玛均称，苏对沙那东至俱战提为17法尔萨赫，约合106公里^[128]。他们所记道里走向，要绕道扎敏附近的萨巴特，多走7法尔萨赫（约合43.7公里）。《新唐书》称，苏对沙那“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200唐里合88公里，与今日里程相差约26公里。这可能是唐代里程较为迂曲之故。《新唐书》所记这两地方位大体正确。

石国，即今塔什干，位于乌拉秋别正北方，公元605~750年，石国宫廷所在地为今塔什干市中心东南方15公里处的阿克·特帕（Ak-Tepa）遗址^[129]。乌拉秋别至塔什干里程，今日约160公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为34法尔萨赫，约合210公里^[130]；《新唐书》记为400（唐）里，约合176公里，与今日实际里程大体吻合。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道路走向是从撒马尔罕出发，苏对沙那至赭时（Shāsh，即石国）要绕道萨巴特、扎敏，里程多走9法尔萨赫左右（56公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称，赭时（石）国西千余里至窣堵利瑟那国^[131]。此记显误。窣堵利瑟那位于石国之南，而非之西；两地之距约为400唐里，而不是千余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可能也把窣堵利瑟那误为曹国（西曹）了。

苏对沙那至撒马尔罕，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称有26法尔萨赫，约合162公里^[132]；《新唐书》记有400里（约合176公

里)。两者所记基本相符。

宁远，即拔汗那，或曰钹汗，即 Akhsikath 古城，在浩罕东北约 60 公里处，西距俱战提约 170 公里，距乌拉秋别约 232 公里。《新唐书》称，苏对沙那东北至宁远 400 里许（176 公里），比实际里程（232 公里）少了 56 公里。

《新唐书·吐火罗传》称：“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靺货罗，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显庆中，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133]。显然，唐人视阿缓城为吐火罗的政治中心。苏对沙那“南至吐火罗 500 里”，似指苏对沙那至阿缓城的距离。阿缓城（Warwaliz），《旧唐书·地理志》作遏换城，并称该城为吐火罗国治所在^[134]，地当今阿富汗东北之昆都士^[135]。乌拉秋别到昆都士，至少也有 400 公里。《新唐书》所记显然太少。吐火罗国北境在著名的铁门关。玄奘说：“出铁门至靺货罗国故地”^[136]。铁门，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州的达尔本脱（Derbent）西约 13 公里处^[137]，至今仍为穿越拜孙套山脉的唯一孔道。铁门距撒马尔罕里程，玄奘称有 800 余里^[138]；两地实际里程 240 公里左右（途经史国）。因此，《新唐书》所记苏对沙那至吐火罗里程肯定有误。

五、石国

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部也。去京师九千里。东北距西突厥，西北波腊，南二百里所抵俱战提，西南五百里康也。圆千余里，右涯素叶河。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窟匿城地。……隋大业初，西突厥杀其王，以特勒匐职统其国。武德、贞观间，数献方物。显庆三

年，以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瞰土屯摄舍提於屈昭穆都督。开元初，封其君莫贺咄吐屯，有功，为石国王。二十八年，又册顺义王。明年，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言：“今突厥已属天可汗，惟大食为诸国患，请讨之。”天子不许。天宝初，封王子那俱车鼻施为怀化王，赐铁券。久之，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勅其无蕃臣礼，请讨之。……石东南千余里，有怖捍者……西千里距堵利瑟那……

1. 几个名称的考释

柘支、柘折、赭时三名，粟特语作 C'c，乃波斯语 Chach (Chāch)、Chāj 或 Jaj、阿拉伯语 Shash 之音译，意为“石”^[139]。公元 8~9 世纪，Chaj 这一名称常出现在阿拉伯、波斯史料文献中。阿尔·比鲁尼 (973~1048 年) 说：Chaj 一名是借自这座城市的突厥语名称，也就是塔什干城，意即石头城^[140]。11 世纪 70 年代，维吾尔族学者马合木德·喀什噶里在其《突厥语大词典》(抄本第 1 卷，413, 577 页) 说：塔什干，在阿拉伯文献中称 Xax，在塔吉克—波斯文献里作 Qaq，突厥语文献则写作 Tarkend；Tarkend 意为“附属的”，“可汗统治者把隶属于他们的省称做 Tarkend”。^[141]石国位于锡尔河支流齐尔齐克河冲积形成的绿洲上。公元 605~750 年，石国宫廷所在地为今塔什干市中心东南方 15 公里处的阿克·特帕 (Ak-Tepa) 遗址；750 年~12 世纪上半叶，石国政治中心迁至今塔什干市中心的宾卡特 (Binkath) 遗址所在地^[142]。

瞰 (Kàn) 羯城，有学者将其对音为 Binkatn^[143]。但是，Binkath (n) 要晚至 8 世纪中叶才成为石国政治中心；而且，该词很难与“瞰羯”审音勘同。所以，瞰 (Kàn) 羯城对音似是 Qaq。

窳 (yù) 匿城，原为汉代康居五小王之一的窳匿王所治，

《汉书·西域传》记为麻城。该城位于康居组成部分的乐越匿地区，后者即今塔什干地区。^[144]

素叶河，《释迦方志》同，《大唐西域记》作叶河。素叶河的方位，上引二书均称在赭时（石）之西邻；《新唐书》称石国右涯素叶河。“右”为北方南视之右，即西方。阿拉伯人、波斯人记东部地区方位，则以东望定左右，以右为南。《隋书·石国传》、《北史·石国传》并记：“石国，居于药杀水”。杜环《经行记》则称：石“国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质河，并西北流。”^[145]真珠河，即药杀水^[146]；质河，应即赭时河。

素叶河之对音，沙畹认定为 Tchou，并把此河与药杀水（Yaxartes，中古波斯语作 Jaxðarta，即锡尔河）相区别，认为此处素叶河误也，应为药杀水^[147]。但是，Tchou 之对音应是楚河。沙畹之说有误。季羨林等先生则把素叶河直接勘定为锡尔河^[148]。考虑到玄奘曾亲临石国，以及上引各书均记作素叶河（叶河），素叶河之称必是有所据。唐人不大可能把楚河与锡尔河相混淆。《世界境域志》把流经赭时（Châch）边界的河称作 Parak 河，并称该河汇入赭时河；大食人（Tâziyân）把赭时河称为 Sayhûn 河^[149]。Parak 河，今名 Chirchik 河。杜环所称之真珠河，似指 Parak 河。“素叶”，古读 sou - iäp，我们很难在上述诸河河名中找到其对音。

2. 关于大宛都督府设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资治通鉴》卷 200 记：显庆四年（659 年）“九月，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怛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百二十七。”^[150]《新唐书·康国传》“石国”条、《唐会要》卷 99 “石国”条则把唐朝在石国瞰羯城置大宛都督府的年代系于显庆三年（658 年）^[151]。

那么，大宛都督府究竟置于何年？

大宛都督府的设立，与唐朝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有关。《旧

《唐书·高宗本纪》记：显庆三年二月，唐将苏定方攻破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贺鲁，贺鲁败走石国，唐军副将萧嗣业追擒之；三月，西域平，唐朝以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复于龟兹国置安西都护府^[152]。同书《突厥传下》述：显庆二年，苏定方率萧嗣业等征讨（阿史那）贺鲁；几经征战，贺鲁败遁石国；萧嗣业追至，石国（突厥统治者）鼠麴设把被石国苏咄城（即 Shoturkath 城，距塔什干 5 法尔萨赫^[153]）城主伊涅达于拘执的贺鲁交给萧嗣业；贺鲁被送往长安；唐朝分贺鲁种落“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其所役属诸国，皆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154]。《旧唐书·地理志三》也称：“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平贺鲁，分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分其种落，列置州县。于是，西尽波斯国，皆隶安西都护府。”^[155]

《册府元龟》卷 967〈外臣部·继袭二〉称：“显庆二年既平贺鲁，三年诏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乃册阿史那弥射为兴昔可汗兼崑陵都护，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兼濛池都护。”^[156]同书卷 986〈外臣部·征讨五〉记：显庆二年“十二月，苏定方大破贺鲁金牙山，尽收其所居之地，西域悉平。……定方于是悉兵，命诸部归其所居，开道路，列置馆驿，埋瘞骸骨，所在问疾苦，分其疆界，复其产业，贺鲁所虏掠者悉括还之。于是，西域诸国安堵如故。”^[157]又，《唐会要》卷 73 记：显庆二年十一月，苏定方大破贺鲁于金牙山，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西域诸国，安堵如故，擒贺鲁以归。十一月，分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其月十七日，又分其种落，列置州县。……其所役属诸胡国，皆置州府，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同书卷 99 记：显庆三年，以石国噉（瞰）羯城为大宛都督府^[158]。此记把二都护府和诸州府县置立时间记为同年同月。石国为阿史那贺鲁所役属诸胡国，大宛都督府置立时间应在十一月十七日。但是，此十一月是在平定贺鲁之乱的显庆二年，还是在

擒贺鲁以归的显庆三年呢？

《资治通鉴》卷 200 称：显庆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乙卯朔，乙丑日），分西突厥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遣光禄卿卢承庆持节册命，仍命（阿史那）弥射、步真与承庆据诸姓降者，准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次年十一月，萧嗣业押贺鲁至京师长安，“甲午，献于昭陵。赦免其死，分其种落为六都督府，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159]。可见，崑陵、濛池都护府应置于显庆二年十二月^[160]；唐朝并未同时在贺鲁种落（五咄陆部）之地置都督府；六都督府应置于显庆三年十一月。《册府元龟》所记濛池、崑陵二都护府诏置时间（显庆三年），《旧唐书·高宗本纪》所记两都护府置立时间（显庆三年二月），可能是高宗正式下诏置立时间。《旧唐书·地理志》所记有误。

《新唐书·地理志七下》“濛池都护府”条记：“显庆二年禽贺鲁，分其地，置都护府二、都督府八，其役属诸胡皆为州。”^[161]此记有三点疑问。其一，唐朝在贺鲁旧地（五咄陆部之地）置都督府数，《唐会要》卷 73、《资治通鉴》卷 200 均作六个，并详列了其称名^[162]；其二，显庆二年，唐朝并未在贺鲁旧地置都督府。因为，《资治通鉴》卷 200 明确记述册命使卢承庆仅册封刺史以下官。第三，两都护府的隶属，《旧唐书》和唐乾陵石人像衔名并称归安西都护府统辖。从唐乾陵石人像衔名看，濛池都护府属下有千泉都督府、俱兰都督府、颉利都督府（以西突厥拔塞干部置）、碎叶州等^[163]；石国不归属濛池都护府统辖，而与康、吐火罗、波斯等一道，属安西都护府统辖^[164]。

《新唐书·艺文志二》著录《西域图志》60 卷，注云：“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诏史官撰次，许敬宗领之，显庆三年上。”^[165]同年，高宗派遣果毅董寄生将康王所居城列为康居都督府，以康王拂呼缦为都督。^[166]高宗

遣使康国等地，应在贺鲁被擒之后；而董寄生西行，估计是在高宗御览《西域图志》之后。如果大宛都督府置于显庆三年（658年），那极可能是董寄生西行时所置。所以，唐乾陵石人像才会把石国与康国、吐火罗同列。千泉、俱兰、颉利三都督府及碎叶州属于贺鲁种落之地，应是与大宛都督府同置于显庆三年。它们大概属于在贺鲁“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之列。所谓“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肯定是指显庆三年董寄生置府州之后之情形。但令人不解的是，高宗显庆四年下诏，仅有石国，而没有康国；似乎石国置于康国之后。而且，《新唐书·地理志》在著录龙朔元年（661年）“于阗以西，波斯以东”的羁縻府州时，未列昭武九姓诸羁縻府州。

所以，《册府元龟》卷966〈外臣部·继袭一〉明确记载，“石国，唐显庆三年列其地为大宛府，以其王瞰吐屯摄舍提於屈昭穆为都督。”

从唐乾陵石人像衔名看，石国不归属濠池都护府统辖，而与康、吐火罗、波斯等一道，属安西都护府统辖^[167]。从地域上看，濠池都护府比安西都护府更靠近大宛都督府（石国）。可是，唐朝却绕过濠池都护府，而让安西都护府统辖大宛都督府。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濠池都护为突厥人（首任濠池都护是阿史那步真；686年，其子阿史那斛瑟罗袭父职爵^[168]）。濠池都护府所辖基本上是在碎叶以西的西突厥五弩失毕部落之地。唐在河中地区设置羁縻府州时，不可能把它们完全交由西突厥人统治；它们只能由唐中央政府直属的西域最高机构安西都护府统辖。唐朝在石国置都督府，反映了石国在唐朝的西域统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在河中地区，唐朝仅设置了康居都督府、大宛都督府和休循州都督府。

3. 关于石国诸王

据《新唐书·石国传》所记，大业初年统领石国的是“特勒